

國家圖書館



004506757



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

# 傳播與政治行為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4

主編—張茂桂 羅文輝 徐火炎







# 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

## 傳播與政治行為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 4

主編—張茂桂 羅文輝 徐火炎



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3.7



540.933  
8744

# 目次

序言	i
導讀	v
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	
1 民衆媒介使用動機與行爲之變遷研究	1
王嵩音	
2 告知與動員：新聞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35
陳憶寧	
3 報紙與電視可信度：1993、1998 和 2003 年的比較研究	65
羅文輝	
4 狂飆的年代？一般民衆的認同趨勢，1992-2005	93
吳乃德	
5 誰是泛藍、泛綠認同者？台灣民衆政黨認同的實證分析	129
吳重禮	
6 民衆政治「兩極化」現象初探：「中間」的變動與啓示	175
張茂桂、陳俐靜	
7 政治容忍的穩定與變遷	241
黃秀端	
8 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的變遷：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	283
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	
9 總統大選投票意向調查中不表態的社會距離效應	329
杜素豪、洪永泰	
附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演變(1985-2011)	371
作者簡介	405

國家圖書館



004506757



## 序 言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計畫從 1984 年和 1985 年開始第一次的調查，到 2011 年時已經進行超過 25 年了。這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長期補助的研究計畫，在早期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到現在的社會學研究所同仁，都努力推動此一計畫，並得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2003 年之前為調查研究工作室）的協助。國科會在 2009 年屆滿五十週年時，特別從五十年來所補助的計畫中挑選出對民生與社會有深遠影響和貢獻的五十項重大研究成果，以專書《閃亮 50 科研路：50 科學成就》（國科會 2010）介紹給全民，「變遷調查」獲選為人文社會科學類八項重大計畫之一。承蒙學界同仁的支持與參與，讓「變遷調查」順利推展，所累積的資料檔已經是國內社會科學界仰賴的重要素材（有關計畫的推動、演變與成果概述，參見書後附錄）。

在 2005 年五期一次計畫問卷資料公開釋出之後，提供了間隔五年五個時點的豐富分析資料，很多參與計畫的同仁都覺得有必要舉行規模較大而且可以有系統地討論二十年來社會變遷的研討會，並期望會後編輯專書。於是，社會學研究所在 2007 年初組成了台灣社會變遷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決定在 2007 年 12 月 21 日至 22 日及 2008 年 3 月 28 日至 29 日兩個階段舉行會議。在第一階段會議的第一天早晨安排了「回顧座談會」，以第一期計畫的參與學者和歷次計畫問卷小組召集人為核心，對這樣一個建立長期間卷資料檔並公開釋出的研究計畫，討論其意義、限制和將來的走向。

在「回顧座談會」之前，籌備委員會特別致贈紀念品給三位「變遷調查」的催生者與推動者：楊國樞院士、葉啟政教授和瞿海源教授。葉啟政教授是當時國科會人文處的研究員，負責社會學門研究的規劃

與推動，楊國樞院士與瞿海源教授則負起第一次調查的重任，瞿海源教授更在第二期計畫開始，奠定了五年的調查週期與運作模式。在最初籌劃時，尚有李亦園院士、文崇一教授與當時國科會人文處的華嚴處長參與，正式計畫的推動與執行還包括李麗雪、林憲、胡佛、徐佳士、袁頌西、張春興、黃光國與陳寬政等教授。我們三人在二期一次以後都參與計畫，並分別擔任過共同主持人和主持人，在此謹代表台灣社會科學界，感謝社會科學界前輩們的努力，為「變遷調查」奠基。

自 1995 年以後，除了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之外，亦仰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下的「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及其前身「調查研究工作室」推動調查訪問。我們必須感謝這兩個研究單位歷任學術主管、行政人員以及研究助理提供「變遷調查」的協助。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變遷調查」已經成為全世界蒐集到最多成功訪問樣本、規模最大的一系列社會調查計畫。我們衷心感謝歷年來接受訪問的十多萬名民衆，有了他／她們的合作，台灣社會科學界才能成就這項重要的集體成果。

「變遷調查」曾於 1987 年 8 月 28 日至 30 日以及 1996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舉辦第一次和第二次研討會，會後分別出版專書。自 1999 年開始，每年舉辦小型專題研討會，會議後由作者們各自投稿。規劃此次（第十一次）研討會時，比照第一次和第二次研討會的規模，也預訂於會後出版專書。與前兩次會議不同的是，因為「變遷調查」已經有四個或五個時點的問卷題組可資分析，因此這次會議以至少運用兩個以上時點的資料分析為論文撰寫的基本原則。我們擔任這次研討會的籌備委員會執行小組，與其他委員們分別規劃兩階段的主題。第一階段包括方法議題（洪永泰、杜素豪規劃），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謝雨生規劃），心理、價值與人際關係（朱瑞玲、張荳雲規劃）以及宗教與術數（瞿海源規劃）；第二階段的主題為家庭（伊慶春、章英華規劃），大眾傳播（羅文輝規劃），政治行為與國家認同（張茂

桂、徐火炎規劃)以及勞動市場(張晉芬規劃)。

兩階段的會議，共發表 42 篇論文，參與的作者與評論人超過百人。會後組成專書編輯委員會，仍由我們三人組成執行小組，編輯委員還包括瞿海源、朱瑞玲、伊慶春、謝雨生、張晉芬、張茂桂、羅文輝與徐火炎。會後的論文修訂稿，都送兩位匿名評審審查。原希望各主題自成一冊，但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最後分成四冊。家庭主題的論文單獨成冊，心理、價值與宗教合為一冊，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勞動市場合為一冊，政治行為與國家認同、大眾傳播合為一冊。經審查與編輯後因各種原因，只收錄 29 篇，其中兩篇已先於學術期刊發表。之後又再加入三篇論文：一篇是在研討會之後所邀約，另外兩篇已發表於學術期刊，因為契合此次專書宗旨與主題而收錄。最後共收錄 32 篇論文。第一冊「家庭與婚姻」與第二冊「心理、價值與宗教」於 2012 年 5 月出版，第三冊「社會階層與勞動市場」於 9 月出版，第四冊「傳播與政治行為」將於 2013 年 7 月出版。在審查與修訂往來過程中，無法適當掌握進度，以致在研討會結束四年之後，專書才能陸續出版，我們為編輯時程過長深感抱歉。

完成四冊專書，首先要歸功於各位作者、各階段的評審人熱心參與。國科會人文處、民族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歷任主管的大力支持和行政同仁的熱心協助，都是此一計畫與專書編輯順利推動的重要後盾。「變遷調查」助理陳秋玲、嚴敬雯、湯尹珊小姐全力協助研討會事宜，陳秋玲小姐隨後處理專書論文審查事務，社會所專業編輯謝麗玲小姐在文字編輯與成書的細心與辛勞，我們也都銘感在心。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專書編輯委員會  
執行小組

章英華、傅仰止、張苙雲

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3/5/31





## 導 讀

本書共收錄九篇論文，分別由十三位作者撰述。九篇論文都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資料為最主要的分析對象；其中八篇發表於2008年3月「台灣的社會變遷1995-2005：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十一次研討會」，另有一篇因主題相關，後由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納入。

除「變遷調查」之外，有些文章尚且補充使用了其他相關調查資料庫，共同提供我們此一時間有關「民意」的多重側寫及變遷。本書可分為(1)媒介生態、資訊與政治，(2)政黨支持與認同，(3)政治兩極化與公民社會等三大主題、八篇論文，以及一篇關於當面訪問的研究法論文。八篇文章分屬大眾傳播、政治學以及社會學領域；作者們雖來自不同學科，各有關照重點，但都以1990年中期至2000年中期為時間軸，探究在此期間內重要且相互關聯的台灣社會變遷議題。上述時期，正值由威權統治體制蛻變，經歷「威權轉化」以及「民主鞏固」階段，民族主義與族群政治、多元文化興起，台灣社會除經歷了各種公民行動、言論自由以及媒體產業市場的劇烈重組之外，並和2000年的「政黨輪替」有直接的關係。

觀察當代社會的基本組成原理與改變，不論其尺度大小，從全球到地方社區，亦不論其涉及的面向是政治、經濟、文化等鉅觀整體現象，抑或涉及微觀的人際互動，均依賴訊息、符碼的策略性運用與其在各層級社會組織的建構效果。以本書所涉及的後解嚴、民主鞏固時期為例，初期的資訊開放、媒介民主化是重要的一件民主改造工程。而關於媒介的公共性、市場壟斷的爭議，又構成影響民主政治是否能持續發展的關鍵。本書的三項主題，分別觸及媒體生態、認同變遷、政黨、政治兩極化、容忍度、公民社會參與，可說互為表裡、彼此烘

托，提供我們多角度的視野與社會圖像。

## 媒介生態、資訊與政治

關於此一主題，包括以下三篇論文；〈民衆媒介使用動機與行為之變遷研究〉由王嵩音撰述，〈告知與動員：新聞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由陳憶寧撰述，以及〈報紙與電視新聞可信度：1993、1998 和 2003 年的比較〉由羅文輝撰述。三篇論文分別都使用了 1993、1998、2003「變遷調查」中的大眾傳播組資料，共同標記出此一時期的重大傳播媒介變化；例如：開放報禁（1988 年），《自由時報》崛起（1990 年初），「第四台」興起及有線電視合法化（約 1994 年），《壹週刊》（2001 年）與《蘋果日報》（2003 年）來台發行並掀起新一波的媒介競爭等重要事件，進而透過調查資料來研究這些變化。

王嵩音的研究從閱聽人的角度出發，借用了「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觀點研究民衆使用各式傳播媒介的動機與行為變遷，進而探討這種變遷是否受到媒介生態改變的影響。王文發現，因為頻道開放、產業自由化的變遷，特別是有線電視的崛起，造成民衆使用電視的頻率逐年上升，電視取代報紙、雜誌成為台灣最普及的媒介。而各類媒介因為受到市場競爭壓力，特別是《蘋果日報》來台發行，衝擊民衆的閱聽行為，突顯了娛樂資訊效益的現象，連帶影響到一般大眾對傳統媒介的使用。而在此同時，網路媒介開始普及，不論是電視、報紙或雜誌等的使用時間受到網路使用時間的競爭，出現了所謂「時間替代」效果。王文在結論中並憂慮媒體的集中化趨勢、資訊內容的娛樂化，恐將降低人民對於公共議題的關心、出現「政治效能」低落的情形。

關於傳播媒介與政治效能的相關研究，可以從陳憶寧的論文中獲得進一步討論。這篇論文主要探討民衆使用新聞媒介的頻率等因素，是否對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發生影響。此為媒體與政治的重要研究議

題，因為不論社會科學界、政治實務界，向來都假定資訊是影響政治行為與態度的重要因素，資訊的競爭與掌控，被認為是策略性爭取政治支持，或攻擊競爭者的工具。但閱聽人的不同價值偏好、利益與認同處境、機會結構等，都使得研究者無法對於資訊接收、資訊使用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係，做出簡化的因果結論。陳文藉由 1993 年、2003 年的經驗資料發現，使用媒介的「時間」與「內容」，與「政治知識」變項為正相關、具預測力；但是如果是關於行動或者動員的層次時，則只有「觀看電視新聞時間」此變項才有較大的預測力。簡言之，看電視新聞與閱報，都可以提高政治知識的可能，但對於行為上的動員，電視新聞的預測力明顯優於報紙。同時，陳文也指出，「政黨支持」變項的影響力在十年間有重要的改變，成為預測政治行為、政治知識的有力變項，並進而推論「台灣可能出現了極化的政治」；而關於「極化政治」，本書張茂桂、陳俐靜的論文則有聚焦討論。

呼應前述兩篇研究，羅文輝的論文探究民衆如何評價不同媒體新聞內容的可信程度問題。此研究涵蓋的時間正值媒體形式與版圖劇烈變動，羅文發現，不論根據「相對可信度」抑或「絕對可信度」，電視新聞一度都是台灣地區民衆最信任的新聞媒介。而在三個測量點所構成的趨勢上，作者發現在 1993 年時，主要信息世界仍為黨政軍「三台」以及主流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所主導，調查顯示這屬於可信度最低的時期；在 1998 年時，民衆因為有線電視新聞台以及《自由時報》等更多的選擇，媒介的整體可信度為三次調查中最高的時間點；時至 2003 年（政治上的藍綠對峙成形）則出現媒體過度偏袒特定政治立場問題，以及《蘋果日報》的風格對媒體生態的影響，媒體的可信度又出現下降的情形。羅文進一步驗證了「選擇可信度理論」的假設，他發現台灣民衆對於媒體產品可信度的衡量，受到群衆的政治態度的影響；受訪者支持的政黨和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之間呈現正相關，或者說，閱聽人在接觸新聞資訊時，會依照政黨

傾向進行「選擇性暴露」，並對不同的新聞產品賦予不同的信任程度。本此，羅文於文章最後期勉：「新聞媒介要提高新聞報導的水準與公正性，必須建立新聞部門自治與民主機制，只有在媒介經營者無法干預新聞決策與運作的情形下」，新聞媒體才可能減少政治偏差、公正報導。

## 政黨支持與認同

此一主題共有兩篇論文，分別為〈狂飆的年代？一般民衆的認同趨勢，1992-2005〉由吳乃德撰述，以及〈誰是泛藍、泛綠認同者？台灣民衆政黨認同的實證分析〉由吳重禮撰述。

首先吳乃德的論文參考歷次「變遷調查」以及各項其他民調，累計 1992-2005 間的八次測量，包括 2003、2004 年的持續追蹤研究（「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III、IV」），探討作者認為是當代台灣政治動力的核心，也是最具有社會科學研究潛力的理論課題之一：認同以及新興民族主義的起伏與變化。吳文首先點出新興的台灣民族主義此一議題的重大意涵，對於民族主義理論研究的重要；其次指出台灣認同變化的主要趨勢，以及對於這種認同變化趨勢提出關於「族群」認同的解釋。

關於各種認同變化趨勢，吳乃德的主要發現在：台灣民衆的「台灣人認同」比例確實經歷了快速而持續的成長，而和台灣認同相競爭的「中國人認同」、「中國民族主義」則均持續萎縮；但是和此有關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如此，反而是處於停滯的狀態；本此，吳文繼續鋪陳進入第二個主問題，如何理解這種不一致的問題？新興的「台灣民族主義」為何停滯？民衆心裡到底如何思考或回應政黨或政治人物對於民族主義政治的提倡？作者的答案聚焦在「台灣人認同」背後的「族群」背景（台灣人 vs. 外省人）的差異。作者認為「族群」與「民族」有複雜的變動與影響關係，但兩者最大的區隔在於民族主義

意識具有將族群（或具公民身分者）與政治體（國家）合而為一，追求獨立主權國家的情感與認同，但是族群群體的意識，具有文化、血緣、語言等群體意識，但並不一定具備上述政治行動、價值的意圖。簡言之，不論台灣人（「本省」族群）抑或外省人（1949年前後來台的中國人與其後裔），在過去一段期間都朝向「台灣人認同」一方流動，變遷趨勢可相互比擬，但是台灣人（「族群」）則有更高比例流向「台灣民族主義」，以此取代了原來的「中國認同」，而外省人（「族群」）則以流向「雙重認同」為主，或者說發展出「台灣人認同」的同時，仍保留了「中國人認同」。

吳乃德使用了原創於1993年對於「台灣民族認同」、「中國民族認同」的測量與類型建構，<sup>1</sup>得以持續觀察台灣兩大民族認同的變化趨勢，並指出新興民族認同中的雙重認同以及不穩定特色，是非常值得後續關注與深究的重大理論議題。

吳重禮的論文選擇以台灣民衆的政黨認同變遷，以及相關認同的民衆社經特質的側寫為主要研究課題。吳文將政黨認同定位為「藍、綠兩大陣營」的認同，並將無明顯政黨支持立場者界定為「獨立選民」。從1990至2006年的六次「變遷調查」資料顯示，國民黨認同有從1992年獲得過半民衆認同，呈現明顯下滑的趨勢。作者認為，國民黨認同者並未「外流」到民進黨支持者，而是流向其他，可統稱為「泛藍」，由國民黨分化出來的新黨、親民黨。而民進黨與台聯黨（統稱「泛綠」）也有競合的現象。至於「獨立選民」所占比例的變化也

---

<sup>1</sup> 台灣民族主義類型與中國民族主義類型由兩題交叉所構成，分別為「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你是不是同意台灣應該獨立？」，以及「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發展相當，你是不是同意兩岸應該統一？」。詳見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4: 33-61，以及本書吳文。本書張茂桂、陳俐靜有關兩極化之研究，亦採取了此項類型建構方式。

非常大，特別是從 2004 年之後，作者認為這是「選民對於政黨的認同逐漸鬆動或者對於原先認同政黨失去向心力」所造成。

在分析群眾的屬性的側寫時，吳重禮採取了三項關於泛藍、泛綠、獨立選民的認同分類，除選擇交叉分析外，同時進行模型檢測（多項勝算對數模型分析，以「獨立選民」與「泛藍認同」為勝算比的計算組）。吳文的結論為：相對藍營支持者而言，獨立選民具備了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低、客家（相對於閩南）背景特徵、居住在中部和南部地區、家戶收入較低、政治興趣與效能感較低、對家庭經濟評估悲觀等諸多特質，其勝算是較高的。而在主要的藍、綠勢力的比較中，相對於綠營支持者，藍營支持者的側寫具有年齡較長、籍貫為大陸各省市、對政府施政不滿的特色；綠營支持者則同時具有家戶收入較高，以及自評「家境較差」兩類不同特色群體。但受訪者居住的地區（北、中南），和是否為藍、綠支持者無關。作者同時認為這個研究支持了有關從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理性選擇的理論途徑，對於政黨認同的研究觀點。吳文標題雖然以「藍、綠」支持者為名，但有相當的篇幅在討論「獨立選民」。

## 政治兩極化與公民社會

延續上述，關於政黨競爭下的民衆態度與行為、不同民族主義的競合，讓我們對於台灣「公民社會」有何想像？這構成了本書的第三編主題，分別有〈民衆政治「兩極化」現象初探：「中間」的變動與啓示〉由張茂桂、陳俐靜撰述，〈政治容忍的穩定與變遷〉由黃秀端撰述，以及〈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的變遷：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由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撰述。

張茂桂、陳俐靜的論文以 2000 年以降困擾台灣各界的「政治兩極化」為探究的議題。作者們認為，政黨的兩極化，或者兩大政治勢力間的劇烈競爭，雖然可能有助於提供選民充分的資訊以利選舉時的抉



擇，但也有可能造成公共政策品質低落，甚至國會失能的問題，特別是選民對於政黨的不信任會傷害政治效能感。作者們也假定：自主行動的「公民社會」存在於「政治社會」（政黨與政治菁英）和一般大眾之間，由於民衆不一定會呼應政黨的動員，或者追隨政黨要求「站邊」的壓力，這是「公民社會」得以存在的前提，也主張「公民社會」的存在將構成政黨政治兩極化對民衆的影響的限度。

本文的經驗研究課題由此出發：從 1996 年到 2005 年間，台灣歷經三次總統大選，主要政黨分化導致「藍、綠」對立陣營的成形，高度的政黨政治動員，如何影響一般民衆的基本價值、認同等立場？是隨著政治社會同時分裂，和政黨一起選邊站？還是不會？作者們選了統獨立場、自我定位（認同）、政黨支持等三個觀察指標，<sup>2</sup>並透過六次「變遷調查」的觀察資料，分析民意分布的「中間」比例、以及兩端的變化。所謂兩極化的民意分布的特色，就是中間下降，並朝向兩端增加的分布情形。作者們的結論是：政治社會的兩極分化，確實影響了台灣民衆的基本政治立場，但絕非線性地隨政黨的號角起舞，甚至有可能背道而馳。三項指標中「統獨立場」最能呼應「政治社會」兩極化的改變，受到政治衝突影響，且以 2003 年及以後的資料中益發明顯；而「自我定位」（認同）指標和政治社會兩極化方向呈現相反方向，民衆不但沒有分化，反而呈現「同質化」的趨勢，亦即，朝向「我是台灣人」定位方向發展（如同本書吳乃德論文的發現）。

2 此處使用的三項指標，(1)「統獨立場」，作者們採取了吳乃德提議的民族主義立場建構方法；(2)「自我定位」，作者們根據通用的「自我認同」，或者吳乃德一文中的「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的「族群」認同為觀察對象，稱之為「自我定位」而非「自我認同」或「族群認同」，理由在其文中另有申論；(3)「政黨支持」的「中間立場」指標，這在吳重禮一文中被認為「獨立選民」，二文使用同樣的問題與資料進行分析。唯究竟對政黨支持表示持有「中間立場」，是否即可當成「獨立選民」，端看如何理解「獨立選民」之意義，或仍有可辯論空間。

最後，作者們觀察「政黨支持」的中間選民比例的變動，指出多數民衆的政黨支持態度呈現不穩定、流動的情形，且當競爭中的政黨數目越多，或者立法院鬥爭越激烈時，民衆同時越選擇向中間移動，拒絕選擇支持特定的政黨，所以也不符合兩極化的假設。根據上述發現與論證，作者們認為民衆的價值傾向並不一定隨政黨起舞，顯示民衆潛藏的反思能動力，也間接肯定「公民社會」的存在、不被「政治社會」所吞噬，甚至可能構成政黨政治動員的一種制衡。

與民衆間的「兩極化」可能有關的議題，是黃秀端探究政治民主化後民衆的「容忍度」論文。本文原只能以 1992 年與 1998 年的調查為基準，但作者選擇佐以 2003、2004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的發現。作者參考美國學者 J. Sullivan 等的研究法，首先要求台灣受訪者指出自認為「對我們社會危害最大」的目標團體，然後續問受訪者六項政治公民權利問題，詢問其認為是否應該給予上述主張者這種權利。通過這樣的設計，黃文試圖發現台灣民衆的政治容忍度的變與不變。在關於「對台灣危害最大」的目標團體一項，民衆的態度有明顯改變。原來認為「台灣獨立」危害最大的比例，兩次調查期間從 35% 跌到 17%，有明顯的下降；而認為「主張共產主義」危害最大的比例在兩次調查都是最高，分別達到 39.2% 和 48.2%。

雖然黃文發現民衆對於「主張台灣獨立」有更包容的情形，但讓作者驚訝的是注意到民衆的整體「容忍度」似乎處於下降的情形，蓋台灣民衆並不因為解除戒嚴、民主化而發展更高的「容忍度」。這是什麼原因？是否可歸因於僅僅依賴兩次觀察的資料，所以難以構成有關「趨勢」變遷的研究？或者可歸因於 1990 年中期的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分裂，加以民衆經歷了 1994 年以及 1998 年的激烈立委與省、市長的選舉對立之後，民衆出現相對更加對立（兩極化）的心態？<sup>3</sup> 這些問題一時間還不易釐清；不過當作者借用政黨輪替後，2003 與

3 張茂桂、陳俐靜的文章並無法支持這樣的「兩極化」看法，但兩篇文章難以進行直接的比對。



2004 的 TEDS 資料分析，進而指出民衆對於自己反對的特定主張者，其「容忍度」確實有因為「政黨輪替」而上升的情形。

黃文繼續對於可能影響政治容忍度的人口與社會、政治特質等，進行多變項分析。整體而言，能提高政治容忍度的變項有：高教育程度、高的民主價值觀，以及「喜歡民進黨」的程度；反之，「喜歡國民黨」的程度越高，越不容忍。作者認為，喜歡民進黨的人固然反對其對立者（主張統一的人）主張，但是並不認為應該限制其政治權利；另外一面，喜歡國民黨的人如果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卻認為應該限制後者的政治權利；<sup>4</sup> 而年齡、性別的影響力並不顯著。

如果將張茂桂、陳俐靜與黃秀端的兩組發現進行後設性的閱讀 (meta-reading)，對於台灣民衆的政治立場的分化與變遷，可以得知台灣民衆內部或仍存有極端意見，對於「台灣獨立」、「共產黨」、「兩岸統一」的主張，預期會有「不容忍」的情形，而政治社會也仍有兩極化的問題，但進入二者討論的 2000 年中期，就趨勢上來說，隨民主化的進程，民衆整體呈現了更支持民主體制的態度與傾向。

其次，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三位的文章，以解嚴後民衆的社團參與情形，進行變遷的研究。作者們參考 Robert Putnam 等的「社會資本」觀點，認為社團參與和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有關，是民主社會的穩健發展的重要基礎。過去雖然有些研究曾主張當戒嚴體制轉化成爲民主體制，且結社自由受到保障以後，民衆參與社會運動或者籌組自主社團應有快速增長的趨勢，但如果根據一些已知的變遷調查，

---

4 對於「喜歡國民黨」的人所流露的對台獨較「不容忍」態度，可與黃囁莉(2007)的研究發現比較。黃囁莉利用權威人格與社會支配心理量表，指出主張大中國主義者，相較於主張台灣意識的本土派，前者傾向於「支配性」與「傳統保守」的心理特質，後者傾向於「開放」、「自主」的心理特質。參考黃囁莉(2007)〈M 型政黨 vs. 鐘型意識——台灣國族認同之意識型態及其心理基礎〉，中華心理學刊 49(4): 451-470。

整體而言民衆參與社團的「數目」呈現不增反降的情形，故作者們想進一步瞭解此一問題，並探究為何如此。

熊、張、林選用了 1990 到 2005 年間八次的「變遷調查」資料，就受訪民衆回答「參加了哪些團體？」或相關問題進行研究。作者們的分析方式，是將相關獨立資料合併成一個大的資料檔，根據「多層次的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分析法」(CCREM)，在控制了受訪者的年齡、調查的時期與世代的線性依賴關係後，建構出「時期」與「世代」交叉後的群落，假定其為「脈絡」的隨機效應，進行依變項以及模型的檢測。

作者們的重要發現可作以下的摘要：一、台灣民衆的社團參與數的成長只經歷很短的時間(1990-1992)，自此開始持續下降(1995-2005)。二、當控制了受訪者的年齡之後，發現「時期」的效應，比「世代」的效應更大。也就是說如果不論年齡、世代，越到後期(2005)，民衆參與社團的數目越少。至於「世代」的效果，作者們發現 1956-1965 間出生的世代，參與社團的數目相對為高。

作者們將社團通過類別因素分析法，區分為「情感性社團」以及「工具性社團」，前者以自我滿足為主要目的，如宗親會、同鄉會、社區祭祀團體、宗教團體等等，後者以集體行動、社會工具團體為主，如獅子會、扶輪社、康樂團體、政治團體、職業團體以及校友會等等，因此得以進一步主張兩種不同性質團體的變遷趨勢其實有不同。作者們認為，從 1990 年以來，民衆參與情感性團體的數目變化不大，但參與工具性社團的數目卻不斷下降。作者們最後推論：台灣的民間社會力，穩定地以情感性社團、傳統宗教等制度為主，但構成市民社會的工具性團體、自願結社等，並不如其他討論公民社會的學者所主張是不斷擴張，反而確實有衰退的危機。尤有甚者，這兩種不同屬性團體的變遷趨勢，一有傳統保守性而趨內聚穩定，一有公共性、參與性但卻消退，顯現台灣的市民社會，仍然還沒有發展出多元包容的溝通能

力。<sup>5</sup>

本書第九篇論文為〈總統大選投票意向調查中不表態的社會距離效應〉，由杜素豪、洪永泰撰述。由於「變遷調查」的問卷內容經常有涉及敏感度較高的政治議題，這對訪員及受訪者來說，或多或少都構成壓力，而這篇論文除在研究方法的學術研究貢獻之外，更提醒依賴調查進行政治研究的學者，有關「面訪」時可能出現的不確定因素與對回答的干擾。

作者們利用社會心理學中有關「順從假設」、「自衛機制」等情境互動有關的假說，探究面訪時的「互動」以及其對訪問結果可能形成的干擾問題。作者們從「訪員 vs. 受訪者」兩陌生人之間因為「問卷訪問」而開始進行溝通互動開始討論，探究兩者配對後的「社會距離」，是否對於敏感問題的訪問有所影響。所謂「社會距離」，作者選定了性別、婚姻狀態、教育程度、省籍、階級（白領 vs. 非白領）、政黨支持、統獨立場等不同性質來配對、比較，如果訪員和受訪者兩者間的社會屬性相近，代表無「社會距離」，否則代表有「社會距離」。而所謂敏感問題，作者選擇以2000年、2003年，以及2004年、

---

<sup>5</sup> 首先，作者們在文內使用「市民社會」一詞，而非「公民社會」。其次，作者們認為有公共性的公民團體的參與一直下降，進而認為解嚴後市民社會發展仍無力的悲觀發現，可說是一個判斷的問題。這和本書張茂桂、陳俐靜認為台灣民眾有越來越不被政黨動員的公民社會的潛力的觀點，可對照，但觀點不一。作者們在此的推論有三個重要前提假設：(1) 政黨（政治團體），也可被納入計算為市民社會的「社團」；(2) 參與社團的數目是公民參與的有效指標，可充分代表實際、有意義的公民參與形式和程度；(3) 所謂「情感性團體」與「工具性團體」，前者被視為保守的、內聚的，後者被視為開放、公共的，具有志願性的，這樣的類別區分必須先在經驗上以及理論上被證明為合理的區分。如果上述這三項前提假設同時被挑戰，那麼作者們在此關於市民社會發展的推論，恐還須多加澄清。

2005 年的總統選舉投票意向問題為例，分析三類的「不表態」作答，包括「沒投票」、「不記得」、「不知道」與「拒答」，<sup>6</sup>三者相對於「明確表態」的 logits 為依變項。作者並且控制其他的情境因素，例如：是否有第三人在場、訪問的日期與投票日期的距離、受訪者的政黨認同等因素，進一步瞭解訪員與受訪者配對後所得到的社會距離，是否會影響敏感問題的「不表態」情形。

作者們透過「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HMLM)統計方法，發現訪員與受訪者配對後的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等「社會距離」，對於敏感的投票問題，因為不同的條件、而有影響力；而且這種影響程度，會隨受訪者的回憶時間距離越久而隨之增大。<sup>7</sup>但是影響力的方向，卻因為「不表態」的類型不同而有差異，例如：(1)當兩者的婚姻狀態不一致時，回答「沒投票」的機率會增加；(2)當兩者間性別不同、或訪員年齡較大，「拒答與不記得」的機率會增加；(3)當兩者間教育程度有落差時，較高教育的訪員會導致「不記得」的機率增加，而較低教育的訪員會導致「拒答」的機率增加。此外，有鑑於「省籍」是台灣政治議題中敏感的議題，作者們也特別針對「省籍」配對的影響進行分析，但未能發現有影響力。

## 結語

綜合上述九篇論文的研究成果，我們對於從 1990 年代中至 2005 年間的台灣社會變遷，可以有什麼總結的看法？或可以分成以下兩大部分來看：第一，調查的結果與分析，直接呼應了一些已知的結構、制度或者政治的改變；第二，調查的結果與分析，對於外在變遷，提

6 如果將「沒投票」的回答計算成「不表態」的答項，是否恰當？此點恐仍有爭議空間。

7 至於為何回憶的時間拉長後，社會距離效果會更加顯著？恐仍須進一步研究來回答。

出比表象更深一層的見解。

在第一部分，關於呼應已知的外部變化，包括以下發現：一、民衆對於傳播媒介的使用、信賴，呼應了傳播體系、生態、科技的改變。舉凡開放報禁、第四台合法化、言論自由獲保障、報紙競爭激烈化、電視與網路逐漸取得傳播優勢等媒介變遷，都在民衆的態度與行為上，找到被影響或被改變的證據。二、隨台灣政治民主化、文化本土化的影響，民衆在族群認同上有朝向「台灣人認同」的方向移動的趨勢；三、新興民族主義立場、政黨支持立場，都呼應了選舉競爭、政黨分化、族群背景政治動員等新興民主國家的特色。

在第二部分的發現，讓我們對於民衆的價值態度、行為變遷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例如：一、羅文輝申論民衆的媒體信賴偏好，其實應理解為民衆的政治立場與媒體立場的「認知諧和」過程。二、吳乃德深究為什麼「台灣民族主義」停滯不前？發現這是因為台灣民族主義屬於新興的民族主義特色，面對島內的族群經驗、政治競爭、島外的武力威脅等壓力，出現「雙重認同」與「不穩定」的現象。三、張茂桂、陳俐靜區分台灣政治社會、一般民衆為兩個範疇，進而認為這是在政黨政治的分類動員(*party sorting*)、政治社群矛盾之外，出現討論中間立場、公民社會存在的空間。四、黃秀端發現，統獨政治立場相異者，對於政治對立者的容忍度，呈現差別。五、熊瑞梅等作者認為，民衆參與社會團體，特別是具有公共性、開放性的自願團體的情形，並未能如預期般增加，不如想像中那樣樂觀，是台灣民主的隱憂。

另外，幾乎所有研究都考慮了個人社經背景的作用。如果考慮民衆的社經背景中經常發生影響力的變項，最主要的是教育程度，幾乎在每篇論文的統計模型中都達到顯著的影響作用，而其他變項如族群、年齡（世代）、收入、性別等則不一定有作用，其是否具有影響力必須視議題而定。不過，教育程度雖然相對普遍、最具影響力，但各篇

論文的研究，可能還無法從這個角度進行解釋，為何如此的疑問。教育程度其與閱聽行為、政治態度、基本價值、認同之間的關係為何？教育程度如何可能影響台灣民衆的價值變遷方向？學術研究能提供多少新的理解？預期這是今後台灣社會、學者，仍然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最後，我們歸納本書論文共同特色：一、不論是傳播學者對於閱聽人反應的研究，或者政治學、社會學者對於價值立場的研究，或者是「面訪」的方法學的探究，他們都強調有理論依據的假設與有意義的詮釋。例如：對於民衆的認知假定、理性選擇、價值偏好、認同策略、容忍態度、互動、公民參與的研究等，都立論有所依據；對此，我們若有自我批評空間的話，就必須指出這些「有依據」的理論幾乎全部都立基於美國的制度、選舉研究、互動心理學、民主與市民社會研究等，而且絕大部分在經驗分析的結論形成後，在結論的地方都相對忽略了理論創新的可能（除少數例外），「理論」在此只是拿來借用而不是拿來被檢討，這也可以說是台灣學術研究經常出現的問題吧？！二、作者們在進行資料解讀時，非常注意資料以外的「當時」的脈絡因素，或者說時代氛圍的轉變，是以能賦予各種圖表以及統計微妙意義、深入的詮釋。這種能回到當時的能力，把「時間」帶回(bring time back in)，將數字的變動賦予時間脈絡的詮釋意義，不但是任何「變遷」研究的必要能力，同時提高了文章的說服力以及可讀性，畢竟數字自己不可能會說話。三、作者們幾乎都流露現實感與關懷，以及對於民主社會、民主政治的「應然」想往。這反映在作者們對問題的選擇，例如：媒體的集中問題，新聞的娛樂化問題，電視優勢的問題，媒體失去可信度的問題，藍綠對立、政治兩極化的問題，公民社會的形成與障礙等。因為這些現實關懷，我們無意間觀察到台灣社會科學界，社會變遷研究者的一個普遍特質：注意學術與「公共議題」的關聯，關注「公共性」議題，這實毋庸置疑。四、作者們對於「變遷調查」期望高，也不斷出現改善的建議。例如：杜素豪與洪永泰提

醒依賴調查資料的大家，面訪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困難，並討論訪員與受訪者的互動問題，對於日後如何「改善」面訪結果的研究方法上涵義；陳憶寧、吳乃德、黃秀端分別呼籲問卷题目的設計要能穩定、母體樣本也要求穩定，才能進行有意義的持續觀察。這些建議對於日後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與研究，都積極而有建設性。相對於上述，我們有時候也會注意到有些作者將目前還難以解決的問題，習慣性地歸諸於使用二手資料、問卷設計不佳等問題，這雖可理解但過於消極，不如本書多位研究者實際動手動腦、補充缺漏或嘗試新的統計方式，進一步發揮資料庫潛力，突出研究者所必備的主動創新能力。

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







# 第 1 章

## 民眾媒介使用動機與行為之變遷研究

王嵩音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

誌謝：作者要感謝章英華教授和羅文輝教授提供「社會變遷」調查資料，也要感謝郭貞教授和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

## 摘要

本研究運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分別於1993、1998及2003三年所做的傳播組調查資料，以「使用與滿足」理論為基礎，探討台灣民眾長期以來使用傳播媒介的動機與行為，並分析媒介使用行為的改變是否反映媒介生態的變遷。結果顯示傳統媒介的使用頻率逐漸降低，其中尤其以報紙降低最多，廣播和雜誌的使用頻率亦降低。但是電視的使用頻率卻是逐年升高，而網路的使用也快速發展，反映有線電視和網路的普及情形。另外觀察民眾使用各項傳播媒介內容的變遷情形，也顯示媒介內容與民眾使用行為之間的互動。本研究發現台灣民眾越來越常使用各種傳播媒介的娛樂性內容，反映了傳播媒介在市場導向的經營型態下，需要提供越來越多的娛樂性內容，以吸引閱聽眾。

關鍵詞：媒介使用、使用與滿足理論、媒介生態、時間替代效果、社會變遷調查

## Changing Patterns of Mass Media Use in Taiwan

Song-In Wang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ed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data collected in 1993, 1998, and 2003 to examine changing patterns of mass media use in Taiwan. Several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asked based on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ople use traditional media less frequently, and more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o get needed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more people are accessing entertainment content on mass media.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media use can reflect the changing market structure of the mass media industry.

*Keywords: media us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media structure, time displacement effect,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 一、前言

根據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觀點，任何一種媒介的出現，都會對人類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傳播媒介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及樣貌，台灣自 1977 年解嚴及報禁開放之後，報業市場百家爭鳴，蓬勃發展。1993 年起禁錮了四十年的廣電頻道亦陸續釋出，傳播生態出現前所未有的改變。其後網路媒介逐一興起，加入戰場，使得民衆媒介使用習慣隨之改變。台灣傳播媒介在這十數年間的變遷情況與民衆的使用行為之間的互動，頗值得進行縱貫觀察。

每一種媒體都有其獨特性質，例如廣播的傳遞速度快，是閱聽人最方便與便宜取得的傳播工具；網路的互動性與其強大的資訊提供功能是領先其他媒體；雜誌與報紙都是平面印刷的媒體，自選性高，可以被閱讀、保存和攜帶；而電視則是目前最爲普及的媒體。由於不同的媒體各有所長，也各有偏好它們的使用者，因此沒有那一種媒體被另一種媒體完全取代的問題，只是被使用的頻率有消長變化（劉美琪等 2003）。

媒介使用行為的研究最常以「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理論爲基礎，因爲該理論取向是以接收者的意向爲探討焦點，強調閱聽人的媒介使用和選擇。本研究將以該理論爲基礎，探討台灣民衆長期以來使用傳播媒介的動機與行為。

過往「使用與滿足理論」之相關研究多偏重於橫斷性研究，僅探討在特定時間點閱聽人使用傳播媒介的動機和行為，而縱貫性研究則付之闕如。本研究之價值即爲透過縱貫性資料觀察民衆的傳播媒介使用動機和行為之變遷，並觀察傳播媒介生態變遷所產生之影響。

台灣社會科學相關之縱貫性調查資料庫有「台灣民主化與選舉」、「全國意向調查」等，但都偏向政治面向之觀察。僅有「台灣社會變

遷基本調查計畫」(以下簡稱「變遷調查」)是唯一包括傳播現象相關的資料庫。該調查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處長期支助的抽樣調查研究計畫,自1984年進行以來,已完成23次48份問卷的全台灣抽樣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家庭、教育、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政治文化、選舉行為、傳播、文化價值、宗教等。這個系列社會調查的主要特色是在蒐集兩個以上時間點的同樣問卷資料,以探究台灣社會變遷的各個面向。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就是運用「變遷調查」傳播組資料,探討民衆傳播媒介使用行為的變遷情形。具體研究目的有三:一為從多重面向探討民衆使用各種傳播媒介的行為,包括使用動機、使用頻率、使用時間和使用內容;二為觀察使用行為的變遷情形;三為探討傳播媒介的生態變遷與民衆使用行為之間的互動。

## 二、使用與滿足理論

根據「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觀點,閱聽衆對於傳播媒介具有不同的使用動機和使用型態,而且從中所獲得的滿足也有所差異。Katz等人(1974)揭示以下使用與滿足理論的五個基本假設:

1. 閱聽人是主動的,並且有目的地使用媒介。
2. 在大眾傳播的過程中,端賴閱聽人把媒介的使用和需求的滿足聯繫起來。
3. 傳播媒介所能滿足的需求,只是人類需求的一部分,即使是大眾媒介所能滿足的需求,媒介也得和其他能滿足需求的來源相互競爭。
4. 使用與滿足研究資料的蒐集,多仰賴閱聽人的自我報告。
5. 研究者不應做任何價值判斷,而應由閱聽人以自己的方式來陳述。

因此,「使用與滿足」理論是由閱聽人的角度出發,認為閱聽人

是爲了滿足自身不同的需求而使用各種傳播媒介，這些需求包括了資訊、娛樂、社會接觸等。學者 McQuail (1972)歸納了四個媒介使用的動機，分別是：娛樂消遣(entertainment)、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監督／資訊尋求(surveillance/information)。數十年來國內外相關研究針對各種媒介使用行爲所進行的觀察，雖然可歸納出多樣的動機項目，但皆可歸類在此範圍內。

過去「使用與滿足」理論多應用於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相關研究，且已獲得豐碩的成果。隨著網際網路興起，「使用與滿足」的概念也被應用在研究各種網路媒介。就理論的主要概念「主動性」而言，網路的使用必須具備相當的網路素養與使用技能，才可以進入其傳播的系統中，比起其他傳統媒體，更需要閱聽人的「主動接近」。Morris 與 Ogan (1996)便認爲該理論是傳統研究取向中最適合用來解釋大眾對於新傳播科技的使用動機和選擇。

而網路和傳統媒介在使用動機方面有類似之處，例如監測環境、社交、自我肯定、娛樂等。但是網路所獨有的特色，例如即時性、互動性、超文本等，則會引發閱聽人異於傳統媒體的使用動機。因此，網路與傳統媒體的使用與滿足狀況並不完全相同。人們會主動打開電視收看節目以獲得資訊或達到娛樂的效果。同樣的，人們也可能打開電腦透過各種搜尋機制獲得想要的資訊，或是玩一場線上遊戲而紓解壓力。研究學者認爲不同的媒介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而功能類似的媒介不但可滿足相同的需要，也可以相互取代。譬如網路和電視因其結構類似，所提供的需求滿足也相似，均能滿足娛樂、逃避現實以及社交的需求(Kaye 1998; Ferguson and Perse 2000; Papacharissi and Rubin 2000)。

國內外探討網路使用動機的論文數量已相當豐富。在國外方面，Papacharissi 與 Rubin (2000)提出使用網路的動機可分爲人際互動、打發時間、資訊尋求、便利性、娛樂五大類型。Angleman (2000)發現網

路使用者依使用動機可分為娛樂、社交、自我肯定、打發時間、放鬆、逃避現實和掌控七種類型。Stafford 等人(2004)研究網路的使用動機為：蒐集資訊、學習知識、了解新事物、社交、娛樂。Grace-Farfaglia 等人(2006)研究跨國網站的使用動機包括：資訊尋求、娛樂、監督、人際關係、自我肯定。在國內方面，有針對一般性網路使用動機研究（蕭銘鈞 1998；董潔如 2002；林呈達 2002），也有針對特定網路媒體使用動機的研究，例如電子報（羅美玲 1998）、網路廣播（馮文清 2007）、網路電視（蔡婉晴 2005）等。

歸納文獻資料所獲得的網路使用動機大致可以分類為：(1)工具性動機：可以不受時空限制，隨時查詢或下載所需要的資訊；(2)娛樂性動機：可以滿足娛樂或打發時間的需求；(3)社交性動機：網路擴展人際關係範圍，不僅維繫舊情誼還可結交新朋友。

媒介結構會相當程度地影響閱聽人使用媒介的行為。媒介結構指的是在特定時空中，閱聽人可接觸的媒介管道和媒介內容(McQuail 2000)。因此要探討閱聽人媒介使用的行為和動機，必須要瞭解當時的媒介結構。以下簡述三份「變遷調查」（分別完成於 1993、1998、2003）十年間重要的媒介發展歷程，以作為研究的背景資料。

### 三、傳播媒介生態變遷

#### (一) 報紙

1988 年報禁解除後，報業市場呈完全開放之勢，也呈現欣欣向榮之景，無論是廣告量或發行量皆屢創高峰。雖然百家爭鳴，但在激烈競爭下產生了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寡頭壟斷現象，發行量明顯集中於少數幾家報紙，《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成為二強獨大。其後以財團為背景之《自由時報》，開始積極往全國性報紙發展，在免費贈



閱與高額贈品的營銷策略下，迅速與《聯合報》、《中國時報》二報形成鼎立格局（王天濱 2002）。

1994 年台灣經濟萎縮，報業的廣告收入銳減，1999 年的報業整體廣告營收與 1998 年比較呈現 15% 的負成長（動腦雜誌 2000）。報紙有效廣告量從 2000 年的 187 億元，一路下滑至 2001 年 164 億元，再降至 2002 年 125 億元的最低點，2003 年才開始小幅回升到 151 億元（動腦雜誌 2005）。再加上電子媒介、網路媒介逐一興起，報紙閱讀率逐年下降，導致各報社都面臨沉重的財務壓力。風光一時的官營報紙，如《中央日報》、《台灣日報》等宣布停刊；其他如《台灣新生報》也轉為民營。在晚報市場中，《自立晚報》、《勁報》和《中時晚報》也因財務不濟而吹熄燈號。影劇娛樂類報紙《民生報》和《大成報》也未能倖免（王天濱 2003）。報業面臨嚴峻的考驗。

根據 AC Nielsen 的資料顯示，報紙閱讀率從 1991 年 76.3% 的高峰開始一路下滑，降至 2003 年的 50.2%（陳筱雁 2004）。有線電視與網路爭食廣告大餅，報紙在所有媒體廣告的占有率相對減少。2003 年，香港壹傳媒的《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內容八卦腥膻，大幅採用彩色圖片，加上超低價的營銷策略，很快對三大報的格局產生劇烈衝擊。短短兩年間，《蘋果日報》就在報業市場面臨萎縮之際，首度在 2005 年 AC Nielsen 調查中，閱報率超越原本居冠的《自由時報》。

## （二）雜誌

1987 年戒嚴令解除，台灣雜誌數量一夕之間爆增，1988 年達到 3,922 家，2002 年更創下 8,140 種的高紀錄，不過在激烈的競爭之下，2004 年時僅剩 4,185 種。台灣的雜誌產業逐漸出現集團化和國際化的趨勢，如華尚文化旗下有四種雜誌；牛頓出版系統則擁有《牛頓》、《小牛頓》、《日本文摘》等近十種雜誌。2001 年時，台灣已形成 PC home、財訊、商周、天下、時報周刊、空中英語教室、尖端出版、景



點傳訊、美人志和一手車訊十大雜誌集團。2001年香港和記黃埔先後收購PC home、城邦、商周等集團股權，2002年10月，和記黃埔以城邦文化為旗艦，整合商周、PC home、尖端出版社諸集團，這些出版社旗下的雜誌總發行量達2,800萬份，在台灣平面媒體市場占有率達三成以上（行政院新聞局2002）。另一方面，雜誌閱讀率也逐漸降低，根據AC Nielsen的調查資料顯示，雜誌閱讀率從1991年的40.5%跌到2003年的32.9%（陳筱雁2004）。

### (三) 廣播

電視興起之後，廣播業一度面臨危機，解嚴後政府大量開放頻道，使得廣播業生機再現。1988年底，共有33家廣播電台186個頻道，其中民營20家56頻道、軍公營12家85頻道，外加中廣的45個頻道。在這一時期，一方面軍公營廣播電台仍獨占調頻廣播，占有絕對的優勢；另一方面，各種專業性電台紛紛湧現。1993年1月，新聞局和交通部共同宣布開放頻道，准許民間申請成立廣播電台。電波開放後，電台數快速增加，截至2006年8月止，已有178家有註冊的廣播電台（陳清河2005）。

調頻廣播電台分為大功率、中功率和小功率三類。其中中功率涵蓋範圍有20公里，小功率僅有5公里。由於政府沒有釋出可全台聯播的大功率電台，因此一些中小功率電台走上聯播之路，以擴大影響。知名的民營聯播網如大眾KISS聯播網、飛碟聯播網、台北之音等。不過，中廣在廣播界仍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另外，地下電台也是另一股勢力。地下電台多以賣藥或其他「工商服務」（廣告）為生，部分且具有政治立場。根據AC Nielsen的資料顯示，廣播收聽率從1991年的32.6%降到2003年的28.6%。另根據中華民國統計月報（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公布，從1998年到2003年報紙、雜誌和廣播電台的數量，顯示報紙和雜誌登記的數目有逐年增加，廣播電台則有減少的趨

勢。

#### (四) 電視

早期台灣的三家無線電視台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分別代表了黨、政、軍三股勢力。台視在過去是屬於台灣省政府，中視起初雖是民營媒體，後來國民黨營事業占總股本提高，華視則具有濃厚的軍方色彩。三台的董事長、總經理等職務也淪為國民黨的政治酬庸，成為當時退休軍政要員的好去處（鄭瑞城等 1993）。由於政治干預媒體引發社會不滿，要求黨政軍退出三台與成立公共電視台的呼聲從未停止。1994 年新聞局開放第四家無線電視頻道。其中，蔡同榮所屬之「民間傳播公司」及張俊宏所屬之「全民電通公司」合併成立「民間全民聯合無線電視公司籌備處」，以下簡稱「民視」，向新聞局提出申請。在 1995 年台灣第一家民營無線電視台由民視雀屏中選，建台之初即有綜合台和新聞台兩個頻道。民視成立之初，虧損嚴重，後來首開八點檔播出台語連續劇的先河，收視才超過老三台，財政收支也轉為盈餘（何貽謀 2002）。

1984 年第一個公共電視節目「大家來讀三字經」在台視播出。之後製播小組納入財團法人廣電基金，易名為「公共電視節目製播組」，徵用老三台每週一到週五晚間 9 時至 9 時 30 分等聯播時段播出公共電視節目，每週共播出 15 小時，但收視的成效不彰。直到 1997 年 5 月 31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共電視法〉，1997 年 7 月 1 日公視正式開播，台灣第一個公共媒體才真正誕生。

有線電視媒體在台灣俗稱「第四台」，意指無線老三台之外的電視媒體。第四台出現的原因是由於台灣地形多山，電視訊號受到山巒阻隔，導致部分低窪地區收視品質不良。因此在部分地區，民間自行搭天線來傳送電視訊號。早期政府並未開放合法經營第四台，因此當 1969 年第四台首次出現，是處於地下經營的狀態。由於取締成效不

彰，第四台逐漸在民間開枝散葉，蓬勃發展，行政院終於在 1983 年成立「建立有線電視系統工作小組」，參考各國經驗進行規畫，最後在 1993 年 8 月 11 日，由新聞局發布〈有線電視法〉規範運作，並於同年 11 月開放第四台登記為過渡性質的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當時共有 610 家取得臨時登記證。之後新聞局將有線電視經營區域劃分為 51 區，每區至多存在 5 家業者，迫使第四台系統業者進行整合淘汰，1994 年 10 月 1 日正式受理有線電視系統申設登記時，只剩 209 件申請案。幾經審核，直到 2001 年年底，共計有 66 家有線電視業者正式營運（王天濱 2002）。

〈有線電視法〉通過後，ESPN 搶先登陸台灣，之後 CNN 等外國頻道紛紛登台。而各企業紛紛成立衛星電視公司，提供電視節目給有線電視頻道業者播放。有線電視頻道數量直線上漲。截至 2002 年 12 月底止，取得營運許可並已開播的系統經營者共有 64 家，向新聞局申報的收視訂戶數將近四百萬戶，僅占全國收視戶的 57.35%，但其他民間調查數據則顯示，連同私接戶計算，有線電視普及率至少在 80% 以上，居世界各國之冠（新聞局 2003）。根據 AC Nielsen 的資料顯示，電視收視率是從 1991 年的 85.9% 上升到 2003 年的 96.1%（陳筱雁 2004）。

## （五）網路

台灣網際網路發展始於 1994 年，第一家 ISP 業者—新絲路開始提供撥接上網，半年後中華電信 Hinet 撥接服務以及資策會 SEEDNet 種子網路兩大國營業者帶動下，網際網路高速發展。而入口網站中發展初期的蕃薯藤(Yam)曾經風靡一時，但之後奇摩站(Kimo)與網路家庭(PC home)競爭不下。依據資策會資料，台灣上網普及率從 1996 年的 3%，1997 年 8%，到 1998 年 14%，一路快速成長至 1999 年 22%，2000 年的 28%，2001 年的 35%，2002 年的 38%，2003 年的 57%。而上網人

數亦從 1996 年的 60 萬，1997 年 166 萬，快速成長至 1998 年的 301 萬，1999 年的 480 萬，2000 年 626 萬，2001 年 782 萬，2002 年的 859 萬，2003 年首次突破一千萬人次達 1,175 萬上網人口（資策會 2012）。

## 四、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焦點著重於媒介使用動機與行為的變遷情形。有別於多數研究僅能觀察特定時間的媒介使用行為，本研究將研究時間範圍擴大為十年，並分別在三個時間點做觀察。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可以完整地描述台灣民衆在不同時間點使用各種傳播媒介的動機、行為和內容。也因為使用縱貫性資料得以觀察媒介生態變遷與使用行為之互動情形。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問題如下：

1. 在不同時期，各項傳播媒介的使用行為有何變遷情形？
2. 在不同時期，各項傳播媒介的使用動機有何變遷情形？
3. 在不同時期，各項傳播媒介的使用內容有何變遷情形？
4. 民衆之媒介使用行為的變遷情形是否反映媒介生態的變遷？

## 五、研究方法

### (一) 樣本

本研究運用「變遷調查」於 1993、1998 及 2003 三年所做的傳播組資料分析台灣民衆媒介使用動機與行為之變遷情況。該計畫抽樣方式是以台灣地區年滿十八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為研究母體，並以台灣地區戶籍資料檔為抽樣名冊(sampling frame)，利用分層等機率三階段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抽出受訪對象。實際抽

樣執行程序，首先，利用羅啓宏先生所撰著之〈台灣省鄉鎮發展類型之研究〉，依據人口特性、商業發展、公共設施、財政狀況、地理環境等相關指標，將各鄉鎮分為七層，再加上台北市、高雄市、省轄市各為一層，共計十層。在抽樣時，先計算各分層所有鄉鎮之人口數，依人口數比例分配各分層欲抽出之人數，並在各分層中依人口數多寡抽取一定數目的鄉鎮市區；其後，在每一鄉鎮市區中，再依人口數多寡依照等距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有系統地抽取一定數目的村里；最後，在前述中選村里中再同樣依等距抽樣法抽取一定數目的受訪個案。1993年的樣本數為1,946，1998年為1,920，2003年為2,161，其中包括網路使用人口樣本數1,026。另經樣本與母體之代表性檢定，顯示此樣本無論在性別和年齡層之比例均與母體無異。

## (二) 媒介使用動機與行為測量

在測量傳播媒介使用動機方面，1993及1998年的「變遷調查」是以一個封閉式問題詢問受訪者使用各種傳播媒介（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的原因。回答題項包括尋求快樂排遣時間、獲取新知、與他人分享苦樂、與他人交換消息、加強聯繫增進人際關係等五項。2003年的調查主題為網路使用，因此僅測量網路的使用動機。網路使用動機則是採用五等隔的李克特量表測量。量表包括15個題項，分別屬於「社交性動機」、「工具性動機」和「娛樂性動機」等三個面向。

在測量傳播媒介使用行為方面，各項傳播媒介的使用行為是由使用頻率以及時間測量。頻率高低由最高的「每天一次或一次以上」，依序為「每週兩、三次」，「每週一次」，「每月一、兩次」，「兩、三個月一次」，「半年一次」，「一年一次」，到最低的「去年都沒有」、「從來都沒有」。除了測量各項傳播媒介的使用頻率和時間，還測量受訪者最常使用各種傳播媒介的時段與內容。從受訪者喜歡接觸的媒介時段和內容，或許可以了解民衆如何安排使用媒介的

時間或媒介之間功能的替代。

## 六、資料分析與解釋

### (一) 傳播媒介使用頻率之變遷情形

#### 1. 報紙和雜誌

三年的「變遷調查」資料顯示，民衆每天閱讀報紙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比例最高。其中以 1998 年的比例最高，達 64.2%，較 1993 年高出 2.4%。2003 年每日閱報的比例則銳減，降至 45.8%。而受訪民衆表示「去年都沒有」閱讀報紙的比例在 1993 年和 1998 年均都在 5% 以下，2003 年卻明顯升高至 11.5%（詳見表 1）。

在閱讀雜誌方面，「從來都沒有」閱讀的比例 1993 年達 21.3%，1998 年降低至 15.7%，2003 年又提升至 24.8%。資料也顯示 1998 年每週閱讀一次（週刊）雜誌（15.2%）或每月閱讀一、兩次（月刊）的比例（23.7%）均高於 1993 年和 2003 年。可知，三年之中以 1998 年閱

表 1 報紙和雜誌閱讀頻率：1993, 1998, 2003

頻率/年	1993		1998		2003	
	報紙	雜誌	報紙	雜誌	報紙	雜誌
每天一次或一次以上	1,202 (61.8)	103 (5.3)	1,230 (64.2)	111 (5.8)	989 (45.8)	102 (4.7)
每週兩、三次	232 (11.9)	211 (11.1)	249 (13.0)	204 (10.6)	327 (15.1)	207 (9.6)
每週一次	83 (4.3)	239 (11.2)	91 (4.8)	292 (15.2)	153 (7.1)	323 (14.9)
每月一、兩次	54 (2.8)	384 (19.8)	70 (3.7)	455 (23.7)	82 (3.8)	426 (19.7)
兩、三個月一次	13 (.7)	176 (9.0)	30 (1.6)	177 (9.2)	39 (1.8)	146 (6.8)
半年一次	3 (.2)	77 (4.0)	9 (.5)	78 (4.1)	12 (.6)	55 (2.5)
一年一次	3 (.2)	26 (1.3)	3 (.2)	35 (1.8)	3 (.1)	23 (1.1)
去年都沒有	82 (4.2)	311 (16.0)	93 (4.9)	263 (13.7)	248 (11.5)	343 (15.9)
從來都沒有	272 (14.0)	414 (21.3)	140 (7.3)	301 (15.7)	307 (14.2)	536 (24.8)
總計	1,944 (100.0)	1,941 (100.0)	1,915 (100.0)	1,916 (100.0)	2,160 (100.0)	2,161 (100.0)

註：表中數字是人次，括弧內是百分比。

讀雜誌的比例最高，而 2003 年閱讀雜誌的比例最低（詳見表 1）。

## 2. 廣播和電視

至於在廣播方面，1993 和 1998 年的收聽頻率相當。調查資料顯示，每天收聽廣播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比例均接近半數（分別為 48.7% 和 48.9%）。然而到了 2003 年則降至 37.6%。2003 年的受訪民衆當中，以每週收聽廣播兩、三次的比例最高，達 49.3%。2003 年從來不收聽或去年未收聽廣播的比例也超過 1993 年和 1998 年（詳見表 2）。

在台灣最普及的傳播媒介就是電視。三年的「變遷調查」資料顯示，每日收看電視人口從 1993 年的 85.8% 遞增至 1998 年的 90.2%，以及 2003 年的 92.5%。至於不收看電視的人數比例一直都偏低（詳見表 2）。

## 3. 網路

台灣網際網路自 1994 年才開始盛行，因此僅 1998 和 2003 年的調查包含網路使用的頻率。資料顯示，1998 年使用網路的人口比例僅有 10.9%，「從來都沒有」使用的比例則高達 69.2%。到了 2003 年，使用的人口比例急速增加至 47.5%，「從來都沒有」使用的比例降至

表 2 收聽廣播和收看電視頻率：1993, 1998, 2003

頻率/年	1993		1998		2003	
	廣播	電視	廣播	電視	廣播	電視
每天一次或一次以上	945 (48.7)	1,669 (85.8)	937 (48.9)	1,731 (90.2)	813 (37.6)	1,998 (92.5)
每週兩、三次	248 (12.8)	205 (10.5)	247 (12.9)	119 (6.2)	252 (49.3)	109 (5.0)
每週一次	107 (5.5)	34 (1.7)	101 (5.3)	32 (1.7)	123 (5.7)	26 (1.2)
每月一、兩次	75 (3.9)	11 (.6)	115 (6.0)	17 (.9)	88 (4.1)	2 (.01)
兩、三個月一次	50 (2.6)	5 (.3)	52 (2.7)	4 (.2)	55 (2.5)	4 (.02)
半年一次	27 (1.4)	4 (.2)	20 (1.0)	1 (.02)	34 (1.6)	---
一年一次	8 (.4)	1 (.1)	3 (.2)	3 (.05)	18 (.8)	1 (.00)
去年都沒有	309 (15.9)	15 (.8)	273 (14.2)	13 (.7)	421 (19.5)	17 (.8)
從來都沒有	173 (8.9)	1 (.1)	170 (8.9)	3 (.05)	356 (16.5)	3 (.01)
總計	1,942 (100.0)	1,945 (100.0)	1,918 (100.0)	1,920 (100.0)	2,160 (100.0)	2,160 (100.0)

註：表中數字是人次，括弧內是百分比。



49.4%。這顯示網路使用越來越普遍，且以驚人的速度快速成長（詳見表3）。

## (二) 傳播媒介使用時間

表4的資料顯示，台灣民衆每日看報紙的時間在1993年為39分鐘，1998年為38分鐘，而2003年為32分鐘，差距不大。1993年民

表3 網路使用頻率：1998, 2003

頻率/年	1998	2003
每天一次或一次以上	113 (5.9)	623 (28.8)
每週兩、三次	89 (4.7)	190 (8.8)
每週一次	56 (2.9)	91 (4.2)
每月一、兩次	50 (2.8)	71 (3.3)
兩、三個月一次	37 (1.9)	24 (1.1)
半年一次	29 (1.5)	23 (1.1)
一年一次	25 (1.3)	4 (.2)
去年都沒有	190 (9.9)	67 (3.1)
從來都沒有	1,324 (69.2)	1,068 (49.4)
總計	1,920 (100.0)	2,161 (100.0)

註：表中數字是人次，括弧內是百分比。

表4 四種傳播媒介使用時間：1993, 1998, 2003

媒介/年	1993	1998	2003
報紙	39.28 (35.68) <i>n</i> = 1,577	38.15 (33.28) <i>n</i> = 1,683	31.82 (30.30) <i>n</i> = 1,604
廣播	128.61 (163.98) <i>n</i> = 1,447	120.38 (161.57) <i>n</i> = 1,473	119.17 (167.97) <i>n</i> = 1,379
電視	116.11 (93.66) <i>n</i> = 1,919	137.45 (103.16) <i>n</i> = 1,902	47.16 (43.33) <i>n</i> = 2,139
網路	--	50.49 (86.90) <i>n</i> = 404	70.77 (102.24) <i>n</i> = 1,026

註1：表中數字是平均分鐘，括弧內是標準差。

註2：回答有使用該媒體的受訪者才回答使用時間，因此人數不同。



眾平均每日收聽廣播的時間為 129 分鐘（約 2 小時），1998 年降為 120 分鐘，2003 年為 119 分鐘，差距也不大。至於每日收看電視的時間在 1993 年時約 116 分鐘（不到 2 小時），1998 年提高為 137 分鐘（超過 2 小時），2003 年卻劇降至 47 分鐘（不到 1 小時）。至於在使用網路的時間方面，1998 年的資料顯示網路使用者每日平均使用網路時間約為 50 分鐘，然而到 2003 年增為 71 分鐘（超過 1 小時）。民眾平均每日花在收看電視的時間在 2003 年顯著降低，而使用網路的時間則顯著提高。整體而言，1993 年民眾花在使用報紙、廣播和電視三種媒介的時間約 4.7 小時，1998 年微升至 4.9 小時。到了 2003 年，民眾使用三種媒介的時間下降至 3.3 小時，但是額外使用網路的時間則超過 1 小時。

### (三) 傳播媒介使用時段

三次「變遷調查」問卷中調查一天當中使用各媒介的時段。調查問卷以時間預算表測量，不過因為填答情況不佳（人數偏低），僅能依據人次多寡觀察民眾使用各種傳播媒介的主要時段。三次調查資料顯示，民眾使用傳播媒介的時間相當固定，例如，閱讀報紙大多在早上 7 點到 10 點之間。看電視的時間有兩個高峰期，分別為中午 12 點到下午 1 點以及晚上 7 點到 9 點。較多人收聽廣播的時段是早上 9 點到 11 點。閱讀雜誌的民眾不多，多選擇晚上 8 點到 11 點間閱讀。1998 年和 2003 年的調查包括上網的時段。資料顯示多數民眾選擇較深夜的時段（晚上 10 點至 12 點間）使用網路。上述資料顯示民眾在不同時段使用不同的媒介。

### (四) 傳播媒介使用動機

1993 年和 1998 年的調查都詢問受訪者使用各種傳播媒介的動機。在閱讀報紙動機方面，「獲取新知」的動機比例從 1993 年的 69.2% 提

高至 1998 年的 84.7%，而「尋求快樂、排遣時間」的動機則由 1993 年的 28.9% 降至 1998 年的 13.3%。這顯示報紙對於一般民衆而言逐漸成爲純粹提供知識與資訊的媒體，且其娛樂的功能逐漸降低。不過，《蘋果日報》在 2003 年之後才進入台灣報業市場，是否影響民衆閱讀報紙的動機尚待觀察。在雜誌閱讀動機方面，1993 年和 1998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尋求快樂、排遣時間」的閱讀動機降低（從 43.6% 降低至 25.8%），而「獲取新知」的動機比例從 1993 年的 54.8% 提高至 1998 年的 72.7%。這和報紙閱讀動機的趨勢一致（詳見表 5）。行政院新聞局（2005）曾調查 2000 年台灣雜誌出版類別，其中以「家庭與婦女」的 40 種(22.86%) 最多，「電子、電機」類 32 種(18.29%) 居次，第三是「藝術美學」類 28 種(16.09%)。因此可以推論台灣雜誌提供的內容多以資訊爲主，而民衆也多由雜誌尋求資訊內容。

至於在電子媒體方面，1993 年和 1998 年的調查資料都顯示台灣民衆無論是收聽廣播或是收看電視，均以「尋求快樂、排遣時間」爲最主要的動機，有高達七成以上民衆是爲了「尋求快樂、排遣時間」的原因收聽廣播或收看電視。此外，「獲取新知」的動機比例則有上升的趨勢。爲了「獲取新知」收聽廣播的比例由 1993 年的 20.9% 升高

表 5 閱讀報紙和雜誌動機：1993, 1998

動機／年	1993		1998	
	報紙	雜誌	報紙	雜誌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446 (28.9)	525 (43.6)	225 (13.3)	367 (25.8)
獲取新知	1,069 (69.2)	660 (54.8)	1,435 (84.7)	1,033 (72.7)
與他人分享苦樂	0 (0)	1 (.1)	1 (.1)	6 (.4)
與他人交換消息	29 (1.9)	19 (1.6)	22 (1.3)	8 (.6)
加強聯繫、增進人際關係	1 (.1)	0 (0)	7 (.4)	4 (.3)
其他	0 (0)	0 (0)	4 (.2)	2 (.1)
總計	1,545 (100.0)	1,205 (100.0)	1,694 (100.0)	1,420 (100.0)

註：表中數字是人次，括弧內是百分比。

至 1998 年的 26.9%，而收看電視的比例由 1993 年的 19.6% 升高至 1998 年的 26.8%（詳見表 6）。研究曾比較廣播電波開放前後之廣播節目類型（孫彬訓 2002），發現開放之後仍以娛樂綜藝性和新聞性節目居一二，而比例增加的為現代音樂和教育性節目。民衆藉由收聽廣播鬆弛身心，也導致音樂類型電台之興起。另外，根據台灣電視資料庫的統計，1995 年至 2002 年無線和有線電視所提供的節目中，屬於資訊類別節目（如新聞、文化、社教）所占的節目總長度（時間）為 33.01%，而屬於娛樂類別節目（如戲劇、綜藝、音樂、體育、動畫）的比例高達 66.17%。由此可部分解釋因媒體提供的娛樂性內容多於資訊性內容，導致民衆接觸到娛樂性內容也高於資訊性內容。

資料顯示 1998 年網路使用者的動機以「獲取新知」為最高，高達七成(70.5%)的民衆認為上網是要「獲取新知」，其次則是「尋求快樂、排遣時間」(12.7%)和「與他人交換消息」(10.8%)，但是比例相差懸殊。

2003 年的調查是以量表方式測量。表 7 的同意度分配表顯示，依同意程度來看，使用網路最重要的前三項最強動機依序是「想要找有用的資訊」、「想要瞭解國內外大事」、「想要學習新事物」。

表 6 收聽廣播和收看電視動機：1993, 1998

動機/年	1993		1998	
	廣播	電視	廣播	電視
尋求快樂、排遣時間	1,099 (76.7)	1,480 (78.7)	1,098 (71.1)	1,366 (71.9)
獲取新知	299 (20.9)	369 (19.6)	415 (26.9)	509 (26.8)
與他人分享苦樂	8 (.4)	12 (.6)	11 (.7)	12 (.6)
與他人交換消息	24 (1.2)	9 (.5)	11 (.7)	6 (.3)
加強聯繫、增進人際關係	3 (.2)	10 (.5)	6 (.4)	6 (.3)
其他	0 (0)	0 (0)	0 (0)	1 (.1)
總計	1,433 (100.0)	1,545 (100.0)	1,545 (100.0)	1,900 (100.0)

註：表中數字是人次，括弧內是百分比。

表 7 2003 年網路動機同意度分配表

項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平均數
想要找有用的資訊	1 (.1)	5 (.5)	65 (6.3)	787 (76.8)	167 (16.3)	4.09
想要瞭解國內外大事	3 (.3)	10 (1.0)	113 (11.0)	787 (76.8)	112 (5.2)	3.46
想要學習新事物	0 (0)	32 (3.1)	155 (4.0)	745 (72.7)	93 (9.1)	3.88
想要瞭解別人對事物的看法	1 (.1)	99 (9.7)	324 (31.6)	548 (53.5)	53 (5.2)	3.54
想要參與討論	16 (1.6)	286 (27.9)	427 (41.7)	270 (26.3)	26 (2.5)	3.00
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	17 (1.7)	274 (14.6)	418 (32.0)	291 (49.0)	25 (3.6)	3.03
想要說平時不敢說的話	16 (1.6)	315 (3.7)	399 (38.9)	276 (26.9)	19 (1.9)	2.97
想要扮演與現實生活不同的身分	29 (2.8)	425 (41.5)	329 (32.1)	224 (21.9)	17 (1.7)	2.78
想要用電子郵件和朋友聯絡感情	5 (.5)	121 (11.8)	204 (19.9)	589 (57.5)	106 (1.3)	3.65
想要幫助別人解決問題	15 (1.5)	237 (23.1)	471 (46.0)	293 (28.6)	9 (.9)	3.04
想要在網路上交朋友	45 (4.4)	410 (4.0)	365 (35.6)	192 (18.7)	13 (1.3)	2.72
想要尋求協助	20 (2.0)	299 (29.2)	340 (33.2)	348 (34.0)	18 (1.8)	3.04
想要獲得娛樂	5 (.5)	119 (11.6)	238 (23.2)	603 (58.8)	60 (5.9)	3.58
想要打發時間	13 (1.3)	155 (15.1)	204 (19.9)	588 (57.4)	65 (6.3)	3.52
想要逃避現實	99 (9.7)	594 (58.0)	253 (24.7)	68 (6.6)	10 (1.0)	2.31

註：表中數字是人次，括弧內是百分比。

總而言之，「資訊」和「娛樂」是所有傳播媒介最主要的功能。受訪民衆使用報紙、雜誌和網路最主要是爲了獲取資訊和新知，而使用廣播和電視則主要是爲了娛樂的目的。

### (五) 傳播媒介使用內容

三年的調查資料都提供了受訪民衆最常使用各項傳播媒介的內容。因爲媒介內容相當多元，以下羅列使用比例最多的前五項內容做比較。

民衆最常閱讀的報紙內容從 1993 年到 2003 年間沒有太大的改變，

最常閱讀的新聞內容依序為政治新聞、社會新聞、影視娛樂、消費理財。1993年體育新聞排序第五常閱讀的內容，1998及2003年則由衛生保健取代。較特殊的是2003年的調查顯示，較常閱讀政治新聞的比例降低，而閱讀影視娛樂新聞的比例則增加（詳見表8）。

在雜誌閱讀內容方面，最常閱讀的五項內容在三年的調查是一致的，只是排列的順序不同，尤其是最常閱讀的前三項內容。1993年為社會、政治、影視娛樂，1998年為政治、影視娛樂、社會，而2003年則為影視娛樂、社會、政治。這顯示影視娛樂越來越成為民眾最常閱讀雜誌的內容（詳見表9）。

最常收聽廣播內容在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間並沒有太大變化。

表8 最常閱讀的報紙內容前五項：1993, 1998, 2003

排序 /年	1993		1998		2003	
	內容	人次 (%)	內容	人次 (%)	內容	人次 (%)
1	政治新聞	740 (47.3)	政治新聞	717 (42.7)	政治新聞	576 (35.9)
2	社會新聞	572 (36.5)	社會新聞	599 (35.7)	社會新聞	549 (34.2)
3	影視娛樂	141 (9.0)	影視娛樂	153 (9.1)	影視娛樂	250 (15.6)
4	消費理財	41 (2.6)	消費理財	65 (3.9)	消費理財	46 (2.9)
5	體育	25 (1.6)	衛生保健	46 (2.7)	衛生保健	41 (2.6)
總計		1,566 (80.5)		1,678 (87.4)		1,605 (74.3)

表9 最常閱讀的雜誌內容前五項：1993, 1998, 2003

排序 /年	1993		1998		2003	
	內容	人次 (%)	內容	人次 (%)	內容	人次 (%)
1	社會新聞	290 (24.3)	政治新聞	168 (21.3)	影視娛樂	327 (35.9)
2	政治新聞	280 (23.5)	影視娛樂	130 (16.5)	社會新聞	228 (34.2)
3	影視娛樂	198 (16.6)	社會新聞	125 (15.9)	政治新聞	165 (15.6)
4	消費理財	127 (10.7)	消費理財	115 (14.6)	消費理財	97 (2.9)
5	衛生保健	74 (6.2)	衛生保健	69 (8.8)	衛生保健	85 (2.6)
總計		1,191 (61.2)		788 (41.0)		1,275 (59.0)

新聞、歌曲、交通服務、輕音樂一直都是民衆最常收聽的廣播內容。不同的是，1993 年和 1998 年的調查顯示時事評論和新聞氣象爲最常收聽的節目，而 2003 年則是流行歌曲。此外，空中教學節目在 1993 年以及衛生保健節目在 1998 年是民衆當年較常收聽的廣播內容（詳見表 10）。

至於最常收看的電視節目內容方面，新聞氣象一直是民衆最常收看的電視內容，不過 2003 年看電視新聞的比例明顯下降。觀眾最常收看的電視節目其次是戲劇節目。1993 和 1998 年的資料並未顯示國內或國外的戲劇節目，2003 年的資料顯示高達 25.3% 的受訪民衆最常收看國內的戲劇節目，也有 7.7% 最常收看國外的電影和影集，這或許是有線電視越來越普及所致。歌唱綜藝節目在 1993 年和 1998 年的調查皆排第四位，2003 年則排第五位。體育節目在 1993 年並未進入前五名，但是在 1998 年躍升爲第三名，2003 年則排在第四名（詳見表 11）。

1998 年和 2003 年的調查包括了民衆上網最常找的資訊內容。資料顯示，影視娛樂、消費理財、社會資訊、觀光旅遊和資訊科技依序爲上網民衆最常找尋的資訊內容，兩年的排序只有在觀光旅遊和社會

表 10 最常收聽的廣播內容前五項：1993, 1998, 2003

排序 /年	1993		1998		2003	
	內容	人次 (%)	內容	人次 (%)	內容	人次 (%)
1	時事評論 新聞氣象	615 (31.6)	時事評論 新聞氣象	689 (47.2)	流行歌曲	508 (37.2)
2	歌曲	385 (19.8)	綜藝歌唱 節目	272 (18.6)	新聞氣象	228 (23.2)
3	交通服務	203 (10.4)	交通服務	238 (16.3)	交通服務	165 (11.0)
4	空中教學	61 (3.1)	衛生保健	79 (5.4)	輕音樂	97 (7.8)
5	輕音樂	58 (3.0)	輕音樂	79 (5.4)	時事評論	85 (4.6)
總計		1,444 (74.2)		1,459 (76.0)		1,275 (59.0)

資訊稍有變動（詳見表 12）。不過，2003 年在網路上尋求影視娛樂資訊內容的比例較 1998 年降低，可能因為網路所提供的資訊更加多元，民衆對於資訊的選擇也越多元了。

## (六) 媒介使用行為與媒介生態變遷的互動

各種媒介使用頻率的變遷情形顯示，傳統媒介的使用頻率逐漸降低，其中尤其以報紙的使用頻率降低最多，廣播和雜誌的使用頻率亦降低，然而電視的使用頻率卻是逐年升高。1998 年平均每日看電視的時間為 137 分鐘，2003 年卻劇降至 47 分鐘。1998 年平均每日使用網路時間為 50 分鐘，2003 年卻增為 71 分鐘。這些使用行為的變化反映

表 11 最常收看的電視內容前五項：1993, 1998, 2003

排序 /年	1993		1998		2003	
	內容	人次 (%)	內容	人次 (%)	內容	人次 (%)
1	時事評論 新聞氣象	1,416 (73.9)	時事評論 新聞氣象	1,403 (74.0)	時事評論 新聞氣象	930 (43.0)
2	劇集	278 (14.5)	劇集	266 (14.0)	電視劇集	535 (25.3)
3	社教	76 (4.0)	體育節目	63 (3.3)	電影、影集	163 (7.7)
4	綜藝歌唱	43 (2.2)	綜藝歌唱	57 (3.0)	體育節目	110 (5.2)
5	衛生保健	36 (1.8)	消費理財	42 (2.2)	綜藝歌唱	94 (4.4)
總計		1,916 (98.5)		1,897 (98.8)		2,117 (98.0)

表 12 最常搜尋的網路資訊內容前五項：1993, 1998, 2003

排序 /年	1998		2003	
	內容	人次 (%)	內容	人次 (%)
1	影視娛樂	103 (26.1)	影視娛樂	229 (22.6)
2	消費理財	70 (17.8)	消費理財	191 (18.8)
3	觀光旅遊	40 (10.2)	社會資訊	105 (10.4)
4	社會資訊	39 (9.9)	觀光旅遊	103 (10.2)
5	資訊科技	32 (8.1)	資訊科技	65 (6.4)
總計		394 (20.5)		1,014 (46.9)



了台灣媒體生態環境的轉變。其中有線電視的普及和網際網路的問世，顯然造成了十年間媒體生態環境的重要轉變，值得進一步分析有線電視和網路對於民衆媒介使用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有線電視加入媒體競爭之後，觀看電視的習慣從過往無線三台有限的內容選擇，演變成得以從上百種頻道選擇個人偏好之節目。調查資料顯示，民衆家中裝設有線電視服務的比例從 1993 年的 38.6%，以二倍數增加至 1998 年的 76.3%，再增加至 2003 年的 82.7%。反映在收視上的是有線電視收視率年年成長，而無線電視收視率一直下滑。從 1994 年有線和無線的收視率分別為 28% 和 72%，消長至 2003 年的 66% 和 34%（動腦雜誌 2003）。電視的使用頻率逐年升高顯示了電視在民衆生活中的重要性。過去的文獻顯示，媒介之間具有時間替代效果（time displacement effect），人們使用一種新媒介的時間，會影響使用舊媒介的時間（Putnam 1995）。換言之，民衆收看有線電視，就可能排擠他們使用其他傳播媒介的時間。本研究分析三次調查家中有裝設有線電視和沒有裝設有線電視的民衆使用各種媒介的時間是否呈現差異。1993 年調查資料顯示，家中有裝設和沒有裝設第四台（當時有線電視是以第四台稱之）的民衆在使用報紙和廣播的時間無顯著差異，但是在使用電視的時間則呈現顯著差異。家中有裝設有線電視的民衆每日看電視的時間（132.6 分鐘）顯著的較家中沒有裝設有線電視的民衆（105.7 分鐘）長（ $t=6.188, p<.001$ ）。1998 年的調查資料也顯示，家中有裝設和沒有裝設有線電視的民衆，在使用報紙和廣播的時間也無顯著差異，但是在使用電視的時間則呈現顯著差異。家中有裝設有線電視的民衆每日看電視的時間（145.8 分鐘）顯著的較家中沒有裝設有線電視的民衆（110.4 分鐘）長（ $t=6.343, p<.001$ ）。2003 年資料則顯示家中有無裝設有線電視也是造成使用電視時間上的顯著差異。家中有裝設有線電視的民衆每日看電視的時間（48.7 分鐘）顯著的較家中沒有裝設有線電視的民衆（39.2 分鐘）長（ $t=3.780, p<.001$ ）。1993 年



和 1998 年的最主要的媒體變化就是有線電視的裝設由 38.6% 提升自 76.2%，也因此民眾看電視的時間顯著增加了。但是民眾收看有線電視，並未影響他們使用其他傳播媒介的時間。另外從各種媒體使用時間之間的相關情形顯示，彼此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1993 年各種媒介之間都呈現顯著正相關。1998 年則是報紙和電視的使用時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r = .347, p < .01$ )，意即閱讀報紙時間越長收看電視時間則越長。2003 年僅有收看電視時間和收聽廣播時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r = .057, p < .05$ )。

其次，網路的出現是否影響民眾媒介使用行為？比較 1998 年和 2003 年的調查，台灣民眾每天上網的比例從 5.9% 提升至 28.8%，顯示網路使用人口的快速成長趨勢。網路相關技術演進造就了蓬勃發展的網路社會。網際網路將各種溝通媒介如文字、圖像、聲音、影像、動畫和錄影等結合成「多媒體系統」，讓人們隨時隨地可以和全世界互通資訊。網路儼然已成爲人們工作、娛樂和進行社會活動的重要工具。1998 年的資料顯示，上網民眾與沒有上網民眾在閱讀報紙的時間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收聽廣播和收看電視的時間上則呈顯顯著差異。沒有上網的民眾顯著的比上網民眾收聽廣播和看電視的時間長。顯然使用網路的時間是影響了使用廣播和電視的時間，產生了時間替代作用。2003 年上網與沒有上網的民眾在閱讀報紙的時間有顯著差異，統計資料顯示沒有上網的民眾閱報的時間較有上網的民眾長，且差異達顯著水準。因此，網路的使用影響了民眾閱讀報紙的時間（詳見表 13）。

從民眾使用各種媒介時間的消長可以反映媒介生態變遷，從媒介功能論的角度來看，如果某些媒介在滿足閱聽人的功能上是一樣，則彼此之間便具有替代性。調查資料顯示民眾閱讀報紙和雜誌的動機從 1993 年至 2003 年越來越以追求資訊爲主，而民眾使用網路也是以資訊的動機最強，因此報紙和雜誌的功能最容易被網路取代。就報紙而言，這其實也是世界的趨勢，因爲全球報紙的發行量均下降，讀者大

表 13 上網與沒有上網民衆使用其他媒介時間的平均數比較：

1998, 2003

1998 年	人數	聽廣播時間	平均數檢定	
有上網	370	104.9 分鐘(159.4)	$t = -.2.135$	$p < .05$
沒有上網	1,103	125.6 分鐘(162.1)		
1998 年	人數	看電視時間	平均數檢定	
有上網	404	122.9 分鐘(94.4)	$t = -.3.201$	$p < .001$
沒有上網	1,498	141.4 分鐘(105.1)		
2003 年	人數	閱報時間	平均數檢定	
有上網	961	30.2 分鐘(27.5)	$t = -.2.716$	$p < .01$
沒有上網	643	34.3 分鐘(34.0)		

量轉移到上網接收資訊（卓越雜誌 2008）。報紙媒體如何在數位時代尋求新的生存之道將是重要的課題。

觀察民衆使用各項傳播媒介內容的變遷情形，也可以了解媒介內容與民衆使用行為之間的互動。資料顯示民衆閱讀報紙以新聞為主，其中政治和社會新聞是最常被閱讀的類別。不過，2003 年民衆閱讀報紙影視娛樂新聞的比例大增，這或許和《蘋果日報》加入報業市場有關。2003 年台灣三大報面對《蘋果日報》加入戰場，應戰策略之一是進行改版，而改版的重點就是加強視覺效果以及擴增影視娛樂版面。學者認為這是「小報化」的趨勢（陳順孝 2003），或是「資訊娛樂化」現象（王泰俐 2004）。「小報化」指的是報紙採取煽情的筆調、斗大的標題、大篇幅的照片、圖像化的編排、鮮艷的彩色印刷來吸引讀者，大幅報導醜聞、體育、娛樂和消費資訊，而很少探討嚴肅的政治、經濟、社會議題（Rooney 2000，轉引自陳順孝 2004）。「資訊娛樂化」則意指一種「將新聞和時事節目中資訊和娛樂兩種成分混合而重製成的新文類」，以滿足閱聽衆的「娛樂需求」為最主要考量（Thussu 2003，轉引自王泰俐 2004）。報紙內容和版面編排的改變似

乎也會影響讀者的閱讀習慣。

至於其他媒體的使用內容型態方面都顯現出相當一致的變遷情形。最常閱讀雜誌的內容在 1993 年和 1998 年以政治、社會為主，而 2003 年則為影視娛樂。最常收聽的廣播節目內容在 1993 年和 1998 年以新聞氣象為首，而 2003 年則為流行歌曲。在電視收看的內容方面，1993 年到 1998 年都維持相同的收看內容型態，2003 年則顯示出觀眾減少收看新聞節目，卻增加了娛樂性節目的收看。由上述變動情形可知民眾越來越常使用各種傳播媒介的娛樂性內容，也反映了傳播媒介在市場導向的經營型態下，需要提供更多的娛樂性內容，以吸引閱聽眾。

如此的發展趨勢下是否會影響傳播媒介只重視市場，而輕忽報導公共事務之社會責任？這又會如何影響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參與？依 Putnam (1995) 有關社會資本之論述指出，電視腐蝕美國社會之社會資本，因為收看電視降低了民眾社區及政治的參與。國外文獻進一步指出，收看電視新聞有助於提升民眾之政治效能感 (political efficacy) 以及政治參與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ewhagen 1994; McLeod et al. 1996)，但是收看電視娛樂性節目越頻繁則其政治效能感越低。在網路使用方面，美國學者 Shah 等人 (2001) 在其全國性的調查中發現，即使控制人口學變項和其他的媒介使用行為，為了蒐集資訊（不為娛樂或買賣交易目的）之網路使用行為，與人際信任、公民參與和生活滿意具有正向的關係。國內研究也指出網路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因使用者的使用動機而異。以「資訊蒐集」為上網動機的網友，在網路上的搜尋資訊行為，或人際關係信任程度（社會資本之指標）以及公民參與程度都有較高評分（張卿卿 2006）。因此，民眾媒介使用動機和行為如何影響其社會、政治態度與行為頗值得持續觀察。

## 七、結論

從 1993 年到 2003 年十年間，台灣媒體生態中最大的變化就是有線電視和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報紙市場的萎縮。整體而言，本研究透過三次「變遷調查」資料的分析，發現民衆使用傳播媒介行為有所改變，而媒介使用型態和媒介生態發展也的確相關。從調查資料顯示出媒體使用行為趨勢摘要如下：

1. 報紙、雜誌和廣播的使用頻率逐年降低，而電視和網路的使用頻率則逐年提高，其中電視成爲民衆最常使用的傳播媒介。
2. 收看電視的時間顯著減少，但是使用網路的時間顯著增加。
3. 「資訊」和「娛樂」是所有傳播媒介最主要的功能。受訪民衆使用報紙、雜誌和網路最主要是爲了獲取資訊和新知，而使用廣播和電視則主要是爲了娛樂。
4. 民衆越來越常接觸各種傳播媒介所提供的娛樂內容，卻減少了接觸新聞資訊的內容。這反映了傳播媒介在市場導向的經營型態下，需要提供越來越多的娛樂性內容，以吸引閱聽衆。
5. 傳統媒介之間時間取代效果並不明顯，各種媒介使用時間之間呈現正向關係，亦即民衆使用某種傳統媒介時間越多，使用其他傳統媒介的時間也會越多。
6. 民衆使用網路的時間影響了閱讀報紙、收聽廣播和收看電視的時間，產生時間替代作用。

從資料中並未發現有線電視對於民衆媒介使用行為造成影響，然而依據媒體生態之區位理論觀點，有線電視無論在閱聽衆、媒體內容和廣告收入等三大資源而言，都超越了所有媒體（吳文俊 2004）。因此，有線電視對於台灣媒體生態乃至社會仍有著長遠之影響。譬如，柯舜智、莊春發(2008)的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的有線電視市場 HHI 指

標高達 8,084，屬於高度集中的產業。而媒介集中度過高，將可能帶來多元意見市場萎縮、媒體內容品質降低、以及阻礙產業成長等多重衝擊。事實上，伴隨著電視產業激烈競爭所產生的影響已形成一股亂象。研究發現「強調收視率」對電視新聞產生之影響包括「羶色腥化」、「非政治化與去政治化」、「個人化」和「戲劇化」等（林照真 2009）。另外，電視產業經營者在投資報酬率考量下，大量從日、韓等國進口影片，不但引發文化侵略的憂慮，也阻礙本土文創產業發展。

另一個重要的趨勢是閱報頻率降低了，主要原因就是讀者從報紙轉向網際網路，讓閱聽大眾獲得訊息的來源更加多元化，造成傳統媒體的沒落。雖然報紙仍擁有品牌優勢，以及優於廣電媒體的深度和可信度，但在激烈競爭下，報紙經營將越來越商業化，且有「小報化」的趨勢，很可能傷害報紙新聞的信譽（蘇蘅 2006）。無論是電視或報紙若一味只求收視率或銷售量，而輕忽其社會責任，恐非社會之福。

目前傳播產業正面臨著極大的變革，電視、廣播、報紙與雜誌等傳統媒體之界線，因電訊與網路等新技術的衝擊而逐漸模糊，形成了「媒體匯流」時代。在此趨勢下，未來傳播將出現不同樣態，也將改變民眾媒介使用行為和形式。數位時代的閱聽眾如何使用媒體值得繼續觀察研究。

本研究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確能夠描述並且比較台灣民眾在不同時期的媒介使用行為。本研究發現報紙、雜誌和網路具有相同的資訊功能，而廣播和電視具有相同的娛樂功能。功能替代的效果的確也影響了民眾使用媒介時間的消長。不過本研究採用之縱貫性資料為針對不同樣本調查，無法追蹤特定對象的改變情形，難以更深入探討兩者之因果關係，建議未來可運用固定樣本連續調查法(panel studies)以獲得更豐富之資料。

至於在媒介使用行為的影響因素方面，本研究著重於媒介生態方面的影響，發現民眾媒介使用行為的確會受到媒介生態變遷的影響。

不過依據 McQuail (2000) 提出之閱聽人媒介選擇過程整合模式，除了媒介方面的影響外，閱聽人方面的因素，例如社會背景、人口特徵、品味、休閒時間等都會影響閱聽人的媒介使用行為。在個人因素和媒介因素相互影響下，造就了媒介使用行為的多元樣貌。本研究限於篇幅，未將閱聽人的個人因素納入分析，為一大研究限制，建議未來研究能同時觀察個人因素與媒介因素的影響。

##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統計月報(2012)第 556 期。台北：行政院主計總處。
- 王天濱(2002)台灣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圖書。
- (2003)台灣報業史。台北：亞太圖書。
- 王泰俐(2004)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之初探研究。新聞學研究 81: 1-41。
- 行政院新聞局(2002)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 (2003)廣播電視白皮書。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 (2005)出版年鑑。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 何貽謀(2002)台灣電視風雲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林呈達(2002)寬頻網路「使用與滿足」研究——比較 ADSL 與 Cable Modem 之異同。新竹：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照真(2009)收視率新聞學：台灣電視新聞商品化。台北：聯經。
- 吳文俊(2004)從區位理論探討我國數位有線電視頻道規劃與使用者滿意度。台北：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卓越雜誌(2008)全球報業王國迎接空前挑戰。283 期。
- 柯舜智、莊春發(2008)再探台灣有線電視市場集中度。新聞學研究 94: 149-192。
- 孫彬訓(2002)電波開放前後台灣廣播節目差異與多樣化研究。嘉義：南



- 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動腦雜誌(2000)報紙媒體廣告營收。284: 12-15。
- (2003)電視媒體廣告營收。323: 12-15。
- (2005)報紙媒體廣告營收。343: 12-15。
- 馮文清(2007)世新網路電台網友使用行為之研究。台北：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卿卿(2006)網路的功與過：網路使用與政治參與及社會資產關係的探討。新聞學研究 86: 45-90。
- 陳筱雁(2004)收視率之運用。第七屆尼爾森校園種子營書面資料。
- 陳清河(2005)廣播媒介生態與產業。台北：亞太圖書。
- 陳順孝(2003)國內報業經營之道探索——善用「小報」創意、開展「大報」新局。見出版年鑑 2003 年，頁 20-27。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 資策會(2012)1996 年起，台灣歷年經常上網人口統計。取自 [http://www.find.org.tw/0105/howmany/usage\\_1.asp](http://www.find.org.tw/0105/howmany/usage_1.asp)
- 羅美玲(1998)電子報讀者之動機分析。桃園：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美琪、許安琪、漆梅君、于心如(2003)當代廣告：概念與操作。台北：學富文化。
- 董潔如(2002)高中學生網路使用動機、使用行為、個人特性與網路沉迷現象之初探。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婉晴(2005)網路電視使用動機、行為與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台北：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銘鈞(1998)台灣大學生網路使用行為、使用動機、滿足程度與網路成癮現象之初探。新竹：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瑞城等(1993)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台北：澄社。
- 蘇蘅(2006)九十四年報業市場概況。見出版年鑑 2006 年。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 Angleman, S. (2000)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nd Internet Profiles: A Factor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estern Science Social Association 2001 Conference held in Reno, Nevada. Retrieved from: <http://www.jrily.com/LiteraryIllusions/InternetGratificationStudyIndex.html>.
- Grace-Farfaglia, P., A. Dekkers, B. Sundararajan, L. Peters, and Sung-Hee Park (2006) Multinational Web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Measuring the Social Impact of Online Participation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6: 79-101.
- Ferguson, D. A., and E. M. Perse (2000) The World Wide Web as a Functional Alternative to Televis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4(2): 155-174.
- Katz, E., J. G. Blumer, and M. Gurevitch (1974) Uti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by the Individual. Pp. 19-32 in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edited by Jay G. Blumler and E. Katz.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aye, B. K. (1998) Uses and Gratification of the World Wide Web: From Couch Potato to Web Potato.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21-40.
- McLeod, J. M., K. Daily, Z. Guo, W. Eveland, J. Bayer, S. Yang, and H. Wang (1996) Community Integration, Local Media Use,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179-209.
- McQuail, D., ed. (1972)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 (2000)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orris, M., and C. Ogan (1996) The Internet as mass mediu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1): 39-50.
- Newhagen, J. E. (1994)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The Suburbanization



- of Race and Clas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45(6): 386-394.
- Papacharissi, Z., and A. M. Rubin (2000) Predictors of Internet Us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4(2): 175-196.
- Putnam, R.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65-78.
- Shah, D., N. Kwak, and R. L. Holbert (2001) "Connecting" and "Disconnecting" With Civic Life: Patterns of Internet U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2): 141-162.
- Stafford, T. F., M. R. Stafford, and L. L. Schkade (2004) Determining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for the Internet. *Decision Sciences* 35(2): 259-288.



# 第 2 章

告知與動員：  
新聞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陳憶寧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檢視新聞媒介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以1993年與2003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為資料來源，研究結果顯示十年前後，媒介使用時間與媒介使用內容對政治知識的預測力相當高，但就政治參與而言，只有媒介使用時間有預測力，而且只限於觀看電視新聞的時間。針對這樣的結果，本研究認為可以顯示出媒介使用對於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預測相當穩定，不受媒介大環境變遷以及政治變動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出在政治行為上電視新聞可能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也就是說看電視新聞與看報紙都可以提高政治知識，但是對於行為上的動員，電視新聞優於報紙。

關鍵詞：社會變遷、政治知識、政治參與、媒介使用內容、媒介使用時間

## Informing and Mobilizing: Relationships among News Media Use,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Yi-Ning Katherine Chen

*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ews media use,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Drawing on 1993 and 2003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the study links time spent on news media and political news use to changes in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ime spent on news media and political news content use positively predict political knowledge. A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ly television news use is found to be predictive. Data analyses also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ews media use,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re stable for the decade. That is, they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climate, mainly the power shift of ruling par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 bigger media environment between 1993 and 2003. More important, watching television news may contribute to political behavior. In other words, exposure to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 news increases political knowledge. Television news may serve better than newspapers, however, to facilitat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Keywords: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edia content use, time spent on media*

## 一、前言

自 1990 年以來，台灣歷經戒嚴解除及政權轉移等重要民主歷程。從西元 1990 年代的國會全面改選，直轄市長、省長及總統直接民選，到 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使長期在野的民進黨成為執政黨，這一系列的民主化歷程不但為政治學者所關心，也成為研究政治的傳播學者的重要研究課題。其中尤受傳播學者重視的研究議題之一，即在此選舉與媒介環境越加競爭激烈過程中，民衆之政治認知與行為是否有所不同？媒介具有的告知(informative)與動員(mobilizing)的功能如何？十年之間民衆的政治知識、選舉參與和媒介使用行為的關係是否有所變化？

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是民主進步過程的核心，民主的品質與社會集體運作的健全與否，其先決條件是政治知識，因此可以推論政治知識與投票行為之間呈現正相關(Carpini and Keeter 1996)。一般而言，學者大多同意在民衆的政治學習與政治參與上，媒體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過去文獻亦顯示，媒介在政治上到底是具有較強的正面功能，例如告知(informative)與動員(mobilizing)的角色( Neuman et al. 1992; Norris 2000; Dalton 2002)，或是具有負面功能，例如形成政治犬儒主義(political cynicism)、降低民衆政治效能感與政治涉入感(e.g., Robinson 1976; Cappella and Jamieson 1997; Schulz 1998; Putnam 2000)，其實是各有一套不同的說法。主張前者說法的學者，多為古典政治傳播學者，認為媒介有設定議題、引發政治興趣的功能；主張後者說法的學者們，觀點為新聞表現過於負面，多著墨於政治鬥爭過程，而非政治議題之實質，因而使得民衆厭惡政治。

台灣過去十多年的新聞媒體受到學術界與社會輿論的撻伐，尤以電視新聞所受的批評最烈，論者認為其內容充滿政客作秀、暴力與八

卦。原因在於自有線電視興起後，衍生出近百個頻道，已徹底改變了原有的電視生態，也可能因而創造了新的閱聽模式。台灣有線電視普及率已從 1994 年的四成多（不及美國的 62%）提高到超越美國，而在 2003 年已至 82.1%（章英華、傅仰止 2004）。有線電視新聞台爲了加速瓜分市場，新聞八卦化越益嚴重，強調對立與衝突的戲劇效果，偏好聳動內容；無線台也幾乎可以說是隨波逐流，競逐庸俗內容，媒體表現倒退（何國華 2002）。除此之外，可能形成觀眾的政治冷漠、對政治與社會關注層面的偏狹，造成世界觀的狹隘。陳憶寧(2007)分析 2006 年的電視新聞與民衆關心的議題之後發現，電視新聞關心的議題與一般民衆關心的議題沒有顯著關係。由此可以推論，看電視新聞對於政治知識或是政治參與是否有正面影響有待觀察。如果電視新聞對於一般民衆在政治知識上沒有影響，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力就更受到懷疑。

考量在十年間大媒體環境變動之下，民衆的政治知識、參與以及媒介使用的關係的可能變化，因而本研究檢視 1993 年與 2003 年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選舉參與的關連。根據媒體、公衆知識與政治參與中的文獻探討，首先，本研究解構所謂的「媒體」，從兩個層次進行討論，第一是媒體的形式，第二是媒體的內容。本研究假設不同的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可能不同。另外，本研究比較有線電視新聞台出現未久的 1993 年資料，與成熟期的 2003 年資料，由十年前後的研究資料所提供的相關數據，評估媒體內容演變、公衆知識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

以下討論中，本研究將先說明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政治參與的關係，隨後描述研究方法並進行資料分析，最後提出討論與建議。

## 二、文獻探討

過去的研究對於民主過程中媒介的貢獻角色的見解是非常不同的。過度強調全然媒介之惡(media malaise) (Robinson 1976)或是媒介之善(virtuous circle) (Norris 2000)等說法，漸漸地已經被視狀況而定(contingency)的媒介效果概念所取代，也就是說媒介的效果研究必須更進一步分析媒介特性，亦即不同的媒介，其效果可能有所差異，不可等而視之。不同的媒介和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聯性也可能有所不同。以下分別探討媒介與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 (一) 媒介與政治知識

從知識即權力的角度來看，知識貧乏代表權力匱乏(Rueschemeyer 2004)，知識常常是社會不平等的來源，缺乏政治知識不僅代表政治資源匱乏，也意味著缺乏政治權力。有了基本的政治知識，民衆不僅知道如何投票以及投給誰，也可運用政治知識影響政治過程。依照政治學者 Carpini 與 Keeter (1996)的說法，政治知識不僅影響政治過程，也影響政治參與，因此對個人及民主政治均極為重要。

兩位學者認為政治知識是一種資源，政治資訊之於民主政治就如同金錢之於經濟，是公民權的貨幣。政治知識的分布狀況，就如同反映了一個國家可能的政治平等狀況。對相對充分知曉的人來說，政治體系運行幾乎如同代議民主；但對知曉較少的人來說，參與政治的可能性較小，其參與政治有實際效用的可能性也較小。然而，政治知識也必須視情況而定，它是相對的，依據不同的時間或團體而有所差異。政治知識的價值也是聚集性的，當一個團體所掌握的資訊總數越大時，政府的行動就越有可能反映這群人的意願。事實上，即使公民無法在政治的所有方面都是專家，一般對於政治的遊戲規則、政治的本質、



政治人物與政黨的熟悉度，對於一個健全的民主維持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Carpini and Keeter 1996)。Carpini 與 Keeter (1996)對於政治知識做了大量資料的系統性整理，他們將政治知識定義為存於長期記憶中的，關於政治事實資訊之範圍。而這種存於長期記憶中的資訊，是公民對於政治世界的詮釋，也讓公民有更大的自主性與賦權依據，有思考與行動的能力。他們認為，公民應該知道的基礎種類包括：關於政治遊戲規則的基礎事實、政治的本質、實行政治的核心人物及政黨。

過去研究顯示，新聞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呈正相關，即使用頻率越高，政治知識越高（羅文輝、鍾蔚文 1991; Lo 1994; Robinson and Levy 1986）。大多數研究顯示，報紙使用對政治知識的影響力最大，如 Robinson 與 Levy (1986)曾分析十五個不同研究，發現閱讀報紙均與政治知識呈顯著正相關。

電視新聞對政治知識的影響力則較無定論，然而上述 Robinson 與 Levy 的研究顯示，電視新聞對政治知識的影響力微乎其微，他們甚至認為：「電視新聞不應被視為是民衆的重要消息來源」(Robinson and Levy 1986: 232)。

另外，有一些研究焦點放在比較電視與報紙的不同影響，例如 Robinson 與 Davis (1990)發現，報紙讀者在新聞時事的知曉程度上比電視觀眾高，但是 Graber (1990)曾發表過電視新聞是觀眾較好的學習方式。Carpini 與 Keeter (1996: 145-146, 193)發現閱讀報紙對讀者的政治知識有正面影響，但是觀看電視新聞並沒有系統性的影響。Neuman 等人(1992)詳細分析電視與新聞作為知識來源所帶來的不同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人們不管從其中任何一種媒介學習，都會因為議題的顯著性，或是議題複雜度、閱聽人的認知技巧以及對議題的興趣而定。看電視與顯著性較低的議題相關，而看印刷媒體則通常與顯著性較高的議題相關。抽象、遙遠與困難的議題呈現在報紙上比電視上更令人感到學習上的困難(Neuman et al. 1992: 89)。此外，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具有

較高程度的認知技巧的人，較有能力從報紙認識到政治性議題，相反的，低認知技巧的人則較無能力。

較新研究則指出，電視新聞對政治知識確有重要貢獻。Zhao 與 Chaffee (1995)分析 1984 年至 1992 年在美國舉行的六屆選舉，發現電視新聞能幫助選民了解候選人的議題立場。Chaffee 等人(1994)則發現，電視新聞在 1992 年的美國選舉中是預測選民對候選人議題立場知識的最佳變項。Vreese 與 Boomgaarden (2006)在歐洲的研究也發現，無論商業電視或是公共電視對於政治知識都有正向預測力。台灣地區進行的研究也發現電視新聞對民衆的政治知識具有顯著預測力（羅文輝、鍾蔚文 1991；陳憶寧、羅文輝 2006；林聰吉、王淑華 2007；Lo 1994）。

另外，有部分學者著重電視節目選擇上所帶來的不同影響。Prior (2003)表示，偏好娛樂性節目與知識有負向的相關性。Holz-Bacha 與 Norris (2001)根據 1990 年代早期的數據，檢視在歐洲不同電視頻道的選擇與高、低政治知識的關係，研究分析中發現，在控制教育程度後，喜愛公共電視與高政治知識程度為正相關，然而喜愛商業電視則與低政治知識程度為正相關。此外，他們也發現頻繁的新聞觀看與政治知識之間存在正相關。Hooghe (2002)發現，觀看新聞與社會資本有正相關，反之，花時間看電視並且偏好娛樂性節目則與社會資本有負相關。

Aarts 與 Semetko (2003)進一步探索所謂的頻道偏好(channel preference)，發展出「媒介使用模式」。他們發現，傾向看公共電視新聞、閱讀高品質的報紙與所謂的意見週報(opinion weeklies)的人，與收看商業電視新聞、肥皂劇與八卦消息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群閱聽人，前者的政治知識程度較高，後者較低。無獨有偶，Newton (1999)發現，閱讀報紙與收看電視新聞其知識及政治參與程度高，然而閱讀小報或是一般性地使用電視（如特別專注於看電視新聞）與較低的政治參與相關。

歐洲媒介效果的討論偏重於公共電視與商業電視的偏好，以及喜愛新聞性報紙與八卦小報的影響；美國的研究則著重於情境變項，例如以社區為對象的研究發現，市民在媒介豐富的環境中，傾向於更富有知識。Chaffee 與 Wilson (1977)發現，在同一社區中，擁有較多報紙的居民，相較於擁有較少報紙的居民，對於議題的瞭解更為深入。Mondak (1995)在研究中指出，接收當地報紙關於某政治活動報導的居民，對比於沒有接收到的（因為報紙罷工之故）在知識層級上是有差別的，那些沒有接觸到資訊的人較沒有相關知識。

從以上討論可以發現，閱讀報紙新聞對政治知識的正面貢獻是學術界比較有共識的，但電視新聞則未必。本研究將探討電視、報紙新聞與政治知識的關係，尤其從十年之內的媒體環境與內容的變遷，或許可看出媒體與民主在不同時代的意義。台灣的電視新聞品質一直為學者所詬病，但若仍對政治知識有所貢獻，則我們應該可以確認收看電視新聞與政治新聞的正向關係，當然本研究的目的並不是合理化目前欠缺品質與規範的電視新聞。

## (二) 媒介與政治參與

Verba 等人(1995: 38)將政治參與定義為「意圖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採取行動的活動」，顯然政治參與不僅只是政治關心或政治興趣，而是一種行動，包括投票、參與競選工作、與官員或民代接觸、捐款、示威，或參與非正式性的社團、地方社團、政治組織等。Verba 等人(1995)也認為心理因素影響政治參與，包括政治興趣、政治效能、價值觀、群體感及對特定議題的承諾。

除了心理因素外，政治參與也受人口背景影響。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多、職業階層較高的人，政治參與程度也較高(Milbrath and Goel 1982; 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Verba 等人(1995)的研究發現，政治參與不僅與個人的動機及機會有關，也與市民技巧(civic skills)及資

源（如足夠時間與金錢）有關。市民技巧包括個人的傳播與組織能力，而教育可讓一個人具有較佳的傳播與語言能力。另有研究指出，收入及教育程度較高、意識形態較為堅定者，政治參與度也較高(Campbell et al. 1964; Converse 1964; Nie et al. 1976)。黃秀端(1995)研究台灣省長選舉發現，民衆的教育程度可以正面預測競選參與。

媒介有守望與整合資訊的功能，收視媒介的政治新聞報導不但可以幫助閱聽大眾了解重要社會事務，也可使大眾較關心社會，因而較可能投入、參與社會事務。相關研究發現，收視媒介的公共事務報導和政治參與呈正相關，且收視公共事務報導數量越多、收視頻率越頻繁，政治參與程度越高，其中又以報紙和政治參與的關聯性最強，即讀報越多，政治參與越多(Bybee et al. 1981; Chaffee and Kanihan 1997; McLeod and McDonald 1985; McLeod et al. 1996; Scheufele and Nisbet 2002; Viswanath et al. 1990)。

然而，Scheufele (2002)認為，新聞報導中能鼓吹民衆投入有意義的政治活動之相關內容越來越少。Lemert (1981)稱這類新聞為動員資訊(mobilizing information)，所謂動員資訊包括如何註冊參加示威遊行、如何投票，或是關於公眾集會的資訊等。Lemert (1981)認為這類資訊在媒體上的匱乏，導致一般民衆不知如何參與政治過程。至於電視呈現較多的衝突畫面，是否較能引發民衆參與？Vreese 與 Boomgaarden (2006)則認為，媒介中政治衝突性較高的資訊會提高民衆的政治參與程度。Putnam (2000)認為雖然電視的娛樂性節目與各種市民參與為負面關係，但觀看電視新聞的頻率與市民行動間有正向的相關。

總而言之，過去的研究並沒有總結各種媒體、政治知識與參與變項之間的確定關係。此外，過去的研究留下一個重要的問題懸而未決：不同的新聞媒體（如電視與報紙）是否帶來不同的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影響？是否媒體當中有所謂告知功能的媒體以及動員功能的媒體？

亦即前者提升知識，後者促進行動？前者能提供特定議題各種面向的實質資訊，讓閱聽人提升知識，後者提供以政治衝突為焦點的內容，讓閱聽人行動。

### (三) 解嚴後台灣報紙與電視台的變遷

1987年報禁解除後，台灣的報紙數量激增。1987年9月《自由時報》創刊，在免費贈閱與高額贈品的行銷策略下，迅速成為《聯合報》、《中國時報》二大報的最大競爭對手。在政治立場上，根據過去研究，《自由時報》偏向民進黨，《聯合報》、《中國時報》偏向國民黨（陳憶寧 2001）。2003年5月2日香港壹傳媒的《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其色羶腥的取材、大幅採用彩色圖片，以及超低價的策略，很快對三大報的風格產生劇烈衝擊，繼而成為具有台灣民眾最常閱讀的大報（尼爾森行銷研究顧問有限公司 2009）。

在電視新聞發展上，1960年代起就陸續成立的台視、中視與華視有固定的每日三節新聞時段，1987年解嚴後，電視媒體快速發展。1996年民視成立，成為第四家無線電視台，且為第一家民營無線電視台，民進黨人士蔡同榮為第一任董事長，另有民進黨重要人士為董事會組成核心。在有線電視台方面，1990年代初期有線電視台崛起，目前有TVBS-N、TVBS、年代新聞台、東森新聞台、中天新聞台、中視新聞台、民視新聞台、三立新聞台與非凡新聞台共九個新聞台，密度居全球之冠，各台之間的競爭越加白熱化，但新聞品質卻被批評越加滑落。

可以發現從1990年代至今，不論報紙或電視，都面臨競爭者眾的挑戰，在眾多媒體瓜分有限市場的情況下，媒體必須考量以何種方式爭取閱聽人的注意。雖然缺乏實證研究佐證，但可以觀察出媒體生存的策略：在政治的面向上，媒體越加自我區隔其政黨色彩；在新聞表現風格上，越加聳動衝突導向。媒介內容的改變是否影響媒介使用與

政治知識、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

#### (四) 研究問題

基於以上文獻，本研究探討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之間的動態關係。研究設計為跨時設計，從 1993 到 2003 年，以瞭解這兩個時間點中，三者之關係是否有所不同。民衆的新聞媒體使用概念上，包含使用某類媒體的時間（例如報紙、電視新聞）以及是否暴露於媒體之政治新聞。

本研究根據文獻，發展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新聞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之間分別在 1993 年與 2003 年的關係為何？

研究問題二：1993 年與 2003 年比較，新聞媒體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產生哪些變化？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二級資料分析，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1993 年第二期第四次政治文化組以及 2003 年第四期第四次大眾傳播組調查。1993 年的研究母體定義為具有台灣國籍，並設有戶籍，年齡在二十歲至六十四歲的國民，總共成功訪問 1,964 人。2003 年調查母體則是台灣地區年滿十八歲及以上國民，總共成功訪問 2,161 人，訪問完成率約為 54%。由年齡觀之，兩次母體有相當差異，為使兩次調查可以比較，故本研究剔除 2003 年樣本中年齡小於 20 歲以及大於 64 歲者，樣本數為 1,793 人。兩次調查的樣本結構如表 1。



表 1 「變遷調查」基本人口學特質分布情形：1993, 2003 人數(%)

變項	1993	2003
性別		
男性	990 (50.4)	902 (50.3)
女性	974 (49.6)	891 (49.7)
年齡		
20-39 歲	1,199 (61.0)	954 (53.2)
40-59 歲	665 (33.9)	733 (40.9)
60 歲以上	100 (5.1)	106 (5.9)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656 (33.4)	337 (18.8)
國中	317 (16.1)	203 (11.3)
高中	569 (29.0)	563 (31.4)
專科	235 (12.0)	340 (19.0)
大學	157 (8.0)	277 (15.4)
研究所	22 (1.1)	73 (4.1)
收入		
2 萬元以下	917 (48.0)	799 (45.2)
2-5 萬元	813 (42.5)	742 (42.0)
5 萬元以上	182 (9.0)	235 (12.8)
政黨支持		
泛藍	571 (29.1)	451 (25.2)
泛綠	200 (10.2)	326 (18.2)

註：1993 年關於政黨支持的測量為「我們社會上總是有人說自己是支持「國民黨的」，有人說他是支持「民進黨的」，請問您認為自己是支持國民黨的，民進黨的，或者都不是？受訪者的回答包括：(1)國民黨的，(2)民進黨的，(3)都支持，(4)都不支持，(8)不知道。本研究將回答國民黨的歸為泛藍，回答民進黨的歸為泛綠。2003 年關於政黨支持的測量為「在現在社會中，有些人會以泛藍和泛綠區分不同的政黨，請問您比較支持哪一邊？」受訪者的回答包括：(1)非常支持泛藍，(2)支持泛藍，(3)非常支持泛綠，(4)支持泛綠，(5)都支持，(6)都不支持，(7)無意見、無所謂。本研究將回答非常支持泛藍與支持泛藍者歸為泛藍支持，非常支持泛綠與支持泛綠的歸為泛綠。



## (一) 依變項說明

### 1. 政治參與

兩次調查的政治參與題項差異極大，爲了讓兩次的資料能彼此對照，本研究採用的政治參與測量題項只能限於詢問受訪者過去的投票狀況。黃秀端(1995)研究台灣省長選舉的選民參與時，發現 92.7%的選民會參與投票，遠遠高於其他競選參與活動，包括拉票(12.1%)、遊行(4.8%)、發傳單(3.0%)、捐款(4.1%)與掛旗子等(1.7%)，因此本研究認爲，此單一指標有其代表性。本研究選取的政治參與題項，是請受訪者回答他們是否同意下列陳述句：1993 年是「請問自從您有投票權以來，每次選舉時，您去投票的情形怎樣？」受訪者回答的方式分爲：(1)每次都去投票，(2)大多數時候都去投票，(3)偶爾去投票，(4)從來不去投票。進行資料分析時，將「1」反轉爲「4」，「2」反轉爲「3」，「3」反轉爲「2」，「4」反轉爲「1」。2003 年的是「過去的公職選舉，我經常會去投票」，回答選項爲：(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4)同意，(5)非常同意。

### 2. 政治知識

1993 年政治知識測量採用六個問題測量受訪者對地方、政黨、中央政府與國際政治人物的知識（測量項目請參見「附錄」），每答對一題得分爲 1，最高爲 6 分，最低爲 0 分。2003 年採用十個問題，分別測量受訪者對政治人物、政黨立場、政府組織與國際政治的知識（測量項目請參見「附錄」），每答對一題得 1 分，最高爲 10 分，最低爲 0 分。

## (二) 自變項說明：媒介使用

爲使兩組資料可以比較，本研究只納入兩年有媒介使用共有的題項，分別爲看電視新聞的時間、看報紙的時間，以及看報紙的內容。

### 1. 看電視新聞的時間

1993 年看電視新聞的時間測量題項為「請問您平均一個星期看幾天電視上的新聞報導？」回答選項為：(1)每天都看，(2)每星期看五、六天，(3)每星期看三、四天，(4)每星期看一、二天，(5)完全不看。2003 年的題項為「過去一年內，您每週平均有幾天看電視新聞？」受訪者直接回答天數，最少 0 天，最多 7 天。

為使兩組資料可以進行比較，本研究將 1993 年的選項轉換為天數，受訪者回答「1」轉錄為 7 天，「2」轉錄為 5.5 天，「3」轉錄為 3.5 天，「4」轉錄為 1.5 天，「5」轉錄為 0 天。

### 2. 看報紙的時間

1993 年看報紙的時間測量題項為「報紙上的新聞，有些人花很多時間去看，有些人沒有時間看，請問您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看報紙？」受訪者直接回答幾小時幾分鐘。2003 年的題項為「您平均每天看報紙看多久？」受訪者直接回答幾小時幾分鐘。本研究將兩組資料的受訪者答案全數轉錄為分鐘。

### 3. 看報紙的內容

1993 年看報紙的內容測量題項為「請問您看報紙看些什麼，最常看的是那一類內容？研究將選擇「國內政治」為最常看的內容的受訪者在此題項分數設為 1，其餘選項為 0。2003 年的題項為「您看報紙最常看以下哪三類內容？」本研究將三項選擇中包含「政治」的受訪者在此題項分數設為 1，其餘選項為 0。

## (三) 人口變項

本研究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政黨認同（分為支持泛綠與支持泛藍兩個變項）。由於這些變項和民衆的政治知識與行為有關，因此將它們列為控制變項。

## 四、研究結果

### (一) 描述性資料分析

新聞媒體使用方面，1993年的資料顯示，在1,964個受訪者當中，平均每天花38.36分鐘看報紙( $SD = 49.16$ )。2003年的資料為1,437個受訪者中，平均每天花41.77分鐘看報紙( $SD = 49.04$ )，顯示對於看報的民衆而言，十年下來並未縮減時間。至於閱讀內容，1993年回答政治是最常看的報紙內容者有487人，占有有效個數1,964的24.8%。2003年回答國內政治是最常看的報紙內容（請受訪者回答最常看的三項內容，其中提到國內政治即列入）者有513人，占有有效個數1,793的28.6%，比例上，兩者差異並不大。每週看電視新聞的天數，1993年有7.3%的民衆不看電視新聞，47.7%每天看電視新聞，平均看電視新聞天數是4.85天( $SD = 2.42$ )。2003年有2.3%的民衆不看電視新聞，83.1%每天看電視新聞，平均看電視新聞天數是6.30天( $SD = 1.73$ )。明顯顯示每日收看電視新聞的人口從1993年到2003年成長超過三成，電視幾乎成爲多數民衆每天使用的新聞媒體。

1993年政治知識的測量題項共有七題，答對一題得1分，最高爲6分，最低爲0分。所有受訪者的政治知識平均值爲3.99分，標準差爲2.38。有195人爲0分，406人爲7分，答對題數上，以答對七題者最多。

2003年政治知識的測量題項共有十題，答對一題得1分，最高爲10分，最低爲0分。所有受訪者的政治知識平均值爲6.21分，標準差爲2.41。有20人爲0分，75人爲10分，答對八題者最多，共325人。

兩筆資料在政治參與上的題項差異相當大，只有在投票行爲是可以互相比較的。1993年選舉參與的測量題項爲「請問自從您有投票權

以來，每次選舉時，您去投票的情形怎樣？」回答從來不投票者有 2.7%，偶爾去投票者有 5.9%，大多數時候都去投票有 20.2%，每次都去投票有 71.2%。2003 年選舉參與的測量題項為「過去的公職選舉，我經常會去投票」，回答非常不同意者有 2.1%，不同意者有 8.4%，普通者有 13.1%，同意者有 46.5%，非常同意者有 28.4%。由以上百分比可看出，從不投票的比例沒太大變化，但是一定去投票的比例大幅下降。

## (二) 研究問題探析

爲了驗證研究假設及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對每一年的資料進行了兩項階層迴歸分析。表 2 呈現這些迴歸分析的結果：第一階層輸入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第二階層輸入政黨支持，包括支持泛藍與支持泛綠等；第三階層輸入媒介使用時間變項，包括電視新聞使用時間與報紙使用時間；第四階層輸入報紙使用內容。

階層迴歸分析是 OLS 迴歸分析的一種，表 2 呈現的是所有變項全部輸入迴歸方程式的最後 Beta 值，因此和執行標準複迴歸(standard multiple regression)的結果 (Beta 值) 完全相同。但採用階層複迴歸可以了解各階層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並在控制人口變項以及政黨支持變項後，了解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變項「媒介使用時間」與「媒介使用內容」對依變項的解釋力。

### 1. 人口變項對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預測力

表 2 中顯示 1993 年的性別、教育程度、收入是可以預測政治知識的人口變項；男性相對於女性、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其政治知識越高。2003 年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收入是可以預測政治知識的人口變項；男性相對於女性、年齡越長、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其政治知識越高。十年前後發生變化的變項爲 2003 年時年齡成爲政治知識的預測變項。

表 2 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階層迴歸分析：1993, 2003

預測變項	1993	2003	1993	2003
	政治知識		政治參與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 (男=1, 女=0)	.21***	.11 ***	-.04	-.02
年齡	-.01	.17***	.15***	.23***
教育程度	.29***	.26 ***	-.07*	-.01
收入	.09***	.13 ***	-.06*	.06*
調整 R <sup>2</sup>	.31	.22	.04	.09
第二階層				
政黨支持				
政黨支持 (泛藍=1, 其他=0)	.01	.12***	.06*	.14***
政黨支持 (泛綠=1, 其他=0)	.04*	.14***	.00	.12***
調整 R <sup>2</sup>	.00	.03	.00	.02
第三階層				
媒介使用時間				
看電視新聞時間	.24***	.08***	.09***	.06*
看報紙時間	.15***	.10***	.00	.04
調整 R <sup>2</sup> 增加	.11	.02	.02	.00
第四階層				
媒介使用內容				
看報紙的政治新聞	.12***	.18***	.02	.03
調整 R <sup>2</sup> 增加	.01	.03	.00	.00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43	.30	.05	.12

註：表格中的數據是最後迴歸方程式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表 2 中顯示 1993 年的年齡、教育程度、收入是可以預測政治參與與知識的人口變項；年齡越長、教育程度越低、收入越低，其政治參與越高。2003 年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年齡與收入仍是可以預測政治參與的人口變項；年齡越長其政治參與越高，但是與前十年不同的是收入越高反而參與越高。

十年前後發生的變化為 1993 年教育程度與政治參與負相關，2003 年時教育程度已經不是預測變項；1993 年收入與政治參與負相關，但 2003 年則是正相關。

### 2. 政黨支持變項對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預測力

表 2 中顯示，1993 年的泛綠支持者是預測政治知識的人口變項，泛綠支持者相對於其他政黨支持者，其政治知識較高。但是 2003 年的資料分析結果卻顯示不論泛藍或是泛綠均可以正面預測政治知識。

1993 年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泛藍支持者可以預測政治參與，但泛綠則否；2003 年的資料則顯示無論泛藍或是泛綠都可以正面預測政治參與。

十年前後發生的變化當中可以發現政黨支持與政治知識、政治參與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

### 3. 媒介使用時間變項對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預測力

表 2 顯示在對政治知識的預測上，1993 年看電視新聞時間與看報紙時間可以正面預測政治知識( $\beta = .24, p < .001$ ;  $\beta = .15, p < .001$ )。2003 年看電視新聞時間與看報紙時間也都可以正面預測政治知識( $\beta = .08, p < .001$ ;  $\beta = .10, p < .001$ )。

表 2 顯示在對政治參與的預測上，1993 年看電視新聞時間可以正面預測政治參與( $\beta = .09, p < .001$ )，但看報紙時間無法預測。2003 年看電視新聞時間也可以正面預測政治知識( $\beta = .06, p < .05$ )，但看報紙時間無法預測。

#### 4. 媒介使用內容變項對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預測力

表 2 顯示在對政治知識的預測上，1993 年與 2003 年看報紙的內容均可以正面預測政治知識( $\beta = .12, p < .001$ ;  $\beta = .18, p < .001$ )，但在對政治參與的預測上，1993 年與 2003 年看報紙的內容均無法預測政治參與。

## 五、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檢視新聞媒介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以 1993 年與 2003 年的「變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十年前後，媒介使用時間與媒介使用內容對政治知識的預測力相當高，林聰吉、王淑華(2007)以 2003 年的 TEDS 資料探討台灣民衆的政治知識來源時，已經發現電視新聞和報紙的接觸頻率都可以提升政治知識，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報紙的內容也有預測力。但就政治參與而言，只有媒介使用時間有預測力，而且只限於電視新聞。針對這樣的結果，本研究認為可以顯示出媒介使用對於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預測相當穩定，不受十年來新聞媒介環境改變以及政黨政治變動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出在政治行為上，電視新聞有較大的影響力，也就是說看電視新聞與看報紙都可以提高政治知識，但是對於行為上的動員，則是電視新聞優於報紙。對於從事競選活動的政治人物而言，此一發現可作為競選傳播工具使用的參考。

本研究結果也顯示，雖然電視新聞與報紙在過去十年來備受批評，但資料顯示在政治知識與政治行為上仍是正向關係。過去電視新聞報導多以衝突、策略、輸贏呈現政治人物與政治議題，可能刺激民衆的政治參與。另外，閱讀報紙的時間與閱讀報紙的政治新聞內容均能預測政治知識，卻與政治參與無關，這樣的結果不讓人意外，畢竟，報紙新聞詳盡且具有深度，雖然國內尚無學者比較報紙與電視新聞的負



面新聞量，但根據國外實證研究，報紙的政治新聞相較於電視新聞，的確是負面報導居多(Jamieson and Waldman 2002; Just et al. 2008)。然而負面的、批判式的政治新聞可能導致一般民衆對政治的疏離感，進而降低參與政治的程度(Cappella and Jamieson 1997; 陳憶寧 2002)，所以閱讀報紙的政治新聞可能反而使民衆不願參與政治。1993年的「變遷調查」並未詢問收聽廣播的狀況，而根據黃秀端(1995)的研究發現，當時收視相當高的主流媒體 TVBS "call in"節目並未能正面預測政治參與，但收聽地下電台卻可以正面預測選舉參與。研究者認為，傳播研究已經一再發現一般大眾媒介使用與政治參與的脆弱關係，未來關於政治參與的傳播研究，可以考慮納入小眾媒介使用作為自變項，例如 BBS、部落格（包括微型部落格），以及現在仍然有影響力的地下電台。

媒介的政治參與預測能力十年前後雖然沒有變化，有趣的是本研究發現，1993年時教育程度負面預測政治參與，但到了2003年時，兩者之間已無關係；1993年時收入負面預測政治參與，但到了2003年，收入正面預測政治參與。由收入、教育程度兩者與政治參與關係的變化，似乎可以推論2003年較1993年的政治參與之人口學特徵上，似乎有向上流動的現象。根據 Wolfinger 與 Rosenstone (1980)以及黃秀端(1995)，教育程度應正面預測政治參與，畢竟透過教育，民衆習得民主價值以及公民責任感。本研究顯示1993年公民教育在當時選舉情境下並沒有正面影響力，十年之後，教育中所含納的公民精神才外顯於投票行為上。當然這樣的差距也可能是因為1993年受訪者離戒嚴時代不遠，投票對於政治影響的意義與重要性不如2003年的受訪者，所以1993年教育程度高者反而過去以來投票次數不多。在收入與政治參與的關係轉變上，Wolfinger 與 Rosenstone (1980)認為有錢的人比沒錢的人負擔得起捐款，且金錢可以轉換成其他的資源，譬如可以雇用他人以照料日常瑣事，使得政治參與較為容易。但或許出於台灣國情不同，

在 1990 年代，收入高者工作時間可能較長，所以 1993 年收入與政治參與有反向關係。而 2003 年台灣週休二日已經兩年（台灣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務員週休二日），收入中等以上者，工作天數反而可能降低，因此可能使得收入可以正面預測政治參與。

在政黨支持上，1993 年時只有泛藍政黨支持能預測政治參與，但到了 2003 年兩者都可以正面預測政治參與，這樣的變化顯示政治參與和政黨認同越來越緊密，似乎也暗示選民在政治參與上有越來越強的政黨傾向，也就是說台灣可能出現了極化的政治(polarized politics)。

本研究有幾個研究限制必須提出討論。首先，本研究為二手資料分析，在題項的選擇上受到相當限制。以自變項而言，1993 年出自政治文化組的資料中較缺乏媒介使用的題項，尤其缺乏對於電視政治內容的收視情形，所以無法與閱讀報紙政治內容作比較。在應變項來說，1993 年關於政治參與的題項設計也與 2003 年不同，礙於必須進行跨年比較，只能選擇投票頻率作為政治參與的測量，雖然過去不少研究也以投票作為政治參與的測量(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但政治參與的層面相當廣泛，雖然投票是最直接的政治參與，但日常生活中的請願、媒體投書、示威，以及選舉時的造勢、拉票、捐獻等等，都算是重要的政治參與活動。另外，在政治知識的測量上，雖然所謂的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的測量飽受批評(Graber 2001; Mondak 2001)，但就算是事實知識的測量也不見得有共識。1993 年「變遷調查」的七題政治知識測量題項偏向各級政治人物的認知，不僅測量題項所指涉的概念較為偏狹，無法反映全面性的政治知識，2003 年的測量題項包含政治人物、國際政治、政治運作的不同面向，兩者在意涵上也有所差異。至於 1993 年的年齡無法預測政治知識，而 2003 年卻年齡正面預測政治知識的變化，或許與測量方法差異頗大有關。1993 年的測量均為當時在朝的政治人物，民衆不覺陌生，而 2003 年的測量涵蓋面較廣，觸及政治運作的脈絡，或許是造成年齡成為預測變項的

因素。

此外，1993 年的樣本年齡為 20 歲到 64 歲的成人，但 2003 年則是 18 歲以上的成人，本研究為使兩次調查的年齡分布可以比較，只好剔除 2003 年樣本中 20 歲以下以及 64 歲以上的受訪者，使得高齡人口（65 歲以上的樣本）不在本研究分析範圍之內。本研究建議未來進行調查的資料蒐集時，高齡人口應不可忽視，畢竟台灣絕對是朝向高齡化邁進，實有必要瞭解資深公民的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和行為。

在媒介於民主中的角色的相關討論中，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一直是重要的關鍵。媒介的內容幫助提升政治知識，但卻未必提高政治參與，未來研究應該要聚焦於分析媒介政治內容的各種元素，以釐清導致參與下降的因素。並進而採用實驗法，確定媒介內容、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之間的因果關係。

## 附錄 政治知識測量題項

### 1993 年的政治知識題項

1. 我們的縣（市）長是誰？
2. 現在民進黨主席是誰？
3. 現在立法院院長是誰？
4. 現在行政院院長是誰？
5. 現在中國大陸的總理是誰？
6. 現在美國總統是誰？
7. 現在外交部長是誰？

### 2003 年的政治知識題項

1. 您知不知道我國現任的副總統是誰？
2. 您知不知道目前我國憲法規定的總統任期是幾年？
3. 您知不知道目前立法院中哪一個政黨的立法委員最多？
4. 您知不知道現在的教育部長是誰？
5. 您知不知道新黨比較支持台灣獨立還是兩岸統一？
6. 您知不知道現在的民進黨黨主席是誰？
7. 您知不知道我國憲法的修正是由哪一個民意機關負責？
8. 您知不知道陳文茜是哪一個政黨的立法委員？
9. 您知不知道下列三個國家中，哪一個國家和台灣有正式邦交？
10. 您知不知道在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現任的行政首長是誰？

## 參考文獻

- 尼爾森行銷研究顧問有限公司(2009)2008年至2009年媒體大調查季報告。
- 何國華(2002)收視率下的集體焦慮。《中國時報》時論廣場4月28日。
- 林聰吉、王淑華(2007)台灣民衆政治知識的變遷與來源。東吳政治學報 25(3): 93-129。
- 章英華、傅仰止主編(2004)。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四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黃秀端(1995)1994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舉研究 2(1): 51-76。
- 陳憶寧(2001)總統候選人攻擊性新聞報導與其支持度的關聯：以公元兩千年總統大選為例。新聞學研究 69: 113-140。
- (2002)候選人負面新聞框架對政治憤世嫉俗感與責任歸因的影響。中華傳播學刊 1: 215-247。
- (2007)電視新聞在議題設定上的有限效果。論文發表於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陳憶寧、羅文輝(2006)媒介使用與政治資本。新聞學研究 88: 83-134。
- 羅文輝、鍾蔚文(1991)電視新聞對青少年政治知識的影響。新聞學研究 45: 81-99。
- Aarts, K. and, H. A. Semetko (2003) The Divided Electorate: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65(3): 759-784
- Bybee, C. R., J. M. McLeod, W. D. Luetscher, and G. Garramone (1981) Mass Communication and Voter Volatilit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1): 69-90.

- Campbell, A., P. E. Converse, W. Miller, and D. Stokes (1964) *The American Voter: An Abridge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Cappella, J. N., and K. H. Jamieson (1997)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pini, M. D., and S. Keeter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haffee, S. H., and S. F. Kanihan (1997)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from the Mass Med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4: 421-430.
- Chaffee, S. H., X. Zhao, and G. Leshner (1994)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Campaign Media of 1992.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305-324.
- Chaffee, S. H., and D. G. Wilson (1977) Media Rich, Media Poor: Two Studies of Diversity in Agenda-Holdi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4: 466-476.
- Converse, P. 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Pp. 206-261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ited by D. Apter. New York: Free Press.
- Dalton, R. J. (2002) *Citizen Politics: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New York: Chatham House.
- Graber, D.A. (1990) Seeing is Remembering: How Visuals Contribute to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 134-155.
- (2001) *Processing Politics: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in the Internet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ltz-Bacha, C. and P. Norris (2001) To Entertain, Inform, and Educate: Still the Role of Public Televis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123-140.
- Hooghe, M. (2002)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Time, Programs, and Station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2): 84-104.

Jamieson, K., and P. Waldman (2002) *The Press Effect: Politicians, Journalists, and the Stories that Shape the Political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st, M., A. Crigler, and T. Belt (2008) *New Media, Old Media...the Same Old 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8-31, Boston, MA.

Lemert, J.B. (1981) *Does Mass Communication Change Public Opinion After All?: A New Approach to Effective Analysis*. Chicago: Nelson-Hall.

Lo, V. H. (1994) Media Use, Involvement and Knowledge of the Gulf War.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1(1) : 45-56.

McLeod, J. M., and D. G. McDonald (1985) Beyond Simple Exposure: Media Orient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Political Process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 3-33.

McLeod, J. M., K. Daily, Z. Guo, W. P. Eveland, W. P., Jr., J. Bayer, S. Yang, and H. Wang (1996) Community Integration, Local Media Use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179-209.

Milbrath, L. W., and M. L. Goel (198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2<sup>nd</sup> e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ondak, J. J. (1995) Newspapers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513-527.

—(2001) Developing Valid Knowledge Scal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224-241.

Neuman, W. R., M. R. Just, and A. N. Crigler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Chicago: University



- of Chicago Press.
- Newton, K. (1999) Mass Media Effects: Mobilization or Media Malais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577-599.
- Nie, N., S. Verba, and J. Petrocik (1976)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 (2000)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ior, M. (2003) Any Good News in Soft News? The Impact of Soft News Preference on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149-171.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obinson, M. (1976)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 409-432.
- Robinson, J. P., and D. Davis (1990) Television News and the Informed Public: 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3): 106-119.
- Robinson, J. P., and M. Levy (1986) *The Main Source: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New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Rosenstone, S. J., and J. M.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Rueschemeyer, D. (2004) Addressing Inequa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4): 76-90.
- Scheufele, D. A. (2002) Examining Differential Gains from Mass Medi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ory Behavi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 46-65.
- Scheufele, D. A., and M. C. Nisbet (2002) Being a Citizen Online: New

- Opportunities and Dead End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3): 55-75.
- Schulz, W. (1998) Media Change and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Television: America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Communication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4): 527-543.
- Verba, S., K. L. Schlozman, and H.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ee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iswanath, K., John R. Finnegan, Jr., Brenda Rooney, Jr., and John Potter (1990). Community Ties in a Rural Midwest Community and Use of Newspapers and Cable Televis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7: 899-911.
- Vreese C. H., and H. Boomgaarden (2006) News,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News Media Exposure on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Acta Politica* 41: 317-341.
- Wolfinger, R. E., and S. J. Rosenstone (1980) *Who Vo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Zhao, X., and S. H. Chaffee (1995) Campaign Advertisements Versus Television News as Sources of Political Issue Inform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 41-65.



# 第 3 章

報紙與電視可信度：  
1993、1998 和 2003 年的比較研究

羅文輝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較 1993、1998 和 2003 年報紙與電視的可信度，並驗證作者提出的「選擇可信度」(selective credibility)理論。本研究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大眾傳播組於 1993、1998 和 2003 年進行的三次全國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在 1993、1998 和 2003 年，無論是「相對可信度」或「絕對可信度」，電視新聞的可信度都比報紙高，這樣的發現顯示，電視是台灣民眾最信任的新聞媒介。在比較報紙與電視新聞的可信度方面，本研究發現，報紙與電視新聞在 1993 年時可信度最低，在 1998 年時可信度最高，到 2003 年報紙與電視新聞的可信度又明顯下降。此外，本研究也證明新聞媒介可信度是一種「選擇可信度」，閱聽人會選擇使用和他們思想、信念較接近的媒介產品，並且認為他們選擇使用的這些媒介產品較為可信。

關鍵詞：選擇可信度、媒介可信度、報紙、電視新聞、政黨支持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News Credibility in 1993, 1998, and 2003

Ven-Hwei L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study examines respondents' perceptions of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news credibility, based on thre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1993, 1998, and 2003.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in each of these years, respondents regarded news on television as most credible.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news credibilit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1993 to 1998 and declined sharply from 1998 to 2003.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eory of selective credibility, which predicts that respondents select those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news sources that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ir existing attitudes and beliefs. Findings further show that political party affiliation i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news credibility. More important, this study found that respondents would rate those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newscasts that they read or watch most frequently as the most believabl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roposed theory of selective credibility.

*Keywords: selective credibility, media credibility, newspaper, television news, political party affiliation*

## 一、前言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較 1993、1998 和 2003 年報紙與電視的可信度，並驗證作者提出的「選擇可信度」(selective credibility)理論。

在民主社會中，可信度是新聞媒介最重要的資產。新聞媒介缺乏可信度，不僅會影響銷售量或收視率，更可能使大眾無法相信媒介提供的資訊。如果大眾無法相信新聞媒介提供的資訊，政府將無法透過新聞媒介傳達政令決策，民衆也將無法藉新聞媒介監督政府，新聞媒介告知、守望與監督政府的功能將無從發揮。因此，新聞媒介的可信度，是學術界與實務界共同關切的問題。

過去探討媒介可信度的研究，把媒介可信度分為「相對可信度」(relative credibility)與「絕對可信度」(absolute credibility) (Schweiger 2000；羅文輝等人 2003)，並從這兩種角度分析媒介可信度。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即依循過去的研究傳統，採用「相對可信度」與「絕對可信度」兩種方式，來比較這三個年度報紙與電視的可信度。

新聞媒介大致可分為媒介類型（如報紙、電視、雜誌等）與媒介產品（如報紙中的聯合報、中國時報，電視中的台視、民視、TVBS 等）。過去探討新聞媒介可信度的研究大多比較不同媒介類型的可信度，很少研究媒介產品的可信度。因此，作者曾提出「選擇可信度」的概念（羅文輝 2004），並把媒介可信度分為媒介類型(media types)與媒介產品(media products)兩種可信度，嘗試從新的角度探討媒介可信度。作者認為媒介產品可信度是一種「選擇可信度」，閱聽人會選擇使用和他們思想、信念較接近的媒介產品，並且認為他們選擇使用的這些媒介產品較為可信（羅文輝 2004）。換言之，媒介產品可信度是閱聽人選擇的結果，因此可視為「選擇可信度」。

本研究的另一目的，即在驗證「選擇可信度」理論，以中央研究



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進行的三次大眾傳播組調查資料，嘗試證明閱聽人較常使用的媒介產品，就是他們較相信的媒介產品。

換言之，本研究將證明媒介使用與媒介可信度具有正相關，由於過去探討「相對可信度」與「絕對可信度」的研究，大多發現媒介使用對媒介可信度的預測力相當有限（Rimmer and Weaver 1987；羅文輝等人 2003），因此本研究除了驗證「選擇可信度」理論外，也將對媒介使用與媒介可信度間的關係提出新的解釋與測量方法。

## 二、相關文獻

### （一）1993、1998 和 2003 年的新聞媒介環境

在 1993 年時，台灣的報紙已經享有相當高的新聞自由。政府在 1987 年宣布解除戒嚴，並在 1988 年廢除報禁政策。解除戒嚴與廢除報禁使報紙享有的自由明顯提升。在報禁政策解除後的最初幾年，《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大報系掌控台灣報業 70% 以上的市場。雖然兩大報曾致力提升文化水準、提倡民主價值，但在政治上，兩報卻明顯支持國民黨，打擊反對運動。

在 1993 年以前，《自由時報》發行量非常有限（羅文輝、陳世敏 1993）。但該報在 1992 年推出一系列贈獎促銷活動後，發行量迅速增加（Wang and Lo 2000）。近年來，《自由時報》在發行量上，已經超越聯合、中時，成為台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該報在政治上支持民進黨，並以宣揚「台灣主權獨立」為辦報宗旨，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和兩大報有明顯的區隔。2003 年 4 月，《蘋果日報》在台發行，以聳動的新聞報導手法及獨特的行銷方式，很快成為台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目前台灣報業呈現聯合、中時、自由、蘋果四分天下的局面，但整體

報業面臨有線電視與網際網路等新媒介的強力競爭，不但廣告量衰退，發行人也逐步下滑，多數報紙處境艱困，報業正面臨景氣的寒冬。

在電視方面，在 1993 年以前，台灣只有三家無線電視台。這三家無線電視台雖然是商業電視台，卻分別由黨政軍所控制。台視的主要股東是台灣省政府，中視的主要股東是國民黨，華視的主要股東是國防部（鄭瑞城 1988）。政府和國民黨透過對三台資本結構的控制，不僅控制了台三台的人事，更控制了台三台的新聞，使電視新聞成為政府實施意識形態控制的利器(Lo et al. 1998)。

政府在 1994 年公布實施〈有線電視法〉，有線電視台得以合法經營後迅速成長。「變遷調查」資料顯示，在 1998 年時，台灣地區擁有電視的家庭中，已有 77.1% 裝設有線電視；到 2003 年，擁有電視的家庭已經有 83.6% 裝設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合法化後，電視台享有的新聞自由大幅提升，各有線電視頻道紛紛開播。在 2003 年，每天定時播放新聞的電視頻道大約有十五個，其中七個頻道是專門播報新聞的新聞專業頻道（TVBS、TVBS-N、東森、東森 S 台、民視有線台、中天、三立等）。

在無線電視方面，除了原有的三家電視台外，政府在 1995 年把第四家無線電視台的執照，頒給了民進黨人士控制的「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成立龐大的新聞部，在 1997 年 5 月開播，並推出二十四小時的新聞專業頻道「民視新聞台」(Wang and Lo 2000)。台灣的電視新聞步入百家爭鳴的激烈競爭時代，電視享有的新聞自由已經大幅提升。

## (二) 可信度的意涵

在早期的研究中，可信度常被視為等同於「可相信度」(believability)，是一種對人物、事件與資訊可信度的認知(Jacobson 1969; Metzger et al. 2003; Savolainen 2007)。近年的研究則把可信度分

成「消息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訊息可信度」(message credibility)與「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Kiousis 2001; Metzger et al. 2003)。「消息來源可信度」主要探討傳播者(包括個人、團體、組織)的可信度,「訊息可信度」分析訊息結構與訊息內容可信度,「媒介可信度」則探討媒介通道(channels)的可信度(Metzger et al. 2003)。

本研究主要探討媒介可信度,由於過去探討媒介可信度的相關研究,絕大多數以新聞媒介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民衆對新聞媒介或新聞可信度的認知與態度,因此在本研究中,媒介可信度即指新聞媒介可信度。此外,本研究並把媒介可信度分成「媒介類型」(media types)與「媒介產品」(media products)兩種可信度。在本研究中,可信度是閱聽人對新聞消息來源、新聞與新聞媒介可信度的評估,媒介可信度則是閱聽人對新聞媒介類型或新聞媒介產品可信度的認知。

在探討媒介類型可信度方面,本研究將依據過去的研究傳統(Schweiger 2000; 羅文輝等人 2003),把媒介類型可信度分為「相對可信度」與「絕對可信度」兩種,以比較受訪者對不同類型媒介可信度的認知;但在探討媒介產品可信度方面,本研究提出「選擇可信度」概念,嘗試證明閱聽人會選擇使用和他們思想、信念較接近的媒介產品,並認為他們選擇使用的媒介產品較為可信。以下的相關文獻將分別說明「絕對可信度」、「相對可信度」、與「選擇可信度」。

### 1. 絕對可信度

絕對可信度指閱聽人對各類媒介可信度的評估(Schweiger 2000),在過去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詢問受訪者:我們想知道您對(報紙、電視、廣播、雜誌)新聞可信度的意見。如果完全可信是100%(相信程度從0%到100%),您會相信(報紙、電視、廣播、雜誌)新聞的百分比有多少?(Carter and Greenberg 1965; 羅文輝、陳世敏 1993)。

### 2. 相對可信度

相對可信度是指當不同類型的媒介對同一事件報導不一致時,閱

聽人對不同類型媒介可信度的評估(Schweiger 2000)。Roper 機構(Roper Organization)從 1950 年代末期便開始比較不同類型媒介的相對可信度，該機構測量相對可信度的方法，是問受訪者下列問題：如果您發現廣播、電視、雜誌或報紙對同一則新聞的報導不一致或不同，對這四種不同報導，您會傾向相信哪一種——廣播、電視、雜誌、還是報紙？從 1961 年開始，Roper 機構便發現，電視已經取代報紙成為美國民衆最相信的媒介(Roper Organization 1979)。由於 Roper 機構測量相對可信度的方法簡單易行，而且對可信度的定義明確，因此最常被學術研究所採用(Gaziano and McGrath 1986)。

近年來，學者們嘗試發展測量可信度的指標，其中最受重視的是 Gaziano 與 McGrath (1986)的研究，他們的研究發現，報紙可信度呈現兩個面向：「報導可信」(credibility)與「社會關切」(social concerns)。其中「報導可信」面向包括十二個題項：能被信任或不被信任、意見與事實分離或未加分離、事實或意見、告知全部新聞或未告知全部新聞、正確或不正確、偏頗或不偏頗、公平或不公平、尊重人們的隱私、關切大眾利益或關切獲取利潤、關心或不關心社區福祉、記者訓練良好或訓練不佳、注意或不注意讀者／觀眾的興趣；「社會關切」面向包括三個題項：道德或不道德、注意或不注意讀者的想法、聳動或不聳動。

另外較受重視的研究，是 Meyer (1988)的研究，他指出「報導可信」這個面向只需要採用下列五個題項：公平、不偏頗、告知全部新聞、正確、能被信任，即可達到相當高的信度(Cronbach Alpha = .80)，因此是測量「報導可信」這個面向的最佳指標。後續研究也證實，Meyer 建議的指標，無論信度與效度都相當高，是測量「報導可信」的適當指標(West 1994)。

因此，本研究在比較報紙與電視新聞的絕對可信度時，參考 Gaziano 與 McGrath (1986)、Meyer (1988)的研究，採用五個題項進行

測量。在相對可信度方面，本研究參考 Roper 機構採用的測量方式，探討當各媒介的報導不一致時，閱聽人最相信的媒介；同時探討社會發生複雜或爭議事件時，閱聽人最相信的媒介。詳細的絕對可信度與相對可信度測量題項及測量方法，將在隨後的研究方法中加以說明。

基於上述分析，在比較報紙與電視新聞的絕對可信度與相對可信度方面，本研究以媒介類型為測量單位，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在 1993、1998 和 2003 年，報紙與電視新聞的「絕對可信度」是否有所不同？

由於 1993 年的「變遷調查」並未測量相對可信度，只能分析 1998 和 2003 年的調查資料，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二：在 1998 和 2003 年，報紙與電視新聞的「相對可信度」是否有所不同？

### 3. 選擇可信度

「選擇可信度」認為閱聽人會選擇使用和他們思想、信念較接近的媒介產品，並且認為他們選擇使用的這些媒介產品較為可信。換言之，閱聽人越常使用某一種媒介產品，越會傾向認為該媒介產品比較可信。由於媒介產品可信度是閱聽人選擇的結果，因此可視為「選擇可信度」。

有關選擇性暴露(selective exposure)方面的研究發現，人們在接觸傳播媒介提供的訊息時，會有意無意地選擇符合自己思想、信念及態度的訊息，並避開不符合自己思想、信念及態度的訊息(Cotton 1985; Zillman and Bryant 1985)。依據選擇性暴露理論，閱聽人在選擇媒介產品時，也可能會選擇較符合他們思想、信念及態度的媒介產品，並避開和自己思想、信念及態度不符的媒介產品。因此閱聽人最常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很可能就是最符合他們思想、信念及態度的報紙與電視新聞。

作者曾以整組縱貫研究(panel study)比較 1992 和 2002 年報紙與電

視新聞的可信度（羅文輝 2004），發現無論在 1992 或 2002 年，受訪者最常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都是預測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的最有力變項。在 1992 年最常看聯合／中時者，最相信聯合／中時的機率，是最常看其他報紙者的 11.55 倍；在 1992 年最常看台視新聞者，最相信台視新聞的機率，是最常看其他電視新聞者的 30.89 倍；在 2002 年最常看聯合／中時者，最相信聯合／中時的機率，是最常看其他報紙者的 76.72 倍；在 2002 年最常看民視新聞者，最相信民視新聞的機率，是最常看其他電視新聞者的 38.86 倍。換言之，閱聽人最常收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往往就是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

由於閱聽人最常收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是閱聽人依據自己的思想、信念、態度加以選擇的結果，因此閱聽人最常收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也可能是他們較依賴的報紙與電視新聞。例如，對平常最常閱讀《聯合報》的讀者而言，《聯合報》不僅是他們了解國內外大事的主要消息來源，也可能就是他們較依賴的新聞媒介。過去的研究發現，媒介依賴和媒介可信度呈正相關，越依賴某種媒介，越相信該媒介報導的新聞（Johnson and Kaye 1998, 2001; Wanta and Hu 1994；羅文輝等人 2003）。羅文輝等人(2003)的研究就發現，個人對某一媒介的依賴程度越高，會越注意該媒介上的新聞，並對該媒介產生較高的情感，因而較相信該媒介報導的新聞。基於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受訪者收看各報與各電視新聞的頻率和他們對各報與各電視新聞可信度的評估具有關聯性。

假設二：受訪者最常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和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具有關聯性。

雖然過去的研究發現，影響閱聽人選擇媒介與相信媒介的因素很多(Bogart 1989; McQuail 1997; Metzger et al. 2003)。本研究認為，在台灣地區，政黨認同可能是影響閱聽人選擇報紙或電視新聞的重要因素。因為過去的研究顯示，無論報紙與電視新聞都有明顯的政治偏差



(political bias) (Lo et al. 1998；羅文輝、黃葳葳 2000)，閱聽人選擇的報紙或電視新聞，往往是最符合他們思想、信念及態度的報紙或電視新聞。閱聽人的政黨認同，可能是決定他們選擇與相信報紙與電視新聞的關鍵因素。羅文輝、陳世敏(1993)的研究就發現，越支持執政黨（國民黨）的人，對報紙和電視新聞的可信度評價越高。因此，本研究認為受訪者的政黨認同會和他們最常看與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具有關聯性。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三：受訪者對各政黨的支持程度和他們對各報與各電視新聞可信度的評估具有關聯性。

假設四：受訪者支持的政黨和他們最常看及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具有關聯性。

### 三、研究方法

#### (一) 抽樣方法與訪問

本研究資料來自「變遷調查」大眾傳播組於 1993、1998 和 2003 年進行的三次全國調查。這三次調查均採面訪方式，以台灣地區年滿十八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為研究母體，並以台灣地區戶籍資料檔為抽樣名冊，利用分層等機率三階段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抽出受訪對象，1993 年的調查訪問 1,946 人，1998 年的調查訪問 1,920 人，2003 年的調查則訪問 2,161 人。

#### (二) 研究變項

##### 1. 絕對可信度

「變遷調查」的這三次全國調查都以若干題項測量報紙與電視新聞的可信度，但三次調查採用的測量題項並不完全相同，其中至少有



兩次調查都採用的測量題項共有下列五題：(1)反映各界意見、(2)報導完整、(3)立場中立、(4)值得相信、(5)公正。在 1993 年的調查未採用(5)公正這個指標，2003 年的調查則未採用(3)立場中立這個指標。此外，這三次調查均請受訪者針對報紙和電視新聞的整體表現分別加以評分。評分標準最高為 10 分，最低 0 分。

本研究建構報紙與電視新聞絕對可信度指標的方法，是把 1993、1998 和 2003 年受訪者對報紙與電視新聞各個題項的評分加起來除以題項數，受訪者評分越高，表示對報紙與電視新聞絕對可信度的評價越高。

## 2. 相對可信度

測量各類媒介「相對可信度」的方法係參考 Roper 機構(1979)與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ASNE) (1985)的方法。詢問受訪者：如果您發現報紙、電視、廣播、或雜誌對同一事件的報導不一致或不同時，您會比較相信那一種媒介的報導？回答選項包括：(1)報紙、(2)電視、(3)雜誌、(4)廣播、(5)不知道。另一測量題項則詢問受訪者：如果社會上發生爭議的事件或是很難了解的事，您覺得報紙、電視、雜誌、廣播中的那一種最能幫助您了解所發生的事？回答選項包括：(1)報紙、(2)電視、(3)雜誌、(4)廣播、(5)不知道。

## 3. 選擇可信度

本研究採用的第三種測量媒介可信度方法，是測量報紙與電視新聞的「選擇可信度」，由於「變遷調查」在 1993 年及 1998 年的調查並未測量選擇可信度，只在 2003 年的調查中設計測量選擇可信度的題項。2003 年的調查先詢問受訪者：平常最常看哪一份報紙？最常看哪一台的電視新聞？然後再詢問受訪者：最相信哪一份報紙？最相信哪一台的電視新聞？回答方式採開放方式(open ended)，由受訪者自行填答。

#### 4. 政黨支持

在 2003 年的調查中，測量政黨認同的方法，是詢問受訪者個人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由受訪者從(1)國民黨、(2)民進黨、(3)親民黨、(4)新黨、(5)台聯、(6)建國黨、(7)其他政黨、(8)不支持任何政黨、(9)不知道中，選擇一個答案。在進行統計分析時，本研究把(1)國民黨、(3)親民黨、(4)新黨合併成「認同泛藍」，把(2)民進黨、(5)台聯、(6)建國黨合併成「認同泛綠」，並把(7)其他政黨與(8)不支持任何政黨合併為「其他」。

此外，在 2003 年的調查中，除了測量政黨支持，也同時詢問受訪者個人對國民黨及民進黨的支持程度，回答方式採 5 點量表，從(1)非常不支持，到(5)非常支持。

#### 5. 人口變項

由於過去的研究顯示，性別（Carter and Greenberg 1965; Mulder 1980; Johnson and Kaye 1998；葉恆芬 2000）、年齡（Mulder 1980; Gantz 1981；羅文輝、陳世敏 1993；葉恆芬 2000）與教育程度（羅文輝、陳世敏 1993）會影響受訪者對「媒介可信度」的認知，因此本研究把這三個人口變項列為控制變項，希望在控制這些變項的影響後，探討政黨認同、媒介使用和報紙與電視新聞可信度的關聯性。

## 四、資料分析

### (一) 研究問題探析

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探討在 1993、1998 和 2003 年報紙與電視新聞的「絕對可信度」是否有所不同。表 1 呈現報紙新聞在「絕對可信度」各題項的得分。可以看出在 2003 年時，報紙在「反映各界意見」、「值得信賴」、「公正」及「合併指標」上的得分比 1993 及

1998年時低。其中差距較大的是「反映各界意見」；至於整體可信度評分，報紙新聞可信度在1993年時最低（平均6.26），1998年最高（平均6.90），2003年則居中（平均6.36）。

表2呈現電視新聞在各可信度題項的得分。在1993年時，電視新聞在「報導完整」、「立場中立」、「值得相信」、「合併指標」及

表1 報紙新聞可信度的比較：1993, 1998, 2003（絕對可信度）

題項／年	1993	1998	2003
反映各界意見	2.50 (.61)	2.58 (.60)	2.37 (.63)
報導完整	2.43 (.62)	2.47 (.60)	2.47 (.63)
立場中立	2.31 (.59)	2.22 (.55)	--
值得相信	2.27 (.56)	2.41 (.55)	2.33 (.55)
公正	--	2.22 (.52)	2.16 (.56)
合併指標	2.37 (.44)	2.37 (.39)	2.33 (.44)
整體可信度評分	6.26 (1.69)	6.90 (1.55)	6.36 (1.91)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數字為標準差。除了整體可信度評分範圍為0分至10分外，其他指標的評分範圍均為1分至5分。分數越高代表可信度越高。

表2 電視新聞可信度的比較：1993, 1998, 2003（絕對可信度）

題項／年	1993	1998	2003
反映各界意見	2.48 (.66)	2.58 (.58)	2.44 (.63)
報導完整	2.37 (.64)	2.59 (.58)	2.57 (.62)
立場中立	2.37 (.67)	2.41 (.57)	--
值得相信	2.36 (.56)	2.59 (.57)	2.41 (.57)
公正	--	2.36 (.56)	2.29 (.58)
合併指標	2.38 (.48)	2.50 (.42)	2.43 (.46)
整體可信度評分	6.59 (1.74)	7.64 (1.50)	7.09 (1.70)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數字為標準差。除了整體可信度評分範圍為0分至10分外，其他指標的評分範圍均為1分至5分。分數越高代表可信度越高。

「整體可信度評分」方面的得分都最低。在 1998 年時，電視新聞的可信度在各題項上的得分，也比 1993 和 2003 年高。換言之，電視新聞的可信度在 1993 年時最低，到 1998 年時提升，但到 2003 年時下降。

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問題探討在 1998 和 2003 年報紙與電視新聞的「相對可信度」是否有所不同。表 3 顯示，在各媒介對同一事件報導不一致時，無論在 1998 或 2003 年，電視都是受訪者最相信的媒介，其次是報紙，雜誌與廣播則遙遙落後。雖然在 2003 年時，相信電視新聞的人數比例比 1998 年低。但整體而言，在 1998 和 2003 年，當不同媒介對同一事件報導不一致時，受訪者表示最相信某一媒介的人數比例並無變化。值得注意的是，2003 年的調查加上網路，最相信網路的人數比例為 5.8%，雖然遠落後於電視與報紙，但已經超越廣播與雜誌，成為受訪者第三相信的媒介。

如果要求受訪者從各媒介中選擇一種作為了解國內外新聞的管道，表 4 顯示，無論在 1998 或 2003 年，電視都是受訪者的第一選擇，其次是報紙，選擇雜誌與廣播的人數和選擇電視與報紙者有很大的差距。從表 4 中可以看出，在 1998 與 2003 年時選擇電視新聞的受訪者人數比例並無變化，但在 2003 年選擇報紙的人數比例，比在 1998 年時減

表 3 受訪者在各媒介對同一事件報導不一致時最相信的媒介  
(相對可信度)

媒介	1998	2003
電視	1,066 (75.3)	1,439 (71.8)
報紙	237 (16.7)	317 (15.8)
雜誌	65 (4.6)	51 (2.5)
廣播	47 (3.3)	81 (4.0)
網路	--	116 (5.8)
合計	1,415 (100)	2,004 (100)

註：表中數字為人數，括號中數字為百分比。

表 4 受訪者認為最能幫助了解社會事件的媒介（相對可信度）

媒介	1998	2003
電視	1,368 (74.8)	1,586 (74.8)
報紙	350 (19.1)	268 (12.6)
雜誌	47 (2.6)	30 (1.4)
廣播	65 (3.6)	77 (3.6)
網路	--	158 (7.5)
合計	1,830 (100)	2,119 (100)

註：表中數字為人數，括號中數字為百分比。

少 6.5%。2003 年的調查加上網路後，選擇網路的人數比例達 7.5%，超過廣播與雜誌，成為受訪者了解國內外新聞的第三選擇。

## (二) 假設驗證

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預測，受訪者收看各報與各電視新聞的頻率 and 他們對各報與各電視新聞可信度的評估具有關聯性。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本研究進行了系列複相關分析，表 5 呈現相關分析的結果。

表 5 顯示，在控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報紙和電視新聞暴露的情形下，受訪者收看各報及各台電視新聞的頻率，都和他們對各報及各台電視新聞可信度的評估呈正相關，而且所有的相關係數均達  $p < .001$  的顯著水準，換言之，受訪者越常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就是他們越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獲得有力的支持。

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預測，受訪者最常收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和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具有關聯性。為了驗證這個假設，作者進行了系列卡方分析，表 6 至表 8 呈現卡方分析的結果。

表 6 顯示，2003 年受訪者最常看的報紙和最相信的報紙具有關聯 ( $\chi^2 = 1796.54, p < .001$ )。在 2,161 位受訪者中，有 357 人（占 16.5%）

表 5 報紙與電視新聞的收看頻率及可信度之相關分析：2003

	收看頻率	可信度	相關係數
報紙			
聯合報	2.00 (2.64)	3.02 (.65)	.25***
中國時報	1.95 (2.54)	3.05 (.62)	.21***
自由時報	2.31 (2.75)	3.04 (.65)	.24***
蘋果日報	1.01 (1.90)	2.81 (.68)	.17***
電視			
台視	2.12 (2.65)	3.09 (.59)	.19***
中視	2.27 (2.74)	3.12 (.60)	.24***
華視	2.01 (2.58)	3.09 (.58)	.19***
民視	3.17 (2.96)	3.16 (.66)	.31***
公視	.86 (1.78)	3.10 (.63)	.15***
TVBS	3.11 (2.97)	3.13 (.64)	.27***
東森	3.03 (2.92)	3.13 (.62)	.28***
中天	2.36 (2.77)	3.09 (.61)	.28***
三立	2.64 (2.85)	3.10 (.61)	.25***

註：收看頻率為平均每星期收看的天數，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可信度為平均數，評分範圍為 1 分（非常不相信）至 5 分（非常相信），分數越高代表越相信，括號中數字為標準差；相關係數為收看頻率與可信度的淨相關係數（控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報紙收視與電視新聞收視）。報紙樣本數 1,527、電視樣本數 2,038。

\*\*\*  $p < .001$

表 6 最常看的報紙與最相信的報紙之交叉分析：2003

		最相信的報紙				
		中時	聯合	自由	其他	合計
最常看的報紙	中時	154 (43.1)	21 (5.9)	14 (3.9)	168 (47.1)	357 (16.5)
	聯合	11 (3.0)	191 (51.9)	7 (1.9)	159 (43.2)	368 (17.0)
	自由	16 (3.3)	10 (2.1)	229 (47.0)	232 (47.6)	487 (22.5)
	其他	38 (4.0)	25 (2.6)	36 (3.8)	850 (89.6)	949 (43.9)
	合計	219 (10.1)	247 (11.4)	286 (13.2)	1,409 (65.2)	2,161 (100)

註：表中數字為人數，括號中數字為百分比。

$\chi^2 = 1796.54, p < .001$

最常看《中國時報》，其中有 154 人（占 43.1%）最相信《中國時報》；最常看《聯合報》者為 368 人（占 17%），其中有 191 人（51.9%）最相信《聯合報》；最常看《自由時報》的受訪者有 487 人（22.5%），其中 229 人（47%）最相信《自由時報》；最常看其他各報有 949 人（占 43.9%），其中最相信其他各報的有 850 人（占 89.6%）。

表 7 顯示，2003 年受訪者最常看的電視新聞，也大致是他們最相信的電視新聞（ $\chi^2 = 1125.05, p < .001$ ）。為了便於分析，作者把台視、中視、華視合併為「老三台」，並把 TVBS、TVBS-G 及 TVBS-N 合併為「TVBS」，老三台、TVBS 及民視以外的各台合併為「其他」。這種區分方式的理由，是因為老三台均為無線電視台，且在 2000 年前均受國民黨控制，新聞報導也明顯偏袒國民黨；TVBS 為民營有線電視台，其新聞收視率遠高於其他有線電視台；至於民視，則因該台由民進黨人士掌控，新聞報導明顯支持民進黨，而且在 2003 年的「變選調查」資料中，受訪者最常看民視新聞的人數高達 21.2%。

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在 2,161 位受訪者中，有 563 人（占 26.1%）最常看老三台新聞，其中有 276 人（49%）最相信老三台的新聞；最常收看民視新聞的有 311 人（占 14.4%），其中有 142 人（45.7%）最相信民視新聞；最常收看 TVBS 新聞的受訪者有 160 人（占 7.4%），

表 7 最常看的電視新聞與最相信的電視新聞之交叉分析：2003

		最相信的電視新聞				合計
		老三台	民視	TVBS	其他	
最常看的電視新聞	老三台	276 (49.0)	18 (3.2)	4 (0.7)	265 (47.1)	563 (26.1)
	民視	19 (6.1)	142 (45.7)	6 (1.9)	144 (46.3)	311 (14.4)
	TVBS	7 (4.4)	2 (1.3)	70 (43.8)	81 (50.6)	160 (7.4)
	其他	47 (4.2)	49 (4.3)	27 (2.4)	1,004 (89.1)	1,127 (52.2)
	合計	349 (16.1)	211 (9.8)	107 (5.0)	1,494 (69.1)	2,161 (100)

註：表中數字為人數，括號中數字為百分比。

$\chi^2 = 1125.05, p < .001$



其中 70 人(43.8%)最相信 TVBS 新聞；最常收看其他電視新聞的有 1,127 人(52.2%)，其中有 1,004 人（占 89.1%）最相信其他台的電視新聞。

換言之，表 6 與表 7 的數據顯示，受訪者最常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大致就是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假設獲得支持。

表 8 顯示受訪者最可能選擇的媒介類型與最相信的媒介類型之關係。可以看出，受訪者最可能選擇的媒介類型，大致就是他們最相信的媒介類型( $\chi^2 = 1230.91, p < .001$ )。在 2,161 位受訪者中，最可能選擇報紙的受訪者有 268 人（占 12.4%），其中有 170 人(63.4%)最相信報紙；最可能選擇電視的有 1,586 人（占 73.4%），其中最相信電視的有 1,313 人(82.8%)；最可能選擇其他媒介的有 307 人(14.2%)，其中最相信其他媒介的有 214 人（占 69.7%）。本研究這項發現，為選擇可信度理論提出了更多一層的證據，也把選擇可信度理論的運用範圍，從媒介產品擴展至媒介類型。

本研究第三個假設預測受訪者對各黨的支持程度和他們對各報與各電視新聞可信度的評估具有關聯性。表 9 顯示，在控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報紙及電視新聞暴露的情形下，受訪者對國民黨的支持度和他們對各報與各電視新聞相信程度呈顯著相關；受訪者對民進黨的

表 8 最可能選擇的媒介與最相信的媒介之交叉分析：2003

最可能選擇的媒介	最相信的媒介			
	報紙	電視	其他	合計
報紙	170 (63.4)	57 (21.3)	41 (15.3)	268 (12.4)
電視	123 (7.8)	1,313 (82.8)	150 (9.5)	1,586 (73.4)
其他	24 (7.8)	69 (22.5)	214 (69.7)	307 (14.2)
合計	317 (14.7)	1,439 (66.6)	405 (18.7)	2,161 (100)

註：表中數字為人數，括號中數字為百分比。

$\chi^2 = 1230.91, p < .001$

表 9 支持政黨與報紙及電視新聞可信度之相關分析：2003

	支持國民黨	支持民進黨
報紙		
聯合報	.26***	-.18***
中國時報	.24***	-.12***
自由時報	-.09**	.16***
蘋果日報	.10***	-.02
電視		
台視新聞	.12***	.04
中視新聞	.18***	-.04
華視新聞	.16***	.01
民視新聞	-.07**	.24***
公視新聞	.10***	.06**
TVBS 新聞	.15***	-.01
東森新聞	.16***	-.02
中天新聞	.16***	-.03
三立新聞	.08***	.06**

註：表中數字為淨相關係數（控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報紙收視與電視新聞收視）。報紙樣本數 1,521、電視樣本數 2,029。

\*\*\*  $p < .001$ , \*\*  $p < .01$

支持程度則只對三份報紙和三家電視新聞的可信度呈相關。越支持國民黨的人，越不相信《自由時報》與民視新聞，但越相信其他報紙及電視台的新聞；越支持民進黨的人，越不相信《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但越相信《自由時報》、民視、公視及三立新聞。這些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大致獲得支持。

本研究第四個假設預測，受訪者支持的政黨和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具有關聯性。表 10 及表 11 呈現統計分析的結果。從表 10 可以看出，認同泛藍的受訪者最相信《聯合報》及《中國時報》的比例較高，而認同泛綠的受訪者最相信《自由時報》的比例較高( $\chi^2 =$

表 10 政黨認同與最相信的報紙之交叉分析：2003

		政黨認同			合計
		泛藍	泛綠	其他	
最相信的報紙	中時	75 (15.0)	34 (8.2)	110 (8.8)	219 (10.1)
	聯合	116 (23.2)	23 (5.5)	108 (8.7)	247 (11.4)
	自由	50 (10.0)	108 (26.0)	128 (10.3)	286 (13.2)
	其他	259 (51.8)	251 (60.3)	899 (72.2)	1,409 (65.2)
	合計	500 (23.1)	416 (19.3)	1,245 (57.6)	2,161 (100)

註：表中數字為人數，括號中數字為百分比。

$\chi^2 = 184.61, p < .001$

表 11 政黨認同與最相信的電視新聞之交叉分析：2003

		政黨認同			合計
		泛藍	泛綠	其他	
最相信的電視新聞	老三台	112 (22.4)	37 (8.9)	200 (16.1)	349 (16.1)
	民視	13 (2.6)	100 (24.0)	98 (7.9)	211 (9.8)
	TVBS	32 (6.4)	18 (4.3)	57 (4.6)	107 (5.0)
	其他	343 (68.6)	261 (62.7)	890 (71.5)	1,494 (69.1)
	合計	500 (23.1)	416 (19.3)	1,245 (57.6)	2,161 (100)

註：表中數字為人數，括號中數字為百分比。

$\chi^2 = 149.60, p < .001$

184.61,  $p < .001$ )。表 11 則顯示，認同泛藍的受訪者最相信老三台的比例較高，最相信民視新聞的比例非常低；而認同泛綠的受訪者最相信民視新聞的比例較高( $\chi^2 = 149.60, p < .001$ )。因此，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獲得支持。

##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是比較 1993、1998 和 2003 年報紙與電視的可信度。研究結果發現，在三年的調查中，無論是「相對可信度」

或「絕對可信度」，電視新聞的可信度都比報紙高，這樣的發現顯示電視是台灣地區民衆最信任的新聞媒介。

在比較報紙與電視新聞的可信度方面，本研究發現，報紙與電視新聞在 1993 年時可信度最低，在 1998 年時可信度最高，到 2003 年又明顯下降。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和政府政策與媒介生態有密切的關係。在 1993 年時，有線電視尚未合法化，三台電視新聞均受政府控制；報紙雖然較為自由，但聯合與中時掌握七成以上台灣報業市場，兩報均較支持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到 1998 年時台灣已有七成家庭裝設有線電視，有線電視的發展及二十四小時電視新聞台的出現，大幅提升電視新聞播出的時間及多元化；在報紙方面，《自由時報》在 1990 年代中期迅速成長，成為和聯合、中時鼎足而立的三大報之一，不僅使報業競爭更為激烈，也提供民衆不同的選擇。這些因素可能促使報紙與電視新聞可信度在 1998 年上升。

在 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藍綠嚴重對峙，報紙與電視新聞的政治偏差情形更為明顯，新聞公正性廣受各界批評（羅文輝等人 2007）。再加上台灣經濟成長率在 2001 年首次出現負成長，傳統產業大量出走，報紙與電視廣告量下滑，經營困難。而《壹週刊》與《蘋果日報》2003 年成功在台發行，聳動的報導手法影響台灣各報及電視新聞的報導方式。在 2003 年以前，報紙與電視新聞雖然也有聳動報導的手法，但聳動的內容與數量均無法和 2003 年時相提並論。到 2003 年以後，不僅各報與各電視台新聞聳動報導、侵犯隱私的情形大幅增加，錯誤報導與捏造新聞的情形也明顯增加，因此報紙與電視新聞的可信度也隨之下降。

當然，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驗證選擇可信度理論。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最常收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均是預測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的最佳變項。換言之，受訪者最常收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

通常就是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這樣的發現顯示，新聞媒介使用和新聞媒介可信度間的關係，應重新評估。過去探討新聞媒介使用與新聞媒介可信度關係的研究，大多以新聞媒介類型為測量單位，詢問受訪者使用各類新聞媒介的時間，以及他們對各類新聞媒介可信度的認知，然後再檢視新聞媒介使用與新聞媒介可信度的關聯性。本研究證實，如果改以新聞媒介產品為測量單位，則新聞媒介產品使用和新聞媒介產品可信度間的關係將會較為明顯。由於受訪者使用的是新聞媒介產品，對所使用的新聞媒介產品應該比較熟悉，因此受訪者使用新聞媒介產品的頻率，應該是預測他們對新聞媒介產品可信度認知的最佳變項。

本研究提出的選擇可信度概念，不僅可以協助釐清媒介使用與媒介產品可信度間的關係，更有助於擴展認知失諧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的範疇。過去探討認知失諧理論的學者，提出選擇性暴露、理解及記憶的概念，認為閱聽人會選擇使用最符合自己思想、信念與態度的媒介訊息，並依照自己的思想、信念及態度去理解與記憶所接觸的媒介訊息。本研究進一步證實，受訪者最常收看的報紙與電視新聞，通常就是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換言之，閱聽人可能會傾向認為他們選擇使用的媒介產品最為可信，在接觸媒介訊息時不僅會做選擇性暴露、選擇性理解與選擇性記憶，還會進行「選擇性信任」。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政黨支持可以預測新聞媒介產品可信度，受訪者的政黨支持會影響他們對新聞媒介產品可信度的評估，受訪者支持的政黨和他們最相信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具有正相關。過去分析政黨支持與新聞媒介可信度關係之研究，大多只探討政黨支持與新聞媒介類型可信度的關係，忽視政黨支持對新聞媒介產品可信度可能產生的影響，因而低估政黨支持對新聞媒介可信度的預測力。

由於閱聽人在接觸新聞資訊時，會依政黨傾向進行選擇性暴露，

並進行選擇性信任，使政治偏差程度高的新聞媒介反而能吸引讀者與觀眾，並受到這些讀者與觀眾的信任。從這種角度來看，選擇可信度對新聞媒介的公正性有不良的影響。在藍綠嚴重對峙的台灣，報導公正的媒介可能受到學術界與新聞界的尊重，但未必能吸引多數民眾收視，因為民眾使用媒介的主要動機除了吸收知識與瞭解環境變化外，另一主要動機是尋求認同（張卿卿、羅文輝 2007）。尤其是有明確支持的政黨或意識形態較強的民眾，收看新聞時尋求認同的動機較強。

在解嚴前，尤其是 1993 年有線電視合法化前，政府控制是影響新聞媒介可信度最關鍵的因素（李金銓 2009）。但在 1993 年以後，媒介經營者的意識型態與市場力量逐漸成為影響新聞媒介公正性與可信度的最重要因素（羅文輝等人 2007）。新聞媒介要提高新聞報導的水準與公正性，必須建立新聞部門自治與民主機制，只有在媒介經營者無法干預新聞決策與運作的情形下，讓新聞人員充分發揮告知、守望與監督的功能，新聞媒體才可能減少政治偏差，進行公正報導。

當然，本研究也有一些侷限。本研究主要探討政黨支持、新聞媒介產品使用與新聞媒介產品可信度間的關係。過去的相關研究顯示，除了政黨支持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收入都可能影響新聞媒介可信度，未來的研究應繼續探討這些人口變項對媒介可信度及選擇可信度的影響。此外，未來的研究需要更進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可能從中影響政黨支持與媒介產品可信度的關係，哪些因素可能影響媒介產品的選擇？在哪些條件下，選擇性信任最可能發生？此外，未來的研究也可以考慮應用「選擇可信度」來探討網路可信度，例如人們使用網路時是否也會選擇收視和他們思想、信念較接近的訊息，並且認為他們選擇使用的這些訊息較為可信。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才能在匯流的新媒介環境中，更精確的評估媒介使用與媒介可信度間的理論關係。

## 參考文獻

- 李金銓(2009)台灣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編，*台灣傳媒再解構*，頁 3-20。台北：巨流。
- 鄭瑞城(1988)*透視傳播媒介*。台北：天下文化。
- 葉恆芬(2000)網路媒體可信度及其影響因素初探研究——以台灣地區網路使用者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卿卿、羅文輝(2007)追求知識、認同或娛樂？政論性談話節目的內容與閱聽眾收視動機的探討。*新聞學研究* 93: 83-139。
- 羅文輝(2004)選擇可信度：1992 及 2002 年報紙與電視新聞可信度的比較研究。*新聞學研究* 80: 1-50。
- 羅文輝、王慧馨、侯志欽(2007) 2004 年台灣報紙總統選舉新聞之政治偏差。*選舉研究* 14(2): 95-120。
- 羅文輝、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2003)媒介依賴與媒介使用對選舉新聞可信度的影響：五種媒介的比較。*新聞學研究* 74: 19-44。
- 羅文輝、黃葳葳(2000)報紙與電視總統選舉新聞的比較研究。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專題研究報告。
- 羅文輝、陳世敏(1993)新聞媒介可信度之研究。台北：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
- ASNE (1985) *Newspaper Credibility: Building Reader Trust*.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 Bogart, L. (1989) *Press and Public*.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Carter, R. F., and B. Greenberg (1965) Newspapers or Television: Which Do You Believe? *Journalism Quarterly* 42(1): 29-34.
- Cotton, J. L. (1985)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Selective Exposure. Pp. 11-33 in *Selective Exposure to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D. Zillmann and J.



- Bryant.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Gaziano, C., and K. McGrath (1986)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Credibi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3(3): 451-462.
- Jacobson, H. (1969) Mass Media Believability: A Study of Receiver Judgments. *Journalism Quarterly* 46(1): 20-28.
- Johnson, T. J., and B. Kaye (1998) Cruising is Believing? Comparing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2): 325-340.
- Johnson, T. J., and B. Kaye (2001) *Cyber House Rules: 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on the Web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 Kiousis, S. (2001) Public Trust or Mistrust? Perceptions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 (4): 381-403.
- Lo, V. H., Neilan, E., and P. T. King (1998)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1995 Legislative Ele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4(3): 340-355.
- McQuail, D. (1997) *Audience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etzger, M. J., A. Flanagin, K. Eyal, D. Lemus, and R. McCann (2003) Credibil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on Source, Message, and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7: 293-335.
- Meyer, P. (1988) Defining and Measuring Credibility of Newspapers: Developing an Index. *Journalism Quarterly* 65(3): 567-574.
- Mulder, R. (1980) Media Credibility: A Use-Gratification Approach. *Journalism Quarterly* 57(3): 474-477.

- Rimmer, T., and D. Weaver (1987) Different Questions, Different Answers? Media Use and Media Credibi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4(1): 28-36.
- Roper Organization (1979) *Public Perceptions of Television and Other Mass Media: A Twenty Year Review 1959-1978*. New York: Television Information Office.
- Savolainen, R. (2007) Media Credibility and Cognitive Authority. The Case of Seeking Orienting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12(3): 319.
- Schweiger, W. (2000) Media Credibility-Experience or Image? A Survey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orld Wide Web in German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1): 37-59.
- Wang, G., and V. H. Lo (2000) Taiwan. Pp. 660-681 in *Handbook of the Media in Asia*, edited by S. A. Gunaratne. New Delhi: Sage.
- Wanta, W., and Y. W. Hu (1994) The Effects of Credibility, Reliance, and Exposure on Media Agenda-Setting: A Path Analysis Model. *Journalism Quarterly* 71: 90-98.
- West, M. D. (1994) Validating 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Credibility: A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 Approach. *Journalism Quarterly* 71: 159-168.
- Zillmann, D., and J. Bryant (1985) *Selective Exposure to Communic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第 4 章

## 狂飆的年代？一般民眾的認同趨勢， 1992-2005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誌謝：本文發表於「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台北：中央研究院，2008年3月28-29日。感謝與會學者所提供的意見，特別是評論人政治大學劉義周教授。劉教授指出作者所忽略的一個重要現象：本省和外省族群的認同變化趨勢上的相同起伏（見圖4）。這個現象對台灣民族認同的研究應有重大的理論啟發，值得進一步深究。

## 摘要

許多人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宣稱：台灣人認同在近幾年有極為顯著和快速的成長；台灣認同已經為社會普遍接受，而成為主流的思潮。這樣的宣稱雖然沒有錯誤，卻太過簡單。認同的現象遠為複雜。過去十多年累積的資料和研究發現指出：(1)「台灣人認同」快速成長；「中國人認同」顯著萎縮。(2)「台灣民族主義」在民主化之後數年確實急速成長，可是近幾年卻處於停頓狀態。相較之下，「中國民族主義」持續萎縮，可是「中國民族認同」持續穩固。結果造成甚大比例的民眾具有「雙重認同」。(3)本省籍民眾和外省籍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有所差異。外省民眾沒有拋棄中國認同，可是卻增加台灣認同；本省民眾則以台灣認同取代中國認同。(4)所有類型的認同都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兩年之間可以有甚大的變動。

關鍵詞：民族主義、民族認同、族群、公民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

## Trend of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aiwan, 1992-2005

Nai-Teh W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conflict between Taiwanese identity and Chinese identity is the most salient issue in Taiwan's politics since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he late 1980's. It is also the only division between two main political parties. Many people claim with the findings from polls conducted by news media and government that Taiwanese identity is now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attitude. The claim, though not wrong, is too simplistic.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 national surveys from 1992 to 2005, which used different and more adequate measuremen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 also summarizes findings from previous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e trend and change of national identity. Firstly, "Taiwanese identity" has indeed grown greatly at the expense of Chinese identity. Seco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surged in the first few years following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but has stagnated in the recent years. In contrast,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has declined rapidly, but Chinese identity continued to persist. As a result, people with "dual identity"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among the populace. Third, with important political implication, Chinese mainlanders and native Taiwanese experienced different trends of identity change. While native Taiwanese replaced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with Taiwanese identity, Chinese mainlanders adopted a new Taiwanese identity without giving up the formerly held Chinese identity. Fourth,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all nationalist groups was volatile, experiencing significant change within a short span of two years.

*Keywords: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ethnicity, civic nationalism, ethnic nationalism*

「如今我們終於有一個實驗室，可以觀察、分析民族主義的成長，從早期的階段開始，追蹤它成長的軌跡，直到它的成熟階段；同時也至少能記錄從過去到現在因之產生的對抗力量。」一位研究亞洲民族主義的學者在半世紀之前，興奮地說道(Emerson 1966[1954]: 520)。在社會科學逐漸成熟的當時，較晚出現的亞洲民族主義對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確實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而和亞洲各國相較，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認同的形塑，甚至遲到得更久。有人或會主張，台灣民族主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就已經出現。可是不論當時所出現的「台灣人認同」是否可以稱之為民族認同，民族主義超越少數知識分子的思想領域，而成為顯著的公共議題確定是 1980 年代末期台灣民主化之後的事。如果亞洲民族主義運動對民族主義的研究是絕佳的機會，更晚半世紀出現的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經過這半個世紀，社會科學在理論思辨上和工具運用上（如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都更為成熟。如今，民族主義的研究者掌握了前人未有的工具；而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出現、在最近十多年的「狂飆」，則提供了前人未有的機會。<sup>1</sup>

除了晚到半個世紀，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在其他的許多層面都提供民族主義研究重要的機會。世界其他地區並不乏如目前的台灣，一個

---

<sup>1</sup> 本文所用的資料包括主持人伊慶春，「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國大代表選舉」，1991-92；主持人陳德禹，「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92 年立委選舉訪問調查」，1993；主持人游盈隆，「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96 年總統選舉訪問調查」，1996；主持人瞿海源，「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政治文化組」，1998；主持人黃秀端，「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2000 年總統選舉」，2000；主持人章英華、傅仰止，「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國家認同組」，2003；主持人黃秀端，「選舉與民主化調查，III：2004 年總統選舉選民面訪調查」，2004；主持人劉義周，「選舉與民主化調查，IV：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選民面訪調查」，2005。以上調查研究皆為國科會支持。



新生的民族認同出現、試圖取代原先具有宰制地位的認同，如西班牙帝國下的拉丁美洲，以及大英帝國之下的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可是一方面，這些先例中的母國做為帝國的中心，是處於衰敗的階段。而另一方面，帝國的中心也因為地理位置的區隔而無法對殖民地的認同和分離運動，產生實質的巨大影響。<sup>2</sup>可是台灣卻緊鄰帝國的中心，而這個帝國在國際政治上、全球經濟上、以及軍事上又正在崛起。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出現的時機，碰巧也是對其滿懷敵意的帝國崛起的階段。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很少像台灣那樣必須同時對內和正統的民族認同競爭，對外處理和帝國中心的關係、抵抗來自帝國的影響。

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這些特殊性，都為民族主義研究帶來難得的機會。可是正如所有的探險和投資，好的機會不一定帶來豐富的成果和回報，特別是如民族主義這樣一個難纏的題目。民族主義的複雜性帶來的結果是，正如一位極為優秀的民族主義研究者所說的：經過數十年的辛苦研究之後，學者仍然無法在許多的問題上有一致的看法，如民族認同到底是現代世界中才出現，或是歷史早期就有的現象；它的起源為何，它的未來又是如何。甚至如何定義民族和民族主義，研究者之間都幾乎毫無共識(Anderson 1996: 1)。

民族主義之所以難纏，來自於它的多面性。蘇格蘭的左派民族主義者、也是研究民族主義的卓越學者 Tom Nairn (1997: 71)，在其著名的文章 *The Modern Janus* 中，用羅馬時代的雙面神祇來比喻民族主義。一個面孔朝著結束的過去，另一則朝向起始的未來；回顧過去、同時也凝視著未來。他這樣比喻，因為「民族主義是落後的文化 and 人民，試圖掌握現代性的力量 and 其所帶來的益處，以將之據為己用的努力……

---

<sup>2</sup> 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地區獨立建國的歷史「自然」趨勢，參見 Eddy and Schreuder (1988)。

現代化的野心、歷史傳統的重新崇拜，兩者共存」。

民族主義的多面性不只顯現在它以過去之名追求未來。民族主義此種「本質的精神分裂症」（或「雙重人格」），還有許多其他的徵候：它的目標是「普世主義」的文明價值和物質進步，可是卻特別強調自己的傳統和「獨特性」。它（特別是被殖民者的民族主義）仇視殖民者，可是卻同時也羨慕並企圖模仿殖民者的成就。它祈求民族光榮的未來，可是卻特別強調屈辱的過去。它的任務是保護自己，卻經常蛻變成侵略別人。它堅持主張自己是一個文化社區，卻強烈要求政治權力。它認為自己的「民族」自古（甚至遠自不可考的歷史）即已存在，卻同時也必須費力去「教導同胞認知這項事實」。

民族主義的這些多重人格讓人對民族主義又愛又恨。建立民族的任務已經完成的歐美知識界視它為昨日黃花；猶在追求民族的人民則對它滿懷憧憬。浸潤於正統民族認同的人覺得它可有可無，擁抱新民族認同的人則對它懷著激情的愛戀。而更多時候我們對它愛恨交加，正如愛爾蘭民族主義詩人葉慈所形容的，一個「令人恐懼的美女」。民族主義之如美女吸引人無須贅言；自尊、平等、被認可永遠引發熱情。它之所以令人恐懼，除了可能的政治後果外，對知識和人文價值可能造成的影響亦令人擔憂。在偉大的認同之前，幾乎所有其他的重要價值都必須俯首。<sup>3</sup>也正是民族認同所負載的價值和感情，讓研究者走在知識和感情的鋼索上，增加了研究成果的不確定性。同時，因為負載太多的價值和感情，「政治正確」經常成為評價民族主義著作的標準。

除此之外，民族主義現象牽涉到太多的領域，歷史的、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研究者傾向於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去觀察這

---

3 台灣民眾在 2007 年見證了認同的巨大能量。民進黨的許多支持者以認同為名，容忍甚至保護著陳水扁政府的貪污和無能。

個多面性的現象。這使得研究者之間似乎沒有對話的機會。Ernest Gellner的「現代化論」以觀看青春期成長痛苦之心情，分析民族主義作為現代化的必然過程。衝突確為痛苦，可是卻屬必要，然而它也終將過去。Benedict Anderson的「印刷資本主義論」以人類學家對出生、死亡、同胞、歸屬等民族神話的好奇和同情，觀看一群散漫的、毫無關連的人如何想像出一個民族(Cocks 2002: 112)。Tom Nairn的「不平等發展論」則以馬克斯主義者和蘇格蘭民族主義者的身分，分析國際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發展，如何刺激了民族主義的出現。這些「大師」們的理論之間如何對話呢？

除了以上這些因理念複雜性所造成的研究難題外，民族主義研究也必須同時照顧、或清楚分辨三個不同的研究層次：理念(doctrine)、政治(politics)、和感情(sentiments) (Breuilly 1996: 146-148)。一方面，這三個層面並非三位一體。對某一層面研究所得的發現，不能推衍至另外層面。可是另一方面，單一層面的研究又不能自給自足。對某一層面中的現象之理解，必須超越該層面。單只研究某一層面而不同時照顧其他層面，成果將非常有限。

「理念」是文化和政治菁英對民族主義的論述。「政治」是民族主義發展的政治運動和過程。「感情」則是一般大眾的心理態度。某一層面的發現和結論，並不適用於另外兩個層面。例如，在東歐（波蘭、捷克等）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論述發展中，我們發現：在運動的初始階段，「公民民族主義」的味道較為濃厚。可是隨著時間的發展，這些地區的民族主義主流思潮逐漸為「族群民族主義」取代(Roshwald 2001)。我們能因此推論說，東歐民族主義在一般民衆中的發展是由「公民民族主義」轉向「族群民族主義」嗎？恐怕不能。當時東歐大多數的一般民衆仍為傳統的農民，並沒有「民族認同」的態度，當然也就沒有認同的轉變。而民族主義文化菁英的論述能代表一般知識界的想法嗎？恐怕也未必。

我們也不能從文化菁英的理念內涵，斷定民族運動的政治動力、目標、和過程。例如，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在初始階段所提出的「血緣論」，當然不能代表一般大眾的想法，也不能代表台灣認同的基礎。我們甚至可以假設：民族主義運動可能不需要民族主義論述。或者：一般民衆根本就不理會文化菁英的民族論述。一般民衆的認同可能來自特定的政治或歷史動力、並且朝向不同的目標。文化菁英的論述不一定能反映這些動力。

然而文化菁英的民族主義理念，做爲一個研究題目仍然值得重視，尤其當同胞對它們產生共鳴的時候。它們精緻地表述了一群人民內在精神的渴望、挫折、和期待。因此也或多或少反映了那個時代、那個地區民族認同的本質。如果我們忽視這個層面的探討，我們可能付出歐洲左派學者在解釋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因爲忽視墨索里尼言論而付出的相同代價：言不及義。台灣的民族主義研究似乎較缺少這個層面的研究。原因或許是，至目前爲止，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仍然相對匱乏。而現存者，如血緣論、台灣新興（商人）民族論，仍然無法引起大眾的共鳴。或許台灣民族主義運動仍在等待它的馬志尼、馬撒里克、尼赫魯、和葉慈，或者竟是果陀？可是無論政治或文化菁英如何論述，在民主時代這些論述的研究都必須回到一般民衆的想法、態度、和感情。

目前我們對民族主義運動政治面的研究，如民族認同和政黨支持、政黨競爭之間的關係等，並沒有超出一般的觀察太遠。學術界對這個面向的研究至目前爲止，似乎只是肯定了一般常識性的觀察，同時提出比較精確的數字來確定常識性的觀察。然而，在民主體制中，認同政治、政治菁英之間的認同立場和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一般民衆的認同感情的反映。因此，關於民族主義運動政治面的理論未來不論是否可能發展、或如何發展，對一般民衆認同感情的理解和分析必然是這個領域發展的必要基礎。因此，歷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研究」所累積的、關於一般民衆的認同態度之基本資料，就成爲未來理論發展的重要基礎。

此外，民族主義研究所需要的比較性眼光，也讓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成爲不可或缺。「要理解民族主義，我們首須了解，爲什麼有些人抗拒官方的定義，以現代民族主義的原則來重新界定國家的範圍；另外有些人則滿足於接受官方的準則和定義，並且努力克服自己的『赤字』以便整合入更大的多族群、世界性國家中」(Feinberg 1997: 68)。也就是說，民族主義的研究不只必須以一般民衆的態度爲基礎，同時也必須是比較性的。如果尊嚴是民族主義的動力，那我們應如何解釋另外一部分沒有受民族主義吸引的民衆？

可是我們知道，問卷調查的基礎是我們對理論的探索、以及我們對現實的精確掌握。對理論、及民族主義現象的不同理解，決定問卷調查的方向和內容。而我們對理論和現實的理解，也經常因知識和研究的累積而有所改變、而獲得成長。問卷調查的方向和內容因此也必須跟隨這樣的成長而調整。而另一方面，台灣政治在近幾年也歷經甚大的變動。問卷調查的內容因此也需要調整。以下對長期趨勢的分析根據少數幾個基本的題目。我們慶幸過去十五年來，這些題目持續被研究者所關心，我們對台灣民衆的認同之變化趨勢，也因此而有初步的了解。可是，如果除了趨勢之外，我們要回答更深入的理論問題，這些資料或許就無法提供太多的幫助了。無論如何，學術和知識是透過不斷的努力和質疑而得以累積。希望未來的問卷調查研究能不斷更新和充實，以讓我們對這個台灣政治中最重要的議題，獲得全面性的、理論性的深入了解。以下的初步分析是根據目前我們所有的資料。這些分析雖然未能對台灣民族主義現象提供深入的理論性解釋，然而總是一個起步。寄望未來的問卷調查研究，可以提供實證資料讓我們提出或驗證重要的理論問題。

以過去十多年的問卷調查資料爲基礎，我們有下列的發現：

### 1. 認同的變化趨勢

- (1) 正如許多政治人物和媒體明星所言，「台灣人認同」在過去十多年歷經快速而持續的成長。
- (2) 可是和統獨立場密切相關的「台灣民族認同」並沒有相對應的成長，反而是處於停滯的狀態。
- (3) 另一方面，和台灣認同競爭的「中國認同」顯著地持續萎縮。
- (4) 「雙重認同」是台灣民族認同的特殊現象。
- (5) 兩種民族認同都尚未沈澱、穩定，可以在短期間內改變。

### 2. 民族認同的族群比較

- (1) 正如其他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族群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本省籍民眾較傾向台灣認同，外省籍民眾則較傾向中國認同。
- (2) 可是外省族群的認同雖傾向中國認同，卻也越來越接受台灣認同。台灣認同逐漸成為兩個族群的共識。
- (3) 兩個族群在認同的變化上有所差異：本省人的中國認同被台灣認同取代，外省人則在中國認同上增加台灣認同。
- (4) 然而兩個族群認同的變化又有相同之處：三種民族認同在兩個族群中的比例都以相近的比率產生變化。

## 一、台灣民眾認同變化的趨勢

最近政治人物經常宣稱，台灣民衆的「台灣人認同」已經取得絕對的優勢。我們的資料也支持了這樣的說法。不過，這只是部分的真相。「台灣人認同」是一個包含不同面向、不同內涵的態度。我們的資料顯示，和統獨立場密切相關的「台灣民族認同」自從1996年之後並沒有太大的成長；雖然「中國民族認同」有顯著的下降。兩個趨勢



共同造成的是：擁有「雙重認同」的民衆，在人口中持續占有甚為顯著的比例。這樣的現象在學術研究上非常值得深究，它對民族主義的理論是挑戰、也是啓發。而在政治的號召、動員、和未來願景的想像上，這個現象也是一個必要的事實基礎。本文將只呈現這個現象。後續的學術解釋留給未來，政治操作則留給具有想像力的政治人物。

「台灣人認同」的具體內涵到底是甚麼？學術研究上和政治操作上，我們可以從這個趨勢中得到甚麼樣的啓發？許多問卷調查和訪問都會詢問受訪者，類似「請問你（自認為）是中國人、台灣人、還是兩者都是？」的題目。這是典型的測量認同的題目。從圖 1A 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顯著的現象：從 1991 年到 2004 年的十三年間，自認為「我是台灣人」在樣本中的比例持續增高。相對的，自認為「我是中國人」的比例則持續性下降。「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在 2003 年達到接近 60% 的高峰。雖然這些問卷調查的提問方法和提供的選項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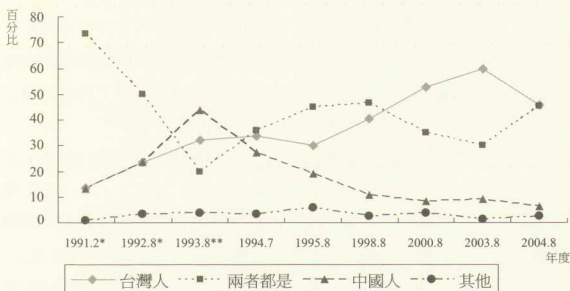


圖 1A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991-2004，家戶面訪

註 1：選項中「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台灣人、或者台灣人、中國人沒有差別」合併為「兩者都是」。

註 2：「兩者都是」的比例和前後年差距極大，是因為該年的問卷中無「兩者都是」的選項，受訪者被迫從二選一。「很難決定」者在本圖中列為「兩者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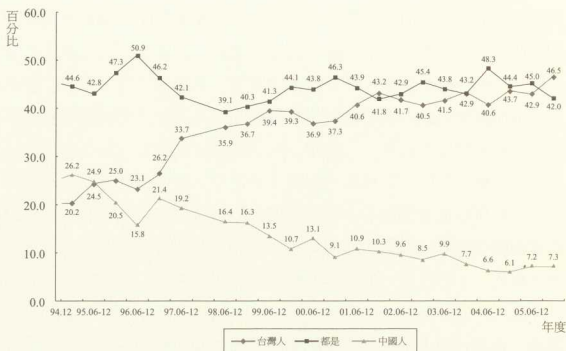


圖 1B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994-2005，電話訪問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相同，可是這個趨勢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圖 1A 的資料都來自家戶面訪。而不同的研究單位，以電話訪問所做的調查，也大致符合這樣的趨勢（參見圖 1B）。將這兩份由不同的研究單位，以不同的訪問方式所得到的資料相比對，同年的數字並沒有相差太多。

此種持續增高中的「台灣人認同」，其具體內涵到底是什麼？「台灣人」、「中國人」、以及「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些態度其實包含著不同的意義。不同的人對它們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以族群概念來界定「台灣人」。其「台灣人」指的是「本省人」，是先祖於 1895 年之前移民到台灣的人，具有相同的歷史經驗，日常生活中使用閩南語。與其對立的概念團體其實比較是外省人。有些人以地理、或政治概念來界定「台灣人」，它指的是居住在台灣的所有人。對立的概念團體則是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有些人的「台灣人」概念則同時具有政治和文化內涵；台灣人具有獨特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也已

經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治社區。其對立的概念團體是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甚至是居住在台灣沒有台灣認同的中國人。

「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概念同樣包括不同的內涵。有些人同時以文化和政治概念來界定：他們是文化上的「中國人」，同時也是政治上的「台灣人」。有些人則單純以地區概念來界定：他們是居住在台灣地區的中國人。因此，不論是「台灣人」、「中國人」、或「兩者都是」，其實都包含著不同的意義。選擇同一回答的受訪者，不必然就擁有相同的態度。

不論「台灣人」概念的具體內涵是什麼，當面對「台灣人」、「中國人」、「兩者都是」三個選項的時候，有越來越高比例的民衆寧願自稱是「台灣人」。這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重要的現象。然而這是否表示，有越來越高比例的民衆支持台灣獨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台灣人」、「中國人」的概念具有多種不同內涵，它們並不能等同對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的態度。

由於台灣獨立和中國統一的分歧態度，是現階段台灣政治中最重要的議題，過去有許多問卷調查都試圖了解台灣民衆在這項問題上的態度，以及變化的趨勢。過去所做的研究也都有一致性的發現：傾向於「維持現狀」的民衆比例非常的高，遠遠高於主張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的比例。既然「台灣人認同」具有絕對的優勢，為什麼主張台灣獨立的民衆卻是少數？這個發現似乎也間接顯示了，「台灣人認同」和主張台灣獨立、或「台灣民族認同」，並非完全對等的態度。

一般所使用的「獨立、統一、維持現狀」的詢問方式，雖然有助於了解民衆當下對統一和獨立的態度，可是卻無法探索到隱含於民衆心中的民族認同，無法顯示民衆對未來的不同想像。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上或政治發展上，民衆所抱持的較為長期的民族認同態度、以及因之而來的對未來的想像，應該和他們目前對統獨的態度同樣重要。

民衆較為長期的認同態度之所以隱含不現，主要是現實環境因素

的影響。這些現實條件對台灣認同者是戰爭的威脅，對中國認同者則是兩岸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差距。因為這些現實條件，讓民眾不會根據他們內心的真正認同，而選擇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的選項。雙方都會因此傾向於選擇「維持現狀」。這也是為什麼在歷年的許多次問卷調查中，主張「維持現狀」者的比例都非常的高，遠遠高過選擇統一或獨立的民眾。然而這並不表示這些高比例希望維持現狀的民眾，沒有特定的民族認同，也不表示他們的民族認同沒有差異，更不表示他們對未來的想像是一致的。以「統一、獨立、維持現狀」的態度來代表民眾的認同在學術研究上和政治上，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參見附錄）。

為了探測民眾心中的真正認同，一個研究方式是在問卷調查的問題中，祛除這些現實條件的影響，同時以類似下列的兩個問題詢問受訪者：「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你是不是同意台灣應該獨立？」，以及「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發展相當，你是不是同意兩岸應該統一？」將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做交叉聯列，我們可以揭露受訪者真正的認同。在不引起戰爭的情況下希望台灣獨立，可是即使兩岸發展相當，也不願意統一的民眾，可以定位為「台灣民族主義者」。他們不願意統一並不是因為中國和台灣的差距，而是認為台灣本就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政治社區。而在兩岸發展相當的情況下願意統一，可是即使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也不希望台灣獨立的民眾，可以定義為「中國民族主義者」。他們之所以不贊成台灣獨立，並不是因為戰爭的危險，而是台灣和中國本就屬於同一民族，因此不應該獨立。這兩種態度都是民族主義，只是對「民族」的範圍有不同的認知。而兩個問題都同意者，我們暫時定義為「雙重認同者」。<sup>4</sup>

表 1 是從 1992 年到 2005 年的調查所得。它的數字顯示幾個顯著

---

4 對本研究設計更仔細的理論說明，參見吳乃德(1993)。

表 1 台灣民衆的民族認同，1992-2005

N (%)					
統一（若經濟社會政治等條件沒有差距）*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總數	
1992.2					
1993.2					
1996.5					
1998.7					
2000.8					
2003.8					
2004.8					
2005.4					
獨立（若能維持和平）	同意	II 311(25.0)	29(2.3)	I 116(9.3)	456(36.7)
		341(25.4)	27(2.0)	138(10.3)	506(37.7)
		540(38.8)	38(2.7)	296(21.3)	874(62.8)
		637(36.0)	83(4.7)	396(22.4)	1116(63.2)
		485(34.4)	35(2.5)	338(24.0)	858(60.9)
		487(24.2)	22(1.1)	636(31.5)	1145(56.8)
		435(23.9)	65(3.6)	525(28.8)	1025(56.2)
		385(30.6)	61(4.9)	348(27.7)	794(63.2)
	沒意見	45(3.6)	82(6.6)	12(1.0)	139(11.2)
		54(4.0)	267(19.9)	18(1.3)	339(25.2)
		46(3.3)	173(12.3)	9(1.4)	238(17.1)
		66(3.7)	133(7.5)	26(1.5)	225(12.7)
		33(2.3)	127(9.0)	8(6)	168(11.9)
		13(0.6)	81(4.0)	17(0.8)	111(5.5)
		36(2.0)	190(10.4)	31(1.7)	257(14.1)
		34(2.7)	127(10.1)	26(2.1)	187(14.9)
	不同意	III 472(38.0)	39(3.1)	IV 137(11.0)	648(52.1)
		371(27.6)	27(2.0)	100(7.4)	498(37.1)
		235(16.9)	5(4)	40(2.9)	280(20.1)
		297(16.8)	27(1.5)	102(5.8)	426(24.1)
		272(19.3)	18(1.3)	93(6.6)	383(27.2)
		364(18.1)	18(0.9)	378(18.8)	760(37.7)
		273(15.0)	46(2.5)	222(12.2)	541(29.7)
		167(13.3)	18(1.4)	91(7.2)	276(21.9)
	總數	828(66.6)	150(12.1)	265(21.3)	1243(100.0)
		766(57.0)	321(23.9)	256(19.1)	1343(100.0)
		821(59.0)	216(15.6)	355(25.5)	1382(100.0)
	1000(56.6)	243(13.8)	524(29.7)	1767(100.0)	
	790(56.1)	180(12.8)	439(31.2)	1409(100.0)	
	864(42.9)	121(6.0)	1031(51.1)	2016(100.0)	
	744(40.8)	301(16.5)	778(42.7)	1823(100.0)	
	586(46.6)	206(16.4)	465(37.0)	1275(100.0)	

I: 台灣民族主義者

II: 雙重認同者

III: 中國民族主義者

\* 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帶來戰爭，你是不是贊成獨立？

\*\* 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相當，你是不是贊成統一？

的現象和重要的資訊。第一個顯著的現象和趨勢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急速凋謝。任何情況都不能接受台灣獨立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其比例從 1992 年的接近四成持續下降到 2005 年的最低點 13%。表 1 顯示的第二個顯著現象是，「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比例在飛彈危機後，有極為明顯的躍升，幾乎是加倍的成長。雖然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這是飛彈危機的效果。可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解釋。然而在 1996 年之後，台灣民族主義就停頓在大約三成左右。這和一般所相信的「台灣認同已經取得主流地位」，有相當大的差距。第三個趨勢是雙重認同者一直維持甚高的比例，從四分之一到將近三分之一。這應該是台灣特殊的現象：新認同出現，可是原先的認同並沒有消逝，兩者同時並存、互相競爭。這個特殊現象應該是台灣的學者可以對世界的民族主義研究有所貢獻的地方。可惜至今，我們仍然缺乏對它作任何的研究；我們沒有理論性的假設，問卷調查也尚未將這個重要現象列為主要的關心之一。

除了雙重認同的重要現象之外，另一個同樣值得探索的現象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停滯。從 1996 年到 2005 年這段期間，首先是李登輝然後是民進黨的陳水扁執政。兩者對台灣意識的宣揚都不遺餘力。而在這段期間，台灣意識似乎也是台灣政治的主流，主流到所有的主要政黨都要互相競爭誰比較愛台灣，總統候選人也必須下跪親吻土地以證明他們愛台灣。可是這個主流意識似乎比較反映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萎縮，而非台灣民族主義的成長上。

為什麼台灣民族主義在李登輝的大力宣揚和民進黨的執政下，仍然停止成長呢？目前我們不只缺乏來自問卷調查的實證資料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也缺乏適當的理論視野足以研究這個現象。可是我們可以有一些臆測。例如中國經濟對台灣的吸引力，讓拒絕和中國統一的民衆無法增加。2003 年的問卷調查中，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同意「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必要時可以和大陸統一。」不同意的民衆只有不

到三成。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中甚至有將近兩成同意這樣的說法、將近三成猶疑不決，不同意的只有一半左右。將台灣和中國視為不同的民族，即使兩岸的發展相當都不願意統一的民衆，其中竟然有將近兩成的人認為，爲了挽救台灣經濟還是主張和中國統一，另外將近三成的人並不立即排斥這樣的想法。（參見表 2）

在 2004 年的訪問調查研究中，我們也初步探索了中國的經濟利益是否影響受訪者個人的認同。對中國經濟的依賴關係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第一是直接的、個人的層次，包括：「中國的市場對自己或家人受雇的公司是否重要」、「自己或家人受雇的公司是否在中國設廠」、「自己或家人是否在中國工作或投資」。第二則是間接的、總體的層

表 2 民族認同與經濟統一，2003

問題：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必要時可以和大陸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

(N) %

	民族認同					總計
	台灣民族 主義者	雙重 認同者	中國民族 主義者	保守 主義者	其他	
同意	(123)	(299)	(256)	(133)	(23)	(834)
	14.7	35.9	30.7	15.9	2.8	100.0
	19.3	61.4	70.3	35.2	15.2	41.4
不知道	(170)	(110)	(72)	(125)	(104)	(581)
	29.3	18.9	12.4	21.5	17.9	100.0
	26.7	22.6	19.8	33.1	68.9	28.8
不同意	(343)	(78)	(36)	(120)	(24)	(601)
	57.1	13.0	6.0	20.0	4.0	100.0
	53.9	16.0	9.9	31.7	15.9	29.8
總計	(636)	(487)	(364)	(378)	(151)	(2,016)
	31.5	24.2	18.1	18.8	7.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 = 542.269, df = 8, p < .001$

次，包括受訪者主觀認為中國經濟的進步在目前、及未來對個人的經濟情況，可能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如表 3 的資料所示，經濟利益和民族認同之間似乎有些關連。中國的市場具有個別切身厲害關係的受訪者（不論是市場的利益還是投資、或就職的利益），有較高的比例為「中國民族主義」者。除了直接的切身利益關係外，間接的總體利益主觀評估和認同的關係更是為明顯。認為中國的經濟進步，不論

表 3 民族認同與經濟利益，2003

							% (N)
		台灣民族 主義	雙重認同	中國民族 主義	其他	總計	
大陸市場 對自己或 家人公司	重要	24.1 (71)	25.8 (76)	24.7 (73)	25.4 (75)	14.6 (295)	
	不重要	33.5 (562)	23.9 (401)	16.9 (284)	25.8 (433)	83.3 (1,680)	
	其他	7.3 (3)	24.4 (10)	17.1 (7)	51.2 (21)	2.0 (41)	
		31.5 (636)	24.2 (487)	18.1 (364)	26.2 (529)	100 (2,016)	
自己或家 人服務的 公司在 大陸設廠	有	27.5 (74)	25.3 (68)	22.3 (60)	24.9 (67)	13.3 (269)	
	沒有	32.4 (561)	24.0 (416)	17.4 (302)	26.2 (455)	86.0 (1,734)	
	其他	7.7 (1)	23.1 (3)	15.4 (2)	53.8 (7)	0.6 (13)	
		31.5 (636)	24.2 (487)	18.1 (364)	26.2 (529)	100 (2,016)	
自己或家 人在大 陸做 生意或 工作	有	21.7 (28)	28.7 (37)	23.3 (30)	26.4 (34)	6.4 (129)	
	沒有	32.3 (608)	23.9 (450)	17.7 (334)	26.1 (492)	93.5 (1,884)	
	其他	0 (0)	0 (0)	0 (0)	0.6 (3)	0.1 (3)	
		31.5 (636)	24.2 (487)	18.1 (364)	26.2 (529)	100 (2,016)	
大陸的經 濟進步對 家庭現在 經濟狀況 有	好的影響	12.7 (10)	36.7 (29)	29.1 (23)	21.5 (17)	3.9 (79)	
	不好的影響	42.8 (115)	17.5 (47)	19.7 (53)	20.1 (54)	13.3 (269)	
	沒有影響	31.2 (502)	25.1 (404)	17.7 (285)	25.9 (417)	79.8 (1,608)	
	其他	15.0 (9)	11.7 (7)	5.0 (3)	68.3 (41)	3.0 (60)	
	31.5 (636)	24.2 (487)	18.1 (364)	26.2 (529)	100 (2,016)		
大陸的經 濟進步對 家庭將來 經濟狀況 有	好的影響	17.2 (31)	32.8 (59)	36.1 (65)	13.9 (25)	8.9 (180)	
	不好的影響	36.7 (162)	23.8 (105)	17.0 (75)	22.4 (99)	21.9 (441)	
	沒有影響	33.7 (411)	23.9 (292)	16.1 (197)	26.3 (321)	60.6 (1,221)	
	其他	18.4 (32)	17.8 (31)	15.5 (27)	48.3 (84)	8.6 (174)	
	31.5 (636)	24.2 (487)	18.1 (364)	26.2 (529)	100 (2,016)		



是目前已經、或將來會帶來更好經濟福祉的受訪者，顯著地傾向於中國民族主義。而認為中國經濟進步，不論是目前已經或將來會損害其經濟福祉的受訪者，則顯著地傾向於台灣民族主義。當然，這些都只是初步的分析。經濟利益對認同的影響有待更精緻的研究。

除了台灣民族主義成長緩慢之外，近十多年來台灣民眾在認同上的重要趨勢是，民族認同態度的不穩定。作者以 1998 年訪問調查的受訪者樣本為基礎，在 2000 年對相同的受訪者又做了一次的追蹤調查。這個追蹤調查發現：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處於高度不穩定的流動狀態。這個高度流動的現象在過去一直為橫切式調查所掩蓋。如表 4 所示，在 1998 年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中，只有不到四成(38.1%)在 2000 年仍然維持不變的民族認同態度。有高達 41.1% 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轉變成為「雙重認同者」。(也就是說，其中四成的受訪者開始可以接受有條件的中國統一。)[中國民族主義者]同樣出現高度浮動的現象：兩年後仍然堅持中國民族主義之態度者，也是不到四成(37.8%)。他們當中同樣有四成左右變成「雙重認同者」。(也就是說，其中四成的受訪者開始可以接受有條件的台灣獨立。)至於原來的「雙重認同者」，雖然態度較為穩定，可是也只有六成的人兩年後維持不變的雙重認同的態度，而有兩成以上的人皈依某種民族認同(吳乃德 2005)(參見表 4)。

此種認同高度不穩定、缺乏結晶化的現象，應該是反映了台灣社會在認同上的糾葛。一方面，具有清楚民族認同的民眾在人口中的比例並不高；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具有雙重認同，或沒有特定的台灣認同或中國認同。他們在客觀條件的容許下，可以接受台灣獨立，也可以接受中國統一。這樣的態度和「以民族之名要求獨立政治社區」的民族主義理念，有很大的差距。而另一方面，即使在部分有比較清楚的民族主義理念的民眾中，他們的認同也非常的不穩定。在 1998 年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中，竟然有高達六成的人在短短的兩年間改變了他們的

表 4 民族認同的變化，1998-2000

		% (N)	
1998		2000	
台灣民族主義 22.4 (239)	台灣民族主義	38.1	(91)
	雙重認同	41.4	(99)
	中國民族主義	3.8	(9)
	其他	16.7	(40)
雙重認同 38.4 (409)	雙重認同	60.4	(247)
	台灣民族主義	12.2	(50)
	中國民族主義	10.5	(43)
	其他	16.9	(69)
中國民族主義 16.1 (172)	中國民族主義	37.8	(65)
	台灣民族主義	8.7	(15)
	雙重認同	37.2	(64)
	其他	16.3	(28)
其他 23.1 (246)	其他	31.7	(78)
	台灣民族主義	16.7	(41)
	雙重認同	36.2	(89)
	中國民族主義	15.4	(38)
100.0 (1,066)			

態度。此種不穩定現象，是民族認同在起始階段的本然性質呢？還是因為台灣特殊的政治和國際關係處境？正如本文一開始所引述的，台灣民族主義的遲到提供了回答這些民族主義重要議題的絕佳機會。可是至目前為止，我們仍然沒有充分利用這個絕佳的機會。

## 二、民族認同和族群

民族認同和族群之間的關係，或許是民族主義研究中最為普遍的議題。可是兩者卻都不容易界定；而兩者之間的關係更是難以掌握。

根據 Connor 的說法，「民族」在拉丁語源中是「共同的血緣」；而「族群」在希臘語源中則是「共同的祖先」。在現代世界中，民族是「自覺的族群」。族群可能由別人定義，民族則永遠由己身的自覺所定義(Connor 1978: 388)。可是正如當代族群現象所顯示的，族群也經常是在面對(vis-à-vis)其他族群的時候所引發的自覺認定。兩者的差別應該不是在於主觀上的自覺。民族比較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根據 Gellner 的說法，「民族主義乃是一種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要求族群的疆界和政治的疆界相一致」(Gellner 1983: 1)。而根據 Anthony D. Smith 的定義，民族則是「一個有名稱的人類群體，其成員共享一塊歷史疆域、神話、和歷史記憶，共享群眾性的公共文化和經濟體，同時具有相同的法律權利和義務」(Smith 1991: 14)。在以上的定義中，民族所具有的政治性意義非常明顯。民族雖然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其特質卻不只是政治性而已。民族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動員力量，或許正因為它同時也包含了血緣、特別是文化的因子。

相較於民族，族群則比較是一文化性的社群。族群團體是「大社會中的群體，它具有真實的、或衆所認定的共同祖先，基於歷史經驗而產生的集體記憶，以及一個或數個作為該群人民之表記的文化象徵元素……除此之外，一個必備的要素是：群體的成員之間有這樣的類屬感」(Schermerhorn 1970: 12)。以 Frederik Barth 的話來說，族群就是一個以文化差異為基礎的社會組織。這項文化差異可由族群成員根據任何一個文化面向／象徵／或符號，主觀地加以認定或創造。而這項主觀地認定或創造的過程，乃是特定的群體互動、歷史情境、經濟、政治條件等所造成的結果(Barth 1994)。雖然族群是以和其他族群的文化差異為其界線，可是這個界線卻經常是游移不定，而非亙古不變的。而且，更重要的，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來自主觀的認定，而非客觀的文化內容。這種主觀認定的性質，使得族群認同可以被操弄，族群可以消失或同化，不同的族群可以互相融合。而族群界線的產生和消弭，

政治菁英扮演著重要角色。

即使我們可以清楚分辨民族和族群的概念，兩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一個難題。在民族形成的過程中，族群所扮演的角色是民族主義研究中最具爭論性的議題之一。在 Gellner (1991) 和 Anderson (1991) 的現代化理論中，民族的形成是一個現代性的計畫。在前者的解釋中，民族的形成主要在於滿足現代資本主義的需求；在後者的理論中，民族的形成和「想像」則必須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普及。兩者都將民族形成視為是一個超越傳統的群體藩籬和群體認同（包括宗教的、族群的、部落的）的現代性認同。現代論者認為，民族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工品、創造物、社會工程製品」(Hobsbawn 1990: 10)。民族的創造無須客觀存在的群體和群體認同。「民族主義並非原先存在的民族因自我意識而覺醒；民族主義創造了先前並不存在的民族」(Anderson 1991: 6)。

相對於民族形成的現代論，另外的學者強調族群在民族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性。其中以 Anthony D. Smith 最具代表性。他認為：族群是許多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礎。許多民族的發展，或以單一的族群為基礎，或以某一核心族群為中心，而消滅或同化其他族群(Smith 1986: 129-152; 1991: 54-70)。族群和民族之間的重要關係，不只在於：現代的許多民族建立在前現代的族群基礎上。同時也在於：「今天如果我們要催生一個民族，那麼創造並精鍊族群元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缺乏這些族群元素，民族建構將遭遇嚴重的阻力」(Smith 1986: 17)。也就是說：族群不但是現代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礎，大多數的現代民族也都包含了某些前現代族群的特徵。很少人會質疑現代論的說法：民族是現代社會的人工想像品。可是如果民族是想像出來的，那麼這樣的想像似乎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現實基礎。正如捷克一位重要的研究民族主義的歷史學者所指出的，如果如現代論者所言，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那麼我們必須解釋，為什麼在十九世紀初的時候，沒有人

發展一個運動來說服愛爾蘭人，他們其實是德國人；或說服匈牙利人，他們是中國人。……什麼因素解釋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為同一民族之理念不為斯洛伐克人所接受，雖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兩次大戰中間的二十年，擁有著有效推廣統一民族國家的所有資源？」(Hroch 1998: 99)。

也就是說，族群和民族具有非常緊密的關係。而我們對台灣政治生活的觀察也發現這項關係確實存在。因此，分析本省籍和外省籍族群在認同上的變化，就不論在學術上或政治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不論是直接的政治觀察或是問卷調查資料都顯示：外省民眾是正統中國認同最重要的選區。這並不難瞭解。文化的教養、中國生活的經驗、政治的形塑、和歷史的記憶，加上戰後的四十年政治力量和社會主流思潮的影響，外省民眾如果不具有中國認同，才是一個無法理解的現象。就像台灣至美國的第一代留學生移民一般，朝思暮想的是台灣，反而對美國政治毫無興趣。外省民眾（特別是其第一代）的民族認同，因此經常被視為一項無須解釋的現象，或無須加以研究的常數。對外省民眾民族認同的刻板印象，也經常成為本省民眾對他們「防範」或不信任的來源（吳乃德 2002: 75-118）。

事實上，外省籍民眾的認同在過去十多年間產生很大的變化。圖 2 是外省民眾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近幾年的變化。圖 2 的數字顯示，一般對外省人的刻板印象似乎是錯誤的。外省民眾的認同在近幾年的變化趨勢是：「中國民族認同」顯著下降，可是中國民族認同並非被「台灣民族認同」取代。他們的「中國民族認同」由 1992 年的 65.9%，在 2000 年以後下降到 35% 左右。而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也從 1992 年的幾乎不可見，上升到 2005 年的將近兩成。可是外省籍民眾最重要的變化趨勢應該是雙重認同的躍升。外省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並不是丟棄中國民族主義，轉而支持台灣民族主義。外省民眾在民族認同上的轉變型態是：在原有的支持中國統一之旁，新增加了對台灣獨立的



圖 2 外省人的民族認同，1992-2005

接受。也就是說，外省籍民衆雖然沒有丟棄中國統一的願景，可是他們也開始接受台灣獨立的想法和可能性。這個現象對台灣的族群關係有重大的意涵。目前外省籍民衆中有將近三成的人具有雙重認同。如果將他們和台灣民族主義者相加，目前外省籍民衆可以接受台灣獨立的比例，已經將近一半。可惜的是，不論是政治領袖或一般民衆似乎都沒有認識到這個重要的現象。<sup>5</sup>

對外省籍民衆作進一步的分析，我們發現促成外省籍民衆認同之變化最重要的動力似乎來自世代差異。外省籍民衆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幾乎全部由 50 歲以上者組成。而 50 歲以下的各種年齡層，在認同上則沒有顯著的差異。50 歲以上的外省民衆或者在中國出生，或者屬於家庭社會化仍然發揮強烈作用的移民的第二代。這些直接或間接的中國經驗，或許是其中國民族認同的重要因素。至於族群通婚，不

<sup>5</sup> 事實上，不只外省民眾的民族認同發生變化，其自我認同（以「中國人、台灣人、兩者都是」來測量）也發生類似的變化：「中國人」認同下降、「台灣人」認同沒有太大成長、「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成為主要類別。參見 Shen and Wu (2008)。



論是本省籍配偶或本省籍母親，對外省籍民衆的認同則沒有太顯著的影響。其中一個解釋或許是東方社會中的男性主宰文化，讓不論是本省配偶或本省母親可能有的台灣認同，對其配偶或子女沒有太大的影響。

和外省籍民衆比較，本省籍民衆在認同上的變化趨勢，有顯著的差異。這項差異也有著巨大的理論意涵。如圖 3 所示，近幾年本省民衆的「中國民族認同」，和外省民衆一樣有極為顯著的衰退。「中國民族認同」在本省籍民衆中的比例，從 1992 年的 28.5%，經過 94 年的 17.9%、96 和 98 年的 13.5%，下降到 2005 年的 10.7%。可是本省民衆的「台灣民族認同」和「雙重認同」的變化趨勢，卻和外省民衆非常不一樣。我們從圖 3 中發現：從 1992 年之後，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下降，「台灣民族主義」顯著成長。「雙重認同者」的比例雖然也有所成長，可是其變化並不如台灣民族主義的成長那樣劇烈。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比例，由 1992 年的 5.9% 在 96 年躍升至 23.2%，和 2003 年的 34.4%。對本省民衆而言，「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兩者是互相競爭、互為消長的。這和上述外省民衆在認同上的變化，表現出頗為不同的型態。本省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似乎比較是：台灣民族主義取代中國民族主義。<sup>6</sup>

本省籍民衆和外省籍民衆在認同上的變化，為何表現出此種不同的樣態？外省籍民衆對「中國認同」的執著，並不難理解。第一代外省人經歷對日戰爭和中國內戰中的逃難、生離死別，他們的生命歷程和中國民族近代的歷史過程無法分割。在此種政治動盪和政治動員的過程中，集體主義的思考和心理傾向是常見的現象。他們對「中華民

6 劉義周和何思因也觀察到類似的趨勢。他們發現 60 歲以上的外省人從 1994 到 1998 的五年間，其「我是中國人」之認同態度顯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兩者都是」。而 39 歲以下本省人的變化則是「我是台灣人」的認同態度增加，「我是中國人」降低(Liu and Ho 1999)。





圖 3 本省人的民族認同，1992-2005

國」的忠誠和強烈的認同似乎是必然的結果。第一代外省人因深刻的親身體驗而型塑的中國認同，同時也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傳承給他們的下一代。幾乎所有的外省第二代都有聽過父母或祖父母講述「老家」的故事，並且要他們記得家鄉的位置。這樣的中國情懷不僅是歷史的記憶、文化的遺產，也是一個祖國的認同。而家庭並不是培養「中國認同」的唯一來源，主流的政治教育與思潮更加強化了這樣的中國祖國的認同。

因此，比較需要解釋的是外省籍民衆所發展出來的台灣認同。型塑外省籍民衆台灣認同的第一項動力，應該是兩岸在發展軌跡上的差異。差異不只表現在政治制度和經濟成長；也表現在歷史經驗和歷史記憶的不同。某些台灣的外省人在和大陸的中國人接觸之後，他們的「中國人想像」似乎立即為現實而具體的「差異」所衝擊。而五十年生活於台灣社會經濟體中，外省人也在台灣社會產生社會關係臍帶和利益聯繫。在四十多年的思念與等待後，終於有機會回到朝思暮想的故鄉。然而大多數的外省人卻選擇了回到台灣的「家」。雖然故鄉是中國，家卻在台灣。第三，近五十年生活於一獨立的政治體中、同時具有政治和社會公民權，台灣的外省人即使有中國的民族認同，其政

治性的思考架構卻一直為「台灣」所限定。當他們討論、或埋怨、或要求公共政策和公共議題的時候，主要是以「台灣」為思考的範疇；而且也只能以台灣為範疇解決問題。以上這些因素都可能使外省人的中國認同，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1992年一項眷村居民的民意調查顯示：在考慮台海兩岸未來發展時，有74.9%的眷村民眾表示將以台灣利益為優先考慮。同時，有72%的人認為台灣是他們永遠的家（中國時報1992/5/18）。

除此之外，另一個對外省人的中國認同有強烈衝擊力量的可能因素是，台灣政治民主化所造成的族群政治力量的改變，以及因此而來的「台灣認同」的勃興。中國民族認同在過去屬於主流價值，「台灣認同」則是一個危險的、被譴責的價值。可是情況卻急速地改變中。外省籍政治人物必須偶爾表演幾句台語，而「愛台灣」也成為他們必要的宣示。外省人成為政治上的弱勢族群、社會上的少數族群；而其秉持的「中國認同」也不斷受到挑戰。這個全新的政治情境對他們的認同，或許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某些人可能會改變認同，以順從社會的主流想法。本土文化和本土語言的被接受或被重視，雖然是來自現實利益的考量，可是卻為心理上的「認同」開啓了必要的門檻。

一般民衆可能基於現實的生活經驗，發展出對該政治體和該共同生活的群體的認同。這個事實對民族主義的理論，或有甚大的重要性。形塑民族認同的主要動力，似乎不僅只是長期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在某一特定政治體中的生活經驗和利害與共也可以成為民族認同的基礎。這樣的生活經驗和共同利益，發展出「我們」的概念。「我們」的概念在每日的政治生活中，不斷地被界定、被強化。不論政治人物對國家未來的主張如何龐雜，他們對「國家」和國家名稱的界定如何古怪和難以理解，畢竟我們所關心的、我們所能影響的，以及能危及我們現實利益的難題，都在我們目前所生活的政治疆域中發生。我們可能對環保、對治安、對色情、對生活品質、對下一代的教育，

對諸多難題感到深惡痛絕。這些都發生在現有的政治疆域中；也只有  
在現有的政治疆域中，我們對這些難題可以發言。而解決這些難題也  
必須以現有的政治疆域為範圍。我們可以假設，「國家」(state)的政治  
管轄和經濟、社會互動，對「民族」認同或有很大的影響。長久生活  
於某一政治疆域中，將讓民族的界線逐漸和國家的管轄範圍趨於一致。  
也就是說，「國家」（權力的管轄和共享、社會經濟生活的參與）對  
「民族」認同的形成或有重要的影響力。<sup>7</sup>

而對本省籍民衆而言，拋棄中國人認同、或中國民族認同卻是一  
件較為輕鬆的工作。在本省籍民衆中，「台灣人」的概念似乎逐漸由  
只是「中國民族中的台灣族群」，演變為和「中國人」對抗的、互斥  
的政治民族概念。

我們可以從表 5 中看到，「台灣人」概念在本省籍民衆中由族群  
演變為族群民族的變化趨勢。在 1992 和 94 兩年，自認為是台灣人的  
本省籍民衆中，只有大約三成的比例同時也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在這  
個階段中，台灣人認同和台灣民族認同並沒有太大的相關性。這時的  
台灣人比較是一個族群的，而非民族的概念；大約七成的「台灣人」  
並沒有秉持一個「台灣民族」的概念。可是在 1996、1998、和 2000 這  
幾年，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本省籍民衆中，已經有將近一半同時也是  
台灣民族主義者。而到了 2004 年，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本省人中，  
甚至有超過六成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在短短的數年間，台灣人認  
同和台灣民族認同的重疊性顯著增加。這似乎顯示，「台灣人」的內  
涵正由文化的族群概念成為政治的民族概念。也似乎顯示，就本省人  
而言，台灣民族主義比較是以（台灣的）文化族群為基礎。<sup>8</sup>

本省和外省兩個族群在民族認同上的變化，除了上述的這些差異

7 對此種「庸常民族主義」的初步討論，參見 Billig (1995)。

8 對本省籍民眾的族群民族主義的進一步討論，參見 Shen and Wu (2008)。

表 5 族群認同與民族主義本省人，1992-2005

		% (N)			
		台灣民族主義	雙重認同	中國民族主義	總數
1992	台灣人	27.4 (37)	47.4 (64)	25.2 (34)	20.7 (135)
	皆是	7.9 (29)	37.2 (137)	54.9 (202)	56.4 (368)
	中國人	4.7 (7)	21.5 (32)	73.8 (110)	22.9 (149)
		11.2 (73)	35.7 (233)	53.1 (346)	100 (652)
1994	台灣人	29.1 (66)	54.6 (124)	16.3 (37)	39.3 (227)
	皆是	15.4 (35)	53.5 (122)	31.1 (71)	39.4 (228)
	中國人	8.9 (11)	32.5 (40)	58.5 (72)	21.3 (123)
		19.4 (112)	49.5 (286)	31.1 (180)	100 (578)
1996	台灣人	46.9 (190)	45.2 (183)	7.9 (32)	44.1 (405)
	皆是	21.0 (82)	56.7 (221)	22.3 (87)	42.4 (390)
	中國人	8.9 (11)	56.5 (70)	34.7 (43)	13.5 (124)
		30.8 (283)	51.6 (474)	17.6 (162)	100 (919)
1998	台灣人	46.3 (232)	43.9 (220)	9.8 (49)	44.3 (501)
	皆是	23.1 (124)	54.7 (293)	22.2 (119)	47.3 (536)
	中國人	11.6 (11)	45.3 (43)	43.2 (41)	8.4 (95)
		32.4 (367)	49.1 (556)	18.5 (209)	100 (1,132)
2000	台灣人	49.3 (321)	43.2 (281)	7.5 (49)	58.6 (651)
	皆是	18.3 (70)	53.7 (205)	28.0 (107)	34.4 (382)
	中國人	10.4 (8)	41.6 (32)	48.1 (37)	6.9 (770)
		35.9 (399)	46.7 (518)	17.4 (193)	100 (1,110)
2004	台灣人	61.9 (343)	29.8 (165)	8.3 (46)	52.4 (554)
	皆是	30.9 (138)	42.7 (191)	26.4 (118)	42.2 (447)
	中國人	15.8 (9)	36.8 (21)	47.4 (27)	5.4 (57)
		46.3 (490)	35.6 (377)	18.1 (191)	100 (1,058)
2005	台灣人	55.8 (213)	37.4 (143)	6.8 (26)	49.5 (382)
	皆是	26.9 (98)	50.0 (182)	23.1 (84)	47.2 (364)
	中國人	34.6 (9)	38.5 (10)	26.9 (7)	3.4 (26)
		41.5 (320)	43.4 (335)	15.2 (117)	100 (772)

之外，似乎也有一致的地方。將兩個族群的變化趨勢曲線放在同一張圖，我們可以觀察到：三種認同在這兩個族群中的成長和衰退趨勢，似乎頗為一致；也就是說，這三種認同的變化趨勢之「斜率」非常接近（圖 4）。我們上述所觀察到的族群差異，似乎來自起點的歧異。外省族群而言，其中國民族認同的變化是由高百分比的起點往下滑落；而本省族群的中國民族認同在 1992 年的起點，遠低於外省族群，可是仍然以相近的斜率往下滑落。雙重認同在兩個族群之間的走勢，似乎也相近；兩者的差異只是來自雙方在起始點上的不同比例。劉義周和何思因的一個研究雖然用「中國人、台灣人、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來測量認同之態度，可是也發現：台灣民衆認同變化趨勢之斜率，不只在不同的族群中非常近似，甚至在不同的年齡、性別、和政黨支持中，也非常的類似、甚至一致。<sup>9</sup> 這個現象似乎暗示著：有相同的因素同時作用在兩個不同的族群（年齡層、性別、政黨支持者）之上。換言之，兩個族群雖然有不同的文化認同、歷史經驗、歷史記憶、和政治傾向，可是其民族認同卻似乎都受到相同因素的影響，而且似乎是以同等的作用力加以影響。然而這個、或這些足以超越歷史、文化、年齡、和政黨支持的因素是什麼呢？這應該是未來的研究和理論思辯的核心議題。

### 三、結語

如前所述，和世界其他地區相較，台灣民族主義遲到得甚久。它的遲到提供了民族主義研究者非常難得的機會。這個難得的機會仍然等待著我們去充分利用。本文僅是提供過去十多年民族認同的變化趨勢。

---

<sup>9</sup> 感謝劉義周教授提供這個資訊。參見 Ho and Liu (2008)。



圖 4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民族認同

就民族的形成而言，十多年或許只是極短的時間。<sup>10</sup> 目前我們所觀察到的變化，並非每一項都是類似洪流的趨勢，而只是變化的跡象和方向。而且我們的某些論斷也仍有待更豐富及更精緻的問卷調查資料來支持。目前我們可用來成為理論性思辯的實證資料仍然不夠多。本文在討論分析的過程中觸及了不少關於民族主義研究的理論性議題，例如民族認同的族群和公民基礎、歷史記憶在形塑族群和民族認同中的角色、政治體制(institution)和日常生活對民族認同的影響、民族想像的建構等。本文也觸及對民族主義理論可能帶來重大貢獻的台灣特殊現象，例如民族認同的浮動性、雙重民族認同、物質利益對感情認同的影響等。可是這些議題的更完整和更深入分析，仍然有待更多的實證資料。而實證資料的蒐集，更需要以理論為指引。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以及投票行為研究，在過去二十年間都累積了相當豐富的

<sup>10</sup> 持相反的立場，認為民族可能在極短時間形成的著作，參見 Beissinger (2002)。

資料。根據這些資料，我們獲得了相當有意義的發現。不論是在理論的思辯上，或政治的操作上，這些發現都有非常重要的啟發。然而，目前我們仍然缺乏足夠的變項資料，足以對台灣民族認同的變化和建構，提出理論性的說明。我們期待社會變遷研究未來可以在問卷設計上不斷地做更新和充實。我們更期待台灣的社會科學家，未來可以對台灣的民族主義現象，提出更豐富的理論和論述。



## 附錄 統獨態度與民族認同，1992-1998

					%
		台灣民族主義	雙重認同	中國民族主義	總數
獨立	1992	50.5	34.3	15.2	13.3
	1993	61.8	38.2	0.0	14.0
	1995	60.1	33.9	6.0	24.0
	1996	60.9	36.9	2.2	24.5
	1998	72.6	26.3	1.1	20.1
維持現狀	1992	23.7	30.4	45.9	37.9
	1993	26.7	37.7	35.6	54.7
	1995	25.9	37.4	36.7	46.9
	1996	23.6	52.4	24.0	59.2
	1998	27.2	46.2	26.5	69.6
統一	1992	13.5	23.6	62.9	48.8
	1993	0.0	29.0	71.0	31.3
	1995	6.0	24.4	69.6	29.1
	1996	3.8	37.2	59.0	16.4
	1998	2.9	43.5	53.6	10.3
					100.0

## 參考文獻

- 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4: 33-61。
- (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 4: 75-118。
- (2005)愛情與麵包：初探台灣民衆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 9(2): 5-39。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 (1996) Introduction. Pp. 1-16 in *Mapping the Nation*,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Verso Press.
- Barth, Fredrik (1994) Enduring and Emerging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Ethnicity. Pp. 11-32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 Beyon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edited by 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Amsterdam: Het Spinhuis.
- Beissinger, Mark R. (2002)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reuilly, John (1996)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Pp. 146-174 in *Mapping the Nation*,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Verso Press.
- Cocks, Joan (2002) *Passion and Paradox: Intellectuals Confront the National Ques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Connor, Walker (1978)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 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4): 377-400.
- Eddy, John, and Deryck Schreuder, eds. (1988) *The Rise of Colonial*

*Nationalism*. Sidney: Allen and Unwin.

Emerson, Rupert (1966 [1954]) Paradoxes of Asian Nationalism. In *Social Change: The Colonial Situation*, edited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Feinberg, Walter (1997) Nationalism in a Comparative Mode: A Response to Charles Taylor. Pp. 66-73 in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edited by Robert McKim and Jeff McMaha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 Szu-yin, and I-chou Liu (2002) The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y of the Taiwan People in the 1990's. *American Asian Review* 20(2): 29-74.

Hobsbawm, Eric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roch, Miroslav (1998) Real and Construct: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 Pp. 91-106 i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hn A. H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u, I-chou, and Szu-yin Ho (1999) The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y of the Taiwan People. *Issues and Studies* 35(3): 1-34.

Nairn, Tom (1997)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New York: Verso.

Roshwald, Aviel (2001) *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Empires*. New York: Routledge.

Schermerhorn, Richard A. (1970)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A Framework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Shen, Shiau-chi, and Naiteh Wu (2008) Ethnic and Civic Nationalism: Two Roads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Nation. Pp. 117-143 in *The "One China" Dilemma*, edited by Peter Chow. New York: Palgrave.

Smith, Anthony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Press.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第 5 章

## 誰是泛藍、泛綠認同者？ 台灣民眾政黨認同的實證分析

吳重禮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

誌謝：拙文使用的資料擷取自歷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所釋出的全國性面訪資料。對於該計畫的規劃與執行機構及人員之付出，筆者表達由衷的感謝。拙文初稿曾發表於 2008 年 3 月 29 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第十一次研討會」，承蒙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王業立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黃紀講座教授等多位學術先進，對於拙文提出的寶貴評論與意見，筆者受益良多。研究助理蘇脩惠、吳嘉玲、邱銘哲在資料處理方面的戮力協助，以及中央研究院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提供部分資助，使拙文得以順利完成。再者，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審閱並提供許多建設性觀點和建議，筆者受益良多，在此謹誌謝忱。當然，文責筆者自負。

## 摘要

在各類政治態度中，「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是一項甚為重要的心理成分。鑑於該研究主題深具重要學理意涵和政治參考價值，本研究探討台灣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基本特質，包括個人社會特徵及其相關政治態度的差別。筆者首先擷取歷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所釋出的全國性面訪資料，回顧1990年至2006年台灣民眾政黨認同的變遷情形。其次，筆者參酌既有理論架構，分析2006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二次—公民與國家組」資料，藉由「交叉分析」(cross-tabulation analyses)與「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s)進行檢證。實證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在年齡、省籍、地理區域、家戶收入、政治興趣、政府施政滿意評價，以及家庭經濟評估等方面，泛藍、泛綠認同者與獨立選民具有顯著差異。值得說明的是，囿於2006年政治局勢的時空脈絡，民眾政黨認同是否深受影響，仍須進一步觀察和探討。在結論中，本文摘述研究脈絡、實證結果及其學術限制，並提出未來研究的方向與建議。

關鍵詞：政黨認同、獨立選民、選民理性、政治態度、投票行為

## Who Are Pan-Blue and Pan-Green Identifiers? Determinants of Party Identifications of Taiwan's Voters

Chung-li W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mongst a variety of political attitudes, party identification is generally accepted a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Given the academic import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this topic, this study examines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sans and independent voters, including their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To this end, I first review the trend in the party identification of Taiwan's voters from 1990 to 2006, using nation-wide survey data obtained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in various years. I then analyze the 2006 TSCS data (fifth wave of the second phase: section of citizens and n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adopted in this study involves two steps. The first approach is the use of cross-tabulation analyses, and the second method employs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to evaluate the simultaneous effect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variables of age, ethnicity, region, household income, political interest,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al performance, and microeconomic condition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pan-Blue supporters, pan-Green supporters, and independent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2006 might have had a contextual impact o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this needs to be explored in more depth. In the conclusion, major findings are reviewed,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outlined, 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party identification, independent voter, voter rationality, political attitude, voting behavior*



## 一、前言

本論文旨在探討兩項議題：首先，在歷經民主化過程中，台灣民衆政黨認同的變遷情形爲何？其次，在當前政黨體系之中，泛藍認同者、泛綠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差異爲何，且其影響因素爲何？在各類的政治態度面向中，「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在其所處環境中，個人對於該重要團體的感情取向」(Campbell et al. 1960: 121)——是一項重要的心理成分，係個人價值觀念與信仰系統中關鍵的一環；就整體效應而言，一般民衆政黨認同的方向和強度對於政黨體系的穩定與否影響甚鉅。這種對於特定政黨的情感依附、歸屬感或者忠誠感，被視爲是政治行爲者其自我認同在政治世界的一種延展與擴張。在產生團體認同的心理過程中，個人會形成一種我群意識，該意識係以「自我歸類」(self-classification)、「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或者「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的方式表達出來，將自我視爲群體的一部分(Abramson 1979; Campbell et al. 1954: 88-89; Converse and Pierce 1985: 144; Miller 1976: 21-22)。迥異於若干文獻將政黨認同作爲解釋民衆政治態度、參與行爲和投票抉擇的變項，本研究藉由實證分析瞭解形塑一般民衆政黨認同的影響因素。簡言之，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探討我國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基本特質及其影響因素，包括個人社會特徵及其相關政治態度的差別。

就學術研究價值和實際政治參考的角度來說，探究台灣選民政黨認同與獨立選民的社會特徵與政治態度，至少具有三項重要意涵。首先，誠如諸多研究著作指出，政黨認同屬於長期穩定的心理因素，用以解釋民衆政治行爲的形成與政治體系的穩定(Campbell et al. 1960; Campbell et al. 1954; Greene 1999; Keele and Wolak 2006; Neely 2007; Schickler and Green 1997)。因此，從政治發展的面向而言，分析政黨

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特質差異，不僅有助於瞭解民衆投票行爲，而且裨益探求台灣民主鞏固的歷程與政黨體系的變遷因素。其次，以比較政治的視角切入，瞭解台灣政黨認同的變遷趨勢及其影響因素，始得將其實證結果作為跨國比較分析的基礎。再者，就政治參考價值而言，在過去十餘年間，我國政治局勢與政黨體系變動甚鉅（諸如新黨、親民黨、台灣團結聯盟的相繼成立和逐漸式微、中央政府與地方政權的政黨輪替，以及泛藍與泛綠的朝野陣營對峙等），因此界定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基本特質，對於朝野政治菁英、政黨組織，以及候選人擬定動員策略與規劃競選議題，應具有莫大的助益。

鑑於政黨認同深具學理意涵和實際參考價值，本研究擬探討下列相關議題。首先，筆者檢視相關研究著作，扼要說明政黨認同的概念意涵及其爭議。其次，筆者擷取歷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以下簡稱「變遷調查」）所釋出的全國性面訪資料，呈現 1990 年至 2006 年台灣民衆政黨認同的變遷情形，藉此闡述本研究的分析背景。再者，本文以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社會特徵與政治態度為研究焦點，鋪陳理論架構，並據此設定分析模型。接續，為檢證研究模型，筆者藉由 2006 年「變遷調查」第五期第二次——公民與國家組（傅仰止、張晉芬 2007）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並進一步設立「多項勝算對數模型」，且試圖分析研究模型的理論意涵。實證資料顯示，在年齡、省籍、地理區域、家戶收入、政治興趣、政府施政滿意評價、當前家庭經濟評估，以及過去家庭經濟評估等方面，為解釋泛藍、泛綠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重要指標。當然，在實證模型方面，本研究僅分析 2006 年面訪調查資料，其研究發現是否得以適用於現今民衆的政黨認同，仍有待商榷。這主要是肇因於 2006 年之後台灣政治情勢時空背景的差異，其是否影響民衆政治態度和心理認知，仍有待持續的觀察和探討。在結論中，本文摘述實證要點，並且提出未來研究的方向、限制與建議。筆者期望透過本文微薄研究結果，引發學界之共鳴，相

互切磋，以補不足之處。

## 二、政黨認同的概念意涵及其爭議

行為學派研究者一向致力於界定影響民衆心理認知、政治態度與參與行爲（尤其是投票抉擇）的可能變項，以及這些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分析架構而言，社會心理學途徑（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亦稱爲「心理—政治途徑」[psycho-political approach]、「態度途徑」[attitudinal approach]，或者是「認知途徑」[cognitive approach]）普遍被認爲是瞭解選民政治行爲的重要切入點，其強調內在的人格特質、價值體系和政治態度，往往形塑個人政治意見和政治參與。必須強調的是，這種團體歸屬感並不僅存在於正式黨員，也不必必然持續地反應在投票行爲(Campbell et al. 1960: 121-123; Converse 1964: 238-241; Miller and Shanks 1996: 120; Sears and Valentino 1997: 45-46)。一般說來，個人透過「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學習歷程，從家庭、學校、職場、同儕團體，以及傳播媒體等，獲得對於政黨偏好與認同的訊息逐漸形成政黨認同，並隨著成長過程與歷次傾向投票給相同政黨的經驗，增強對於該政黨的的心理認同。

藉由社會心理學途徑詮釋選民投票行爲，首推密西根學派的理論建構；其以爲，政黨認同係影響投票抉擇長期且穩定的「心理依附」(psychological attachment)因素。政黨認同之所以成爲經驗政治理論的核心概念，主要因爲政黨認同協助選民瞭解政治社會，決定政治偏好；亦即，政黨認同不僅左右個人投票抉擇，甚至影響民衆對於「議題取向」(issue orientation)的詮釋與「候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的評價(Converse 1966: 16; Conway 2000: 52-55, 59-60; Milbrath and Goel 1977: 53-56; Zaller 1992: 231, 296-299)。簡言之，此派研究者認爲，政黨認同屬於選民自我認知的一種特質，具有長期穩定的效應，用以解

釋個人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爲的形成；相對於此，就政治行爲的取向來說，議題立場和候選人條件則屬於中期與短期因素。

無疑的，社會心理學途徑的觀點至少具有兩項優點。首先，以政黨認同解釋民衆的政治態度和投票行爲，此項解釋淺顯易懂，甚爲符合理論的「簡約」(parsimony)與「直接性」(straightforwardness)之基本條件，具備相當程度的說服力。其次，其結合若干重要概念（包括價值觀念、信仰體系、心理取向、行爲模式、政治社會化等），提供頗具學術視野的研究領域。儘管如此，這項學說仍有其不足之處，引發許多爭議，其中一項議題就在於政黨認同的概念意涵。<sup>1</sup>

更確切地說，在過去數十年間，政黨認同的「長期穩定」與「心理依附」兩項基本命題備受質疑（陳陸輝 2000; Achen 1992; Box-Steffensmeier and Smith 1996; Burden and Klostad 2005; Fiorina 1981; Johnston 2006; Wu 2002）。首先，針對政黨認同長期穩定的性質，抱持保留態度的學者指出，以美國選舉經驗爲例，既然一般民衆的政黨認同不易在短期間內更動，爲何匯集的集體性結果，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支持率與得票率會隨著時間而不斷地改變，甚至呈現巨幅波動？換言之，假若「個人層級」(individual-level)的政黨認同係持續穩定，則「總體層級」(aggregate-level)的政黨支持情況，應該不會呈現起伏震

---

1 儘管政黨認同儼然成爲選舉研究的核心概念，且應該是行爲學派研究者最常使用的變項，然而細究諸多文獻著作，政黨認同的研究仍遭逢若干爭論。大體而言，爭議主軸環繞四個面向：其一，政黨認同的概念意涵爲何？其二，如何測量政黨認同？其三，如何釐清政黨認同與選民政治行爲（尤其是政治態度、投票抉擇）的關係？其四，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社會特徵與政治態度是否有所差異？必須說明的是，政黨認同所衍生的問題往往相互糾葛，互爲因果，並不宜截然劃分。某一項議題所蘊含的意涵，與其他問題亦有若干重疊之處；爲清楚呈現討論議題，始將其區分爲四種面向（相關說明，建議參閱何思因、吳釗燮 1996；吳重禮、許文賓 2003；莊天憐 2001；Wu 2002）。

盪的現象，然而實證資料顯示並非如此。其次，對於政黨認同心理依附的意涵，若干研究者引用「理性選擇途徑」的立論(Downs 1957)提出「選民理性」(voter rationality)的觀點；其認為，選民的投票抉擇係基於理性計算，因此對於多數民衆而言，政黨僅是簡化投票計算的工具而已，考量以最少的政治行動成本獲致極大化的個人利益(Fiorina 1981: 198-200)。簡單地說，所謂選民的心理依附僅是過於理想的假設；反之，民衆的投票抉擇取決於其他短期政治經濟因素，舉凡總統聲望與知名度、政府施政滿意、個人經濟評估、總體經濟表現，以及政治議題訴求等。

相對於社會心理學途徑的觀點，「社會學途徑」(sociological approach)和「理性選擇途徑」(rational choice approach)則提出不同論點，解釋選民的政治行為(Beck et al. 2002: 57-58)。依據社會學途徑（亦稱為「哥倫比亞學派」[Columbia studies]）觀點，「社會人口因素」(sociodemographic factor)決定選民的政治偏好，這些個人社會特徵提供民衆基本的「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資訊脈絡」(informational context)，以及「個人網絡」(personal network)，進而影響政治意見與投票行為。簡單地說，屬於某種性質的團體成員擁有高度「政治同質性」(political homogeneity)，相較於其他團體，成員彼此政治態度頗為相似(Berelson et al. 1954; Huckfeldt 1979, 1986; Huckfeldt, Ikeda, and Pappi 2000; Huckfeldt, Sprague, and Levin 2000)。這些社會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種族（族群）、宗教信仰、居住地區、收入、職業等。易言之，社會學途徑認為，民衆基本特徵左右「社會計算」(social calculus)結果，為決定政治態度與投票取向的關鍵因素。

迥異於社會學途徑偏重政治行為的「社會計算」過程，理性選擇途徑則強調選民「個人計算」(personal calculus)的重要性，藉此連結議題立場、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的關係(Downs 1957; Fiorina 1981; Lewis-

Beck and Nadeau 2000, 2001; Rabinowitz and MacDonald 1989; Tufte 1978)。如前所述，該學派基本前提認為，一般民衆為理性個體，其投票抉擇係基於利益極大化的考量，因此政黨取向僅是簡化投票計算的工具而已。歸納而言，採理性選擇途徑的學者挑戰社會心理學途徑所發展的政黨認同概念，認為其面臨諸多研究瓶頸，這主要源自於政黨認同概念的預設立場與不確定性因素。相對於政黨認同的效應，此派學者以為，短期總體經濟因素、政府施政表現評估、總統聲望與知名度、選舉議題立場、意識形態差距，以及政黨與候選人的政策訴求等，對於選民政治行為極具解釋力。<sup>2</sup>

歸納前述分析，社會心理學途徑強調政黨認同具有長期穩定的效應，而社會學途徑和理性選擇途徑則質疑此基本命題，強調民衆社會背景特徵和個人利益極大化對於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的影響。接續，本文將擷取六波「變遷調查」資料，檢視 1990 年至 2006 年台灣民衆政黨認同的變遷狀況，藉此瞭解總體層級的政黨認同究竟是呈現持續穩定趨勢，或者是巨幅波動的現象？之後，藉由 2006 年「變遷調查」

<sup>2</sup> 值得說明的是，關於政黨認同與選民投票行為的關聯，理性選擇學派研究者所提出的解釋亦是眾說紛紜，不一而足。舉其犖犖大者，從反映選民「當前投票意向」(current vote intention) (Budge and Farlie 1976; Thomassen 1976)、民眾對於政府施政與在職者評價影響其本身政治態度的「回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 (Fiorina 1981)、自我利益考量與衡量政黨未來作為的「前瞻投票」(prospective voting) (Achen 1992)、斟酌以往政黨表現能力與「世代效應」(effects of age cohorts)的「理性學習模式」(rational learning model) (Alwin and Krosnick 1991; Gerber and Green 1998)，乃至於 1990 年代以來引發美國政治學界關注和爭議的「集體政黨認同」(aggregate party identification; 更為普遍的用詞為 macropartisanship)，其嘗試以集體選舉資料詮釋選民政黨認同的長期變動性(Abramson and Ostrom 1991, 1992, 1994; Box-Steffensmeier and Smith 1996; Erickson et al. 1998; Green et al. 1998; MacKuen et al. 1989, 1992; Meffert et al. 2001)。



面訪資料，瞭解當前政黨體系之中，泛藍、泛綠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為何？

### 三、台灣民眾政黨認同的變遷趨勢

回顧台灣政治發展歷程，直至 1980 年代起，隨著社會結構快速轉型，黨外後援會凝聚各方反對菁英共識（儘管當時的黨外運動仍然屬於非法組織），建立全島性選舉組織，進而促成日後反對黨的興起、大眾政治參與程度的提升，以及政黨競爭的制度化。總體而言，這些發展代表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弱化，逐步朝向政黨政治的民主體制。在選舉競爭過程中，政黨認同不僅對於選民投票決定具有重要的影響，亦為左右個人政治態度與其他選舉議題的關鍵因素。因此，觀察民眾政黨認同的長期變遷，一方面可以瞭解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民眾政治支持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得以約略窺見未來政黨體系版圖的發展趨勢。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的「變遷調查」，在不同時間點詢問民眾的政黨偏好，筆者以此檢視 1990 年、1995 年、1998 年、2000 年、2004 年、2006 年等六個時期，民眾政黨認同的變遷情形（關於歷次政黨認同問卷措辭與選項，請參見附錄 1）。在這段時期，民眾對於不同政黨的認同分布情形，誠如表 1 所示。<sup>3</sup>就國民黨而言，從 1990

<sup>3</sup> 必須強調的是，在歷次「變遷調查」中，測量政黨認同的措辭並不一致，而且問卷選項亦有差異。筆者以為，測量措辭和題目選項的改變，主要反映過去十餘年來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其政黨體系的變動性，似乎不若英美西方國家政黨體系的穩定程度。對於本研究來說，這兩項因素造成相當程度的侷限性，其至少反映在三方面。第一，自 1990 年至 2006 年政黨認同的變化情形，影響判斷未來的發展趨勢，其究竟會持續呈現波動現象，抑或逐漸趨於穩定？第二，由於進行跨時比較「縱向分析」(longitudinal analysis)產生的困難，因此不宜過度詮釋政黨認同變化的成因。第三，在研究設計上，本文後續實證分析僅著重於 2006 年



表 1 台灣民衆之政黨認同與藍綠陣營認同趨勢

	%					
	1990	1995	1998	2000	2004	2006
國民黨	49.7	52.2	36.5	19.6	29.7	20.3
民進黨	7.7	17.5	23.6	37.6	32.9	11.9
新黨	--	8.2	4.4	.7	--	.2
親民黨	--	--	--	14.4	3.5	.8
台灣團結聯盟	--	--	--	--	1.7	.5
獨立選民	42.7	22.1	35.6	27.6	32.2	66.3
	1990	1995	1998	2000	2004	2006
泛藍陣營	49.7	60.4	40.9	34.7	33.2	21.3
泛綠陣營	7.7	17.5	23.6	37.6	34.6	12.4
獨立選民	42.7	22.1	35.6	27.6	32.2	66.3

年的 49.7%，在 1995 年達到高峰 52.2%，之後逐漸遞減到 2006 年 20.3%，顯示國民黨認同者逐漸流失的情形；此現象在 2000 年首度政黨輪替的時候最為明顯，國民黨認同者僅占 19.6%，直至 2004 年旋即回升到 29.7%。儘管如此，國民黨認同者似乎並非外流至與其對立的民進黨，而是流向從國民黨內部分裂出來的新黨，以及之後成立的親民黨。相當程度而言，在 1993 年成立的新黨不僅實質挑戰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優勢，提供民衆另一種選項，也有助於落實政黨競爭與政治制衡的作用。然而，或許因為新黨過於強烈的意識形態，偏離了「台灣化」、「本土化」社會主流價值，使得認同者逐漸流失；從 1995 年的 8.2%，至 2000 年時降為 0.7%，甚至在 2006 年僅占 0.2%，在在說明了新黨的泡沫化趨勢。

的「跨區分析」(cross-sectional analysis)，至於實證結果亦無法確切斷言其屬於特定的短暫現象，或者屬於長期穩定的變遷趨勢。筆者坦承，這些都是本研究的限制之處。

無獨有偶地，以宋楚瑜為首的親民黨與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台灣團結聯盟，他們的演化歷程和新黨甚為相近。在親民黨方面，2000年挾著宋楚瑜競選總統的旺盛氣勢，甫成立即吸引了若干原有國民黨支持者，造成國民黨認同者在此時降到僅 19.6%，而親民黨支持者則達到 14.4%，兩者差距僅為 5.2%，這也是兩黨支持度最接近的時候。然而，這種情形在 2004 年時出現顯著變化，國民黨認同者回升到 29.7%，親民黨認同者卻驟降至 3.5%，雙方差距擴大到 26.2%。之所以如此，可能原因在於 2004 年總統選舉，陳水扁、呂秀蓮以些微差距再度擊敗連戰、宋楚瑜的搭配，以及國民黨新共主馬英九出現，再加上 2004 年底立法委員選舉的提名分配爭議，造成國親合作破局。若干民衆對於親民黨的信心不再，轉回支持馬英九領軍的國民黨，隨著諸多親民黨政治菁英體認局勢不再，陸續返回國民黨，以致於在 2006 年親民黨認同者僅剩 0.8%。同樣地，在 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中，台聯初試啼聲，頗有斬獲；然而，至 2004 年其氣勢已大為減弱，認同者比例為 1.7%，甚至在 2006 年僅剩 0.5%。

相對於此，認同民進黨的比例從 1990 年之後一路攀升，至 2000 年首度超過國民黨，達到高峰 37.6%，到 2004 年略微下降至 32.9%。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4 年至 2006 年，民進黨認同呈現戲劇性變化，到 2006 年驟降到僅有 11.9%，與國民黨的 20.3%，彼此相距達 8.4%。之所以如此，筆者以為，應與 2005 年底爆發高雄捷運工程弊案，之後引發陳水扁政府一連串的醜聞弊案密切相關，包括趙建銘的台開案、陳水扁與夫人吳淑珍及其親信陷入國務機要費案，以及其他貪腐案件等，民衆對於過去強調清廉、改革的民進黨政府失望，甚至引發 2006 年 7 月親綠學者籲請陳水扁總統自行下台，以及 9 月起的紅衫軍「倒扁運動」，導致認同民進黨的比例下滑。然而，一項值得關切的現象是，民進黨認同者的減少並沒有導致其他政黨認同者的增加，對於朝野政黨失去信心，反而促使獨立選民比例的躍升。這些缺乏特定政黨

偏好的民衆，從 1990 年的 42.7%，至 1995 年下降到 22.1%，在 1998 年至 2004 年之間，則維持在 30% 左右，直到 2006 年則高達 66.3%。

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將屬性相近的政黨歸併，亦即將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稱為「泛藍陣營」，民進黨與台聯以「泛綠陣營」稱之。如表 1 所示，泛藍陣營認同者在 1995 年達到 60.4% 的高峰之後，便呈現下滑趨勢，1998 年尚有 40.9% 的認同民衆，2000 年和 2004 年維持在 34% 上下，到了 2006 年則下降到 21.3%。另一方面，認同泛綠陣營的民衆在初始十年間有著穩定成長的趨勢，1990 年時僅 7.7%，歷經 1995 年的 17.5%，1998 年的 23.6%，在 2000 年高達 37.6%。在民進黨執政之後，2004 年泛綠陣營的認同比例雖微幅下滑到 34.6%，然而至 2006 年卻急轉直下，僅剩 12.4%。

整體而言，從台灣民衆政黨認同的變遷態勢，至少可以歸納出三點觀察。首先，在過去十餘年間，整體層級的政黨認同並非呈現持續穩定趨勢，而是展現出波動現象。其次，儘管不同政黨之間曾經出現勢力消長的情形，然而仍是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與以民進黨為主的泛綠陣營為主軸，而且有朝向兩黨選舉競爭的方向發展。再者，獨立選民的比例變化不可謂不大；在 1990 年至 2004 年期間，這些獨立選民逐漸被政治動員而具有黨派屬性，這似乎意味著民衆逐漸具有政黨政治與政黨競爭的觀念。然而，在過去幾年來，這種獨立選民的比例明顯增加，顯示有越來越多的民衆拒絕表達對於特定政黨的偏好。這種式微的情形，其實和美國在 1960 年代末期之後的發展情勢相當類似；亦即，選民對於政黨的認同逐漸鬆動或者對於原先認同政黨失去向心力，導致獨立選民的比例不斷提升。

在瞭解台灣民衆的政黨認同變動趨勢之後，本研究嘗試探求民衆政黨認同的影響因素；詳言之，泛藍、泛綠認同者、獨立選民的基本特質差異為何，而其社會特徵與政治態度是否呈現顯著不同？誠如前言所述，此項議題甚為重要，尤其若干學術文獻顯示，朝野政黨在意

識形態的模糊與政策立場趨於近似，使得選民無所適從，導致政黨認同弱化與投票率降低的趨勢(Cohen and Collier 1999; Sears and Valentino 1997; Wattenberg 1990, 1991)。<sup>4</sup> 如是以觀，清晰描述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特質，顯然並非易事。鑑此，筆者考量 2006 年「變遷調查」資料特性，較適宜進行「跨區分析」，比較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社會特徵與政治態度。該研究於 2006 年完成全國性民意調查，面訪 1,972 個年齡滿 18 歲以上的國民（傅仰止、張晉芬 2007）。筆者為文時，該調查研究屬於甫完成的計畫，應足以反映新近我國政黨體系的態勢，契合本文的研究主旨。

#### 四、變項選擇與相關理論背景

爲了探討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差異，筆者根據相關理論基礎擇取變項，進行「交叉分析」和「多項勝算對數模型」加以檢證。在分析模型中，依變項爲民衆的政黨認同，區分爲泛藍認同者(21.2%)、

---

<sup>4</sup> 以美國選民為例，依據「全國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NES)所發展的標準化問卷題目與量表，政黨認同者包括「強烈民主黨員」(strong Democrat)、「弱民主黨員」(weak Democrat)、「獨立民主黨員」(independent Democrat)、「純粹獨立選民」(pure independents)、「獨立共和黨員」(independent Republican)、「弱共和黨員」(weak Republican)，以及「強烈共和黨員」(strong Republican)等七類。學理上，「弱民主黨員」和「弱共和黨員」對於政黨偏好應該較「獨立民主黨員」和「獨立共和黨員」更為強烈，因此其投票行為也應該更為穩定。然而，實證研究顯示，這些「獨立民主黨員」和「獨立共和黨員」雖自稱爲獨立選民，但仍舊偏好某個特定的政黨，而且他們比「弱民主黨員」和「弱共和黨員」擁有更強的政黨情感，因此他們長期性政黨取向投票行為甚至比「弱民主黨員」和「弱共和黨員」更加穩定(Dennis 1988a, 1988b; Keith et al. 1992)。

獨立選民(66.3%)，以及泛綠認同者(12.4%)等三類。<sup>5</sup> 在自變項方面，筆者選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省籍、地理區域、家戶收入等各項受訪者社會特徵，以及政治興趣、「政治功效意識」(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政府施政滿意評價、當前家庭經濟評估、過去家庭經濟評估等各項個人政治態度。其相關理論架構，茲摘述如後。

在性別方面，男性普遍被認為對於政治事務有較高的興趣、較為關切各類政治議題，參與涉入各類政治活動。部分文獻指出，這種性別差異主要源自於個人政治功效意識強弱的不同；相較於女性，男性選民擁有較強烈的感覺，認為自己具有處理複雜政治事務的能力和智識(Campbell et al. 1960: 489; Milbrath and Goel 1977: 117)。這似乎意味著男性選民的政治態度較具資訊吸收的能力，得以比較朝野政黨的黨綱意見，瞭解特定政黨的政策立場，因而維持較為穩定的政黨認同，而女性選民則較易成為獨立選民。

若干研究指出，民衆年齡與其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呈現顯著相關(陳義彥 1996; 陳義彥、蔡孟熹 1997; 劉義周 1994; Conway 2000)。大體而言，個人政治資訊的取得與政治經驗的累積，經常會隨著年紀的成長而增加，「心理涉入感」(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與政黨認同亦逐漸增強，促使本身政治參與程度的升高。就「生命週期效應」(life-cycle effects)觀點而言，年齡越輕的選民對於政治體系的認知較為薄

5 值得說明的是，表 1 所示 2006 年的政黨認同測量題目，和後文實證分析所使用的測量題目並不相同(請參閱附錄 1 和附錄 2)。之所以如此，主要在於有效樣本數的考量。前者共計有 1,920 位，分別為國民黨認同者 390 人，民進黨認同者 229 人，新黨認同者 3 人，親民黨認同者 16 人，台聯認同者 9 人，表示「沒有偏向哪一黨」者有 1,273 人。後者則略多，總計有 1,960 位，分別為泛藍認同者 450 人，泛綠認同者 265 人，表示「中立不偏」者有 1,245 人。若以 Gamma 和 Kendall's tau-b 進行這兩個變項的相關性檢定，分別為 .826 ( $p < .001$ ) 和 .634 ( $p < .001$ )，顯示兩者具有統計顯著的高度正相關。

弱，對於政黨的情感依附不深且不固定。相反地，在考量家庭與事業因素之下，年齡越長的民衆其政治參與較為穩定，隨著對於政治事務的熟悉而強化其政黨認同。

若干美國實證研究顯示，個人教育程度越高，社會資訊吸收能力越強，對於政治事務的判斷力越強，訊息處理技巧越成熟，較無須仰賴政黨標籤做為投票依據，因此較易成為獨立選民；反觀，教育程度越低，更加需要政黨認同做為政治判斷與參與行為的依據，故較可能成為政黨認同者(Keith et al. 1992; Stone and Schaffner 1988; Zaller 1992)。迥異於美國選民的研究結果，以往研究顯示，台灣民衆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成為政黨認同者，而教育程度越低者，越可能成為獨立選民。再者，就政黨支持對象而言，教育程度越高，社會地位越高，越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因此傾向支持長期執政的國民黨，反之則較可能成為民進黨認同者（吳重禮、許文賓 2003；莊天憐 2001）。民進黨在 2000 年和 2004 年贏得總統選舉成為執政黨，台灣政治局勢不變，政黨版圖變動甚鉅，朝野勢力興衰互見，教育程度與政黨認同的關係是否有所改變，頗令人好奇。

由於我國政治環境背景使然，省籍因素向來是台灣實證研究的重要變項。在特有社會歷史背景之下，每逢選舉期間，省籍議題經常成為熱門話題，甚至成為選舉動員的關鍵依據。部分實證研究顯示，相對於人數最多的本省閩南族群，大陸省籍人士對於某些政治議題（諸如兩岸統獨議題）具有顯著立場，或者因為凝聚力強烈的「團體意識」(group consciousness)，對於政治事務存有特定看法，政治參與程度較高（王甫昌 1998；胡佛 1998；黃紀、吳重禮 2000；Wu 2008）。整體而言，民進黨支持者有較高比例為本省籍選民，反觀大陸省籍民衆則較其他族群傾向支持國民黨（吳重禮、許文賓 2003；黃秀端 1995）。除了閩南與外省族群之外，客家籍民衆的政黨認同亦是關注焦點，故亦將此類型納入觀察。



另外，本研究探討「脈絡效應」(contextual effects)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亦即居住在不同地理區域的選民，是否由於地域政治特性的差異，影響其政黨認同。若干研究指出，由於區域結構、經濟形態、人口特性等因素差異，居住在不同地區的民衆往往抱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吳重禮等 2003）。就現今政治版圖而言，雲林和嘉義以南各個縣市儼然成爲泛綠陣營的鐵城重鎮，而新竹和苗栗以北以泛藍陣營的支持者居多。鑑於「北藍南綠」的對立態勢，有識者甚至預言「南北差距」、「南方政治」於焉產生。依據前述之剖析，本研究假設，北部的選民傾向認同泛藍陣營，南部選民較認同泛綠陣營，至於中部和東部的選民則有待檢驗。

無疑的，家戶收入係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若干研究文獻指出，經濟收入對於民衆政治行爲具有顯著影響(Lipset 1981; Milbrath and Goel 1977)。基本上，政治參與需要考量個人的資源、時間、能力，因此經濟條件較佳的選民，其政治參與程度也較高。若干研究亦指出，家庭收入越高者，其對於政治歧異分子的容忍度、言論自由度、集會遊行自由的保障，以及政治改革速度贊同的比例越高。此外，相對於農工階級，中產階級也有較高的比例，足以接納溫和的民主化措施（田弘茂 1995；吳重禮、許文賓 2003）。近年來，經濟發展成爲社會各界備受關注的議題，家戶收入與政黨認同的關係究竟爲何，頗值得探討。

就政治興趣與政黨認同的關係而言，部分研究指出，彼此之間相互影響；亦即，可能因爲政黨認同而對於政治事務產生較爲強烈的興趣與關懷，也可能因爲政治興趣的提升，越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而強化其政黨認同(Conway 2000; Rosenstone and Hansen 2003)。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政治興趣與政黨認同呈現正向關係。再者，猶如教育程度的影響，若干文獻證實，獨立選民往往對於政治事務和選舉動員缺乏興趣，較不願意涉入政治參與，對於政治議題可能僅有些微的認知，



甚少瞭解政治訊息，對於政治活動抱持冷漠態度，致使選舉投票的動機偏低。然而，亦有學者提出不同論證，其認為諸多獨立選民具有高度政治興趣，其雖然自稱獨立選民，但對於政治事務甚為關切，偏好特定的政黨，而且可能比政黨認同者擁有更強的政黨情感，因此他們長期的政黨取向、投票行為甚為穩定(Dennis 1988a, 1988b; Keith et al. 1992; Valentine and Van Wingen 1980)。如是以觀，政治興趣與政黨認同之關係為何，尚待進一步檢證。

政治功效意識係影響民衆政治行為的重要因素，其意指「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於政治過程必定有或者有所影響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履行公民責任(civic duties)是值得的。它是一種感覺，認為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是有可能的，而身為一公民可以扮演相當的角色來促成這樣的改變」(Campbell et al. 1954: 187)。一般而言，民衆之政治功效意識越高，汲取社會資訊的動機與意願越加強烈，從而提升參與政治事務的興趣。針對政治功效意識的意涵，可進一步將其區分為兩個層面：「內在功效」(internal efficacy)和「外在功效」(external efficacy)。前者指涉的是個人相信自己具有能力可以瞭解政治事務、認知政治過程的全貌，以及參與政治活動的程度；後者則意指個人相信政府官員對於人民的要求有所反應與重視的程度(吳重禮等 1999: 25; Balch 1974; Pattie and Johnston 1998; Wu 2003)。在此，本文假設，政治功效意識對於選民政黨認同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亦即政治功效意識越高者，較易成為政黨認同者，反之則傾向成為獨立選民。

從理性選擇途徑的觀點切入，如前曾述，民衆對於執政者的施政評價，不僅如同一把政治溫度計，足以反映民衆對於執政者的感受，進而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和投票行為(吳重禮、李世宏 2003；李世宏、吳重禮 2003；Wu and Huang 2007)。由此看來，對於政府施政表現滿意程度，自然成為增強或者弱化政黨認同的關鍵依據。由於民進黨在 2006 年為執政黨，本研究假設，對於政府施政表現持正面評價的

選民，傾向認同泛綠陣營；反之，對於政府施政評價持負面觀點者，則傾向認同泛藍陣營。至於施政評價與獨立選民的關係，則有待檢驗。

諸多歐美實證研究指出，國家短期總體經濟情況呈現繁榮或者衰退，向來是影響民衆是否支持政府的重要因素(Kinder and Kiewiet 1979, 1981; Lewis-Beck and Nadeau 2000, 2001; Rabinowitz and MacDonald 1989)。在此研究領域中，「回顧投票」(Fiorina 1981)與「前瞻投票」(Achen 1992)為解釋經濟評估與民衆政治行為的重要理論。根據回顧投票的觀點，國內若干研究指出，民衆對於政府施政與在職者的評價，即可能形塑其本身的政治態度，進而影響投票抉擇；反之，前瞻投票意指民衆嘗試比較、評估政治人物對於未來政策的規劃與承諾，從而影響政治行為(吳重禮、王宏忠 2003; 黃秀端 1994; 黃紀、吳重禮 2000)。<sup>6</sup>一般而言，經濟狀況可分為兩類：其一，以經濟成長與通貨膨脹率為指標的總體經濟情況；其二，以個人或家庭的收入為主的個體經濟狀況。相當程度而言，個體經濟狀況為個人對於日常生活之親身體驗，故對於民衆政治態度的影響似乎較為強烈。在此，本文同時考量當前家庭經濟評估與過去家庭經濟評估等兩項變項。大體而言，民衆基於自我利益考量且衡量政黨可能作為，對於經濟狀況抱持正面樂觀的看法傾向支持執政黨，反之則傾向支持在野勢力。依此邏輯，本研究假設，對於經濟評估抱持樂觀態度的民衆傾向認同泛綠陣營，反之亦然。

---

6 換言之，在選舉過程中，選民不僅會比較候選人或者政黨對於未來政策的規劃與承諾，於此同時，它也提供選民評估過去候選人或者政黨的政策表現機會，選民會據此施予獎勵或者懲罰，並進而影響下次的投票抉擇。一項研究分析美國 1952 年至 1976 年全國選舉調查資料發現，選民對於總統施政評價程度，不僅對於總統選舉具有強烈影響，同時也會左右國會選舉結果(Fiorina 1981)。據此，選民對於總統施政評價會表現在投票抉擇，而且反映在總統與國會選舉方面。

綜合前述各項理論與研究經驗，本研究選定個人社會特徵和政治態度等各項變項，與政黨認同進行交叉分析，初步檢驗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差異。關於問卷措辭與選項，以及變項之重新編碼請參見附錄 2。

## 五、政黨認同者的初步分析

根據社會學途徑的觀點，政治偏好往往取決於個人社會特徵。鑑此，本研究依據民衆基本背景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省籍、地理區域、家戶收入等變項，檢證不同特徵的社會群體在政黨認同的差異。本文假設，屬於某種性質的團體成員擁有高度同質性，相較於其他團體，成員彼此政治態度頗為相似。表 2 所示為民衆基本資料與政黨認同之交叉分析，藉由卡方檢定，在 95%信心水準下，這些人口基本變項，除了教育程度之外，其餘社會特徵變項皆與政黨認同顯著相關，且多數實證結果與研究假設相當契合。

首先，在性別方面，女性獨立選民比例高於男性，泛藍、泛綠認同的男性選民比例略高於女性，此與研究預期頗為吻合。

在年齡方面，19 歲至 29 歲年輕民衆屬於獨立選民的比例較高，而具有政黨認同的比例較低。就政黨認同者而言，各類年齡群體認同泛藍陣營的比例均高於泛綠陣營，其中尤以 19 歲至 29 歲的年輕選民差距最小，約僅有 2%，其餘年齡層民衆認同泛藍陣營的比例高於泛綠陣營約為 10%。結果顯示，相對而言，民進黨較易爭取年輕族群的支持，此與一般社會經驗認知相符。

在教育程度方面，區分為小學程度、國中程度、高中職程度、大專程度四類，惟各組間差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儘管如此，相對而言，小學以下程度者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偏高，此與研究假設相符。

在省籍方面，實證資料顯示，獨立選民比例最高者為客家人，其

表 2 個人基本資料與政黨認同之交叉分析

N (%)

	泛藍認同者	獨立選民	泛綠認同者	
性別				
女	178 (19.0)	651 (69.6)	107 (11.4)	$n = 1,961$
男	238 (23.2)	650 (63.4)	137 (13.4)	$df = 2$
合計	416 (21.2)	1,301 (66.3)	244 (12.4)	$\chi^2 = 8.321^*$
年齡				
19-29 歲	71 (15.1)	338 (71.9)	61 (13.0)	
30-39 歲	78 (22.5)	232 (67.1)	36 (10.4)	
40-49 歲	98 (24.7)	246 (62.1)	52 (13.1)	
50-59 歲	82 (24.0)	213 (62.5)	46 (13.5)	$n = 1,961$
60 歲及以上	87 (21.3)	272 (66.7)	49 (12.0)	$df = 8$
合計	416 (21.2)	1,301 (66.3)	244 (12.4)	$\chi^2 = 18.022^*$
教育程度				
小學程度以下	76 (16.7)	325 (71.3)	55 (12.1)	
國中程度	52 (22.4)	149 (64.2)	31 (13.4)	
高中職程度	109 (22.3)	319 (65.2)	61 (12.5)	$n = 1,958$
大專程度以上	178 (22.8)	506 (64.8)	97 (12.4)	$df = 6$
合計	415 (21.2)	1,299 (66.3)	244 (12.5)	$\chi^2 = 8.202$
省籍				
台灣閩南人	223 (16.3)	938 (68.4)	210 (15.3)	
台灣客家人	56 (18.9)	213 (72.0)	27 (9.1)	$n = 1,916$
大陸各省市人	114 (45.8)	130 (52.2)	5 (2.0)	$df = 4$
合計	393 (20.5)	1,281 (66.9)	242 (12.6)	$\chi^2 = 132.555^{***}$
地理區域				
北部	219 (25.1)	553 (63.3)	101 (11.6)	
中部	53 (18.0)	214 (72.8)	27 (9.2)	
南部	104 (15.6)	465 (69.6)	99 (14.8)	$n = 1,958$
東部	40 (32.5)	66 (53.7)	17 (13.8)	$df = 6$
合計	416 (21.2)	1,298 (66.3)	244 (12.5)	$\chi^2 = 38.329^{***}$
家戶收入				
4 萬元以下	124 (20.8)	412 (69.1)	60 (10.1)	
4-6 萬元	85 (21.5)	268 (67.7)	43 (10.9)	
6-10 萬元	109 (22.1)	319 (64.6)	66 (13.4)	$n = 1,835$
10 萬元以上	84 (24.1)	200 (57.3)	65 (18.6)	$df = 6$
合計	402 (21.9)	1,199 (65.3)	234 (12.8)	$\chi^2 = 20.311^{**}$

註：n 為有效分析樣本數；df 為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 $\chi^2$  為 Chi-square。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顯著水準係採雙側檢定(level of significance for two-tailed test)。

次為閩南人，而大陸各省市人的比例最低。此外，大陸各省市人、客家人有相當比例傾向認同泛藍陣營，而泛綠認同的人數明顯偏低，其結果與經驗認知甚為符合。至於閩南人認同泛藍陣營和泛綠陣營的比例甚為接近，此結果與研究預期相當一致。

無疑地，地理區域的差異為當前我國關鍵政治議題。統計數據顯示，中部地區獨立選民的比例最高，其餘依序為南部、北部，以及東部。就朝野政黨認同者而言，東部地區民衆泛藍認同比例最高，其次為北部，再其次為中部。必須說明的是，南部地區的泛藍認同略高於泛綠認同，但彼此甚為接近。如是以觀，所謂「北藍南綠」、「南方政治」的論斷，恐言過其實；比較精確的說法是，泛藍認同者普遍散佈在全省各個地理區域，只不過在南部地區，雙方的差距甚為有限。

在家戶收入方面，相較於低收入（4萬元以下）民衆，高收入選民的政黨認同比例相對較高。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此類的民衆擁有較多的資源、時間與能力，有利於蒐集相關政治資訊，以積極參與政治事務；這種情形與本文的研究預期相當吻合。就朝野政黨認同者而言，認同泛藍陣營的比例均高於泛綠陣營，其中以10萬元以上高收入民衆的差距較小，約略為5%，其餘類別泛藍認同的比例高於泛綠認同約有10%。

曾如前述，除了基本社會特徵之外，選民的政治態度與其政黨認同亦密切相關。在此，筆者考量資料性質，納入政治興趣、政治功意識、政府施政滿意評價，以及家庭經濟評估等變項。表3所示，為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政黨認同之交叉分析；數據顯示，這些政治態度皆與政黨認同顯著相關。

就政治興趣與獨立選民而言，兩者呈現正向關係，亦即政治興趣偏低的選民傾向成為獨立選民；易言之，獨立選民往往對於政治資訊與公共事務抱持冷漠態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黨認同者對於社會訊息與政治議題則較為關切，此結果與研究預期頗為契合。

表3 政治態度與政黨認同之交叉分析

N(%)

	泛藍認同者	獨立選民	泛綠認同者	
<b>政治興趣</b>				
偏低	236 (17.9)	962 (72.8)	123 (9.3)	
中度	136 (26.9)	277 (54.7)	93 (18.4)	$n = 1,943$
偏高	43 (37.1)	47 (40.5)	26 (22.4)	$df = 4$
合計	415 (21.4)	1,286 (66.2)	242 (12.5)	$\chi^2 = 92.499^{***}$
<b>外在功效意識</b>				
高度	128 (25.7)	296 (59.4)	74 (14.9)	
中度	64 (20.0)	219 (68.4)	37 (11.6)	$n = 1,889$
低度	212 (19.8)	733 (68.4)	126 (11.8)	$df = 4$
合計	404 (21.4)	1,248 (66.1)	237 (12.5)	$\chi^2 = 13.285^*$
<b>內在功效意識</b>				
高度	139 (25.6)	319 (58.6)	86 (15.8)	
中度	121 (23.1)	342 (65.4)	60 (11.5)	$n = 1,892$
低度	142 (17.2)	593 (71.9)	90 (10.9)	$df = 4$
合計	402 (21.2)	1,254 (66.3)	236 (12.5)	$\chi^2 = 27.589^{***}$
<b>政府施政滿意評價</b>				
較差	344 (28.9)	764 (64.1)	84 (7.0)	
差不多	38 (8.8)	324 (75.0)	70 (16.2)	$n = 1,953$
較好	32 (9.7)	207 (62.9)	90 (27.4)	$df = 4$
合計	414 (21.2)	1,295 (66.3)	244 (12.5)	$\chi^2 = 182.373^{***}$
<b>當前家庭經濟評估</b>				
較差	59 (15.9)	260 (70.3)	51 (13.8)	
普通	174 (21.4)	557 (68.5)	82 (10.1)	$n = 1,958$
較好	182 (23.5)	482 (62.2)	111 (14.3)	$df = 4$
合計	415 (21.2)	1,299 (66.3)	244 (12.5)	$\chi^2 = 16.544^{**}$
<b>過去家庭經濟評估</b>				
較差	186 (22.5)	565 (68.4)	75 (9.1)	
差不多	162 (21.6)	486 (64.8)	102 (13.6)	$n = 1,960$
較好	68 (17.7)	249 (64.8)	67 (17.4)	$df = 4$
合計	416 (21.2)	1,300 (66.3)	244 (12.4)	$\chi^2 = 19.903^{**}$

註：n 為有效分析樣本數；df 為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 $\chi^2$  為 Chi-square。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顯著水準係採雙側檢定(level of significance for two-tailed test)。

在政治功效意識方面，區分為外在功效意識與內在功效意識，誠如研究假設所預期，政治功效意識越低的選民較易成為獨立選民；反觀，政治功效意識越高者，傾向具有政黨認同。就政黨認同者而言，抱持高度政治功效意識認同泛藍陣營的比例，明顯高於認同泛綠陣營。

在政府施政滿意評價方面，與研究假設相當契合的是，對於民進黨政府施政表現抱持正面評價的選民，傾向成為泛綠認同者。反之，統計資料證實，對於政府施政情形抱持負面看法的民衆，則傾向認同泛藍陣營。誠如研究預期，政府施政滿意評價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顯然是不容小覷的。

在經濟評估方面，區分為當前家庭經濟評估和過去家庭經濟評估。實證數據顯示，對於經濟評價「較差」的民衆，較傾向成為獨立選民。就朝野政黨認同者而言，認同泛藍陣營的比例大多高於泛綠陣營，而且對於家庭經濟評估抱持正面態度者傾向成為泛藍認同者，反之亦然。這似乎意味著，在 2000 年民進黨取得中央執政權之後，財政經濟政策持續更迭，國家總體經濟表現明顯不如預期，導致部分民衆對於執政黨失去信心，減低其政黨認同，轉而支持在野政黨。<sup>7</sup>

藉由表 2 與表 3 的交叉分析，初步瞭解各個變項與政黨認同的關係，且多數印證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當然，每個變項的影響必須與其他變項相互比較，透過整體分析始得做更為客觀的評估。由於政黨認同的各種選項之間並無順序關係，屬於「無序多分變項」

7 關於民進黨政府經濟施政的困境，或許可由財經首長（包括財政部、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機關首長）的更換可見端倪。在 1992 年至 2000 年國民黨執政時期，總共換過六位財經首長；然而，自從 2000 年至 2008 年 3 月，民進黨執政時期，共計更換了 14 位財經首長，更動頻率不可謂不高。2006 年歐僑商會藍皮書直陳，主政者頻繁更動，導致政府政策走向不明，對於外商在台發展與投資已產生負面影響（吳重禮 2007: 81）。



(nonordered polytomous variable)。根據依變項之性質，本文設定「多項勝算對數模型」，以統計軟體 SPSS 13.0 進行資料檢定與分析。

## 六、實證結果與分析討論

在分析模型中，依變項區分為「泛藍認同者」、「獨立選民」與「泛綠認同者」等三類，以「獨立選民」做為對照組。<sup>8</sup> 在自變項方面，除了將年齡重新編碼改為「連續變項」(continuous variable)之外，其餘變項均依據先前處理方式，由於這些變項屬於「質變項」(qualitative variable)，故以虛擬變項登錄之。<sup>9</sup>

在實證分析方面，模型設定分為三個步驟。依據社會學途徑的理論架構，模型一僅考量個人社會特徵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省籍、地理區域，以及家戶收入等。模型二同時考量個人社會特徵和政治態度的影響，後者包括政治興趣與政治功效意識。模型三則為完整模型，除了人口社會特徵和政治態度之外，亦將理性評估變項納入考量，包含政府施政滿意評價和家庭經濟評估。藉由這三種模型，

<sup>8</sup> 本研究模型包含兩個方程式與一個限制式，其分別為：

$$\log P_{\text{泛藍認同者}} / P_{\text{獨立選民}} = a_1 + Xb_1$$

$$\log P_{\text{泛綠認同者}} / P_{\text{獨立選民}} = a_2 + Xb_2$$

$$P_{\text{泛藍認同者}} + P_{\text{泛綠認同者}} + P_{\text{獨立選民}} = 1$$

<sup>9</sup> 詳言之，在性別方面，以「女性」為對照組。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小學程度以下」為對照組。在省籍方面，以「台灣閩南人」為對照組。在地理區域方面，以「北部」為對照組。在家戶收入方面，以「4萬元以下」為對照組。在政治興趣方面，此變項屬於「有序多分變項」(ordered polytomous variable)，其中以「偏低」為對照組。外在功效亦屬於「有序多分變項」，以「低度」為對照組。在內在功效方面，以「低度」為對照組。在政府施政滿意評價方面，以「差不多」為對照組。在當前家庭經濟評估方面，以「普通」為對照組。在過去家庭經濟評估方面，以「差不多」為對照組。

得以比較各群變項的影響，且各個模型解釋力的差別得以獲得驗證，以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sup>10</sup>

表 4 所示，為 2006 年台灣民眾政黨認同的影響因素，區分為三個不同層次的模型討論，三個模型的「擬判準係數」(Nagelkerke pseudo R-square)分別解釋 12.4%、16.5%、26.1%的變異量；就社會科學研究而言，其意味著模型中所含括的變項群對於依變項具有若干程度的解釋能力。<sup>11</sup> 另外，在三個模型的「符合度檢定」(Pearson chi-square statistics of goodness-of-fit)之值分別為 2999.588 ( $df=2,944, p=.233$ )、3376.295 ( $df=3,310, p=.207$ )，以及 3365.619 ( $df=3,374, p=.537$ )。<sup>12</sup> 數據顯示，這三個模型推論出的分析結果具有其可信度。另外，猶如研究預期，從模型一、模型二至模型三，隨著模型解釋變項的增加，其對於政黨認同的解釋力亦隨之提升，惟其有效分析樣本數亦呈現微幅下降的情形，其分別為 1,788、1,719 及 1,716。

再者，就個別分析模型而言，模型一（社會人口特徵變項群）的

<sup>10</sup> 關於模型設定，論文初稿僅有完整模型（亦即模型三）。論文修訂稿增列兩種模型（亦即模型一與模型二），此模型設定必須感謝兩位審查人所提出的寶貴評論，筆者深受啟發，在此特別致謝。

<sup>11</sup> 在模型所設定的自變項中，並無存在著「共線」(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檢視這些自變項的「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s)，其中「年齡」與「教育程度」的係數最高(-.639)，但未達一般判別共線的程度( $r > .85$ )。其餘有五組相關係數介於.5與.3之間，依序為「教育程度」與「家戶收入」(.458)、「家戶收入」與「當前家庭經濟評估」(.389)、「當前家庭經濟評估」與「過去家庭經濟評估」(.341)、「年齡」與「家戶收入」(-.325)，以及「政治興趣」與「內在功效意識」(.300)。由於資料處理過程甚為繁複，礙於篇幅有限，本文無法詳盡陳述。對於分析資料和結果有興趣之讀者，敬請不吝聯繫，筆者樂於提供詳細資訊。

<sup>12</sup> 必須說明的是，模型符合度檢定數值的解讀，如同其他的「符合度」檢定，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反而表示模型預測值與觀察值並不符合（請參見 Hosmer and Lemeshow 2000: 145-156）。

表 4 政黨認同之多項勝算對數模型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泛藍認同者/ 獨立選民	標準誤	迴歸係數	獨立選民 標準誤	泛綠認同者/ 獨立選民	標準誤	迴歸係數	獨立選民 標準誤	泛藍認同者/ 獨立選民	標準誤	迴歸係數	獨立選民 標準誤	泛綠認同者/ 獨立選民	標準誤	迴歸係數	獨立選民 標準誤
常數	-2.703***	(.355)	-2.469***	(.436)	-2.630***	(.371)	-2.271***	(.461)	-3.470***	(.457)	-2.117***	(.533)	-2.117***	(.533)		
性別 (男)	.155	(.126)	.188	(.149)	.068	(.131)	.029	(.159)	.083	(.134)	-.057	(.165)	-.057	(.165)		
年齡	.016**	(.005)	.009	(.006)	.013**	(.005)	.002	(.006)	.015**	(.005)	-.004	(.007)	-.004	(.007)		
教育程度 (對照組：小學程度以下)																
國中程度	.568*	(.237)	.199	(.270)	.445 <sup>†</sup>	(.245)	.057	(.286)	.323	(.254)	.296	(.301)	.296	(.301)		
高中職程度	.722**	(.221)	.135	(.259)	.513*	(.228)	-.123	(.273)	.292	(.239)	.090	(.289)	.090	(.289)		
大專程度以上	.695**	(.231)	-.010	(.272)	.412 <sup>†</sup>	(.241)	-.321	(.292)	.142	(.252)	-.011	(.312)	-.011	(.312)		
省籍 (對照組：台灣閩南人)																
台灣客家人	-.092	(.181)	-.633**	(.233)	-.143	(.186)	-.694**	(.243)	-.092	(.190)	-.830**	(.254)	-.830**	(.254)		
大陸各省市人	1.075***	(.160)	-2.055***	(.518)	1.044***	(.165)	-2.074***	(.521)	.878***	(.170)	-1.809**	(.530)	-1.809**	(.530)		
地理區域 (對照組：北部)																
中部	-.364*	(.183)	-.512*	(.241)	-.338 <sup>†</sup>	(.186)	-.460*	(.246)	-.328*	(.191)	-.647*	(.260)	-.647*	(.260)		
南部	-.406**	(.148)	.191	(.167)	-.375*	(.152)	.255	(.174)	-.284*	(.157)	.089	(.184)	.089	(.184)		
東部	.164	(.273)	.480	(.310)	.132	(.288)	.471	(.328)	-.022	(.299)	.493	(.344)	.493	(.344)		
家戶收入 (對照組：4萬元以下)																
4-6萬元	.243	(.177)	.195	(.225)	.200	(.181)	.091	(.235)	.100	(.189)	.112	(.249)	.112	(.249)		
6-10萬元	.216	(.176)	.589**	(.216)	.156	(.181)	.504*	(.224)	.007	(.190)	.634**	(.242)	.634**	(.242)		
10萬元以上	.356 <sup>†</sup>	(.197)	1.034***	(.231)	.219	(.202)	.844***	(.241)	.034	(.218)	.853**	(.269)	.853**	(.269)		

(續)



數據顯示，年齡、教育程度、省籍、地理區域、家戶收入等，與政黨認同具有較為顯著相關性。模型二（社會人口特徵與政治態度變項群）的實證資料顯示，年齡、教育程度、省籍、地理區域、家戶收入、政治興趣，對於政黨認同具有顯著影響。在模型三（社會人口特徵、政治態度、理性評估變項群），經過整體比較之後，可以發現，年齡、省籍、地理區域、家戶收入、政治興趣、政府施政滿意評價，以及家庭經濟評估等，為解釋選民政黨認同的重要指標。反觀，在性別、教育程度、政治功效意識等方面，泛藍、泛綠認同者與獨立選民未必具有明顯差異，顯示這些變項的影響較不顯著。茲針對政黨認同的影響因素，分述如下。

就個人社會特徵看來，在年齡方面，相較於獨立選民，年齡越長的民衆越傾向成為泛藍認同者，此與研究假設頗為吻合。或許由於政黨立場、政治菁英形象、選舉風格，以及基本政策訴求的歧異，使得年輕民衆認同泛綠陣營的情形較為明顯，年齡越長的民衆對於泛藍陣營的情感依附較深。

猶如諸多研究文獻證實，省籍係構成國內長期存在政治糾結的主要因素，並且藉由情感的投射作用，產生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爭議，是決定台灣民衆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的重要變項。統計數據顯示，相對於台灣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傾向認同泛藍陣營，而明顯排斥抱持泛綠認同，此結果符合以往實證研究的觀點。另外，台灣客家人較傾向成為獨立選民，而排斥認同泛綠陣營，此與一般社會認知契合，認為客家人的政治態度和大陸各省市人的立場較為接近的看法。

居住在不同地理區域的選民，其政黨認同是否有所差異，亦是本研究關切的重點。資料結果顯示，相對於北部地區的民衆，南部民衆傾向成為獨立選民，而排斥認同泛藍陣營；不過，在泛綠認同者與獨立選民比較之下，兩者的差異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這種情形意味著，迥異於普遍為人所論及的一種觀點，亦即「北藍南綠」的立論，似乎

不宜過度推論。另外，在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比較之下，相對於居住在北部的民衆，中部居民傾向成爲獨立選民。就實際政治意涵而言，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政府被詬以「重北輕南」，而民進黨政府則被視爲「重南輕北」，中部地區爲朝野政黨所輕忽，致使若干民衆傾向成爲獨立選民，由此可略窺一二。

家戶收入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實證資料顯示，在泛綠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相較之下，相對於收入在 4 萬元以下的民衆，收入相對較高的民衆（包括 6 萬元至 10 萬元和 10 萬元以上）傾向抱持泛綠認同，此結果明顯有別於傳統觀念，認爲泛綠支持者屬於較低社會階層的刻板印象，其確切情形有待進一步探索。

就政治態度而言，猶如研究預期，在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比較之下，對於政治具有濃厚興趣的民衆，其傾向具有明確政黨認同，包括認同泛藍陣營與泛綠陣營。筆者以爲，民衆之所以缺乏政黨歸屬感，與他們對於政治事務缺乏興趣、甚少瞭解政治訊息、較不願意涉入政治參與，彼此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因而拒絕對於特定政黨產生情感依附。

在理性評估因素方面，政府施政滿意評價的效應顯然甚爲關鍵。就學理而言，選民對於政府施政表現評價，足以反映人民對於執政者的感受，是決定民衆政治態度的重要因素。誠如研究假設所預期，在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比較下，對於政府施政評價持負面意見者，則傾向成爲泛藍認同者，或者因爲對於政府表現不滿而成爲獨立選民。反觀，對於政府施政表現抱持正面評價的民衆，則明顯成爲泛綠認同者。特別值得說明的是，數據顯示，政府施政滿意評價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顯然非常關鍵，其效應甚至有凌駕其他變項的趨勢。就理論價值和政策意涵來說，此似乎意味著，對於朝野政黨領導菁英而言，企圖藉由以往選舉動員訴求，諸如族群意識、國家認同，或者「愛台灣」的意識形態口號，爭取一般民衆的政黨認同似乎已有所不足。取而代之

之的是，藍綠政黨必須藉由政府施政表現，提出具體政績取得選民正面評價，才得以獲得民衆的肯定與支持。

在當前家庭經濟評估方面，相對於認為家境狀況「普通」的民衆，認為目前家境狀況「較差」的民衆，在泛綠認同者與獨立選民比較下，傾向抱持泛綠認同，而明顯排斥成爲獨立選民。其次，在過去家庭經濟評估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在泛綠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相較之下，認爲以往家境狀況「較差」的民衆，其傾向成爲獨立選民。

## 七、結論與建議

誠如前言所述，釐清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基本社會特徵與政治態度，蘊含重要理論意涵與實際政治參考價值，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有二。其一，在經歷民主轉型過程中，我國民衆政黨認同的變遷趨勢如何？其二，在現今政黨體系之中，泛藍認同者、泛綠認同者、獨立選民的基本特質差異爲何，且其特徵與政治態度是否呈現顯著不同？對於第一項議題，筆者擷取歷年「變遷調查」面訪資料，描繪1990年至2006年台灣民衆政黨認同的變遷情形，並歸納出三個觀點。第一，在這段時期，整體層級的政黨認同展現相當程度的波動現象，而非呈現持續穩定趨勢。第二，在朝野政黨政治版圖勢力消長的變化趨勢中，逐漸朝向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競爭的方向發展。第三，猶如美國在1960年代末期以降的情勢，台灣獨立選民的比例明顯增加，而政黨認同者的比例則顯著降低。

對於第二項議題，筆者分析2006年「變遷調查」資料，藉由「交叉分析」與「多項勝算對數模型」進行檢證。總體而言，相關統計數據多數印證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綜合研究發現，歸納以下結論。首先，就獨立選民的基本特徵而言，年齡越輕的民衆較易成爲獨立選民；教育程度偏低的民衆傾向成爲獨立選民；本省客家人較易成爲獨



立選民；居住在中部和南部地區的民衆較易成爲獨立選民；家戶收入較低者傾向成爲獨立選民。在政治態度方面，政治興趣越低者較易成爲獨立選民；政治功效意識越低者較易成爲獨立選民；在政府施政滿意評價方面，認爲無明顯差異的民衆傾向成爲獨立選民；在經濟評價方面，包括當前家庭經濟評估和過去家庭經濟評估，抱持悲觀態度者較傾向成爲獨立選民。

相較於朝野政黨認同的情形，年齡越長的民衆較易成爲泛藍認同者；在省籍方面，大陸各省市人士傾向成爲泛藍認同者，而明顯排斥成爲泛綠認同者；就地理區域而言，南部民衆傾向成爲獨立選民而排斥認同泛藍陣營，中部居民傾向成爲獨立選民，而拒絕對於藍綠陣營產生情感依附；在家戶收入方面，收入較高者傾向成爲泛綠認同者；在政治興趣方面，具有較高興趣的民衆傾向具有明確政黨認同；在施政滿意評價方面，對於政府施政表現抱持正面評價的選民，傾向成爲泛綠認同者，而對於政府施政評價持負面意見者，則傾向成爲泛藍認同者；在當前家庭經濟評估方面，認爲家境狀況「較差」的民衆傾向成爲泛綠認同者。

就整體分析模型而言，筆者淺見以爲，前述分析至少具有兩項理論意涵。首先，猶如實證數據顯示，個人社會特徵、政治態度，以及施政表現和經濟評價等變項群，對於解釋泛藍、泛綠認同者和獨立選民的差異，均呈現顯著相關。此似乎意味著，社會學途徑、社會心理學途徑與理性選擇途徑，爲瞭解台灣政黨認同者和獨立選民不可或缺的關鍵面向。其次，對於政黨認同者和獨立選民的影響因素來說，這三組變項群呈現明顯差異。詳言之，在個人理性計算方面，政府施政滿意評價與政黨認同具有顯著關係；在社會人口特徵方面，省籍因素對於泛藍、泛綠認同者差異具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在政治態度和認知方面，政治興趣爲解釋政黨認同的關鍵變項。

儘管本文在研究分析上得到若干佐證，但仍有若干限制和值得改

進之處。首先，對於前述的研究結論，筆者必須補充說明，這樣的發現是否得以適用於現今台灣民衆的政黨認同，恐不宜貿然論斷。這主要是因為調查資料時空背景的差異，更確切地說，自從 2006 年以來國內外政治局勢變化甚鉅，這種情形是否影響民衆對於朝野政黨的觀點和支持，仍須進一步觀察和探討。舉例來說，實證數據顯示，2006 年泛綠認同者的驟降與獨立選民的遽增，這究竟僅是短期「波動」或者是長期「趨勢」，並無法確知，而這也是調查結果可能產生的限制。本研究設計屬於「橫切面分析」，未來若能探討台灣民衆政黨認同長期變遷的可能原因，應更具有學術參考價值。

其次，囿於資料性質，本研究僅將政黨認同區分為泛藍認同者、泛綠認同者，以及獨立選民等三類。然而，誠如諸多實證研究所示，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顯然並非單一性質的團體，其基本特質差異為何，尚待檢證。舉例來說，就政黨認同者而言，若進一步考量「黨性強度」因素，則得以細分為「強烈泛藍認同者」、「弱泛藍認同者」、「強烈泛綠認同者」、「弱泛綠認同者」等各種類型。另外，獨立選民亦可以再區分為「純粹獨立選民」、「偏向泛藍獨立選民」、「偏向泛綠獨立選民」等各種類別。然而，考量當前我國政黨體制的特性與有效分析樣本總數，本文無法進一步細分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的種類，殊為可惜，亦為其研究限制。

再者，本研究使用 2006 年「變遷調查」資料，由於資料性質之故，並未納入若干重要變項，諸如族群認同和兩岸統獨議題。在資料選取方面，若能擷取其他面訪資料，例如「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所釋出之面訪資料，與此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分析，應是饒富意義的研究方向。進一步來說，若能藉由其他測量方式，採取「個人層級」的態度調查研究途徑（修改政黨認同測量問卷與量表形式），或者「總體層級」的行為結果研究途徑（使用集體投票資料詮釋政黨認同的變動性），將能使相關研究更加周延。

持平而論，在過去短短數年間，台灣政治局勢與政黨體系變動不可謂不大。當此之際，研究民衆政黨認同的變遷及其影響因素，殊為重要，卻也不易。因此筆者無寧將本文視為是一份「拋磚引玉」性質的研究，希望藉此引發學界更多的關注，做為未來研究的參酌。

## 附錄 1 「變遷調查」歷年政黨認同的問卷措辭與選項

1990 年

- 62、在我們社會裡，有很多人在心理上傾向國民黨，也有很多人傾向民進黨，還有不少人傾向其他政黨。請問您認為自己在心理上傾向哪一個政黨？(1)國民黨(2)民進黨(3)獨立選民（其他政黨、都不值得傾向、很難說、不關心這種事、不知道、不願意回答設為遺漏值）

1995 年

- 72、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這三個政黨中，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1)國民黨(2)民進黨(3)新黨(4)獨立選民（其他政黨、不知道、不願意回答設為遺漏值）

1998 年

- 81a、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人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有人是民進黨的支持者，有些人是新黨的支持者。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1)國民黨(2)民進黨(3)新黨(4)獨立選民（其他政黨、不知道、不願意回答設為遺漏值）

2000 年

- 84、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這四個政黨中，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1)國民黨(2)民進黨(3)新黨(4)親民黨(5)獨立選民（其他政黨、不知道、不願意回答設為遺漏值）

2004 年

- 98b、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建國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請問您偏向哪一個政黨？(1)國民黨(2)民進黨(3)新黨(4)親民黨(5)台聯(6)獨立選民（其他政黨、拒答、不知道、無法選擇、缺漏設為遺漏值）

2006 年

- J4、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請問您有沒有比較偏向哪一個政黨？(1)國民黨(2)民進黨(3)新黨(4)親民黨(5)台聯(6)獨立選民（其他政黨、拒答、不知道、無法選擇、缺漏設為遺漏值）

## 附錄 2 問卷題目節錄與重新編碼

### 政黨認同

J5a、有人認為現在台灣的政治是「泛綠」與「泛藍」兩大陣營的競爭，而人們有時候會認為自己是「泛綠」陣營的，也有些人認為自己是「泛藍」陣營的。請問您認為自己是「泛綠」的，還是「泛藍」的？(1)泛綠(2)中立不偏(3)泛藍（拒答、不瞭解題意、無法選擇、缺漏設為遺漏值）

### 性別

A1、性別：(0)女性(1)男性

### 年齡

A2、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民國\_\_\_\_\_年\_\_\_\_\_月（即95－出生年＝年齡）

### 教育程度

A10a、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1)小學程度以下：無（不識字）、自修（識字、私塾）、小學(2)國中程度：國（初）中、初職(3)高中職程度：高中普通科、高中職業科、高職、士官學校(4)大專程度以上：五專、二專、三專、軍警專修班、軍警專科班、空中行專、空中大學、軍警官學校、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大學、碩士、博士（其他、拒答設為遺漏值）

### 省籍

A5、請問您父親是哪裡人？(1)台灣閩南人(2)台灣客家人(3)大陸各省市（台灣原住民、拒答、其他、忘記和不知道設為遺漏值）

### 地理區域

A3、請問您目前居住在什麼地方？\_\_\_\_\_省（市）\_\_\_\_\_縣（市）\_\_\_\_\_鄉（鎮、市、區）(1)北部：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基隆市、新竹市、台北市(2)中部：彰化縣、台中縣、南投縣、雲林縣、台中市(3)南部：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澎湖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4)東部：宜蘭縣、台東縣、花蓮縣（廣東省、浙江省設為遺漏值）

家戶收入

J12、包括各種收入來源，請問您全家人的所有稅前收入，每個月大約有多少（包含工作收入、兼業收入與獎金、投資利息收入、紅利或股息、政府津貼、房租收入或其他收入、退休金等）？(1) 4 萬元以下(2) 4-6 萬元(3) 6-10 萬元(4) 10 萬元以上（拒答、不知道、缺漏設為遺漏值）

政治興趣

D10、請問您個人對政治的興趣有多大？(1)偏低：不太有興趣、一點也沒興趣(2)中度：還算有興趣(3)偏高：相當有興趣、很有興趣（拒答、不瞭解題意、無法選擇設為遺漏值）

外在功效意識

D11a、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1)低度：同意、很同意；(2)中度：既不同意也不反對(3)高度：很不同意、不同意（拒答、不瞭解題意、無法選擇設為遺漏值）。

內在功效意識

D11c、我覺得我對於國家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有相當的瞭解？(1)低度：很不同意、不同意(2)中度：既不同意也不反對(3)高度：同意、很同意（拒答、不瞭解題意、無法選擇設為遺漏值）

政府施政滿意評價

F1、整體而言，您對於我們政府的表現滿不滿意？(1)較差：不滿意、很不滿意(2)差不多：無所謂滿不滿意(3)較好：滿意、很滿意（拒答、不瞭解題意、無法選擇設為遺漏值）

當前家庭經濟評估

G10、您覺得自己家庭目前的經濟情況怎麼樣？(1)較差：不太好、非常不好(2)普通：不好不壞(3)較好：還算好、非常好（拒答設為遺漏值）

過去家庭經濟評估

G11、您覺得自己家庭現在的經濟情況，與幾年前相比有什麼變化？(1)較差：差一些、差很多(2)差不多：跟以前一樣(3)較好：好一些、好很多（拒答設為遺漏值）

## 參考文獻

- 王甫昌(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 2: 1-45。
- 田弘茂(1995)台灣民主鞏固的展望。國家政策雙週刊 121: 5-7。
- 何思因、吳鈞燮(1996)台灣政黨體系之下政黨認同的測量方法。選舉研究 3(1): 1-16。
- 吳重禮(2007)分立政府與經濟表現：1992 年至 2006 年台灣經驗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 11(2): 53-91。
- 吳重禮、王宏忠(2003)我國選民「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投票穩定度：以 2000 年總統選舉與 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選舉研究 10(1): 81-114。
- 吳重禮、李世宏(2003)總統施政表現對於國會選舉影響之初探：以 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理論與政策 17(1): 27-52。
- 吳重禮、許文賓(2003)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以 2001 年台灣地區選民政黨認同的決定因素為例。政治科學論叢 18: 101-140。
- 吳重禮、湯京平、黃紀(1999)我國「政治功效意識」測量之初探。選舉研究 6(2): 23-44。
- 吳重禮、譚寅寅、李世宏(2003)賦權理論與選民投票行為：以 2001 年縣市長與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例。台灣政治學刊 7(1): 91-156。
- 李世宏、吳重禮(2003)總統施政表現評價影響因素之分析與比較：以整體施政、經濟發展與兩岸關係為例。公共行政學報 8: 35-71。
- 胡佛(1998)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台北：三民。
- 莊天憐(2001)我國獨立選民的發展與變遷 1989~1999。選舉研究 8(1): 71-115。



-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學研究 7(2): 109-141。
- 陳義彥(1996)不同族群政治文化的世代分析。政治學報 27: 83-121。
- 陳義彥、蔡孟熹(1997)新世代選民的政黨取向與投票抉擇。政治學報 29: 63-91。
- 傅仰止、張晉芬(2007)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二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95-2420-H-001-006-B1）。
- 黃秀端(1994)經濟情況與選民投票抉擇。東吳政治學報 3: 97-124。
- (1995)一九九四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學研究 2(1): 51-75。
- 黃紀、吳重禮(2000)台灣地區縣市層級「分立政府」影響之初探。台灣政治學刊 4: 105-147。
- 劉義周(1994)台灣選民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選學研究 1(1): 53-73。
- Abramson, Paul R. (1979) Developing Party Identification: A Further Examination of Life-Cycle, Generational, and Perio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1): 78-96.
- Abramson, Paul R., and Charles W. Ostrom (1991) Macropartisanship: An Empirical Reassess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1): 181-192.
- (1992) Question Wording and Macropartisanship: Respon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2): 481-486.
- (1994) Question Form and Context Effec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Partisanship: 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Artifact Hypo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4): 955-958.
- Achen, Christopher (1992) Social Psychology,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Linear Regression: Breaking the Iron Triangle in Voting Research.

- Political Behavior* 14 (3): 195-211.
- Alwin, Duane F., and Jon A. Krosnick (1991) Aging, Cohorts, and the Stability of Sociopolitical Orientation over the Life S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1): 169-195.
- Balch, George I. (1974) 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Concept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1(2): 1-43.
- Beck, Paul Allen, Russell J. Dalton, Steven Greene, and Robert Huckfeldt (2002) The Social Calculus of Voting: Interpersonal, Media, and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s on Presidential Choi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1): 57-73.
- Berelson, Bernard R.,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1954)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x-Steffensmeier, Janet M., and Renee M. Smith (1996) The Dynamics of Aggregate Partisanshi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3): 567-580.
- Budge, Ian, and Dennis Farlie (1976)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actors Correlated With Turnout and Voting Choice. Pp. 104-126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Representations of Voting and Party Competition*, edited by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New York: Wiley.
- Burden, Barry C., and Casey A. Klofstad (2005) Affect and Cognition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26(6): 869-886.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Cohen, Jeffrey E., and Ken Collier (1999) Public Opinion: Reconceptualizing Going Public. Pp. 41-58 in *Presidential Policymaking: An End-of-Century Assessment*, edited by Steven A. Shull. Armonk, NY: M. E. Sharpe.
- Converse, Philip 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Pp. 206-261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ited by David E. Apter. New York: Free.
- Converse, Philip E. (1966) The Concept of a Normal Vote. Pp. 9-39 in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edited by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New York: Wiley.
- Converse, Philip E., and Roy Pierce (1985) Measuring Partisanship. *Political Methodology* 11(3-4): 143-166.
- Conway, M. Margaret (2000)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rd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 Dennis, Jack (1988a)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Part I: On Being an Independent Partisa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1): 77-109.
- (1988b)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Part II: Towards a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2): 197-219.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Erickson, Robert S., Michael B. MacKuen, and James A. Stimson (1998) What Moves Macropartisan? A Response to Green, Palmquist, and Schickl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 901-912.
- Fiorina, Morris P.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erber, Alan, and Donald Philip Green (1998) Rational Learning and

- Partisan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2): 794-818.
- Green, Donald, Bradley Palmquist, and Eric Schickler (1998) Macropartisan: A Replication and Critiqu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 883-899.
- Greene, Steven (1999) Understanding Party Identification: A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Political Psychology* 20(2): 393-403.
- Hosmer, David W., and Stanley Lemeshow (2000) *Applied Logistic Regression*. 2nd ed. New York: Wiley.
- Huckfeldt, R. Robert (197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eighborhood Social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3): 579-592.
- (1986) *Politics in Context: Assimilation and Conflict in Urban Neighborhood*.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Huckfeldt, Robert, John Sprague, and Jeffrey Levin (2000)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Deliberation in the 1996 Election: Campaign Effects on Accessibility, Certainty, and Accu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3): 641-651.
- Huckfeldt, Robert, Ken'ichi Ikeda, and Franz Urban Pappi (2000) Political Expertise, Interdependent Citizens, and the Value Added Problem in Democratic Politic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171-195.
- Johnston, Richard (2006) Party Identification: Unmoved Mover or Sum of Preferenc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9: 329-351.
- Keele, Luke, and Jennifer Wolak (2006) Value Conflict and Volatility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4): 671-690.
- Keith, Bruce E., David B. Magleby, Candice J. Nelson, Elizabeth Orr, Mark

- C. Westlye, and Raymond E. Wolfinger (1992) *The Myth of the Independent Vot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nder, Donald R., and D. Roderick Kiewiet (1979) Economic Discontent and Political Behavior: The Role of Personal Grievance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Judgments in Congressional Vo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3): 495-527.
- (1981) Sociotrop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Cas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2): 129-161.
- Lewis-Beck, Michael S., and Richard Nadeau (2000) French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conomic Vote. *Electoral Studies* 19(2-3): 171-182.
- (2001) National Economic Voting i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63(1): 159-181.
- Lipset, Seymour M. (1981) *Political 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cKuen, Michael B., Robert S. Erikson, and James A. Stimson (1989) Macropartisanshi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4): 1125-1142.
- Mackuen, Michael B., Robert S. Erikson, James A. Stimson, Paul R. Abramson, and Charles W. Ostrom, Jr. (1992) Question Wording and Macropartisanshi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2): 475-486.
- Meffert, Michael F., Helmut Norpoth, and Anirudh V.S. Ruhil (2001) Realignment and Macropartisanshi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4): 953-962.
- Milbrath, Lester, and M. L. Goe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 Miller, Warren E. (1976) The Cross-National Us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 a Stimulus to Political Inquiry. Pp. 21-32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Representations of Voting and Party Competition*, edited by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New York: Wiley.
- Miller, Warren E., and Merrill J. Shanks (1996) *The New American Vo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eely, Francis (2007)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Emotion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A Replic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28(6): 667-688.
- Pattie, Charles, and Ron Johnston (1998) Voter Turnout at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92: Rational Choice, Social Standing or Political Effic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3(2): 263-283.
- Rabinowitz, George, and Stuart MacDonald (1989) A Directional Theory of Issue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1): 93-121.
- Rosenstone, Steven J., and John Mark Hansen (200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Longman.
- Schickler, Eric, and Donald P. Green (1997) The Stability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Results from Eight Panel Survey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0(4): 450-483.
- Sears, David O., and Nicholas A. Valentino (1997) Politics Matters: Political Events as Catalysts for Preadult Soci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1): 45-65.
- Stone, William F., and Paul E. Schaffner (1988)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Thomassen, Jacques (1976)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Cross-National Concept: Its Meaning in the Netherlands. Pp. 63-79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Representations of Voting and Party Competition*, edited by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New York: Wiley.

- Tufte, Edward R. (1978)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alentine, David C., and John R. Van Wingen (1980) Partisanship, Independence and the Partisan Identification Quest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8(2): 165-186.
- Wattenberg, Martin P. (1990)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The Rise of Candidate Centered Politic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 the 198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u, Chung-li (2002) Controversy over the Measurement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Unidimensional vs. Multidimensional.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10(2): 135-151.
- (2003) Psycho-Political Correlates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e Case of the 1994 New Orleans Mayoral Electio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33 (6): 729-760.
- (2008) Ethnicity, Empower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The 2005 Local Elections in Taiwan. *Issues & Studies* 44(1): 105-132.
- Wu, Chung-li, and Chi Huang (2007) Divided Government in Taiwan's Local Politics: Public Evaluations of City/County Government Performance. *Party Politics* 13 (6): 741-760.
- Zaller, John R.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第 6 章

## 民眾政治「兩極化」現象初探： 「中間」的變動與啟示

張茂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陳俐靜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誌謝：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主辦之「台灣的社會變遷 1995-2005：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十一次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作者感謝評論人廖達琪教授及與會者的評論，特別是之後兩位匿名審查人、章英華教授等的建議，以及謝麗玲女士的編輯改正，他們促使本文得以大幅修訂並避免了很多錯誤，特此表示由衷謝忱。

## 摘要

台灣政黨政治呈現所謂藍、綠兩極化的現象，但一般民眾在政治態度上的分布情形是否也有同步兩極化的現象？兩者之間有何關係？本文選取「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5-2005年）十年間的六次調查，以三變項的「中間立場」進行初步探究。此三項變項分別為：(1)政黨認同中的「無政黨偏好」、(2)自我認定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雙重認同」，及(3)統獨立場中的「務實者」或者「搖擺者」。本文假定當民眾態度的兩極化出現時，中間比例的線圖會呈現下降的趨勢。民眾在「統獨」態度分布上確有較明確的兩極化跡象，但在「自我認同」定位上反而是「同質化」，朝「我是台灣人」的趨勢發展；而「政黨支持」的態度相當流動，兩極化趨勢並不明確。民眾態度的兩極化，並不是對於政黨衝突的立即反應，而是一個受其影響、漸進且不以直線方式進行的過程。這樣的研究發現可支持公民社會並沒有被政治社會所吞噬的看法，並點出了民主代議政治與民意之間的動態關係。

關鍵詞：政治兩極化、中間立場、政黨支持、統獨立場、自我認同

## Explor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Lessons from Reading the Fluctuating "Middle"

Mau-kuei Ch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Li-ching Che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s party politics is said to be polarized along the "Blue vs. Green" divide. We know little, however, about whether the same polarization takes place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Drawing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archive, this study selects three "middle-ground" indicators and charts their respective trend lines based on six surveys over a ten-year period (1995~2005). These three indicators are 1) "supporting none of the parties" when asked about "partisan position," 2) "holding dual identities" when asked whether they are "Taiwanese or Chinese," and 3) "taking pragmatic or swinging positions" when asked about their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position. If polarization exists, the trend lines of the middle-of-the-road indicators would display a downward tendency. This study finds that people's standings about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have been clearly more polariz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ajority of standings on self-labeled identities are moving toward the "Taiwanese" end instead of becoming polarized, however. As for respondents' partisan preferences, the trend line for the no-party-preference group fluctuates.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is only gradually influenced by partisan polarization in a complicated and non-linear way. By analyzing the dynamics betwee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opinions, this study argues for the autonomy of civil society which is not to be subsumed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Keyword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middle-of-the-roader, party preference, Unification-and-Independence, self-identity*

政黨政治的兩極化和民衆態度的兩極化，有必然的對應嗎？兩者有何關係？本文使用 1995 年至 2005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資料，選定三項「中間立場」，觀察民衆居於「中間」比例的變化趨勢，討論台灣政治「兩極化」現象。

這三項中間立場分別設定為政黨認同中的「無政黨偏好」、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的自我定位問題中的「雙重認同」者，以及統獨立場中的「務實者」或者「搖擺者」。本文將從政治兩極化現象的既有研究、描述與評論開始，提出討論政治兩極化的現實與理論意義，進而從兩個主題來進行探討。第一個主題是觀察上述三類「中間立場」的歷年變化，試圖解釋影響這些變化的外部原因。此外，由於在上述調查期間，台灣正處於政黨政治中的重組期，國民黨與民進黨雖然仍是兩個主要的競爭對手，但是都面臨新的、立場類似，但可能更激進的政黨的挑戰。例如，原來可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先後出走籌組新黨、親民黨進行挑戰，而民進黨則面臨台聯黨的挑戰；本文第二個主題，是從「變遷調查」民衆的個別資料中，進一步探究民衆的「中間」位置的比例，是否受到政黨衝突的延伸作用，也表現出兩極化發展的現象？

## 一、「政治兩極化」的相關議題

台灣各界人士慣用藍、綠的顏色為政治立場代表，民衆對於政治兩極化的現象的評論並不陌生。泛綠代表民進黨、台聯黨等的政治光譜，泛藍則包括了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的立場；評論者也用深藍、深綠來代表一些堅定或極端的光譜。以此進行相關評述，可發現以下幾種相關的論點：第一，以「藍綠惡鬥」、「政黨對立」為政治兩極化的問題現象；第二，以國家認同、族群為主的「統獨對立」現象與「撕裂」的說法；第三，以立法院癱瘓，議事成效不彰、民主治理惡

化的現象；第四，以媒體誇大渲染、推波助瀾、以及黨同伐異的現象；以及對國家或政黨領袖進行的不信任、策略性的杯葛、羞辱等，所謂「逢 X 必反」的問題。

而「泛藍」、「泛綠」除了敵對與競爭之外，他們各自又代表何種政治立場呢？這牽涉到選擇用什麼議題，例如是國族認同、左右政治、抑或性別政治？此亦即有關政黨立場測量的問題；但在台灣單獨以政黨立場為課題的研究並不多見。Dafydd Fell 曾採用後設回顧(meta-review)的途徑，搭配菁英訪問以及政黨選舉文宣的內容分析研究，提到國民黨、民進黨以及新黨三黨的菁英，自認為在過去的 10 年(1991-2001)裡，強調的第一重要議題都是「國家認同」議題，雖然 Fell 提醒實際上這並非當時政黨的唯分別議題。<sup>1</sup>進一步探討「國家認同」並以「統、獨」立場為議題進行測量時，他認為台灣民衆能清楚分辨上述三個政黨以及親民黨的立場，並發現各黨在 1996 年中期以後，政黨的統獨立場都有向中間移動的情形，唯獨自 2001 年始，民衆明顯認為國民黨開始向右端（統一）移動、民進黨向左端（獨立）移動，新黨以及親民黨則居於比國民黨更右端的位置(Fell 2004: 119-122)。Fell (2007)後來持續對於台灣政黨政治觀察，相較於他在 2004 年的觀點，他發現台灣的政黨競爭，特別是立法院的選舉，更加強調單一的「國家認同」或者統獨議題，而此一核心議題也和其他原來屬於跨黨派的

---

<sup>1</sup> Fell (2004)發現：除國家認同議題外，其次重要的議題，對國民黨來說是「經濟發展」與「繁榮安定」，對民進黨來說是「反金權」、「民主」、「社會福利」，對親民黨來說是「反金權」、「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他認為各政黨之間的差異，並不能完全用「國家認同」單一議題來決定，而是由一組不同的「議題」，包括反金權、民主化、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不同的立場來決定的。二在兩極化的議題上，他認為在 2001 年之前，並沒有看到極化的問題，反而是一種趨於溫和，但各自保有明顯歧異的情形。但他同時也認為當時一些新的政黨，可能會採取更激進的認同，從而影響政黨的相互位置。

社會經濟議題，出現了議題結合。他對台灣民主進而提出了較悲觀的論調，對於政黨的議題單一化、極化，表示憂慮。

綜合台灣有關的政黨立場研究和政治兩極化的詮釋，我們可以歸納得到最常見的說法，就是政治立場上形成「藍、綠」或者「統、獨」的兩極光譜，政黨與選民各據一端、或向兩端移動的情形。而此一光譜又可理解為「國家認同」或者「國族認同」議題，藍色偏向與中國統一，綠色偏向台灣主權獨立，「中間」則以維持現狀居中間位置。至於在「國家認同」議題下，又有眾多公共政策或議題，例如：有沒有「九二共識」、「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內容的妥適性、ECFA（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e Framework Agree，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正反影響的辯論、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內容，進而關於重要憲政位置的任命，如審查大法官與監察委員等候選人資格時，針對其「國家認同」立場的質疑等等，都涉及到政黨的基本國家認同立場與價值。

其次，我們必須說明為什麼要注意「政黨兩極化」這個議題？一般而言，政治學者不一定特別反對政黨之間的兩極化，畢竟政黨存在的功能之一，即在提供選民可以進行合理的選擇；而政黨因為提供選民清楚的選項，即使採取了極化的競爭策略，仍然有提供選民重要的資訊的功能。而另外一方面，對於也有學者為政治兩極化感到憂心，他們通常關心的問題在於「政黨兩極化」如何影響到重大的公共決策，民主政治與追求公益的關係；而社會學家則注意到政黨為社會的重要集體行動者，如何影響到社會變遷、公民社會，或者公民社會又如何影響到政黨政治與重大的公共政策制訂。

美國政治學者如McCarty等人(2006: 163-188)的研究，帶給讀者很多關於兩極化的想法。他們認為美國長年累積的政黨兩極化造成重要的所得分配改革方案無法通過的僵局，憲政體制、政黨兩極化是造成美國貧富懸殊差距擴大，無法解決的重要因素之一；兩個問題形成一



種緊密的集合體(a tight assemble)，兩黨因為各種議題的意識形態對抗，對重要的任命進行杯葛，議會立法效能差，時而造成議會掌控在少數關鍵人手中，政黨多數決並無法符合中間立場的選民多數偏好，最糟糕的是議會的失能(inactivity)，以及選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台灣的憲政體制具有類似總統制的一些特點，不過整體政治體制以及運作方式都和美國不同，上述在美國發生的問題並不必然會在台灣發生，但從已知關於台灣政治兩極化的評論，其中與美國的問題竟然也有眾多可比擬之處，特別是以不負責任的政黨政治的負面評價為多。

此外，對主張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發展與推進的社會學者來說，我們的基本立場是不被「國家—政黨—公民個人」這種簡單代議關係的思維所設定，而是以「國家（政府與政治社會）—公民社會—市場」為鼎足三分的鉅觀體系<sup>2</sup>來思考代議民主的處境。在這具有「公民社會」想像的理論中，代議政治體系只是政治社會一部分並非全部，代議政治的正當性，或者政黨政治，都必須回歸到主權在民，受公民社會節制的基礎上。假定代表人民的政黨因為各自的策略性利益，進行兩極化鬥爭而導致政府失能、不值得信賴，就構成對公民群體的共和精神的一種傷害。換言之，政黨兩極化與群眾的共和要求疏離，代表著一個可能是異化的代議民主，而超級的兩極化，即超級的異化，並不符合我們對於民主合理性、政治合理性的假定，更是對於主張直接參與、對代議者進行監督的公民社會的反命題，是以站在公民社會的立場必須省思和介入干預。

而另一方面，台灣也有一些政治評論持不同觀點，認為「政黨惡鬥」論述並非「中立客觀」。例如最近台灣知名政論者—南方朔則對

---

2 關於公民社會相關的政治哲學以及實踐的探討，請參考Cohen與Arato(1992)、Edwards(2009)等有高度代表性的著作。

「撕裂」、「政黨惡鬥」的用語，特別是當聽到從國民黨當權者的口中說出，譏之為國民黨一貫以來「牽拖別人」以卸責的宣傳策略。他認為政黨惡鬥只是國民黨從威權時期以來就一直用「責怪對方」的方式來扭轉自己該負的責任的伎倆，或者只是用來掩飾執政者的無能的說辭（南方朔 2012）。如果確實如此，那我們更須要理解所謂「兩極化」是真實抑或虛構的問題，以及政治對立的責任歸屬問題。

綜合上述，台灣是否有「政治（藍綠）兩極化」的客觀現象？或者這是誇大的、特定政黨的「相罵」政治？抑或是部分人的杞人之憂？如果有，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是促成本文撰寫的主要背景。

## 二、文獻回顧

一般對於「政治兩極化」的討論，可分為兩種不同的文體形式：一是透過時事觀察與評論的方式，觀察不同的政爭、政治矛盾的動力與形式，根據對於雙方衝突的觀察，進行敘事性質的描繪；如果這樣的政治衝突越來越頻繁、劇烈，使理性磋商以及相互的同理心 (empathy) 都難以維持，終於促使主要的行動者向不同的極端發展。另一種方式，則藉由統計上的定義，建立「兩極化」議題光譜，提供運作定義以及可觀察的測量指標，透過指標數值的變化與特性進行說明。

這兩種文體所採取的立場或所得到的結論，並不必然一致，但也非必然矛盾。第一種方式常為政治人物、評論者所依賴。例如，當政黨或政治人物持續地只顧黨派立場進行角力，從相互「杯葛」進而「相罵」，也可能動員支持者相互挑釁，缺乏對整體公共利益的考量，因為長期「膠著」而忽略或傷害了民主政治的共和性質，一般人多認為其影響是負面大於正面。第二種方式主要由美國學者所提出，例如在政治學方面有 Poole 與 Rosenthal (1984, 1997, 2007) 等，他們長期致力於國會法案的點名投票紀錄的研究方法，從投票紀錄中進行聚集分析

(cluster analysis)；而在社會學方面有 DiMaggio 等人(1996)，他們使用美國的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分析美國民意的集中或分散的問題。

而其他的政治行為主義者，或者經驗論者，認為「政治兩極化」，特別是政黨所扮演的角色，並非絕對負面。例如，Levendusky (2010) 等部分政治學者認為政黨本來就有提供選民線索，幫助選民決定的體系功能，如果一個政黨走向內部同質化，立場趨於一致，甚至顯得極端，這也是民主政治中政黨應該扮演的角色。以下我們或可以從這兩種方式來瞭解台灣從 1990 年代後期以降，所發生的「政治兩極化」現象或問題的特色。

### (一) 對於政治兩極化的描述與評論

首先我們可以參考那些用描述或者評論方式，討論台灣是否有「政治兩極化」問題的文獻，而新聞與媒體評論是可觀察的項目之一。王湘廷(2009)統計從 1993（或 1994）年到 2008 年間的《中國時報》以及《聯合報》的政治新聞，出現「政治對立」關鍵語的次數，以及報導的內容，得到的結論是 2000 年為相關報導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國內政黨競爭或者政治對立的報導有限，但在進入 2000 年之後，次數有顯著的增加，而 2006 年（百萬人反貪腐、倒扁運動，又稱「紅衫軍」）則再出現一個高峰。他並提出數據，認為「媒體的曝露」程度，和民衆是否有政黨（不論藍、綠）立場有統計上的正相關。

進一步參考台灣政治學者的有關論述，我們發現 2000 年之前政治學者的研究，大致上認為台灣的民主政治趨向溫和、中間。例如吳玉山針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的「兩岸政策」（相對於「國家認同」概念的政策，或是國家認同議題的政策運作），認為各政黨為了「選票最大化」的考慮，為爭取更多的選票，不論是國民黨或者民進黨在 2000 年之前都有「向中看齊」的跡象（吳玉山 1999, 2000: 20-24）。

而Chu（朱雲漢）與Diamond因為觀察到1998年進行的選舉中候選人特別不強調國家認同，族群情緒的「去兩極化」努力，因而對台灣進入民主鞏固、「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步伐表示樂觀(Chu and Diamond 2000)。前述Fell對於台灣在2000年以前的政黨政治發展，同樣持較樂觀的看法，認為主要的兩大黨並非在單一議題上競爭，而是多面向議題的多面向競爭，因此也不是極化的政治(Fell 2004)。

但不旋踵，在2001年時，政治學者吳玉山（吳玉山 2000, Wu 2000）與楊泰順(2001)分別在媒體投書，提出他們對於政黨開始採取極端主義與以對抗為主軸的憂慮。Rigger (2003)對於台灣在2002年的政治情勢也指出政黨的兩極對立，造成台灣一連串的經濟與社會風暴問題。此外，黃秀端(2004a)根據立法院的投票紀錄進行研究，她發現立法院的「黨紀」原本相對鬆弛，各政黨及其立委常因為議題的屬性進行不同的投票結盟，但是從2000年5月後的立法院各會期來觀察，這種結盟的空間大為減縮。<sup>3</sup>將上述研究和王湘廷的媒體報導的研究合併來看，2000年5月的政黨輪替似乎開啓了重大的政治兩極化的變化。

當時陳水扁、呂秀蓮所代表的民進黨得以在總統大選以39.3%的選票獲勝，<sup>4</sup>這開啓台灣民主政治的新頁，但這次得票未達四成就當選，且導致政權轉移的情形，至少有一部分要「歸功」於傳統國民黨支持者的分裂與重組。因為約略由1993年開始，台灣最激烈的政治競爭，並不侷限於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而同時發生在國民黨的主要派系，以及日後與新黨、親民黨之間的一連串分化與衝突。

從陳水扁的競選與執政承諾來說，新政府的首要選擇似乎是合作而非對抗；因為陳、呂僅以相對多數獲勝。客觀來說，原來民進黨即

<sup>3</sup> 黃秀端(2003, 2004a)認為這是行政權（執政）與立法權（在野多數）分立的結果。

<sup>4</sup> 第二高票為脫黨參選的宋楚瑜、張昭雄，得票率36.84%，第三高票為國民黨的連戰、蕭萬長，得票率23.1%。

欠缺執政與國際事務經驗，選民以及美國都「不放心」民進黨有關台灣獨的主張；而在立法監督方面，民進黨的立委只有 70 席次(31.1%)，相對國民黨的 123 席(約 54.7%)；衡諸國內外情勢，陳、呂提出「全民政府」、「新中間」的中道路線，<sup>5</sup>並在兩岸與國際關係上說出「四不一沒有」<sup>6</sup>維護現狀的公開承諾，試圖獲得較多的信賴與支持，種種似乎都符合當時的主客觀條件：採取「中間」立場付出的代價相對小，不但可望使後威權政府的政權轉移不以「清算」為訴求，避免劍拔弩張而順利進行，民進黨也比較容易操作在野陣營中之間的既有小矛盾，例如國民黨、新黨與親民黨勢力，拉攏不同的競爭者進行合縱連橫。

不過台灣繼承自 1947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雖然歷經數次增修，仍有五權憲法以及大中國架構的遺留，並不利於立足於台灣的「跨黨」政府的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關於總統、閣揆與內閣、立法機構三者之間的憲政分際，有所謂半總統制(又有稱混合制)的行政、立法劃分規範不清或無先例的曖昧處，也就是總統府與行政院，以及立法權與行政權如何相互制衡、合作的遊戲規則等問題，如果再考慮新政府概括承受了多年以來「黨國」的遺緒等，凡此皆提高了跨黨合作的實際困難。

陳水扁上任後首先邀請國民黨籍的唐飛以個人(非政黨)名義出任閣揆(但並不主導組閣)，組成新政府後經過三個多月的嘗試，因為唐飛個人理念與民進黨看法懸殊，始終無法獲得預期中的朝、野信

<sup>5</sup> 關於「新中間路線」對於 2000 年大選的影響，參考王鼎銘(2005)。

<sup>6</sup> 陳水扁在總統就職演說中表示：「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這五項保證與條件，一般通稱為「四不一沒有」，被認為是維持台海現狀的一種承諾。

任，加以體制問題，唐飛終於在當年 10 月，民進黨要求推動廢除興建核四之後被迫辭職。<sup>7</sup>當民進黨失去唐飛作為跨黨媒介的時候，轉而成爲理所當然的「全面執政」，導致台灣成爲由少數政府擔負「執政黨」名義，面對多數在野議會，並承負執政責任的情勢。隨此新發展，各政黨的一連串博弈隨之展開，朝野領導菁英雖曾在輿論壓力下會談，但彼此之間信賴達到最低，終於形成難以化解的對立。

因應民進黨的廢除核四政策及任命黨員張俊雄接替組閣等一連串行政強勢，立法院的新黨、親民黨立委於 2000 年 10 月遊說國民黨立委宣布成立「在野聯盟」。聯盟一方面聯名提「不信任案」共商倒閣（張俊雄內閣），後又繼續提案將閣揆張俊雄送監察院彈劾，另一方面於 11 月集體聯名提出罷免陳水扁的提案，要求對兩岸政策採取更開放的態度，不斷地相互否定與杯葛，提升了「後全民政府」的政黨間直接對抗的機率與強度。

由於停建核四政策的反覆，政爭以及輿論對新政府壓力上升，陳水扁選擇於 2000 年 11 月 5 日在電視上發表公開講話，承認錯誤、深切致歉，並引用林肯的名言：「一棟分裂的房子，是永遠無法站起來的！」要求朝野團結，<sup>8</sup>但似乎無力挽回，因爲國民黨上下的具體回應就是在 12 月 25 日，史無前例的以在野、民衆的身分走上台北街頭，號召上萬群眾參加「全民搶救台灣」的反扁與護憲的大遊行。<sup>9</sup>

7 參考唐飛的自述，《台北和平之春：閣揆唐飛 140 天全紀錄》(2011)。

8 中華民國總統府(2000)總統針對國內政局的發展發表談話。11 月 5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8241>，引用日期：2012 年 9 月 19 日

9 此次遊行名義上由一些親國民黨、親民黨的民間團體所組成，但新聞報導稱「處處可見黨工身影」，國民黨副主席蔣仲苓、秘書長林豐正、文傳會主委胡志強、組發會主委趙守博、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和多位立委都參與（聯合報 2000/12/26 三版）。



如前述，很多人認為 2000 年的政黨輪替是一個關鍵點，為台灣的「治理」帶來惡果。<sup>10</sup> 例如，朱雲漢在 2010 年 1 月間評論台灣在過去十年（始於 2000 年）的經濟落後、治理能力下墜時指出：「朝野政黨惡鬥與國家認同分裂兩者間複雜的糾葛，導致政治競爭超脫民主常軌，激化社會兩極對立」，又說「惡性競爭引導新聞媒體追逐聳動新聞、刻意誇大對立與衝突、鼓吹民粹論述、媒體的弱智化傾向嚴重壓縮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空間」（朱雲漢 2010）。到底社會一般輿論，對於上述的藍綠兩極化的問題有什麼樣的不滿或憂慮？我們尚可以下面兩例為說明。

例證之一為王永慶、李遠哲、林懷民（以下簡稱「王李林」）三人的聯合公開聲明。時值 2004 年初總統大選期間，主要的候選人包括尋求連任、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水扁、呂秀蓮一組，以及國民黨與親民黨泛藍大團結的連戰、宋楚瑜一組。因為泛藍記取 2000 年大選失敗的教訓，喊出「泛藍大團結」的口號，頗具重返執政的態勢；而民進黨由總統主動提案，在總統選舉前拋出牽手護台灣，並由總統提出「防禦性」公投，將國家認同議題運作為國家安全與兩岸政策的關鍵。<sup>11</sup>

<sup>10</sup> 陳水扁初始的「中間路線」的失落，不乏評論者認為這主要是陳水扁人格特質的問題。但是由事後的發展看來，馬英九在 2008 年以七成多的高票當選總統以後相比，馬英九仍然不能做到兼顧的「全民總統」，反而採取了所謂「撥亂反正」的政黨鬥爭觀點，我們可能不能將政治的問題歸因於所謂少數人的人格特質，反而忽略了台灣政黨競爭體制與國家認同議題的複雜度。

<sup>11</sup> 公投標的有二，第一案被通稱為「強化國防公投」：「台灣人民堅持台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共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你是不是同意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第二案被稱為「對等談判公投」：「你是不是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協商談判，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謀求兩岸的共識與人民的福祉？」，這是第一次「公投綁大選」，兩案均遭否決。學術論文方面可以參考蔡佳泓等人(2007)。



大選的動員造成民衆情緒浮動。在此時空條件下，2004年1月15日「王李林」三位代表台灣不同領域的頂尖菁英人士，在《中國時報》聯名刊出聯合聲明。聲明中評論台灣的政治「太多口水叫罵」、「意識形態對立」、「鼓吹仇恨與偏激」、「看不到清明與理性」、導致台灣的混亂與困頓。他們三人憂慮選舉結束後，社會將被「重創」與「割裂」，強烈要求各方立即自行導正，提出最能維護國家利益增進全民福祉的治國理念。<sup>12</sup>

事後發展證明，這樣的呼籲達不到預期的效果。2004年選舉雙方估計己方的勝算都僅有誤差之內的微小差距，而三月十九日選前20餘小時發生的「槍擊案」，更發生難以預料的影響。以不到三萬票敗選的藍營群眾占領凱達格蘭大道久久不散，且媒體知名人士捕風捉影，政治陰謀論每日均出新版；藍營支持者普遍認為陳水扁受槍擊是假，而作票是真。一連串的議會杯葛，大規模驗票、街頭抗議，歷經數月而不休。游清鑫(2004)爲文評論此爲「高度政治不信任」的時期，不但朝野無互信、在野不能團結，人民也不信任選舉與司法機構，可以說正式進入所謂「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或者說只問政黨立場，由立場決定最終價值的時期。盛杏媛、黃士豪(2006)更針對立法院長期以來表現就不被人民信賴（「討厭」！）進行研究。

例證之二，是透過《天下雜誌》所進行的「國情調查」成果，它

---

12 全文摘要如下：「……我們在這一次選舉活動中，看不到清明與理性的一面，卻看到朝野政黨仍堅持僵固的意識型態，以及太多的負面文宣、太多的口水叫罵、太多的意氣衝突。持續四年的政黨惡鬥正在變本加厲中，加劇了台灣當前混亂困頓的情勢。若是持續下去，理性論政沒有空間，民之所欲亦將落空。我們認為這錯用民主，也是對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輕蔑；因此，我們強烈要求相關各方立即自行導正」，又及「……國事爛塘，至盼大家放下仇恨，遠離偏激，找回清明和理性，心繫台灣，眼觀全球，藉由一場高尚格調與深度內涵的選舉，終結台灣混亂困頓的情勢」。

可用來說明一般民意對於政治對立的擔憂。《天下雜誌》從1990年初開始做「國情調查」的民意調查，<sup>13</sup>從2001年底（《2002年國情調查》）到2009年底（《2010年國情調查》）詢問台灣民衆「台灣目前最大危機」問題，其中可詮釋為「政黨惡鬥」的選項，從2002年的報告開始高居第一名，百分比都達到50%以上，這樣的高比例一直維持到2007年年底的報告為止，才淪為第二選項，被「經濟衰退」所超過，<sup>14</sup>但「政黨惡鬥」仍然在45%以上。而從2002年到2004年的報告，第二高是「媒體煽動，激發對立」，達30%以上。

另外，2006年9月以後正式展開的「百萬人倒扁」，反對陳水扁的群眾展開「十月圍城」、「遍地開花」的大規模群眾活動時，支持者認為是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表現，而反對者（如李登輝）則稱之為「民主內戰」，<sup>15</sup>也有將之稱為台灣版的「文化大革命」。<sup>16</sup>這也反映在當年媒體出現「政治對立」關鍵詞次數增多的情形。以上我們是從不同政治學者的分析與評論，「王李林」三人聯合聲明，以及從《天

13 《天下雜誌》編輯部基於台灣高層政爭、縣市長改選、兩岸經貿頻繁互動、弊案連連，為了瞭解台灣人民的感受，在1993年12月進行「一九九三年國情調查」，此後幾乎每年年底，或在第二年年年初進行相關調查，以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針對全國十八歲以上的國民進行電話調查，藉以解讀當時台灣的政經局勢。參考李雪莉(2005, 2006, 2008a, 2008b)，李雪莉、汪文豪(2007)，林偉妃(2009)，天下雜誌編輯部(2003)，游常山(2002, 2003)等。

14 美國在2007年年中發生次級房貸的本土性金融危機，並於2008年9月擴大為全球性金融風暴。

15 李登輝在2006年9月18日參加台聯舉行的「環境政策、產業發展與永續台灣」政策研討會上將這場「倒扁運動」所掀起的藍綠之間的重大紛爭形容為「民主的內戰」，並表示自己的中立立場。（聯合報2006/9/19 A5版）。

16 參考原籍中國大陸的政論家曹長青所撰〈倒扁運動和中國文革的四大相似〉。[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477](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477)，引用日期：2012年9月21日。

下雜誌》國情調查所顯現出的普遍的不安情緒與憂心中，可以反向推知，從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時至 2004 年政黨之間的激烈衝突與不妥協、媒體的煽情報導，加以經濟衰退的波動等對於人們所產生的衝擊。

## (二) 以實證經驗主義為研究取向的兩極化

其次，如果是第二種方式，實證／經驗研究的途徑，用指標數值的改變，我們要如何說明台灣是否有政治兩極化的問題？由於國內相對應於此的研究相對缺乏，我們可先參考美國政治學者對於美國的「政治兩極化」的研究方式與發現。他們對於「兩極化」的定義都以美國本土的主要政黨，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對立為主，並在意識形態上分出保守派相對於自由派的光譜。而晚近這一波有關「兩極化」的討論，特別受到 Poole 與 Rosenthal 的開創性研究的影響。他們首先利用歷年美國的主要利益團體對於個別參、眾議員的量表評分，發現美國國會議員自 1970 年代開始的兩極化現象(Poole and Rosenthal 1984)，之後利用文獻中紀錄的參、眾兩院的點名表決紀錄，使用 NOMINATE (Nominal Three-Step Estimation)的聚集統計程式分析，算出不同年代、不同任期、不同政黨的議員間，投票紀錄相互聚集（或發散）的程度，並可將這樣的程度標準化約為+1 到-1 的數值，從這樣的數值計算並推估個別議員、各地區議員、各黨派之間的「立場」指標(Poole and Rosenthal 1997)。<sup>17</sup> 他們發現美國國會的意識形態分裂，約從 1968 年代通過《民權法案》之後，在不同的公共政策議題上，共和黨籍背景的議員明顯更向保守的光譜集中，顯示更高的同質性，呈現出意識形態（保守 VS 自由）兩極化的趨勢。2006 年 McCarty 等人出版了具影

<sup>17</sup> 他們進而為每一個任期的每一位議員，發展出動態加權後的 DW-NOMINATE Scores，來代表他們的黨派／意識形態的光譜，進行進一步的投票預測分析，供選民／公民團體參考。

響力的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一書，認為美國的議會政治兩極化的社會變遷（共生）原因，不能簡單歸因於社會的種族、宗教等認同政治的歧異，而應該看到數十年來美國選民（大社會）的所得分配不公，社會不平等的大問題。他們認為美國的富有階級日益清楚自己的利益，政治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他們與共和黨政治菁英密切結盟，而共和黨整體有向右移動的情形，進而與民主黨的差距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美國的大規模貧窮人口，例如非法移民或者是新移民，相對缺乏政治影響力或根本無參政權，因此無力扭轉這樣的政治過程。他們認為，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因為上述的選民結構與選舉過程，應想到所有關於重分配的重大法案都無法達成跨黨協議，這是分配不平等與政治兩極化的惡性循環。

至於以社會變遷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者，他們在「兩極化」的研究以 DiMaggio, Evans 與 Bryson (DiMaggio et al.1996) (簡稱 DEB) 的發現最為著稱。作者以「向兩端移動並集中為兩組人」為兩極化的定義，而這個定義的統計操作，一是兩組人的「均差」，一是母體的「標準差」。如果選民在某些議題上有兩極化現象發生時，會出現兩組人（通常又以具有政黨認同／傾向的「積極選民」為代表）對於某一項議題的態度立場，在正反兩端聚集後，兩組間的均差勢必擴大，或者出現雙峰(bimodal)的現象，或者峰度(kurtosis)或中位數下降，同時母體的標準差也出現擴大的情形；另外，他們也將兩組人的內部出現議題的匯集(convergence of issues)，多議題呈現高度統計的相關，代表異質化降低，當成是一種兩極化的指標。他們利用 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民調 20 餘年的資料分析，提出以下的觀點：儘管媒體評論者認為美國正處於紅軍與藍軍的文化大戰的兩極化對立，<sup>18</sup> 但是美國大眾

18 關於美國的「紅、藍」大戰，經常被引用的有 Hunter (1991)。Hunter 的觀點認為美國人正面臨兩種價值觀的戰爭。一種可稱為文化正統，或者文化保守主義(cultural orthodox)，對於道德採取一種絕對、宗教，以及

的社會態度，並沒有出現兩極化；唯一的可能例外是，自稱是兩黨的支持者在面對墮胎、宗教等少數的議題時，呈現明顯的落差。DEB 三人中的 Evans (2003) 進一步更新他們的發現，認為：整體而言，美國民意並未呈現兩極化的現象，但他也比 DEB 的發現更確定，當針對墮胎、性教育、校園祈禱、貧窮與社會福利等議題時，在那些積極的政黨認同者（共和黨 VS 民主黨）的次團體之間，確實發生了兩極化的問題。簡單說，美國部分群眾開始認同美國的「政治生活中的標籤」(labels in political life)。Evans 認為造成這種極化擴大的兩項最主要原因：(1) 兩黨菁英的兩極化，提供選民須要選邊站(take sides)，(2) 保守派 VS 自由派的意涵的結晶化(Evans 2003: 87)。

「美國的政治菁英、政黨出現兩極化，但是民衆是否也兩極化呢？」隨之成為美國政治學者間的一個辯論。<sup>19</sup> 例如，Fiorina 等人依循 DEB 對於兩極化的定義，根據歷年的經驗資料分析，他們幾乎斷定至 2006 年為止，美國的政治「兩極化」只發生在政黨菁英（政治的上層階級），而不是發生在普通的選民之間。選民對於特定議題所持的政治態度，呈現相當的重疊，也呈現中庸(moderate)、不一致(ambivalent)，又展現高度的包容度。政治階級與選民是「不連結」、「斷裂的」(Fiorina and Levendusky 2006)。但是持對立觀點如 Abramowitz 等學者(Abramowitz and Saunder 2005, 2008; Abramowitz and Stone 2006)認為，選民的政黨認同，政黨對特定議題所持有的立場，以及自己的「保守 VS 自由」的意識形態都越來越一致，兩黨支持者

---

維護傳統的立場。另外一種是文化進步的觀點。他們主張現代、世俗，而且相對主義的道德觀。這樣的價值衝突，延伸到美國兩個政黨對於某些公共政策的立場的涇渭分明。例如對於墮胎、同性戀、幹細胞研究、校園祈禱時間、對移民的包容政策等等。

<sup>19</sup> 參考 Fiorina 等人(2006)、Fiorina 與 Levendusky (2006)、Fiorina 與 Abrams (2008)等著作。作者特別感謝評審人的文獻建議，隨後連帶大幅度改變了本文的撰述方式。

間的差異也越來越大。<sup>20</sup>

那麼美國選民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Fiorina 等人提出了重要的「政黨分類」(party sorting)的概念。所謂政黨分類，就是指美國選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sup>21</sup> 和自己支持的政黨的立場，確實有越來越趨一致的情形；換言之，對特定議題，各該黨的支持者，有和各該黨日益同質化、結晶化的趨勢，這雖可以推論選民對於特定議題的看法，可能受到政黨的影響，但是這不是「兩極化」的問題。因為進一步研究發現，民衆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基本價值其實並未移動，或移動微乎其微；而導致政黨分類發生的原因，是因為處於日益兩極化的政黨透過不同管道，將提供兩極化的政治線索(cues)與清楚的對立選項，而選民也會就提供的選項而選邊(take sides)，因此產生了符合同黨的議題立場。<sup>22</sup> 但是重點是選民的基本的態度，仍然相當穩定，並沒有像政治菁英那樣發生分裂變遷的跡象。Fiorina 同時警告，政黨固然可能讓選民在議題上「選邊」，但選民仍然受到自己的價值的約束，是以他們連帶認為，政黨認同對選民的價值抉擇「可能」，但並非「必然」，更加重要。<sup>23</sup>

---

<sup>20</sup> 由於本文並不在討論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問題，有關辯論的第三者評論，可參考 Hetherington (2009)的綜合評述，或者社會學者 Baldassarri 與 Gelman (2008)的綜合討論。

<sup>21</sup> 這裡雖然都簡稱「選民」，但是在上述相關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要發現，經常是指那些有高度政治知識，或對政治關心的選民，針對比較屬於「積極」的選民，有政黨認同，或者自認關心政治的選民。

<sup>22</sup> 此一觀點，可參考 Levendusky (2010)的後續研究發展。

<sup>23</sup> 類似的研究，可參考社會學者 Baldassarri 與 Gelman (2008)的分析：他們選擇不用社會屬性（如種族、教育、階級、收入）來對選民分組分析，而是用議題屬性來分析。他們雖然也在結論中肯定 Fiorina 的觀點，但同時也認為，選民的政黨分類過程，和政治階級（菁英）的兩極化，是一個相互支持的過程。換言之，政黨分類也確實可能改變選民的基本價值，可能促使選民朝向意識形態分化、價值重組。



回顧台灣，直接以選民偏好的價值，立場的變動的統計數值來界定「兩極化」，並直接進行「兩極化」的研究並不多見（參考下節的文獻討論）。一來政黨政治在台灣的時間相對仍短，而形成兩黨極端鼎立態勢的時間相形更短。不過，對於台灣政黨菁英、立法院（政治社會）的兩極研究並不算少（參考黃秀端、陳鴻鈞 2006；楊婉瑩、陳采葳 2004），但直接援引立法委員「點名投票」的研究仍屬少數。主因是近年來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非常依賴政黨提名，議事時易受黨紀與政黨立場的影響，<sup>24</sup> 常以黨鞭意旨與協商結果為主要依據（黃秀端 2003；黃秀端、何嵩婷 2007），是以我們只能從記名表決的結果中，政黨的投票分配狀況瞭解政黨對立確實越來越嚴重，但這仍限於菁英或者政治社會的兩極化，無法將立委的「對決投票」紀錄，擴大詮釋為其選民之間的極化，民衆與代議士間的可能落差，這是代議政治的普遍議題。

另一方面，台灣政治學、社會學等對於民衆的議題傾向、變遷的研究數量雖然很多，但卻很少以「兩極化」為重點。我們甚至可以說，我們已知政黨競爭、國家認同（相關於兩岸政策的擬定）確實是各政黨的主要立場分化，或者政黨間的區辨，這原本是構成「泛藍」、「泛綠」兩極光譜的主要意義，但是這只限於是政治階級或者政治菁英的

---

<sup>24</sup> 黃秀端、陳鴻鈞(2006)發現立法院議事主要依賴委員會決議以及黨團協商，是否進行「記名表決」受到前述二種機制的影響甚大，且在第四屆與第五屆立委任期時（政黨輪替之後），如果採用「記名表決」進行表決時，幾乎都是以藍綠陣營「政黨對決」方式進行。又如，楊婉瑩、陳采葳(2004)亦發現：「第二波國會改革之後，委員會取得是否將法案交付黨團協商的程序上的先行權力，但是對於委員會無能力解決的爭議性法案，仍傾向保留到黨團協商來處理，而這些法案一旦進入黨團協商，委員會的意見便僅供參考，法案內容有大幅實質修正的趨勢；如此觀之，委員會雖然取得程序權力，但法案實質修正權力仍相當受到黨團協商的影響」。



對立問題，我們其實不知道藍綠問題對於選民的核心價值來說，是否也有類似的兩極化問題？如果從上述引用的評論中，政治學者、社會賢達的評論，似乎都把矛頭指向政治階級的對立或者媒體渲染，並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心聲。我們仍不知道政黨的支持者，對於多重的議題，是否也有簡單化成為符合政黨立場的趨勢？選民間的政黨分類作用是否出現？我們也不知道「分類化」的後續效果，是否日久結晶化？是否可能回饋到兩極化的政黨立場，形成相互增強的情形？

王湘廷(2009)的碩士論文，《台灣民衆兩極化政治態度之觀察：以1992至2008年為例》，因此具有參考價值，它是少數針對上述「台灣的政治兩極化，究竟是政黨菁英的兩極化？還是民意兩極化？」問題而進行探究的報告。<sup>25</sup>他分析了1992年到2008年的調查資料，<sup>26</sup>得到幾個發現：(1)在統獨問題、族群問題、政黨認同上，中間立場的民衆一直是主流或相對多數，並未出現兩極化的問題(pp.104-105)；(2)在其他社會議題上，統獨對於例如經濟發展與環境的取捨、社會福利等議題上，關係並不確定(pp.92-93)。他同時懷疑，由於人民的國家認同議題立場相對穩定、趨中，人們之所以認為「政治越來越兩極化」，很可能是媒體渲染的後果(p.106)。同樣持有「民意並未兩極化，只有政黨兩極化」論點的相關研究還有黃曬莉(2007)，她在研究國族認同意識形態時，同時推論出「台灣優先」其實是民衆的共識，因此她主張台灣的民意呈現「鐘型」的分配，但是政黨所呈現的卻是兩極化的「M型分配」。<sup>27</sup>

<sup>25</sup> 他的統計分析方式沒有參考 DEB 等人在方法上的建議，導致實際進行分析的時候有失焦的情形。

<sup>26</sup> 主要是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TSCS)與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sup>27</sup> 黃曬莉的研究所根據的問卷調查並不是以台灣人口為母體抽樣，而是研究者為了衝高「政治參與積極者」的樣本，經由個人關係蒐集得到，其

除此之外，蔡佳泓等人(2007)發表的〈兩極化政治：解釋台灣 2004 總統大選〉論文亦值得討論。作者們發現 2004 年陳水扁陣營提出的「防禦性」公投，導致「公投領票或不領票」成為藍、綠選戰的主爭議，在此過程中，民進黨的「公投（綁大選）」策略，誘發了藍營的強力杯葛，也成功地促成選民能清楚的「選邊」。作者們解釋這個關於公投的爭議，是透過極端政治的「衝突延伸」的過程，達到影響選民的最後投票的考慮。作者們結論認為，此一新議題，取代（或轉移）了選民對於統獨議題原來屬於「中間」看法，有意識地更向藍綠政黨的兩極化立場靠攏。該研究建立在三個前提：(1)台灣藍、綠各政黨在統獨議題上長期以來是「兩極化」且各據光譜的一端，這是事實（不必討論或改變的）；(2)就民意的分布來說，在統獨議題上選民是兩邊對稱，並以「維持現狀」（中間）為單峰分配；(3)接受選票最大化為政黨政治的邏輯，認為政黨必定要追求勝選，也必須提供足夠線索讓選民理解爭議的核心，進而促成該政黨要他們做的「正確」抉擇。根據這三個前提，作者們從經驗資料的模型檢定中，認為競選連任的陳水扁陣營所提出的「防禦性」公投議題，導致「是否領公投票」這個變項取代了統獨議題的變項，並影響選民的作用。

蔡佳泓等人(2007)的研究確實揭露了一部分有關兩極化政黨菁英的選舉理性邏輯，包括如何設定議題、轉化選戰議題，將處於中間位置的選民轉成該黨的同類立場。但是也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評述：

第一，作者們的前提之一，假定台灣的政黨「長期處於政治光譜的兩端」，因為國家認同一直是「最重要」的政治分歧點。這恐怕與該時間點的事實不符；雖然眾所皆知台灣各政黨對國家認同有不同想

---

結論確不能推論到母體。但如果根據「政治參與積極者」都得到這樣的「民意鐘型分配」的推論，那麼合理假定，如果增加樣本代表性擴大到普通的「非積極公民」，研究者可能得到「民意為鐘型分配」的可能性更大。

像與強硬主張，但是至少在 2000 年 7 月全民政府路線失敗以前，台灣的政黨政治仍處於多議題、跨議題競爭且複雜的態勢，並非僵硬固著於兩極。<sup>28</sup> 特別是如果我們從作者們研究的 2004 年 1 月的時間點往後推，政黨間以國家認同的兩極化來統合其他社會正義議題，或者以國家認同為各式議題、各公共論述的「王牌」(trump card)，只有約四年的時間。

第二，作者們並未深入瞭解選民的基本價值與複雜的議題光譜，如同 DiMaggio 或 Fiorina 等人所評論，這類研究只是在政黨所提供的有限選項（二選一）中去研究選民，只能理解選民對於政治標籤的回應，但無法說明選民的基本態度是否改變。換言之，作者們所說明的更有可能只是政黨將選民進行分類，選民「選邊站」的投票行為，尚不足以用以說明選民的價值的兩極化。

第三，如同大多數極化政治的研究，他們對於選民如何將複雜的議題進行配對、化繁為簡，以致於和政黨的極化立場相同，或者如本文所描述，「選民透過理性選擇將統獨議題轉化為公投領票議題」，一直有交代不清其轉化機制與改變過程的問題。<sup>29</sup>

<sup>28</sup> Fell (2004) 甚至認為，在 2000 年之前的多次選舉中，民進黨之所以能不斷獲得更多的選民支持，是因為從事了複雜議題的競爭，包括反對金權、爭取社會福利（公平）、環境保護等，而非單一的國家認同意題。而在 1994 至 1995 年間，民進黨與新黨立委屢喝「大和解咖啡」，並攜手力推施明德為立法院院長且幾乎成功，也是一例。

<sup>29</sup> 可以參考 Levendusky (2010) 的研究。他用實驗法研究發現政黨菁英的兩極化對於一般人更加容易形成清楚而一致的立場，具有統計上微小但顯著的因果作用。他在實驗中操作政治菁英的兩極化程度，發現一般人的反應很具啟發性：「菁英的兩極化，能透過兩步驟促使大眾形成一致性。菁英越極化，越能提供選民清楚的訊息；而當受試者選擇他們的政黨的立場時，他們不只和他們的政黨形成呼應的立場，同時在受試者之間形成相呼應的立場」(p.124)。作者一方面承認現實世界比實驗室更為複雜，一方面也提出合理懷疑，認為在現實世界中，兩極化的政黨與政

第四，政黨為獲得選民的支持，有幫助選民釐清複雜的議題、協助選民做理性選擇的正面功能要扮演，蔡佳泓等人(2007)或許無意但同時也替選擇極化策略的政黨（不一定是哪一個政黨），提供了道德或者理論的理性基礎。<sup>30</sup> 這裡作者們忽略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只依賴一個政黨致力提供的「線索」，或單憑民進黨一黨之力，並不一定會造成選戰的兩極化。如同 McCarty 等人(2006: 2-3)所指，政黨的兩極化總是像在跳「探戈」，總是兩個極端者的「前進後退，不可兼得的選擇與計算」，而且這樣的舞者，是在議會這舞台上所一起完成的。台灣 2004 年的總統大選、公投議題，這其實是後來快速形成的「藍、綠」陣營，從唐飛院長辭職前夕開始大跳兩極化探戈之後發生的結果。換句話說，作者們也許專注於某一個政黨設法令群眾「分邊站」策略的選票邏輯與正當性，從而疏忽了政治階級作為各政黨的集體、功能分化的一個社會體系，因為各自的利益衝突，以及為了爭取選票的利害需要，而對社會進行「衝突延伸」時可能帶來的外溢的負面結果。例如，對於其他的社會體系，教育、經濟、文化、各種職業專業，甚至個人親密關係體系等衝突與負面的問題，或者社會中日益嚴重的互不信任問題。

第五，作者們未能考慮從政黨兩極化的質疑來思考，是以不必探究民主制度的應然面辯論：政黨代議政治是民主體系或政治體系的一部分或者全部？除非我們認為它是全部，否則，如果只是一部分，那麼我們恐怕不能將一個社會對於公民社會的共和精神，直接參與等實踐與追求，都將其化約為政黨認同，或者政黨政治來取代。我們也無法假定政治體系對於其他不同社會體系，處於絕對支配的位置，因為

---

治顯著人物，對於群眾的意識形態「同形化」的影響，可能比在實驗室的效果更大。

30 例如，作者們不忌諱民進黨「公投綁大選」的立場，也不大在意國民黨反制公投的行動。

一個社會的運作，必須依賴某種程度的情同感、共和精神，以及涉及到對陌生人的普遍信賴感(*generalized trust*)。單獨依賴狹義的政治體系，是無法生產出這種社會運作所必須有的道德基礎與正當性。因此當論及台灣國家、社會各種公共議題、各項發展方向與策略時，若僅只依照政治體系的選舉邏輯運作，而不看重有共和需求的群眾或者民間，忽略人民的情感認同等價值，將使得政治上的分裂，外溢並擴散到其他社會生活領域，間接威脅整體社會各層面的運轉正當性。因為「政黨、政治社會」以及「群眾、公民社會」兩者是相關但不同的存在體系，它們具備不同的價值、利益與行事邏輯，因此，前者的兩極化與後者的兩極化，有必要分開探討，將其當成兩種不同層次的問題來理解、面對。

### 三、台灣民眾兩極化議題初探與研究假設

如同上一節文獻探討所言，如果使用量化的方式探討台灣政治兩極化過程，可以有幾個選擇：(1)針對政治階級、政黨的兩極化研究，從議會的各式紀錄，或者其他有代表性的指標著手；(2)針對選擇的政治議題，例如環境、社會福利或者國家認同，研究社會價值變遷，建立不同價值指標之間的關聯性，進而觀察民眾的國家認同的兩極化或者偏好的改變；(3)針對政治階級與一般民眾之間的落差以及相互影響的過程或程度進行研究。

本研究屬於第(3)種選擇的一種嘗試，不過從「變遷調查」既有的縱時資料入手，難以建立起符合如上的假設檢驗，而我們在兩極化的統計上，也面臨測量的尺度特性的限制。從可選定的相關議題中，所用的量尺均為三分或四分法的類別選項，並不符合連續性的尺度的假設；折衷的方法，也是初探的方法，是篩選有關且既有資料所允許的議題。基於上述考慮，本文以不同變項的「中間立場」當成兩極化的

替代觀察(proxy)，我們假定當兩極化趨勢現象發生時，各指標的中間立場將出現下滑趨勢。如果沒有明顯的下滑趨勢，則不能反推得到兩極化發生。但是針對下滑的趨勢，我們恐仍須繼續觀察以下二端，進一步予以確認。

(1)當中間立場的趨勢線由高點，例如從接近二分之一左右處開始下滑，那麼這相對符合所謂的兩極化趨勢，但仍要繼續檢定兩端差異的變化。如果兩端民衆的百分比呈現持續負相關，一端減少、一端增加，且中間從高比例下降，顯示一種「偏峰」或者「共識化」形成的過程。反之，如果兩端民衆的百分率趨勢線呈現平行，或者正相關，代表兩陣營各自穩固不流動，或者各自爭取中間立場流入成爲支持者，導致中間下降的情形，就接近「持續衝突」，但不一定是「雙峰化」或者「兩極化」的情形。

(2)當中間立場趨勢線由未達三分之一的比例或更低開始下滑，由於參考起始點沒有達到相對多數的情形，代表民衆原來就不太可能是鐘型的分配，此刻繼續檢定兩端民衆的百分比，如果兩者從接近的百分比，代表接近「雙峰」的現象。此時如果兩極端開始呈現負相關的發展，同樣可能代表朝向一端的「單峰化」或「共識化」過程；反之如若兩端民衆的百分率趨勢線呈現平行或正相關，甚至同時上升，就符合「雙峰化」，或者「高度」兩極化的條件，至少可能屬於膠著的持續對抗。

同時，不論使用何種資料，「時間」都是非常重要的環境因素。「兩極化」是一種形成的變動過程，其變化也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此外，不論是政黨或者一般民衆，他們的立場偏好必定容易受到時事發展與國際地緣政治大氣候的影響，而前事也必然會對後事影響，例如1996年總統大選的台海危機、2004年的「319」槍擊案、2009年的國際金融海嘯等等。因此，特定的時間區間的選擇也很重要，唯有透過長期觀察方能不受短期波動的影響，避免過度推論。



本文的時間點選定為(1995-2005)大約十年的時間，也是我們上述文獻討論中，台灣民主政治被認為逐漸成熟，通稱屬於民主鞏固的過程，但是也逐漸從中間、相對溫和，進而分化且朝向激烈競爭，進而被一般人評為「兩極化」的時期（參考附錄 1，台灣時事大事紀）。但是十年畢竟很難說是「長時間」，雖然對台灣這個新興民主來說，因為憲法與體制的變化很大，外加兩岸關係難以事先預料，所以十年也可能有很多改變，因此我們的觀察最後必須根據選定的指標的可用性，無法避免地受到資料性質、問卷內容提問方法等研究法層次的影響。以下我們利用「變遷調查」來討論幾個和兩極化有關的變項的改變，研究台灣民衆的政治立場。

### (一) 時間點的時事意涵

本文以「變遷調查」在 1995-2005 年間所做的六次調查進行觀察。<sup>31</sup> 第一個時間測量點（1995 年 7 月）正值李登輝總統出訪美國，引發中國政府不悅，進行一連串的飛彈試射，稱為「台海危機」。當時李登輝提出「新台灣人」的觀點並推動修憲，就是不分省籍都是台灣人的理念，除新黨支持者以及部分國民黨的忠貞黨員以外，李登輝受到民衆的較高支持，不過這個時間點因為被當成趨勢研究的起始參考點，無法直接解釋日後變遷的因素。

第二時間點（1998 年 7 月）正值修憲已經進入尾聲，政治上以廢除國代、台灣省虛級化為焦點。<sup>32</sup> 因為修憲，國民黨黨中央主流派與

31 三期一次(1995)、三期四次(1998)、四期一次(2000)、四期四次(2003)、四期五次(2004)、與五期一次(2005)，共六次。由於這六次抽樣的樣本年齡層並不一致，本文統一選用年滿 20 歲以上的樣本，作為研究依據（詳如附錄 2）。

32 第四次修憲主要內容：行政院院長原由總統提名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改由總統直接任命；總統在特定條件下得宣告解散立法院；總統、副總



民進黨攜手，而「台灣優先」的施政基調，將兩岸關係持續置於「戒急用忍」的冷卻中。同時，1997年英國將港九歸還中國大陸，一國兩制成為中國對台灣的主要統戰政策。

第三個時間點（2000年7月），亦即評論者所稱的台灣兩極化的開始時期。民進黨在國民黨支持者內爭分裂的情形下，以相對多數獲得總統選舉的勝利，台灣民主化正進行第一次政權轉移。國民黨因為分裂敗選，掀起批李風潮，逼迫其交出權力，而原來支持李登輝的宋楚瑜，因為違紀參選，選後開始籌組「親民黨」並與國民黨在立法院內競爭。這一時間民進黨氣勢上升，但和緩的中間執政路線，即將因為內部意見不一，加之外部的壓力與杯葛隨之將至。

第四個時間點（2003年8月）兩岸關係方面已經進入「一邊一國」的對立情形，民進黨進而推動公民投票法（於該年年底時通過）。而稍早舉行的直轄市長選舉，北高兩市分由馬英九與謝長廷當選。選舉過程中抹黑與刺激族群的語言眾多。但此時的社會情緒主要受到通稱人禽流感(SARS)風暴的影響，作為全球化連結的台北市與台灣經濟都受到重大影響。

第五個時間點（2004年7月）國內政治因為藍營與綠營都完成團結，呈現清楚的二元角逐，雙方都以「愛台灣」、「台灣優先」為主。而在選情緊繃時發生疑點重重的「槍擊事件」，選後的訴訟、群眾抗爭與重新計票，激發群眾情緒。

第六個時間點（2005年7月），稍早國民黨在連戰的領導下與親民黨合作，達到重返立法院獲得穩定的多數席位，足以制衡民進黨政府。連戰進而表示世代交替，馬英九接班聲望上揚。而中國對扁政府

---

統之彈劾提案權原為監察院行使改由立法院行使；立法院增設倒閣權與總統、副總統彈劾案提議權；引進不信任案制度；立委身體自由保障改為「會期中」始受保障；凍結省級政府組織……等重大議題。

繼續施壓，中共中央通過「反國家分裂法」，將台獨問題定位成中國內政，引發另一波「民主護台」的群眾運動；相對應的，連戰、宋楚瑜分別於當年4月與5月赴中國訪問，展開國共和談、政黨和談的序幕。此時期也可說是藍營政治人物開始出發，結合中國的影響力，如台商利益（以喬圍攻）等，試圖制衡國內主政的傾獨勢力。

本研究將選擇三項「中間立場」的變動為主要觀察點，分別為：和認同有關的「自我定位」（見下節說明）、「統獨立場」以及「政黨支持」三項。主要因為這三項測量（概念）都是台灣政治兩極化常被提及的因素，例如：認同分裂、自我定位不清楚、統獨對立、藍綠對抗等。且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變遷調查」1995-2005年的調查資料，其中有延續使用、多次同時訪問的題目並不多，是以最後選擇這三項指標為主要觀察對象，檢視其「中間立場」的變動作為分析依據。「台灣或中國之自我定位」、「統獨立場」以及「政黨支持」，如果三項都一致出現中間遞減的情形，那麼我們就可以推論民衆也有出現兩極化的現象。如果三項都一致出現中間遞減的問題，我們可以先予以假定民衆的意見分布，可能受到政黨兩極化的作用而繼續分析。如果不是，我們也想尋求其涵意。這三項指標的運作定義以及在本文使用的特殊方式，將在以下具體說明。

## 四、三個「中間」指標項的趨勢線討論

### 指標一：和認同有關的「自我定位」

本研究的「自我定位」的兩端分別為「我是台灣人」與「我是中國人」。其「中間立場」，我們設定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兩者都是」等回答。所謂「自我定位」，例如在1995年（三期一次）時，題目為：

「有好幾種對自己的稱呼，請問您覺得那一項對您最適合？」<sup>33</sup> 這指對自己的集體身分屬性，是「中國人」抑或「台灣人」，或者兩者都是，做一概括陳述，簡稱「自我定位」。

過去一般研究都將此一問題等同於「民族認同」、「自我認同」等測量，但認同的意義過於強烈，或者邊界性、本質性太強，超過了問題所能承載的意涵，尤其無法處理認同的流動的問題。是以，當研究者用此權當「認同」變項作為多變項分析中的預測項，並用以解釋政黨立場、統獨立場、投票行為等，雖然經常可得到統計的效度，但是如果考量認同研究特別強調的情境性、流動性與策略性時，會懷疑將這一簡單的提問等同於認同的問題，特別不能掌握認同的時間性與方向性的複雜度。

我們認為人們回答本題的選擇，最恰當的詮釋，是一種根據個人經驗，面對既有的公共論述時的定位回應，加以受訪者必定受限於問卷的固定選項，其回答因此是對於公共集體標示、公開的認同政治的一種選擇，一種自我定位；更簡單地說，是受訪者對於政治社會提供的認同政治標籤，進行的定位回應。本文故將此類似問卷所得到的結果，定義之為「自我定位」，亦即個體在面臨政治社會中，「台灣人 VS 中國人」等相關集體論述時的一種回應，利用社會既有的公共標誌進行的選擇。這種選擇，可能包涵了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意涵，但不宜等同於認同的測量。<sup>34</sup> 「自我定位」各類別的歷年次數分配，詳見下表。

<sup>33</sup> 題目與選項請參考附錄 3。

<sup>34</sup> 本文同時認為，所有調查訪問的情境，絕大部分都是一次陌生人之間的「偶遇」，雖然有證明文件、學術研究、訪員證件、查證電話等「可證為真」的線索，但當在大多數情形，畢竟仍是生疏的情境，而到底是什麼，更難在陌生人之間的對談中表達出來。如果我們一定要說這是一種「民族認同」，可能有過度詮釋受訪者的風險。

圖 1 為根據表 1 繪製的趨勢線圖，我們發現在六個時間點的測量中，受訪者的自我定位分配，有相當大的變化，以下為討論。

(1) 本文所關心的「自我中間定位」表述，「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者有人說「雙重認同」選項，在同一時期亦呈現波動、但緩降的趨勢。例如，在 1995 年時中間定位表述的比例還有 45.1%，但是到了 2003 年只剩下 30.2%。然而在 2004 年總統大選選後，經歷選舉

表 1 歷年認同政治表述的「自我定位」次數分配

	n (%)											
	1995 年		1998 年		2000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我是台灣人	634	(30.3)	709	(40.5)	1,036	(52.9)	1,172	(59.5)	854	(50.4)	1,161	(55.3)
我是中國人	395	(18.9)	187	(10.7)	163	(8.3)	181	(9.2)	67	(4.0)	113	(5.4)
中間定位 <sup>a</sup>	943	(45.1)	811	(46.3)	684	(34.9)	595	(30.2)	764	(45.1)	723	(34.5)
其他 <sup>b</sup>	102	(4.9)	33	(1.9)	61	(3.1)	12	(.6)	--		67	(3.2)
無效回答 <sup>c</sup>	19	(.9)	11	(.6)	16	(.8)	11	(.6)	10	(0.6)	34	(1.6)
總數	2,093 (100.0)		1,751 (100.0)		1,960 (100.0)		1,971 (100.0)		1,695 (100.0)		2,098 (100.0)	

<sup>a</sup> 包括：「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兩者都是」等回答。

<sup>b</sup> 包括：「其他」、「兩者都不是」、「無法選擇」等回答。2004 年題目無此類選項。

<sup>c</sup> 包括：「不知道」、「不瞭解題意」、「不願意回答」等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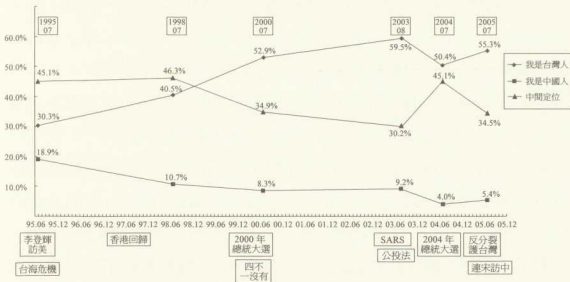


圖 1 認同政治的自我定位趨勢

不公的重大紛爭，「中間定位」的表述並未因此下降，反而又有短暫且明顯上升，達到 45.1%，較前期增加了 14.9%，雖然到 2005 年時又稍微下降 10.6%至 34.5%。

(2)十年間的測量顯示，關於自我表述定位為中間的民衆，從 1995 年相對高的 45.1%之後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在 2004 年、2005 年的調查中出現小回彈。資料上可以看出到 2004 年以前，確有「兩極化」的可能，但到 2005 年以後，因為觀察資料的限制、趨勢方向有些不明。

(3)進一步檢查自我定位的兩端變化，在過去十年期間「我是台灣人」定位表述，相對於「我是中國人」定位表述，穩定而互為消長（負相關）的情形極為明顯。例如，「我是台灣人」從 1995 年下半年（台海飛彈危機）的 30.3%上升到 2003 年（SARS 期後）的 59.5%，之後則在 50%以上盤桓。和此相反的則是「我是中國人」定位表述，從 1995 年的 18.9%下降到 2004 年的 4.0%，2005 年為 5.4%。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修正我們的看法，不論是「中間定位」，還是「中國人」定位，都有向「台灣人」定位的一端流動的情形，這代表了「自我定位」公共表述可稱為「共識化」的趨勢。

侷限於此 10 年的觀察值，這種關於認同的公共論述，朝向「我是台灣人」一方「自我定位」的「共識化」的趨勢，在 2004 年之後的兩次觀察時，似乎又有變動的可能。

(4) 2000 年與 2004 年的兩次總統大選對於「中間定位」似乎都發生影響作用，但是作用方向卻不一致。2000 年總統大選時，宋楚瑜以「新台灣人服務團隊」出發，和民進黨的「正港台灣人」形象與國民黨的「本土化國民黨」（李登輝一連戰／蕭萬長）競爭，當大家都在比較誰可以「真正」代表台灣人時，三組人馬的「我愛台灣」的宣稱，激勵了「我是台灣人」表述的抬頭，也在同一時期壓縮了另外兩項選項：「兩者皆是（中間定位）」以及「中國人定位」。

時至 2004 年大選是以兩強對立的方式進行拉鋸戰，選舉前夕發生

槍擊案，選舉結果雖判定陳水扁獲選，但選舉的有效性爭議不斷。在這種情形下，該次「變遷調查」的結果並不如 2000 年的發現，並沒有出現更高的台灣人定位的共識。比起之前調查中的「中間定位」的百分比反而彈升，且「台灣人定位」的比例在此時似乎受到壓抑沒有增長。這對於一般人認為 2004 年兩顆子彈造成群眾立場的兩極化，似乎提出了修訂的看法：人們在面對是非、價值難辨、信者恆信的政治環境時，反而容易選擇安穩的「中間定位」。概括來說，2004 年、2005 年之後的政治重大矛盾，是否會將民衆推向趨中？我們還有兩項指標可以檢驗，將留待下文處理。

### 小結：關於自我定位的中間立場

在這一段時間，可能影響「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自我定位的趨勢，符合「共識」趨勢而非「兩極化」趨勢的因素，合理推測的原因有：(1)與民主化、主權在民發展同時進行的，是一種結合台灣、用本土來呈現的價值效應；(2)這是透過政黨競爭與大選而進行；(3)台灣人口結構、政治社會化改變的漸進世代交替後果；(4)也有中國施壓、國共和談等兩岸關係的影響。

但最後，雖有朝向「我是台灣人」一端發展的共識，因為無論如何至少都有三成左右的受訪者，選擇了「中間定位」，是以我們不能確定地說「中間」在「消失」，反而是「中間定位」似乎成爲「台灣人 VS 中國人」的二選一之外，又多出一種可能的選擇，特別是在政黨激烈競爭、兩岸關係膠著的時機下發生。

### 指標二：「統獨立場」（民族主義價值觀的接近值）

如同前述，國家認同是台灣政黨之間的主要區分，一般民衆對於各政黨的統獨立場都有相當清楚的認識，而政治階級、政治菁英的兩

極化，經常沿國家認同的分歧立場進行。<sup>35</sup> 不同國家認同的政黨與政治菁英，成為統合眾多公共政策、社會問題／議題爭議的主要行動者，而國家認同分歧，也被假定是台灣政治社會分裂的主因。

此處將統獨立場偏好當作台灣國家認同的測量指標。統獨立場偏好在不同的研究中有數種測量方式，此處採用吳乃德(1993)「民族主義態度測量」之模式建構而成。吳乃德測量方法為利用兩個問題，建立交叉項，再依據交叉項建立統獨立場（或偏好）之類型。以下以 1995 年「變遷調查」使用問題為例：

第一題：有人主張「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的關係，則台灣應該成為一個新國家」。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主張？

第二題：有人主張「如果大陸和台灣兩地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兩岸應該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主張？

根據受訪者在上述兩題的回答（同意與否），建構交叉類型如下：

	贊成與大陸統一	對統一無意見	反對與大陸統一
贊成台灣獨立	1	4	7
對獨立無意見	2	5	8
反對台灣獨立	3	6	9

根據上述交叉類型，本文選定「中間立場」者為第 1 類（都贊成）、第 5 類（都無意見）與第 9 類（都反對）；另外，贊同中國民族認同（中國民族主義價值觀）為第 3 類，其選項為「贊成與大陸統一」、「反對台灣獨立」；而贊同台灣民族認同（台灣民族主義價值觀）為第 7 類，其選項為「贊成台灣獨立」並「反對與大陸統一」。至於第 2、4、6、8 類則歸入「其他」；而「不知道、不瞭解題意、拒答」列入「無效回答」。根據吳乃德的解釋，這裡的「中間立場（雙

<sup>35</sup> 參考黃秀端(2004b)，引自蔡佳泓等人(2007: 11)。



重認同)」者，除了堅定的維持現狀者之外（第 9 類），有時亦可稱為立場務實者、搖擺者，或看情形而無定見的投機者。

本文暫時將此中間立場與務實者合為同一類別，簡稱「統獨中間」立場。但是歷年來都有將近 10-20% 的受訪者，無法被有效的分類，分別落入難解釋的「其他」或「拒答」等項目之中。這或許是受到訪問施測方式的影響，在面訪中受訪者會傾向不願真正表態，<sup>36</sup> 然因此為調查方法的研究範疇，在此不多做討論，我們單純檢視重整後的數據。交叉後的結果為表 2：

表 2 歷年統獨立場次數分配

	n (%)					
	1995 年	1998 年	2000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支持台灣獨立 <sup>a</sup>	308 (14.7)	383 (21.9)	435 (22.2)	619 (31.4)	540 (31.9)	542 (25.8)
支持未來統一 <sup>b</sup>	428 (20.4)	288 (16.4)	284 (14.5)	360 (18.3)	270 (15.9)	333 (15.9)
中間立場或務實者 <sup>c</sup>	918 (43.9)	853 (48.7)	865 (44.1)	846 (42.9)	768 (45.3)	880 (41.9)
其他 <sup>d</sup>	170 (8.1)	196 (11.2)	160 (8.2)	15 (.8)	--	167 (8.0)
無效回答 <sup>e</sup>	269 (12.9)	31 (1.8)	216 (11.0)	131 (6.6)	117 (6.9)	176 (8.4)
總數	2,093 (100.0)	1,751 (100.0)	1,960 (100.0)	1,971 (100.0)	1,695 (100.0)	2,098 (100.0)

<sup>a</sup> 在吳乃德的模型分類中，此為「台灣民族主義認同」，即「贊成台灣獨立且反對與大陸統一」。

<sup>b</sup> 在吳乃德的模型分類中，此為「中國民族主義認同」，即「贊成與大陸統一且反對台灣獨立」。

<sup>c</sup> 指：「贊成統一也贊成獨立」、「對統一或獨立無意見」、「反對統一也反對獨立」。

<sup>d</sup> 包含：「贊成統一但對獨立無意見」、「贊成獨立但對統一無意見」、「反對獨立但對與大陸統一無意見」、「反對統一但對獨立無意見」。2004 年題目無此類選項。

<sup>e</sup> 包含：「不知道」、「不瞭解題意」、「不願意回答」。

從表 2 與圖 2 的觀察，我們可以得到下面幾個論點：

(1) 統獨中間立場的選項，也就是研究者推定的「統獨現實主義、現狀維持」者，在本研究設定的十年中一直是三種主要選項中百分比最高的一個選項，比「獨立」和「統一」的選項高，範圍在 41.9% 到 48.7% 之間小幅度波動，這可以說是此一時期台灣的相對的主流觀點。

36 可參考吳齊殷(1997)，〈受訪者之訪答效應：施測方法、問卷型式與問題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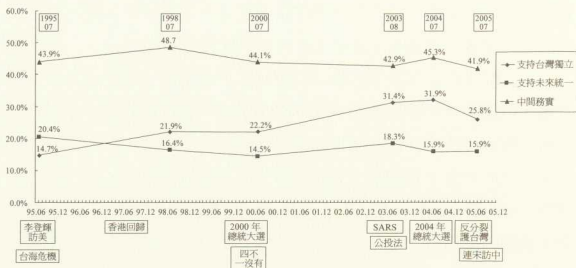


圖 2 統獨立場趨勢

觀察每次調查期間的波動，發現起伏小且趨勢呈現平穩。但 2000 年出現「中間」些微下降的情形，懷疑此時期有小幅的統獨兩極化現象；而從 2004 到 2005 年間，這兩次調查的統獨中間選擇的百分比的變化方向，則又有由上向下降低的情形，出現了符合「兩極化」的情形。和我們對於「自我定位」的觀察有類似情形：民衆對於 2004 年的選舉爭議（319 槍擊事件），在不確定的情形下，間接導致了流向「中間」、「無效答案」，或者說「猶疑不定」的情形，造成了 2004 年調查時中間立場的上升，而隨之一連串的紛爭，國民黨的重振，以及國共和談的新發展，2005 年時，中間立場比例下滑，出現符合「兩極化」的跡象。

(2)繼續觀察兩端的變化，「獨派」價值（「支持台灣獨立」、台灣民族主義價值）之選項，呈現緩增的趨勢，最低出現在 1995 年下半年調查，比例為 14.7%；逐增的情形在 2004 年下半年曾達到 31.9% 的高點，但在 2005 年時甚至下滑 6.1%。至於另外一端「統派」價值的選項，屬於拒絕考慮任何獨立的可能性（有條件的獨立），這從 1998 年之後均呈現相對穩定不變的情形，在 14.5% 到 18.3% 之間小幅波動，即使在 2004 年、2005 年時變化也很小。

(3)1995 至 2000 年的觀察顯示，統獨立場百分比出現高低逆轉，從原來統派價值略勝的分配，轉為台獨價值略勝的分配。此兩選項在 2000 年之前，呈現互為消長的負相關的趨勢：我們定義中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上升，而中國民族主義者下降，尚不足以定義是兩極化的現象；但在此之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百分比開始持穩。以 2005 年時的調查為例，當年持獨派價值立場的民衆稍微下降，但持統派價值的比例並未因此增加，而是流向「其他」、「無效回答」。是以，當中間下降，而與兩端趨勢接近平行（方向一致或相似），特別是 2004 至 2005 年的兩次調查，可理解為「持續對立」、「衝突膠著」。

### 小結：統獨立場偏好的變遷

在本研究設定的時間範圍裡，根據吳乃德定義的兩種民族主義來看，統獨中間立場者在此時期人數仍相對為多，佔了四到五成，<sup>37</sup> 顯示這是台灣的「主要」民意。在此一時期間，以 2000 年以及之前的調查來觀察，中間立場者出現微跌，但重點在「統消獨長」、獨派意識開始抬頭。可是到了 2004 年及 2005 年的兩次調查，我們發現中間稍微下降，但獨派價值上升趨勢線並未能因此上升，在上升面臨阻力的同時，統派價值繼續持平，反映出民衆的極化趨勢變化，有凝固或結晶的意涵。但本研究受觀察期間所限制，如果採取更保守的推論來解釋則可說：民衆的統獨立場並未如評論者所描述或預期，在 2000 年呈現向兩極方向快速發展的情形，統獨的比例在 2004、2005 年時，反而從原來台獨立場上升，轉為雙方拉距，至少顯示出膠著、持續的衝突（或對抗）的情形。

但我們這樣的詮釋，也有一個受限於觀察期間限制的問題。因為

---

<sup>37</sup> 且這十年中有將近 15% 左右民衆難以歸類，反映了民衆對此類測量民衆可能有難以回答的情形。

統獨或者民族主義問題，並非始自本研究所涵蓋的 1990 年中期，或起源更早，超過本研究測量開始的時間。因此如果要探究兩極化的更長時間的情形，我們的資料涵蓋的時間可能不夠回答。本研究只能說：統派價值的「穩定」比例，和獨派價值的相對「不穩定」上升，反映統獨的兩極化趨勢並非是直線發展的，而是可能擺盪的、也非快速的，且受到很多情境因素的影響。但不能否認，即使是最保守的觀點來解釋，這裡所呈現的民意結構，仍可能發展出膠著對抗，堅持對立等引發社會焦慮的氛圍，無法化解的情形。

### 指標三：「無政黨支持」比例的趨勢

「政黨支持」的相關問題，常被命名為「政黨認同」概念的觀察值。但「政黨認同」這個概念，被認為是一種對於特定政黨的心理或價值的認同，是一種政黨偏好的心理結構。因此在本文中「政黨認同」並不適合套用於「變遷調查」中所使用的問卷題目。例如，「變遷調查」經常使用的調查題目，如 1995 年（三期一次）第 72 題的題目：「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這三個政黨中，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請受訪者回答自己是支持還是不支持，或者是否偏向某一個政黨，成爲一種「標準化」的，有關受訪者「當下」「支持」哪一個政黨的測量題。如果勉強視爲持續的「心理認同」結構，將有過度解釋的疑慮。本研究選擇六次調查的相關問題，並加以統整。至於此一指標的中間選項，我們定義爲「無政黨支持偏好」，簡稱爲「無政黨支持」，其運作定義爲：

「都支持」、「都不支持」、「都不是（都不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沒有（沒有偏向哪一個政黨）」、「不知道」等諸選項，但不包含「拒答」在內。

表3 歷年政黨支持次數分配

n (%)

	1995年	1998年	2000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國民黨	912 (43.6)	444 (25.4)	322 (16.4)	290 (14.7)	204 (12)	491 (23.4)
民進黨	299 (14.3)	253 (14.4)	613 (31.3)	331 (16.8)	376 (22.2)	530 (25.3)
新黨	142 (6.8)	43 (2.5)	13 (.7)	8 (.4)	3 (.2)	--
親民黨	--	--	229 (11.7)	114 (5.8)	53 (3.1)	55 (2.6)
建國黨	--	9 (.5)	--	--	1 (.1)	--
台聯	--	--	--	11 (.6)	23 (1.4)	27 (1.3)
其他	--	21 (1.2)	--	12 (.6)	20 (1.2)	--
泛藍	--	--	--	119 (6.0)	--	--
泛綠	--	--	--	51 (2.6)	--	--
均無(中間項) <sup>a</sup>	614 (29.3)	970 (55.4)	648 (33.1)	977 (49.6)	998 (58.9)	827 (39.4)
拒答 <sup>b</sup>	126 (6.0)	11 (.6)	135 (6.9)	58 (2.9)	17 (1.0)	168 (8.0)
總數	2,093 (100.0)	1,751 (100.0)	1,960 (100.0)	1,971 (100.0)	1,695 (100.0)	2,098 (100.0)

<sup>a</sup>指：「都支持」、「都不支持」、「不知道」、「沒有偏好的政黨」等回答。

<sup>b</sup>指：「不願意回答」、「有支持政黨但不願意回答」等答案。

圖3-1是歷年政黨支持的直方圖，而圖3-2為「無政黨支持」(中間項)的趨勢圖。我們發現在六個時間點的測量中，各黨的支持百分比起伏甚大，或許是因為台灣政黨歷經裂解、重組、執政等不同原因而導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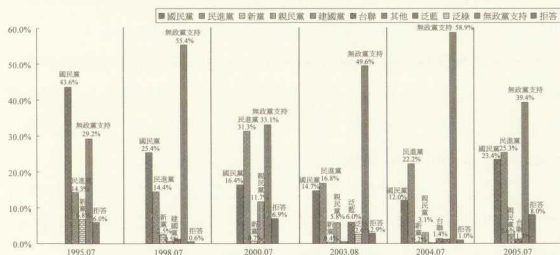


圖3-1 歷年政黨支持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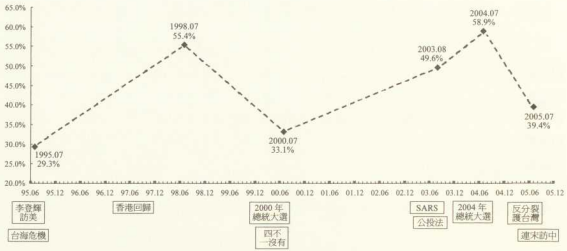


圖 3-2 無政黨支持趨勢

我們可以歸結相關的解釋如下：

(1)本研究所關心的政黨支持度的「中間立場」的消長，在此時間區間裡呈現不穩定跳動情形。如從整體來看，首先，位於中間的可稱為「無政黨支持」者在 1998 年達到過半數，2000 年政黨輪替後下降到約 33.1%。然後又上升到 2004 年總統選後的 58.9%，隨即於一年後下跌至 39.4%。由於此一時期是國民黨分裂與重組又失去政權的時期，也是民進黨首次執政的時期，歷經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重大的國家認同辯論，很多過去和政黨有關的政治價值與意識形態，都有主、客異位的輪替，以及政權輪替中的種種矛盾。這種政黨形象與價值的重組、流動，反映在這個「中間立場（無支持偏好）」的跳動。但是很明顯的，這並不符合「兩極化」的統計分配應出現的情形，反而是民衆的政黨立場在短時間內「擺盪」的情形。

根據我們的資料觀察點顯示，第一次擺盪出現於 1995 至 1998 年之間；李登輝的執政路線，導致國民黨支持者大幅度流失，由 43.6% 下降到 25.4%，唯同一時期民進黨的支持率並未上升。

第二次擺盪出現於 2000 年，政黨輪替時的觀察。與 1998 年的調

查相比，此刻無政黨支持的民衆下降了22.3%，國民黨支持者下降了9個百分點，下降者可能轉向支持新成立的(1)親民黨（達11.7%），(2)民進黨（達31.3%，增加16.9%），(3)拒絕透露（達6.9%，增加6.3%）。

第三次擺盪出現於2003年與2004年的調查，此時有將近半數的民衆，甚至在2004年高達58.9%的民衆選擇了「無政黨支持」的立場，這似乎並不符合兩極化的假設。進一步探究，相較於2000年前期，最主要的變化是國民黨、親民黨支持者都出現持續流出的情形，以及2003年的調查出現了「泛藍」（6.0%）及泛綠（2.0%）的選項。這兩個選項其實並非「政黨支持度」的答項，其主要意涵是在此一時期，民衆寧可用一種認同政治的光譜來取代對於特定的政黨認同。這凸顯對於部分群眾而言，議題已經不重要，只有國家認同的排比才重要。此一時期的最大分化似乎位於藍、綠之間，而小分化則是國民黨與親民黨，以及民進黨與台聯黨這兩組之間。同時，民進黨並未因國民黨與親民黨支持者的流出而獲利，甚至自身也出現支持者輕微外流的現象。

第四次擺盪出現於2005年，此次較接近政黨支持兩極化的擺盪。這一期間主要的變化來自中間立場的下降（減少19.5個百分點），而兩端同時增加，因為支持國民黨的百分比有快速的回升（增加11.4個百分點），而民進黨也有小有回升（增加3.1個百分點）但不顯著。這樣的變化符合了我們對於兩極化趨勢現象的設定。

### 小結：政黨支持與其中間項（無政黨支持）的變化

綜合言之，十年間「無政黨支持」的百分比時而有增加的情形，當其增加時，均與「國、親、新」三黨的支持減少有關，呈現負向相關的情形。是以政黨支持的中間項，與原來執政者的分裂、重組有大的關聯，特別是和支持國民黨的升降，以及支持親民黨、新黨兩黨的



升降有反向的連動。這說明一黨獨大時的國民黨支持者，在 1990 年後期開始，處於台灣民主競爭、國民黨陷入黨內路線爭議、政黨重組的激烈變動，開始出現觀望、猶疑、轉向，而且以向中間流動的情形為高，至於反轉成為民進黨支持者的情形則相對不顯著。

此外，在這十年中群眾的政黨支持立場有多次擺盪，但中間項的民衆最少仍有三成左右。調查資料顯示，比較符合所謂「兩極化」現象定義的時間點，只有出現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的觀察點，以及 2005 年（總統大選後，國民黨、親民黨聯手開始重振旗鼓、掌握立法院多數，並展開國共和談）之後的觀察點。

上述觀察，相對於通稱的「政黨支持」的立場兩極化、藍綠對立的簡單說法，更加複雜也並不完全相符。在這十年期間，雖確實可觀察到兩極化情形，但難說這是持續不變的長期趨勢，或是受特殊的時事影響而產生。而「中間立場」的政黨支持者，在 1998 年、2003 年及 2004 年間倏乎上升，然後又下降的情形，仍待下面進一步探究。

## 五、綜合討論三項指標的關係

### (一) 三項指標的變遷趨勢觀察

圖 4 呈現三項指標的變遷趨勢。我們選用的三個指標，「政黨支持」、「自我定位」與「統獨偏好」，它們的趨勢與波動，三者呈現共同性與獨特性。在共同性方面：

第一，三者方向上大致是同步的，亦即在各個調查時間點的上升或下降的方向均同，顯示我們設定的三個「中間」指標，有正向的關係性。

第二，就 1998 年的調查而言，此一時期，對於特定政黨的支持態度不明顯，而在統獨中間立場、自我定位中間立場，相較於 1995 年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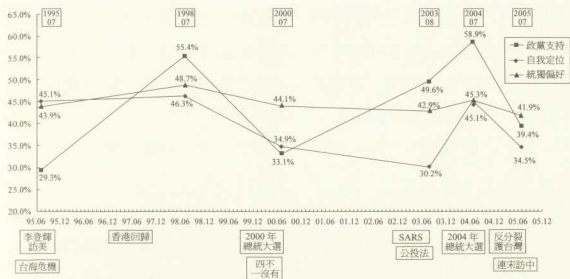


圖 4 中間指標趨勢合併

有小幅度的上升。三個指標在此次調查中上升可解讀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原屬支持特定政黨（以國民黨為主）的群眾，態度開始偏向中間，或有不確定的問題。

第三，就 2000 年 7 月的調查而言：相較於之前的調查，此一時期的結果大致符合了評論者有關政治兩極化發展的趨勢。結果可解讀為民衆對於國民黨失去政權，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一般態度變遷，此時期無政黨支持者（中間）比例下降，相對地，民衆對於特定政黨的支持有大幅度提升，而特定政黨此處應限定為民進黨與親民黨；前者為新的執政黨，後者為從失利的國民黨所分裂出來的新興政團。另外，統獨中間立場比例下降（偏向獨派價值的一端增加），而自我定位的中間立場也有下降情形（以更大幅度向「我是台灣人」定位的一端增加）。

第四，就 2003 年 7 月的調查而言，中間立場百分比有向上彈升的情形，不過此次調查和前一次調查間隔三年，不容簡化解釋。此一時期因為統獨立場更加鮮明的親民黨和台聯黨先後成立，並在立法院獲得發言位置，社會上所謂「泛藍」、「泛綠」的認同政治標籤，已經

成形；合計約9%的民衆可用政黨光譜自居，其中又以「泛藍」支持者為多數。之前跨國家認同的政黨可進行議題合作的空間，因為國家認同議題出現「王牌效應」而被壓縮，這種衝突延伸到民衆的態度，反映在這一次以及後續的調查中。

第五，就2004至2005年的調查而言，此一時期三個指標的中間立場比例在2003年出現高點之後，開始出現明顯下滑的情形：首先是無政黨支持者的比例，其次是有關中間自我定位，然後是統獨的中間立場，而2004、2005年間的調查，也都符合有關兩極化趨勢的假定。

進一步比較這三個中間指標，並從他們各自的特殊性角度來觀察，可以得到以下的發現：

第一，中間比例的高度不同：在測量期間，民衆的政黨支持，有兩次突破半數，屬於高點，反映當時各政黨利用衝突手段爭取民衆支持，不一定能成功，也可能造成與民意的距離。而統獨的中間立場，歷次維持在四成以上，且波動不大，兩端呈現拉距、持續對立的情形。關於自我表述的中間定位，則在三成五之下，是三者間最低的（肇因於向「台灣人」定位一端流動的偏峰分配）。

第二，擺盪波度不同：三者之間，以政黨支持這個面向的中間指標變化最大，擺盪幅度最大，代表群眾政黨支持度的兩極化在短時間內擺盪。相對最穩定的是統獨立場的中間指標，變化不大但有些微的下降，特別是在2000年、2003年、2005年三次調查時較明顯。其次，自我定位的波動也平緩，呈現「共識化」的情形，唯一的例外在2004年7月的調查時，民衆有向中間流進的情形，呼應當時總統大選後的紛爭的影響。

## （二）各次調查的個別資料的關聯性分析

我們可以根據歷次調查的個別資料，將其加總後進一步檢驗，也就是利用受訪者個別資料探索三個中間指標的關聯性分析。根據趨勢

圖的觀察，我們首先假定，三個中間立場的個別資料應呈現正向關聯，也就是選擇「自我定位」、「政黨支持」、「統獨偏好」的中間項的民衆，政治態度應該有一致性。但我們也知道將六次獨立樣本加總當成一個大的樣本來分析，橫跨十年間，有時間差的問題，母體本身也有改變，也可能有不可預期的偏差，因此這裡的關聯性分析，其詮釋應該僅僅作為一種探索，或用來與前述的趨勢觀察分析共同解釋。

從表 4 中可知三個「中間」指標間的簡單相關係數(Pearson  $R$ )，計算個別資料，三指標的中間項，相關係數皆為正。其中較高的為「統獨中間立場」與「自我中間定位」( $R = .138$ )；其次為「統獨中間立場」與「無政黨支持」( $R = .127$ )。而相關係數較低的為「自我中間定位」與「無政黨支持」( $R = .032$ )可以忽略。

上述初步分析大致符合預期，亦即：在態度上選擇「非兩端的、中間的」自我定位的民衆，同時會選擇「統獨中間」的立場的機率為正，兩變項呈現有正相關；此外，態度上選擇「統獨中間」立場的民衆，也相對容易出現「無政黨支持」的情形，兩者有正相關。

三者之間，自我定位為「中間」的民衆和「無特定政黨支持」的類屬關聯性比較弱，甚至可以疏忽。這代表選民不論是否有特定的政

表 4 三個中間指標的關聯性

	無特定政黨支持	中間自我定位	統獨中間務實立場
Pearson 相關	1		
無特定政黨支持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1,072		
Pearson 相關	.032**	1	
中間自我定位			
顯著性 (雙尾)	.001		
個數	10,737	11,192	
Pearson 相關	.127**	.138**	1
統獨中間務實立場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個數	10,931	11,013	11,348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黨支持，他們會選擇「中間定位」機會都差不多；意即各政黨對於民衆的「自我表述」的中間定位，是較不具影響力的。

### (三) 中間選項與政黨形勢變遷的關聯性

本文根據既有論述，在一開始時假定政黨分化與競爭的情形對於「中間選項」可能造成影響，也就是說激烈的政黨競爭更容易帶來兩極化，或者導致中間選項百分比下降。如同 Dafydd Fell、Shelley Rigger、黃秀端等對台灣政治的觀察，我們假定在調查時出現具有競爭力的新政黨，例如：親民黨、台聯黨，當他們沿著國家認同議題進行競爭，或將刺激政黨立場的極化發展，民衆的中間指標比例，自有可能因此下滑。同時，如台灣衆多的兩極化政治評論，咸以2000年政黨輪替為一重要時刻，爲了檢驗各時期的「中間」的變動，我們將六次調查結果分成 T1 與 T2 兩個時間變數，將資料分成兩組進行檢驗。

T1：包括「變遷調查」1995、1998、2000年三次的資料。在這期間我們進一步將樣本分成兩組，A組包括了1995與1998年，代表親民黨成立之前的調查結果，B組爲2000年7月的資料，代表總統大選後民進黨勝選，而宋楚瑜得票數超越國民黨且親民黨正式成立（2000年3月）之後的資料。從比較這兩分組的關聯性分析，可幫助瞭解2000年7月，當親民黨成立後，親民黨與國民黨之間所謂如同「內部」競爭，以及他們共同對民進黨的「外部」抗爭，對於「中間立場」的比例所可能發生的綜合效應。

T2：包括「變遷調查」2000、2003、2004、2005年四次的資料。在這期間，爲了測驗當台聯黨成立（2001年1月），出現了台聯黨與民進黨的「內部」競爭，也出現了「台聯黨與民進黨」共同面對其他黨派的所謂「藍綠」競爭，我們進一步將樣本分成兩組：C組（台聯黨成立前）包括了2000年的調查資料，將其對照於D組（台聯黨成立後），包括了2003、2004、2005年等三年的資料。我們假定沿著國家

認同進行多重、複雜的多黨競爭，將刺激民衆的國家認同政治的發展，那麼中間指標的高低變化，也會因此出現變動，特別是發生下降的情形。

親民黨由國民黨原主流派脫黨參選的宋楚瑜的「新台灣人服務團隊」，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後正式成立。表 5-1 至表 5-3 檢視親民黨成立前、後的比較（A 組與 B 組資料），探索各中間選項與兩端選項的百分比的變化趨勢。以下為初步觀察結果：(1)根據表 5-1，2000 年總統大選、親民黨成立之後的政黨政治生態，和「自我定位」有最大的關聯性( $R = .108$ )，如同前面所發現，民衆開始向兩端中的一端（我是台灣人）集中的趨勢，這造成中間的比例滑落。不過，這是偏向同質化的過程，而不是兩極化的過程。(2)表 5-2 顯示了不同方向的結果，親民黨的成立對於「統獨偏好」改變的相關性，關係極微小( $R = .007$ )，這或說明在它成立初期，尙未如日後明確的反對台獨，或採取統獨立場為主要旗幟。(3)表 5-3 則顯示親民黨出現以後，對於「無政黨支持」的中間選項的比例，造成滑落( $R = .072$ )，但關聯係數小。這也符合本文稍早所做的趨勢觀察，亦即親民黨的成立，提供民衆原來國民黨之外的選項，甚至也可能吸引原來屬於民進黨支持者，導致中間（無特定支持政黨）比例的滑落，但整體而言影響有限。

表 5-1 親民黨成立前後，自我定位之變化

	自我定位表述（台灣人／中國人）		
	中間定位 <sup>a</sup>	兩端定位 <sup>b</sup>	小計
A 親民黨成立前	1,754 (47.7)	1,925 (52.3)	3,679 (100.0)
B 親民黨成立後	684 (36.3)	1,199 (63.7)	1,883 (100.0)
總和	2,438 (43.8)	3,124 (56.2)	5,562 (100.0)
Pearson 卡方	$\chi^2(1) = 65.183, p = .000$		
Pearson R 相關	$R = .108^{**}$		

<sup>a</sup>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者兩者都不是。

<sup>b</sup>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或者是中國人。

表 5-2 親民黨成立前後，統獨偏好之變化

	統獨偏好立場		
	中間／務實 <sup>a</sup>	兩端立場 <sup>b</sup>	小計
A 親民黨成立前	2,686 (71.1)	1,094 (28.9)	3,780 (100.0)
B 親民黨成立後	1,345 (70.3)	567 (29.7)	1,912 (100.0)
總和	4,031 (70.8)	1,661 (29.2)	5,692 (100.0)
Pearson 卡方	$X^2(1) = .312, p = .576$		
Pearson R 相關	$R = .007$		

<sup>a</sup> 為不明確表達立場者，包含：認同或統或獨皆可、拒答、不知道在內。

<sup>b</sup> 為同意（贊成、支持）、不同意（不贊成、不支持）統一或獨立的合併項。

表 5-3 親民黨成立前後，政黨支持之變化

	政黨支持		
	無特定支持 <sup>a</sup>	有特定支持 <sup>b</sup>	小計
A 親民黨成立前	1,584 (43.0)	2,102 (57.0)	3,686 (100.0)
B 親民黨成立後	648 (35.5)	1,177 (64.5)	1,825 (100.0)
總和	2,232 (40.5)	3,279 (59.5)	5,511 (100.0)
Pearson 卡方	$X^2(1) = 28.239, p = .000$		
Pearson R 相關	$R = .072^{**}$		

<sup>a</sup> 如：「選人不選黨」、「沒有支持政黨」、「都不支持」、「都支持」、「看狀況」等回答。

<sup>b</sup> 有回答特定的支持政黨。

接著我們繼續探究表 6-1 至表 6-3 的發現，這三項表格分別呈現了台聯黨成立之前（且親民黨業已成立），與台聯黨成立之後的調查比較。也就是用 2000 年 7 月的調查結果（C 組資料），和 2003、2004、2005 年三次調查結果（D 組資料）進行比較。影響 C 組資料的政黨因素，如前一節的解釋，限於總統大選暨親民黨的成立之共同效果，而影響 D 組資料的政黨因素，則藍綠兩大陣營的對立，以及四個主要政黨的競爭：民進黨、台聯黨、國民黨與親民黨四黨，所以競爭也更為激烈。



表 6-1 台聯黨成立前後，自我定位之變化

	自我定位表述 (台灣人/中國人)		
	中間定位 <sup>a</sup>	兩端定位 <sup>b</sup>	小計
C 親民黨已成立但台聯黨未成立	684 (36.3)	1,199 (63.7)	1,883 (100.0)
D 台聯黨與親民黨皆成立	2,082 (37.0)	3,548 (63.0)	5,630 (100.0)
總和	2,766 (36.8)	4,747 (63.2)	7,513 (100.0)
Pearson 卡方	$\chi^2(1) = .261, p = .610$		
Pearson R 相關	$R = -.006$		

<sup>a</sup> 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者兩者都不是。

<sup>b</sup> 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或者是中國人。

表 6-2 台聯黨成立前後，統獨偏好之變化

	統獨偏好立場		
	中間/務實 <sup>a</sup>	兩端立場 <sup>b</sup>	小計
C 親民黨已成立但台聯黨未成立	1,345 (70.3)	567 (29.7)	1,912 (100.0)
D 台聯黨與親民黨皆成立	3,287 (58.1)	2,369 (41.9)	5,656 (100.0)
總和	4,632 (61.2)	2,936 (38.8)	7,568 (100.0)
Pearson 卡方	$\chi^2(1) = 90.012, p = .000$		
Pearson R 相關	$R = .109^{**}$		

<sup>a</sup> 為不明確表達立場者，包含：認同或統或獨皆可、拒答、不知道在內。

<sup>b</sup> 為同意 (贊成、支持)、不同意 (不贊成、不支持) 統一或獨立的合併項。

表 6-3 台聯黨成立前後，政黨支持之變化

	政黨支持		
	無特定支持 <sup>a</sup>	有特定支持 <sup>b</sup>	小計
C 親民黨已成立但台聯黨未成立	648 (35.5)	1,177 (64.5)	1,825 (100.0)
D 台聯黨與親民黨皆成立	2,802 (50.4)	2,759 (49.6)	5,561 (100.0)
總和	3,450 (46.7)	3,936 (53.3)	7,386 (100.0)
Pearson 卡方	$\chi^2(1) = 122.220, p = .000$		
Pearson R 相關	$R = -.129^{**}$		

<sup>a</sup> 如：「選人不選黨」、「沒有支持政黨」、「都不支持」、「都支持」、「看狀況」等回答。

<sup>b</sup> 有回答特定的支持政黨。

首先根據表 6-1，在親民黨之後成立的台聯黨，對於「自我定位」的「中間」位置的百分比變化，幾乎已經沒有影響( $R = -.006$ )。從上節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得知，中間定位者在 2000 年之後，既沒有明顯的增加但也沒減少；至於兩端的選項，「我是中國人」一端持續下跌，而「我是台灣人」一端則有上升，各項資料都指向「自我定位」有向「我是台灣人」一端同質化的過程，且從 2000 年 7 月之後的調查顯示，自我定位開始不受黨派競爭而改變，方向明確。

其次，表 6-2 顯示，政黨競爭形勢的激烈化（D 組資料）與「統獨偏好」百分比的改變有關聯性( $R = .109$ )。亦即，當台聯黨在 2001 年成立之後，各政黨得以提供民衆更明確的統獨選項，相互沿國家認同議題進行區隔，其對於「統獨中間」的百分比的作用就是造成其向下滑落的效應。至於在兩端方面，根據前述分析，以「統派」價值略下滑但維持穩定，而「獨派」價值的民衆的百分比，則呈現高低起伏的情形。

但是政黨競爭對於「無特定支持政黨」此一變項的作用，卻與上面的發現相反。表 6-3 的結果顯示，因為 D 組的中間選項，相較於 C 組的中間選項有明顯的上升，而在 D 組的資料中有特定政黨支持偏好者，反而出現明顯的下滑，其意涵應指：政黨分化且競爭激烈，各有立場的媒體與陰謀論的新聞事件越發激動，當被訪問到支持某一政黨時，民衆反而越向中間位置靠攏，造成持有特定政黨支持態度的比例下降。

#### (四) 根據個別資料分析的綜合討論

表 5 與表 6 的個別資料的統計相關（列聯表）分析，進行關於這十年間觀察的進一步引伸，我們得到以下解釋：

在關於自我定位的測量方面，政黨政治的動態作用，推動了「同質化」現象，而不是「兩極化」的情形。且從 2000 年以後的調查開

始，方向就已經確定，政黨政治幾乎沒有左右這方向持續發展的作用。

其次關於統獨價值偏好方面，這個普遍被認為是台灣政黨政治的主要分歧點，政黨政治對於民衆的態度分配的影響，卻相當複雜。事實上，直到 2000 年的調查時間為止，民衆的統獨偏好分配雖有兩極化跡象，但並不明顯也不固定，即使是在親民黨成立之後，關聯性也不明顯。但隨之在台聯黨成立之後，政黨的統獨光譜則更清楚，這讓我們在 2003 年之後的調查中，確實發現了民衆意見分布的極化現象，若增加考慮兩岸關係從 2004 年之後的變化，則相對更符合兩極化的現象。

第三，在對於特定政黨表示支持態度上，民衆最容易受到政黨解組、政黨激烈競爭的影響，但政黨競爭和政黨支持的擺盪並非如線性般發展。根據上述分析，親民黨成立時的確一度提供民衆比較清楚的「替代」政黨的選擇，但是當台聯黨也加入競爭行列以後，情形更加混沌，一方面政黨的統獨價值抬頭，促成民衆的統獨偏好出現兩極化的現象，另一方面，反而也促成轉向「都不支持特定政黨」的「中間」立場。這其中或有以下可能：(1)民衆厭惡政黨的反覆與惡鬥，選擇和各特定政黨維持一定的距離；(2)民衆可能被混亂的負面政黨資訊所混淆，不知應該支持何方；(3)民衆面對政黨政治競爭帶來的衝突，感覺疏離或無意義。

## 六、討論與總結

本文的出發點在思考：政黨政治的兩極化對民衆的政治價值的兩極化，有何影響或有無關聯？此項提問的重要性，在於我們認為代議政治中的政治社群（政府與政黨）和社會中的民衆，包括我們對於公民社會的想像，必須要分開處理。代議政治不能取代公民的主動參與和意見，前者不能等同後者，後者不能被忽視且化約為前者，這是重

要的規範性與現實關懷。特別是當台灣作為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人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想像仍受到很多威權時代遺緒作用的影響，此一問題的重要性，關於民衆的態度，關於兩者的適當關係，關於「公共領域」的問題實不應被忽視。而我們如何從經驗材料中去找到支持，或發現上述兩者之間的主、從關係，就顯得格外重要。

我們發現美國的一些研究頗具參考意義，所以特別指出（一）政黨菁英與民衆之間的極化，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過程，我們須要關注政黨／政黨菁英們對於特定議題的主張，以及民衆的基本態度，對兩者都進行長期的測量才能瞭解兩者間的關聯性，（二）政黨對選民造成的「選邊站」影響，或者民衆開始選擇支持政黨的政策主張，並不等於群衆基本態度的兩極化，以及（三）政黨兩極化對於社會公平正義可能造成的負面作用。過去台灣的相關研究對於政黨的「兩極化」雖有頗多著墨，但對於選民的「選邊站」議題，以及民衆的基本價值的極化研究，卻相當少。同時，學者們對於政黨為爭取選票而進行的極端操作，促使選民「站邊」還有不同看法；一方面認為這是政黨為提供選民充分投票線索的功能，一方面認為這對於社會的共和精神與概括信賴，或有負面影響。

在此脈絡下構思，本文使用六次的「變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在第一部分，我們觀察三個指標的趨勢變化並找出「兩極化」的跡象。這三個指標分別為「自我定位表述」、「統獨偏好」、「政黨支持」；我們首先觀察「中間」的百分比變動，其次觀察兩端的百分比變化，進而對於民衆的兩極化進行解析。

由於我們的研究課題橫跨十年，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十年間影響民衆態度的可能因素，在本文中特別提出兩岸關係以及國內政黨政治的重大發展。而在解釋趨勢變遷的意義後，我們又進行個別資料的統計分析，採用了列聯表的相關係數檢驗的方式，探究在十年間，新政黨對原有政黨的挑戰，特別是他們透過國家認同議題所進行的競爭，是

否可能引發民衆意見兩極化的現象。

下面是我們針對這十年來的調查資料，所發現的重點整理以及引伸。

### (一) 從三個指標來看

(1) 三個指標中，只有「統獨偏好」的價值態度出現較明確的兩極化線索，而且民衆的兩極化現象並不是在民進黨執政後的 2000 年的調查中被立即確認，而是要到 2003、2004 和 2005 年的變動中，才能較察覺。此外，我們必須考慮此一項目的中間立場百分比，一直都在四成以上，甚至更高，是三者中最接近想像的「鐘型」分配。是以，上述兩極化現象應發生於部分的積極民衆，或者易受媒體報導左右的民衆之間，不能推論到多數的民衆。

(2) 和認同有關的「自我定位」指標，民衆態度的趨勢並不符合「兩極化」現象，反而支持「同質化」現象，且應是朝向「我是台灣人」定位發展的偏峰分配；而這個發展的趨勢，在 2000 年 7 月的調查時就已經出現，且在之後的數次調查中都沒有大的改變。

(3) 影響「政黨支持」指標變化的因素衆多，早期仍是和國民黨支持者從國民黨流出有關，而後期的原因則和激烈的政黨競爭有關。但整體而言，政黨支持的極化趨勢並不明確，屬於「擺盪」的情形。如果有所謂「兩極化」的現象，只出現在 1998-2000 年（政黨輪替開始時期）的觀察點，以及 2004-2005 年（總統大選後，國民黨、親民黨聯手重振，掌握立法院多數，並展開國共和談時期）的觀察點（但此一時期的中間指標，仍然達到四成[2005 年]），顯示多數民衆的政黨支持態度相當流動，但從 2003 年之後的調查也顯示，少數民衆出現了藍、綠分明，但並沒有支持的特定政黨。

## (二) 從時間點來看

在 2000 年 7 月、2004 年 7 月這兩次的調查中，民衆態度有明顯的波動。因爲這兩年的調查都是在當年的總統大選之後進行，反映了選舉所帶來的效應。在 2000 年 7 月的調查，各中間指標都出現下滑的情形，但在 2004 年 7 月的情形正好相反，大選期間的紛擾以及選後的政治衝突，反而讓所有的中間指標都出現上升的情形，反映了民衆態度與激烈抗爭中對立的政黨立場的疏離與分歧。換言之，政黨政治衝突的延伸，並不一定導致「中間立場」的消失，反而可能導致上升。而中間立場究竟是上升還是下降，受到很多政治生態與情境因素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論。

## (三) 政黨分化、重組、競爭對於民意兩極化的作用

本文將六次調查的個體資料加總，進行分期對照，探究三項「中間」指標的波動，是否和不同時期的政黨競爭態勢有關，總結如下：

(1) 本文發現政黨競爭和統獨價值偏好的兩極化有關聯性，但我們的發現和政治學者與政治評論家看法略有不同。關鍵點在於民衆偏好的極化現象，並未在 2000 年的調查中可以確認，民進黨執政與親民黨的成立對民衆的「統獨價值」變化的影響其實有限。真正影響民衆的是在立法院的「藍、綠」成形以及台聯黨加入政黨纏鬥之後，根據本研究的資料則是在 2003 年之後。但如同我們在本文一開始所述，這樣的兩極化並非某一單一政黨的問題，而是政黨之間持續「共舞」、長時間「拉鋸」的結果。

(2) 政黨競爭情勢的變化，包括 2000 年的政黨輪替，都和「自我定位」的發展的波動沒有關係。而日後的政黨分化、選民重組，呈現在 2003 年 7 月及其之後的調查結果，也無法發生其對「自我定位」的作用。



(3) 政黨競爭情勢的變化，對於「政黨支持」的變動影響相當大，但並不是如同線性發展的關係。親民黨成立初期，民衆呈現比較清楚的政黨支持態度，但隨日後台聯黨出現，統獨價值偏好兩極化，黨爭激烈，加以大選後的紛擾，民衆反而「向中看齊」，和政黨保持一定距離。

回到本文最初的提問：政黨政治的兩極化，透過衝突的延伸，是否影響到民衆態度的兩極化？本文以設定的中間立場指標進行台灣民衆態度初探，我們的答案如下：「會，但過程複雜且有限」。原因如下：(1) 須看研究者所設定的指標為何；例如，本文設定的指標之一、自我表述的定位，不但沒有兩極化，反而同質化；所以，如果研究者選擇不同的指標，結果可能不一定；(2) 當政黨政治開始被國家認同政治所取代，「藍」、「綠」凝聚為政黨衝突的王牌象徵時，較多民衆反而採取了與各代表政黨疏離的「中間」態度；(3) 民衆態度的極化，不是對於政黨衝突的立即反應，而是一個受影響、漸進、且不一定採取直線方向進行的過程，民衆的態度擺盪，也不排除其逆轉可能；(4) 相對於嚴重對立的國家認同立場，民衆反而保持了在三個指標中最高的「中間」比例，這和政黨所欲強調的認同區隔正好違背。

政黨政治衝突以及民衆意見的趨向，這兩者間的共變情形，反映政黨政治可能透過衝突延伸的方式影響到部分民衆的態度，但是分析結果卻顯現不一致的情形，這顯示政黨可以支配民衆價值的程度仍有限。民衆的中間立場的流動、或不動，以及其所潛藏的反思能動性，間接佐證了公民社會不會被政治社會所吞噬的可能，也等於用經驗資料的證據，質疑了以政黨代議政治統攝眾多公共議題討論、政黨為選票而強推國家認同議題，使選民選邊站進而壓縮公民討論空間的看法。

最後，由於本文僅只選取了三個特定的議題為指標，並不能涵蓋所有的公民價值議題，只能定位於對於民衆的價值兩極化的初探。此外，本研究涵蓋的時間架構，侷限於台灣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階段，特



別是總統選舉紛爭與國家認同衝突較突出的 1995 至 2005 年間，這樣的時間區段選擇，有兩個問題須要保守應對：(1)十年可能太短，無法推知更長期的趨勢發展的解釋；(2)2005 年之後的變化無法考慮，例如兩岸關係逐漸加溫的影響，2008 年的第二次政黨輪替，加以立委選舉方式改變，政黨重組後又回歸到以兩大黨為對抗的情形等等，這些都非此次研究中所能包涵，是以不論是民衆的價值兩極化，抑或政黨的兩極化，其對於民主品質與治理的影響，仍有很大的等候探討的空間。

附錄 1 台灣時事大事紀：1995 年至 2005 年

時間	類別	說明
1995/06/07	兩岸關係	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講，宣示台灣主權獨立，被中共視為「李登輝分裂之旅」
1995/07/21	兩岸關係	(1995/7/21-1996/3/25)中共不滿李登輝訪美並意圖影響台灣首次民選總統結果，舉行多次軍事演習
1995/12/02	國內政治	第 3 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國民黨 46.1%、民進黨 33.2%、新黨 13.0%
1996/03/23	國內政治	第 9 任總統選舉得票率：李登輝、連戰 54.0%【當選】，彭明敏、謝長廷 21.1%，林洋港、郝伯村 14.9%，陳履安、王清峰 9.9%
1997/07/01	兩岸關係	香港回歸，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共承諾執行一國兩制，主權移交後 50 年內不會實行中共的社會主義
1998/12	國內政治	為了解決中央與地方行政區的過度重疊而通過將省虛級化（精省）的方案，台灣省虛級化
1998/12/05	國內政治	第 2 屆直轄市市長選舉得票率：台北市／馬英九 51.1%【當選】、陳水扁 41.9%、王建煊 3.0%；高雄市／謝長廷 48.7%【當選】、吳敦義 48.1% 第 4 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國民黨 46.4%、民進黨 29.6%、新黨 7.1%
1999/07/09	兩岸關係	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指稱台灣與大陸關係為「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中央政府與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1999/09/21	社會經濟	九二一台灣大地震或稱集集大地震，震度 7.3 級，造成 2,415 人死亡，11,305 人受傷，為二十世紀末期台灣傷亡損失最大的天災
2000/03/18	國內政治	第 10 任總統選舉得票率：陳水扁、呂秀蓮 39.3%【當選】，連戰、蕭萬長 23.1%，宋楚瑜、張昭雄 36.8%
2000/05/20	兩岸關係	陳水扁於就職典禮發表四不一沒有：「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統獨公投、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2001/01/01	社會經濟	台灣海峽兩岸實施小型三通模式，於廈門、金門、馬祖實現兩岸小規模的通商、通航和通郵
2001/12/01	國內政治	第 5 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國民黨 31.3%、民進黨 36.6%、親民黨 20.3%、台聯 8.5%、新黨 2.9%
2002/01/01	社會經濟	由於政治因素，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台灣才獲准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義正式加入

時間	類別	說明
2002/05/11	國內政治	「台灣正名運動聯盟」舉行台灣正名大遊行，由李登輝出任總召集人，推動台灣正名運動，為台灣本土化運動之一
2002/08/02	兩岸關係	陳水扁在世界台灣同鄉會表示「要走我們台灣自己的路」、「台灣不是別人的一部分」、「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
2002/12/07	國內政治	第3屆直轄市市長選舉得票率：台北市／馬英九 64.1%【當選】、李應元 35.9%；高雄市／謝長廷 50.0%【當選】、黃俊英 46.8%
2003/03	社會經濟	(2003/03/12) WHO 發布 SARS 全球警報 (2003/03/14)台灣出現首例，SARS 警報持續至夏季
2003/03/14	兩岸關係	胡錦濤於第10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2003/07/01	兩岸關係	由於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程序，加上SARS導致香港不景氣，引起香港市民不滿而有「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遊行
2003/11/27	國內政治	台灣通過公民投票法保障中華民國國民舉行公民投票的權利，於2004年1月2日起正式實施
2004/02~ 2004/11	國內政治	(2004/02/28) 228 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或稱 228 手護台灣）：由民進黨、台聯及其他相關團體組織，活動訴求是反對中國大陸部署針對台灣的飛彈設施以及支持反飛彈公投 (2004/03/19) 319 槍擊事件：3月19日（總統選舉前一天）時爭取總統連任的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副總統呂秀蓮於台南掃街拜票時發生槍擊事件 (2004/03/20) 第11任總統選舉得票率：陳水扁、呂秀蓮 50.1%【當選】，連戰、宋楚瑜 49.9% (2004/11/4) 台灣高等法院宣佈「陳水扁當選無效之訴駁回」
2004/12/11	國內政治	第6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國民黨 32.8%、民進黨 35.7%、親民黨 13.9%、台聯 7.8%
2005/03/14	兩岸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胡錦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反國家分裂法」，指出「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將台灣問題定義為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
2005/03/26	國內政治	因應「反國家分裂法」，民進黨、台聯及其他民間社團結合而成的「民主和平護台灣大聯盟」發起 326 民主和平護台灣大遊行
2005/04	兩岸關係	(2005/4/26-2005/5/3) 國民黨和平之旅，連戰率團訪問大陸 (2005/5/5-2005/5/13) 親民黨搭橋之旅，宋楚瑜率團訪問大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附錄 2 「變遷調查」樣本年齡層

	1995 年 三期一次 I	1998 年 三期四次 II	2000 年 四期一次 I	2003 年 四期四次 II	2004 年 四期五次 I	2005 年 五期一次 I
樣本年齡層	20-75 歲	19-75 歲	20 歲以上	18 歲以上	18 歲以上	18 歲以上
成功數本數	2,093	1,798	1,960	2,016	1,781	2,146
未滿 20 歲 樣本數	0	47	0	45	86	48
年滿 20 歲 樣本數	2,093	1,751	1,960	1,971	1,695	2,098

## 附錄 3 三項指標的「變遷調查」原始題目

指標一：台灣人與中國人公共論述的自我定位表述題目

1995 年 三期一次問卷 I	65. 下面有好幾種對自己的稱呼，請問您覺得那一項對您最適合？ <input type="checkbox"/> (1) 台灣人 <input type="checkbox"/> (2) 中國人 <input type="checkbox"/> (3) 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input type="checkbox"/> (4) 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input type="checkbox"/> (5) 其他（請說明）
1998 年 三期四次問卷 II	59. 下面有好幾種對自己的稱呼，哪一項對您最適合？ <input type="checkbox"/> (1) 台灣人 <input type="checkbox"/> (2) 中國人 <input type="checkbox"/> (3) 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input type="checkbox"/> (4) 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input type="checkbox"/> (5) 其他（請說明）
2000 年 四期一次問卷 I	70. 題目選項同「三期一次」問卷 I
2003 年 四期四次問卷 II	40a. 目前社會上有人會說自己是台灣人，有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input type="checkbox"/> (1) 台灣人 <input type="checkbox"/> (2) 中國人 <input type="checkbox"/> (3) 兩者都是 <input type="checkbox"/> (4) 兩者都不是
2004 年 四期五次問卷 I	94. 在我們的社會上，有人會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input type="checkbox"/> (1) 台灣人 <input type="checkbox"/> (2) 中國人 <input type="checkbox"/> (3) 都是
2005 年 五期一次問卷 I	89. 題目選項同「三期一次」問卷 I

## 指標二：統獨偏好之價值態度題目

1995 年 三期一次問卷 I	<p>67. 有人主張「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的關係，則台灣應該成爲一個新國家」。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主張？  <input type="checkbox"/> (1) 很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2) 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4) 很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5) 無意見 <input type="checkbox"/> (8) 不了解題意 <input type="checkbox"/> (9) 拒答</p> <p>68. 有人主張「如果大陸和台灣兩地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兩岸應該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主張？  <input type="checkbox"/> (1) 很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2) 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4) 很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5) 無意見 <input type="checkbox"/> (8) 不了解題意 <input type="checkbox"/> (9) 拒答</p>
1998 年 三期四次問卷 II	<p>69. 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大陸維持和平的關係，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獨立」這種主張？  <input type="checkbox"/> (1) 非常贊成 <input type="checkbox"/> (2) 贊成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贊成  <input type="checkbox"/> (4) 非常不贊成 <input type="checkbox"/> (5) 無意見</p> <p>70. 如果中國和台灣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接近時，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與大陸統一」這種主張？  <input type="checkbox"/> (1) 非常贊成 <input type="checkbox"/> (2) 贊成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贊成  <input type="checkbox"/> (4) 非常不贊成 <input type="checkbox"/> (5) 無意見</p>
2000 年 四期一次問卷 I	73、74 題目選項同「三期一次」問卷 I
2003 年 四期四次問卷 II	<p>45a. 有人認爲，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就應該宣布獨立。請問您同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1) 非常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2) 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4) 非常不同意</p> <p>46a. 有人認爲，如果大陸在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發展跟台灣差不多，兩岸就應該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1) 非常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2) 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4) 非常不同意</p>
2004 年 四期五次問卷 I	<p>96、97 題目同「三期一次」          選項爲：  <input type="checkbox"/> (1) 很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2) 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3) 不同意 <input type="checkbox"/> (4) 很不同意</p>
2005 年 五期一次問卷 I	91、92 題目選項同「三期一次」問卷 I

## 指標三：政黨支持之題目

1995 年 三期一次問卷 I	72. 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這三個政黨中，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 <input type="checkbox"/> (1) 國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2) 民進黨 <input type="checkbox"/> (3) 新黨 <input type="checkbox"/> (4) 都支持 <input type="checkbox"/> (5) 都不支持 <input type="checkbox"/> (7) 不知道 <input type="checkbox"/> (9) 拒答
1998 年 三期四次問卷 II	81. 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人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有人是民進黨的支持者，有些人是新黨的支持者。請問您是那一個政黨的支持者？ <input type="checkbox"/> (1) 國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2) 民進黨 <input type="checkbox"/> (3) 新黨 <input type="checkbox"/> (4) 建國黨 <input type="checkbox"/> (5) 其他（請說明） <input type="checkbox"/> (7) 都不是
2000 年 四期一次問卷 I	84. 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這四個政黨中，您認為您比較支持那一個政黨？ <input type="checkbox"/> (1) 國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2) 民進黨 <input type="checkbox"/> (3) 新黨 <input type="checkbox"/> (4) 親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5) 都支持 <input type="checkbox"/> (6) 都不支持 <input type="checkbox"/> (7) 不知道 <input type="checkbox"/> (9) 拒答
2003 年 四期四次問卷 II	73b. 國內的政黨都有它們的支持者，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 <input type="checkbox"/> (1) 國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2) 民進黨 <input type="checkbox"/> (3) 親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4) 台聯 <input type="checkbox"/> (5) 新黨 <input type="checkbox"/> (6) 建國黨 <input type="checkbox"/> (7) 其他（請說明）
2004 年 四期五次問卷 I	98.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建國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請問您是否偏向哪一個政黨？ <input type="checkbox"/> (1) 有（跳答 b） <input type="checkbox"/> (2) 沒有（續答 a） 98a. 那相對來說，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黨？ <input type="checkbox"/> (1) 有（續答 b） <input type="checkbox"/> (2) 沒有 98b. 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input type="checkbox"/> (1) 國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2) 民進黨 <input type="checkbox"/> (3) 新黨 <input type="checkbox"/> (4) 親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5) 建國黨 <input type="checkbox"/> (6) 台聯 <input type="checkbox"/> (7) 無黨籍 <input type="checkbox"/> (8) 其他
2005 年 五期一次問卷 I	93. 在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聯這四個政黨中，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呢？ <input type="checkbox"/> (1) 國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2) 民進黨 <input type="checkbox"/> (3) 親民黨 <input type="checkbox"/> (4) 台聯 <input type="checkbox"/> (5) 都支持 <input type="checkbox"/> (6) 都不支持 <input type="checkbox"/> (7) 不知道 <input type="checkbox"/> (8) 拒答

##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總統府(2000)總統針對國內政局的發展發表談話。11月5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8241>，  
引用日期：2012年9月19日。
- 天下雜誌編輯部(2003)2004年國情調查：人民壓力大。天下雜誌 289:  
148-156。
- 王湘廷(2009)台灣民衆兩極化政治態度之觀察：以1992至2008年爲  
例。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鼎銘(2005)「新中間路線」在2000年總統選舉的意義與作用：中位  
選民定理的應用分析。台灣政治學刊 9(1): 39-81。
- 朱雲漢(2010)變形民主耗損台灣治理品質。中國時報。1月8日。[http://  
www.igotmail.com.tw/home/27040](http://www.igotmail.com.tw/home/27040)，引用日期：2012年9月19  
日。
- 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4: 33-61。
- 吳玉山(1999)大陸政策，向中看齊。聯合報，第15版。11月5日。  
——(2000)台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選票極大化模式與  
戰略三角途徑。遠景季刊 1(3): 1-33。
- 吳齊殷(1997)受訪者之訪答效應：施測方法、問卷型式與問題性質。調  
查研究 4: 5-38。
- 李雪莉(2005)2005年國情調查：人民看不到未來。天下雜誌 314:  
72-80。  
——(2006)2006年國情調查：多些經濟，少些政治惡鬥。天下雜誌 338:  
124-130。  
——(2008a)2008年國情調查：民生優先，政治閃邊。天下雜誌 388:



48-58。

——(2008b)2009年國情調查：迷霧中，人民期待清楚的方向。天下雜誌 413: 38-46。

李雪莉、汪文豪(2007)2007年國情調查：社會對立減少，經濟卻是人民的痛。天下雜誌 364: 66-73。

林倖妃(2009)2010年國情調查：貧富差距、依賴大陸，國人最焦慮。天下雜誌 437: 56-63。

南方朔(2012)怪哉，所謂的「藍綠惡鬥」！新新聞 1321: 22-23。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20627171011H0F

唐飛(2011)台北和平之春：閣揆唐飛 140 天全紀錄。台北：天下文化。

曹長青(2006)倒扁運動和中國文革的四大相似。11月16日。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477，引用日期：2012年9月21日。

盛杏媛、黃士豪(2006)台灣民衆為什麼討厭立法院？台灣民主季刊 3(3): 85-128。

游常山(2002)2002年國情調查：雖不滿意，尚有期待。天下雜誌 248: 72-85。

——(2003)2003年國情調查：台灣人為什麼對未來悲觀？天下雜誌 266: 78-88。

游清鑫(2004)2004年台灣總統選舉——政治信任的缺乏與未鞏固的民主。台灣民主季刊 1(2): 193-200。

黃秀端(2003)少數政府在國會的困境。台灣政治學刊 7(2): 3-49。

——(2004a)政黨輪替前後的立法院內投票結盟。選舉研究 11(1): 1-32。

——(2004b)2002年至2004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黃秀端、何嵩婷(2007)黨團協商與國會立法：第五屆立法院的分析。政

- 治科學論叢 34: 1-44。
- 黃秀端、陳鴻鈞(2006)國會中政黨席次大小對互動之影響——第三屆到第五屆的立法院記名表決探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8(3): 385-415。
- 黃曬莉(2007)M型政黨 vs. 鐘型意識——台灣國族認同之意識型態及其心理基礎。中華心理學刊 49(4): 451-470。
- 楊泰順(2001)國會衝突對立將更直接更全面。中國時報，A15 時論廣場。12月2日。
- 楊婉瑩、陳采葳(2004)國會改革風潮下黨團協商制度之轉變與評估。東吳政治學報 19: 111-150。
- 蔡佳泓、徐永明、黃琇庭(2007)兩極化政治：解釋台灣2004總統大選。選舉研究 14(1): 1-31。
- 聯合報(2000)砸飯碗 燒芻像 反扁遊行一度緊張 國民黨主導 凸顯反扁護憲兩訴求 總統府前演出行動劇。3版焦點。12月26日。
- 聯合報(2006)李登輝：台灣發生民主內戰，我保持中立。A5版。9月19日。
- Abramowitz, Alan I, and Kyle L. Saunders(2005) Why C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The Reality of a Polarized America. *The Forum* 3(2): 1-22.
- (2008) Is Polarization a My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2): 542-555.
- Abramowitz, Alan I., and Walter J. Stone (2006) The Bush Effect: Polarization, Turnout, and Activism i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6(2): 141-154.
- Baldassarri, Delia, and Andrew Gelman (2008) Partisans without Constrain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rends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2): 408-446.
- Chu, Yun-han, and L. Diamond (2000) Taiwan's 1998 Elections: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sian Survey* 39(5):

808-822.

- Cohen, Jean L., and Andrew Arato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DiMaggio, Paul, John Evans, and Bethany Bryson (1996) Have American'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3): 690-755.
- Edwards, Michael (2009)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Evans, John H. (2003) Have Americans'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An Updat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4(1): 71-90.
- Fell, Dafydd (2004) Measurement of Party Position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Taiwan. *Issues and Studies* 40(3&4): 101-136.
- (2007) Partisan Issue Competi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s Taiwan's Democracy Dead?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32: 23-39.
- Fiorina, Morris P., and Samuel J. Abrams (2008)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Th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563-588.
- Fiorina, Morris, Samuel J. Abrams, and Jeremy C. Pope (2006) *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 Fiorina, Morris P., and Matthew S. Levendusky (2006) Disconnected: The Political Class versus the People. Pp. 49-71 in *Red and Blue 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 edited by Pietro S. Nivola and David W. Brady.
- Hetherington, Marc J. (2009) Review Article: Putting Polarization in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2): 413-448.
- Hunter, James Davison (1991)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Levendusky, Matthew S. (2010) Clearer Cues, More Consistent Voters: A Benefit of Elite Polar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32(1): 111-131.

- McCarty, Nolan,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2006)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oole, K. T., and H. Rosenthal (1984)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46(4): 1061-1079.
- (1997) *Congress: A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7) *Ideology and Congres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Rigger, Shelley (2003) Taiwan in 2002: Another Year of Political Droughts and Typhoons. *Asian Survey* 43(1): 41-48.
- Wu, Yu-shan (2000) Theorizing o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ine Contend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25): 407-428.

# 第 7 章

## 政治容忍的穩定與變遷

黃秀端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 摘要

隨著民主化的發展，台灣民眾的政治容忍是否因此而提升？不同民眾對目標團體的選擇是否有差異？是否因時代有所轉變？此外，何種因素影響民眾政治容忍度？本文對政治容忍的測量採取 Sullivan 等人的內容控制測量，先詢問民眾危害社會最大的是哪一種主張的人，再問是否願意給他們各種權利。比較 1992 年與 1998 年之資料，發現民眾政治不容忍並未因逐漸民主化而降低，主張共產主義的人在兩次調查中都是最高的目標團體，也是民眾最不能容忍的對象。但是，民眾對主張台獨者與統一者之看法有轉變。再者，性別、年齡、省籍、教育、政黨喜歡度、統獨立場與目標團體的選擇呈現顯著的關係。教育、民主價值、政黨喜歡度、目標團體在 1992 年與 1998 年皆會影響民眾之政治容忍；性別、年齡、參與團體則無顯著相關。一般認為社會經常有不同意見的討論，民眾的態度將會逐漸容忍。借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之資料，發現近年來儘管政黨對立，但是在開放社會下，大家對敵對團體的容忍逐漸提升。

關鍵詞：政治容忍、政治權利、目標團體、內容控制測量

##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Political Tolerance

Shiow-duan Haw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As Taiwan became more democratized, did the political tolerances of the public increase? Di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have different target groups? Did people change their views of target groups? In addition, what factors influenced the attitude of political tolerance? Were those factors stable enough? This paper used Sullivan's content-controlled measure to test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tolerance. We provided respondents with a list of potentially unpopular groups, and asked them to choose the most dangerous group in this society. Then respondents were further asked whether they agreed or disagreed with giving that group a list of political rights. Comparing the data from 1992 and 1998, we found that the rate of political tolerance did not increase as Taiwan became more democratic. In both years, communists were the least liked group. But, the public had changed its view toward the group of independent promoters and unification advocates.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chose different target groups. With regard to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ttitude of political tolerance, this paper found that education, democratic values, party preference, position toward 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and target group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political tolerance, but not sex, age, or group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used 2003 and 2004 TEDs data; we found that in more open societies, the public was more willing to give opposition groups political rights.

*Keywords: political tolerance, political rights, target group, content-controlled measure*



## 一、前言

多數統治一向為民主政治所強調之原則，但是在此原則之下，更強調尊重少數，以免淪為眾暴寡、強凌弱之情況。民主與其他政體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允許反對政府及領導者之言論存在。民主政體允許人民有權參與政府，更允許人民有權表達任何意見及組織或參與各種政治團體的自由，因此各種反對政府之言論或團體便可能存在。當反對被允許甚至被鼓勵時，我們便可能面臨什麼樣的反對形式是可以容忍的，以及此種容忍是否可能無限制地擴張等問題。Sullivan 等人(1979: 784)將容忍定義為「願意忍耐自己所拒絕或反對的」。在政治上，容忍隱含願意給予自己所反對的人或團體表達觀點和興趣的權利。當沒有任何我們反對或不喜歡的人存在，就沒有所謂政治容忍或不容忍的問題。換言之，當有人強烈反對某一種團體或他們的主張，並且拒絕給予該團體參與政治過程的權利，才能說有所謂的不容忍。

我國憲法保障所有公民有言論、講學、集會遊行及參與各項公職之權利，但是碰到異議分子或我們討厭的對象時，我們是不是仍願意給予他們基本的公民權利呢？近年來在台灣社會，統一與獨立的爭論不僅出現於菁英的對立，也出現在藍、綠雙方之支持民衆。因此政治容忍在台灣絕對不是一件小事，缺乏容忍的態度將可能導致不容忍的行為，進而妨害台灣形成「忠誠的反對黨」的概念，此概念對民主的穩定相當重要(Wang and Chang 2006: 378)。

本文想要瞭解隨著民主化的發展，台灣的民衆是否會更容忍？不同特質的民衆對目標團體的選擇是否有所差異？目標團體的選擇是否因不同時期的環境與政治氣候有所轉變？除此之外，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民衆政治容忍的程度？此種影響因素是否穩定？

## 二、政治容忍的測量

政治學界對於政治容忍的測量最普遍的有兩種：最經典的測量是由 Stouffer (1955) 在 1954 年對美國民衆與社區領袖所調查的方式；另一種則是 Sullivan 等人(1979, 1982)的內容控制測量(content-controlled measures)。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

Stouffer (1955)的測量方式行之於學術界已有五十年之久。他首先找出被認為是社會上最不受歡迎的團體，接著詢問受訪者對這些團體的容忍度。測量的項目包含是否允許這些人在公開場合演講、在學校教書、舉行示威遊行、以及他們所寫的書是否應該自圖書館中的書架撤出等一連串的問題。然而受到當時 McCarthy 時期影響，Stouffer 所列出的不受歡迎團體，如：共產黨員(communists)，社會主義者(socialists)和無神論者(atheists)，在意識形態上皆屬於左派團體。此種測量被批評為無法真正測量政治容忍之概念，而且無法得知對於左派團體不容忍的人，是否也同樣地對其他異議團體不容忍(Sullivan et al. 1979, 1982)。換言之，若是我們將團體名稱由左派團體換為相對之右派團體如三 K 黨(Ku Klux Klan)或是美國納粹黨(American Nazi Party)，受訪者是否會有同樣的反應呢？假如某甲對共產黨有敵意，而某乙對三 K 黨有敵意，但卻可以接受共產黨，在此種情況下，Stouffer 對於政治容忍之測量僅指涉共產黨時，得到的結果可能是甲比乙不容忍。Stouffer 最大的問題是把對於共產黨及相關左派團體之容忍，視為對於整個社會之容忍(Sullivan et al. 1982)。

McClosky 與 Brill (1983)對於幾項自由權的研究確實發現意識形態與容忍之關係。同時，如 Sullivan 等人(1979, 1982)所言，保守派對於他們感到特別敏感的團體難以容忍，而自由派對於他們喜歡的團體或意見與他們接近的較為容忍。

儘管批評不斷，Stouffer之測量方式歷年來一直為美國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所採用。美國綜合社會調查對於政治容忍一直從事經常性之測量，不過為了平衡對左派團體容忍之測量，後來的調查不再只是左派團體，也加入了右派團體。爾後不少學者對於政治容忍之分析，均採取美國綜合社會調查之資料(McCutcheon 1985; Bobo and Licari 1989; Sniderman et al. 1989; Davis 1992; Wilson 1994)。

加入右派團體之名單並不能解決政治容忍是否被正確測量的問題。前面提到，根據定義，政治容忍是指「願意接受自己所討厭團體擁有自由表達意見及行使公民權利之自由」。就政治之意義而言，它暗示了願意容忍自己所拒絕的對象。然而 Stouffer 以及美國綜合社會調查的問法並無法得知受訪者對於這些團體是否有敵視態度，因此，充其量只是在測試一般民衆是否贊成或給予這些團體自由權利而已，而不是對於政治容忍之測量。

為使政治容忍被正確的測量，Sullivan 等人(1979, 1982)先讓受訪者表達自己最不喜歡的目標團體(target group)，然後再進一步詢問他們對於不喜歡團體之容忍態度。每一位受訪者之目標團體可能都不太一樣，但是都必須回答六道題目所構成之政治容忍量表，量表題目包括：是否嚴禁他們成為美國總統？是否允許他們在公立學校教書？是否應宣布他們為非法？是否允許他們在本市演講？是否允許政府監聽其電話？是否允許他們在本市舉辦示威遊行？

此種方式之優點在於受訪者對目標團體的評估等於是被視為常數加以控制，亦即強調透過允許受訪者選擇功能上相等之團體來控制內容，因此，Sullivan 等人(1981)稱之為內容控制的測量(content-controlled measure)。

Sniderman 等人(1989)則不同意 Sullivan 等人之觀點，視「不喜歡為容忍的必要條件」。他們認為此種假設是對容忍之誤解。Bobo 與 Licari (1989)則認為 Stouffer 和 Sullivan 兩種測量的策略，事實上是在

測試不同的東西。

在評估 Stouffer 和 Sullivan 兩位學者之測量之後，Gibson (1992)認為就經驗性而言，兩者俱佳；然而就理論而言，Sullivan 等人的測量方式較值得推崇，因為他們對概念之運作化扣緊了理論，較能反映出概念與測量間之關係。如果我們所關心的不是概念上與運作上的嚴謹，而是一般民衆是否贊成給予政治上之少數分子公民自由，那麼 Sullivan 等人的反對便無關緊要，然而如果我們要測量的是「政治容忍」概念，那麼 Sullivan 等人的論點是值得肯定的。儘管有不少的討論與批評，目前無論在國外或國內對於政治容忍的測量不外乎這兩種方式。

### 三、影響政治容忍的因素

過去的文獻除討論政治容忍的測量外，也有不少文獻企圖瞭解影響民衆政治容忍的因素。筆者從這些文獻歸納出影響政治容忍來源的三個面向：個人與社會背景變項、心理因素與政治因素。

#### (一) 個人與社會背景因素

歸納過去學者的研究，曾經被探討的個人及社會背景因素包括性別、教育、年齡、種族、職業和居住地區，其中職業、種族、宗教因素被發現與受訪者之政治容忍態度無關(Peffley and Sigelman 1989)。

教育一直被認為是政治容忍很好的預測因素，不少研究皆發現教育程度越高，政治容忍度便越高(Stouffer 1955; Davis 1975; McClosky and Brill 1983; Bobo and Licari 1989; McIntosh et al. 1995; Nunn et al. 1978; Cigler and Joslyn 2002)。教育的影響在不同國家的研究皆呈現顯著，如：Peffley 與 Rohrschneider (2003)比較 17 個民主國家，Bahry 等人(1997)研究後共時代的俄羅斯，Karpov (1999)對波蘭之研究都有同樣發現。McIntosh 等人(1995)對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的研究發現，影響政

治容忍之因素與西方國家差不多，其中教育扮演重要因素。

在 Stouffer 的著作中便指出教育對容忍之影響，他對於此種發現的解釋為：「教育使得一個人必須與許多意見與價值不同的人接觸，此種情況在完成正式教育之前，一直持續下去……」、「要容忍，一個人必須更進一步學習，不只是那些具有不同意見的人不見得是壞人，而且必須知道那是對美國保持自由市場之地的關鍵，甚至有些觀點可能令人討厭或是甚至對這個社會是有危險的」(Stouffer 1955: 127)。對 Stouffer 而言，教育有認知的功能，透過教育的過程，民衆有機會接觸不同意見的人，並意識到不同意見不見得是不好或是危險的。Nunn 等人(1978)則更進一步闡釋，教育功能的認知發展所呈現的特點是彈性的、理性的思考策略，因此形成對不同意見團體之克制。Bobo 與 Licari (1989)也是從教育促進認知發展的角度來解釋容忍。

另外亦有學者從社會化角度來說明教育與容忍的關係。社會化理論強調學校社會化的功能，教育時間越長，民衆接觸民主價值與遊戲規則的時間越長，因此自然產生更高之容忍態度(Lawrence 1976; Gibson and Duch 1993; Golebiowska 1995)。然而此種解釋亦隱含在非民主國家，若教育內容不利民主，教育程度越高，政治容忍不但不會增加，反而可能減少。

爾後，有些學者懷疑教育並無法增加民衆對不喜歡之少數團體之尊重與容忍(Sullivan et al. 1979, 1982; Sullivan et al. 1981; Jackman 1978; Shamir and Sullivan 1983)。Jackman (1977, 1978)認為教育程度高者在一般原則之層次或許較為容忍，但是在特殊政策問題上並沒有較容忍。McCutcheon (1985)認為教育程度只能解釋完全容忍與不容忍的群體，但無法解釋只對左派不容忍的人，甚至與只對右派不容忍的人呈現負相關。Golebiowska (1995)認為教育還是有影響力，然而透過個人價值對政治容忍產生間接的影響。具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者，較高的教育將導致較高之容忍；反之，具有較傳統觀念者，較高之教育不見得

會傾向較高之容忍。

年齡是另外一個經常被用來解釋政治容忍的因素。年輕一代的世代比年長的世代更能容忍不同的政治團體，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皆得到證實(Davis 1975; Nunn et al. 1978; Bahry 1987; McClosky and Brill 1983; Culter and Kaufman 1975; Cigler and Joslyn 2002)。年輕的一代，他們所處的環境較老一輩的年代開放與多元，因此他們也呈現較容忍的態度。儘管年紀輕者的教育程度較年長的一輩高，但是當教育程度被控制之後，年齡之影響仍然存在。

McCutcheon (1985)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將受訪者分成四種類型：容忍者、不容忍者、僅不容忍右派團體者、僅不容忍左派團體者。對於容忍者與不容忍者而言，確實是年輕者較為容忍；但是僅不容忍右派團體者，卻出現年紀越輕越不容忍之情況，至於僅不容忍左派團體者與年齡並無明顯關係。

除此之外，亦有學者發現社會地位(Sullivan et al. 1982)、地區(Peffley and Sigelman 1989)與政治容忍也有關係。至於在性別方面，大部分學者並未發現性別與政治容忍的關係(Sullivan et al. 1981; Peffley and Sigelman 1989)，但是有少數學者發現男性較女性容忍(Stouffer 1955; Nunn et al. 1978)。

## (二) 心理因素

政治學家長期以來便對於心理特質對個人態度與價值之形成，感到相當的興趣。所以除了個人及社會背景因素外，也有不少學者用心理與人格因素來解釋政治容忍態度(Zalkind et al. 1975; Peffley and Sigelman 1989; Duch and Gibson 1992)。

對於個人心理特質之測量，學者發現自尊感低的人(low self-esteem)與不容忍之間有相當一致的關係(Snideman 1975; Sullivan et al. 1979, 1982; McClosky and Brill 1983; Gibson and Duch 1993)。自尊感低



的人思考過程僵化，缺乏能力與動機學習民主的價值與規範，對於任何政治刺激很容易放入好與壞兩個極化的類別中，對於被放入壞的類別中的人或事物皆難以容忍。

另一個常常被用來衡量心理特質的是 Adorno 的權威型人格。權威型人格具有若干特徵，如絕對服從權威、重視權力、崇尚嚴峻、強調秩序、對外來團體採取敵視與挑釁的態度。除此之外，具有權威型人格的人，常常憂心有許多荒謬危險的事正在進行，因此易於將此種想法投射到社會公認的異端或敵人身上(Adorno et al. 1950)。此種特徵可能使他們無法容忍其所不能認同的團體。權威型人格因而被學者用來預測低政治容忍度(Sullivan et al. 1981; Peffley and Sigelman 1989; Duckitt and Farre 1994)。

### (三) 政治因素

越來越多的文獻用政治的因素來解釋政治容忍態度。這些因素包括政治意識形態、對政治威脅之認知，以及對一般民主規範或遊戲規則之支持、政治參與和參加各種團體成爲該團體之會員。

過去「容忍」與「自由主義」一度被交互使用，一個採取自由主義立場者被認爲較有容忍的觀念；反之，保守者較不能容忍異己(Lipset and Raab 1970)。保守主義與不容忍之間的連結，不僅在美國得到證實(McClosky and Brill 1983; Sullivan et al. 1981, 1982)，其他國家也有同樣的發現(Sullivan et al. 1985)。但是，意識形態與容忍之間的關係，似乎相同程度地受到政治脈絡的影響(Muller 1988)。在一個相當政治化的國家，如以色列，意識形態與容忍有強烈的關聯；反之，此種關係便可能減弱(Shamir and Sullivan 1983)。

對於意識形態的測量，通常使用一個由左至右的七分量表，讓受訪者指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在量表中之位置(Sullivan et al. 1981; Duch and Gibson 1992)。然而在左右意識形態不是很明顯的國家，或是政治環境



變動快速的國家，如蘇聯（或現在的俄羅斯），要找出意識形態之認同與政治容忍之關係，恐怕不太容易(Gibson and Duch 1993)。

不少研究者皆指出，對於政治容忍最好的預測變項乃是對於目標團體威脅的認知(Sullivan et al. 1981; Peffley and Sigelman 1989; Gibson and Duch 1993; Duch and Gibson 1992; McIntosh et al. 1995)。就如同 Stouffer (1955)所言，當我們面臨我們認為有威脅的敵對團體，很自然的傾向便是想要去鎮壓對方。此種政治威脅越高，政治容忍度便越低的發現，舉世皆然，不僅在美國(Sullivan et al. 1981; Stouffer 1955; Peffley and Sigelman 1989)，在西歐(Duch and Gibson 1992)，甚至在東歐都有相同的發現(McIntosh et al. 1995)。Wang 與 Chang (2006)也發現在台灣那些感受北京政府武力威脅之認知者較無法容忍主張一國兩制者；而那些認為台灣獨立運動對社會威脅最大者，便較無法容忍主張台獨者。

政治容忍是民主價值的運用，不只是對於異己抽象原則之忍耐；而且是對於容忍原則具體之適用。一般認為，對於一般民主遊戲規則之支持，會有助於對於異議團體之容忍。

早期 McClosky (1964)、Prothro 與 Grigg (1960)的研究發現容忍與對於一般民主規範之支持無關。一般民衆對於基本民主原則相當支持，但是將此原則適用於具體事件時則表現出不同之態度。不過 Lawrence (1976)、Sullivan 等人(1982)、Gibson 與 Duch (1992)皆發現對抽象民主原則之支持與政治容忍有強烈關係。Marcus 等人(1995)在實驗中也證實支持民主的原則對政治容忍的正面影響。

另外有學者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觀察，假定人的政治取向和行為是學習而來的，一個人的網絡經驗將成為其政治容忍取向發展的重要成分。團體內面對面的互動與合作行為鼓勵互助性與信任、妥協與願意尊重不同觀點和與其他人的關係成為團體的必要，團體內的小民主取向對更大的政治環境是有影響的(Almond and Verba 1963; Brehm and

Rahn 1997)。所以，Cigler 與 Joslyn (2002)發現加入團體本身會促進政治容忍；加入越多的團體，此種關係就越強烈。不過，他們也發現控制參加團體之數量，某些特殊型態的團體會影響政治容忍，有些則不會。參加工會、宗教團體、農會，與未參加任何團體者相比，對政治容忍有負面的影響；參加專業團體及文藝團體則對政治容忍有正面影響。有些團體較強調同質性、狹隘之利益以及排他之認同，因此對政治容忍的影響較為負面。

最後，對政治的參與較為活躍者，也被認為可能較為容忍。對此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些學者認為一般的政治參與，如投票、參加政見發表會、捐款等，較能容忍不同的意見。但是，有些學者則認為民主積極份子(democratic activism)，如：參與一些活動抗議、示威、遊行等來反對政府政策，而不是一般的投票參與者，較能容忍異議團體。有街頭抗爭經驗的人較能體會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等的可貴，因此也會將心比心，願意給不喜歡的團體同樣的政治與自由權利。Peffley與 Rohrschneider (2003)發現在 17 個民主國家中有 8 國家政治參與的活躍分子和政治容忍呈現統計上顯著的正相關；其他統計上未呈現顯著水準之國家，也都呈現預期之方向。

由以上討論可以發現國外有關政治容忍之文獻相當豐富，然而國內學者在此方面之研究相對較少。傅仰止、伊慶春(1994)的〈容忍態度的結構肇因：都市背景、遷移經驗、異質聯繫〉一文主要從個人在社會結構中所經歷與接觸的環境和對象，探討同質性和異質性的結構特色與容忍態度間之關係。結構肇因的變項包括都市生活背景、遷移經驗或地位和異質的聯繫。其主要理由在於都市生活背景讓居民暴露於不同生活型態之人羣中，較可能培養出寬宏之觀點，因而能夠容忍與自己看法、作風不同的人 and 事；其次，遷移經驗使得當事人離開向來熟悉之社會文化環境，暴露於另一個陌生的環境裡，接受文化衝擊，進而提高對偏差者之容忍態度；最後，個人網絡中的成員如果背景差

異大，則當事人較可能習慣從不同立場來衡量事物，此乃培養容忍態度之基礎。根據他們的實證分析結果，都市生活背景和異質聯繫與政治容忍有關，但是遷移經驗則未能得到證實。黃秀端(1996)採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計畫第二期第三次資料分析台灣民衆對政治容忍的態度，並進一步探討影響政治容忍之原因，研究發現教育程度高、閩南人、支持民進黨者、對反對黨之信任態度越高者越能容忍異己。

除此之外，另外有幾篇有關政治容忍的分析是採取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以下簡稱 TEDS）的資料。TEDS 採用的是 Stouffer (1955) 所發明的測量方式，詢問受訪者對於主張「台灣共和國」以及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的容忍程度。<sup>1</sup> 陳陸輝、鄧忠俊(2005)採用 TEDS2003 之資料、鄧忠俊(2005)採用 TEDS2003 與 2004LB 兩次資料之比較分析。根據鄧忠俊分析的結果，無論是對於主張「台灣共和國」或是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教育程度為大專程度以上者（相較於國中教育程度以下者），以及民主價值較高者之政治容忍度皆較高。至於，對於某一主張有較強的威脅認知者，對該主張者之容忍度便較低。另外，大陸省籍者（相對於本省客家）不僅對主張「台灣共和國」的人較不容忍，對於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也較不容忍。這項發現與一般的印象較不相同。最後，鄧忠俊(2005)比較兩次的調查訪問結果發現，民衆之政治容忍度有提升之趨勢。

## 四、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前面討論對於政治容忍測量的兩種方式，Stouffer (1955)的傳統測

---

<sup>1</sup> TEDS 的問卷題目分別詢問民眾對於主張「台灣共和國」以及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是否容忍他們集會遊行、在學校教書、競選公職。

量方式以及 Sullivan 等人(1979, 1982)的內容控制測量。「變遷調查」計畫第二期第三次問卷 II 與第三期第四次問卷 II 政治文化組之間卷題目皆採取 Sullivan 等人的方式，此種測量方式較能掌握政治容忍概念的精髓。「變遷調查」第二期第三次於 1992 年 7 月間進行，第三期第四次於 1998 年 7 月進行，前者共完成有效問卷 1,408 份，後者共完成 1,798 份。兩次調查計畫皆由瞿海源教授主持，問卷題目之設計是先由受訪者自行選出哪一些政治主張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受訪者可以選擇的選項包括「主張恢復戒嚴的人」、「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主張共產主義者」以及「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sup>2</sup>由於台灣的政治生態與美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問卷中所列舉的目標團體名稱與美國有相當大的差異。

另外，問卷題目與 Sullivan 等人(1979)所設計之間卷最大的不同在於 Sullivan 等人是要受訪者指出最不喜歡的團體(least-liked group)，而「變遷調查」則用「對社會危害最大」的字眼，這可能是台灣社會並沒有那麼明顯的最不受歡迎的目標團體，因此才使用「對社會危害最大」的用詞。另外，採取「最不喜歡的團體」之用詞，受訪者情緒化之作用較大；而「對社會危害最大」則包含受訪者對該團體社會影響之評估。

當受訪者指出他們的目標團體後，接著再進一步詢問是否應該給這些他們認為危害社會最大的人憲法上所賦予的權利。1992 年詢問之項目包括是否應該禁止他們出入境、是否應該禁止他們舉行集會遊行、是否應該禁止他們在電視上發表言論、是否應該禁止他們擔任學校老師、是否應該禁止他們競選縣市長或民意代表，以及是否應該禁止他們擔任公務員等六項，不過 1998 年調查只有三項，包括是否應該禁止

2 1998 年的問卷將「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改為「主張接受中共所提一國兩制的人」。

他們在電視上發表演論、是否應該禁止他們擔任中小學老師、是否應該禁止他們擔任政府官員。<sup>3</sup>

自由出入境屬於憲法第十條中遷徙自由、集會遊行是第十四條集會及結社之自由、在電視上發表演論是第十一條之言論自由、擔任學校老師是第十五條對工作權之保障、擔任公務員是第十八條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之保障、競選縣市長或民意代表是第十七條之被選舉權。相信這六道題目足以測量受訪者對公民權利之態度。可惜的是，1998年的問卷中並沒有延續，只有三項對政治權利的測量，即禁止在電視上發表演論、禁止擔任學校老師、禁止擔任政府官員。

在瞭解民衆認為會危害社會的目標團體之後，本文接著再分析不同特質的選民對目標團體之選擇是否有差異，以及民衆對不同目標團體之容忍程度，並比較1992年到1998年間究竟有何種變化。最後，則分析哪些因素影響政治容忍以及此種影響因素是否因不同年代而有所變遷。

從前面第三節的文獻探討，本文企圖建立一個較完整的影響政治容忍的解釋變項，不過受限於既有的問卷，有些變項不得不割捨。圖1的架構圖顯示，在個人與社會變項方面，採取性別、省籍、教育程度、年齡等幾個變項。這些變項為個人的預存傾向(predisposition)，是一種耕植於人心且相當穩定的個人特質，此種特質使其傾向於某種一般性的思考、感覺或行為方向(Marcus et al. 1995)。在性別方面，女性通常被認為較為保守、較傾向於穩定，對於異議團體較無法容忍。其次為年齡，年紀越大越保守，對異議團體較年輕者不能容忍。省籍則是源於台灣特殊政治環境以及不同省籍背景的民衆有不同之歷史經驗，所以對於不同目標團體的容忍度可能有差異。教育程度對政治容

3 1992問卷題目為「是否應該禁止他們擔任公務員」，1998年則問「是否應該禁止他們擔任政府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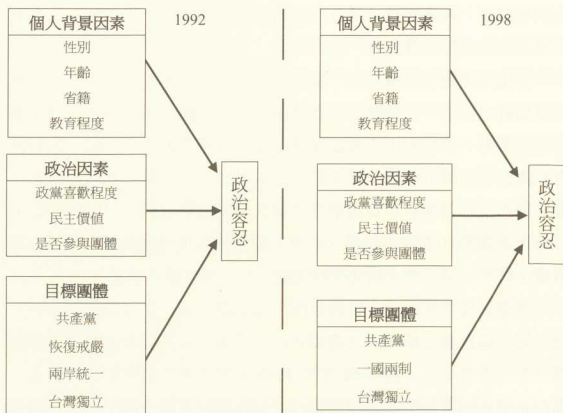


圖 1 本文影響政治容忍的因素架構圖

忍的正面影響在所有國家的研究得到證實(Sullivan et al. 1981; Stouffer 1955; Peffley and Sigelman 1989; Duch and Gibson 1992; McIntosh et al. 1995; Wang and Chang 2006)。教育使得民衆認知不同想法與觀點之存在，同時也較能理性面對不同意見者，因此教育將為本文重要解釋變項。

在政治變項方面，由於問卷題目本身便已指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政治主張者，其內容已隱含對社會威脅的認知，所以本文並不以威脅的認知作為解釋變項。本文以民主價值、政黨喜歡度、參與團體的情況作為解釋變項。其中民主價值、政黨喜歡度皆屬於 Zaller (1992)所說的政治預存傾向，此種傾向可能受到幼年的社會化、對實際政治事務的參與之影響，也有可能受到個人人格因素和風格品味所影響。Zaller (1992)認為當個人面對新的資訊時，政治預存傾向對於個人的偏好或判



斷常扮演關鍵性之中介變項，民主價值與政黨認同被視為相當重要的政治預存傾向。民衆的民主價值越高，表示越接受平等價值、自由的意見表達、多元的聲音、分權與制衡的原則，因此預期這些人對異議分子的容忍度也會越高。至於考慮政黨因素是因為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與台灣未來前途之迥異，此種差異不僅可能影響到受訪者對目標團體選擇之差異，也可能影響他們對目標團體容忍之程度。此外，在台灣的 political 發展脈絡中，國民黨曾經是威權的政黨，民進黨則是從黨外運動開始，抗議國會結構不合理、主張國會全面改選、要求開放言論與集會遊行之自由等，所以本文預期民進黨認同者較國民黨認同者對異議團體之容忍度較高。

過去 Putnam (1993) 的研究將參與社團與社會信任視為社會資本重要的元素，並以實證資料證明其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關係。民衆熱心參與社團活動，人與人的互動關係越熱絡與密切，對不同團體的容忍度便越強，因此本文預期參與社團者較未參與任何社團者政治容忍度高；同時，參與的團體越多、接觸的團體越多，容忍亦必隨之而提高。除了參與團體外，各種的政治參與，包括和選舉有關的參與以及積極活動的參與都可能影響政治容忍，然而此兩份問卷並沒有這些題目，只好放棄。

最後，由於受訪者選擇的「對社會危害最大」的團體並不相同，本文因此將不同類型的目標團體也放入迴歸模型作為控制變項。在控制不同的目標團體下，我們方能證明解釋變項的影響力，而不受不同目標團體的影響。

所有變項的測量方式請參看附錄。政黨因素以民衆對該政黨的喜歡程度來測量，事實上有兩個變項，一為對國民黨的喜歡度，另一為對民進黨的喜歡度。參與的團體則是詢問受訪者是否有參與各種類型的團體。另外，必須提的是民主價值的測量方式在 1992 年與 1998 年並不相同。1992 年是解嚴之後的第一次國會全面改選之前，當時有兩



道問題對台灣是否適合實施民主的看法，另外兩道問題是對自由權利的看法。1998年的問卷則是採取胡佛、徐火炎(1983)發展出的民主量表，包括平等權、制衡權、自由權與多元權，再加上一題對台灣是否適合實施民主的看法。

#### 1992年民主價值的測量方式

##### (1)對台灣是否適合實施民主的看法：

- a. 政府把治安交通經濟搞好就好是否民主不重要
- b. 從解除戒嚴後的變化來看台灣不適合實行民主

##### (2)對自由權的看法：

- a. 社會那麼亂是因為政府給人民太多自由的緣故
- b. 今天社會那麼混亂，跟解除戒嚴有直接的關係

#### 1998年民主價值的測量方式

- a. 對台灣是否適合實施民主的看法：以這幾年的政治情況來看，台灣並不適合實施民主政治
- b. 自由權：一種言論或意見，可不可以在社會上公開流傳，應該讓政府來決定
- c. 制衡權：政府如果常常受到民意機關的牽制，就不可能有所作爲了
- d. 平等權：國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應該聽從中央政府首長的決定
- e. 多元權：在地方上，如果有許多不同意見的團體，就會影響到地方的安定。

這兩次「變遷調查」並沒有任何關於心理變項的問題，因此僅考慮個人背景變項與政治變項。由於本文使用的是現存的調查訪資料(existing data)，問卷調查題目之設計並非爲本計畫而產生，因此常會面臨所需變項與實際訪問之變項有差距的情況。除此之外，在比較1992年與1998年的差異上，可說是困難重重，因爲兩次問卷的用字

謹詞皆不盡相同，難以比較。因此當本文進行 1992 年與 1998 年的比較時，只能作為參考，無法過度推論。

## 五、政治容忍分析

近年來台灣社會族群間之衝突與對立日益嚴重，對於政治容忍之瞭解實有其必要，唯有民衆對於不同族群對象或不同政治主張的人持有更寬容之態度，社會方能臻於和諧。

本文首先觀察民衆認為危害社會最大的目標團體是什麼。雖然兩次的目標團體有些不同，至少主張獨立、主張共產主義、主張統一在兩次調查皆有列入。從表 1 可以看出民衆選擇目標團體的變化，亦即認為危害社會最大的政治主張有明顯的改變。在 1992 年時，有 35.0% 之受訪者表示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危害社會最大，但是在 1998 年只剩下 17.1%，整整少了一半。不過視主張共產主義的人危害社會最大者在兩次調查都是最高的，其百分比更是由 1992 年的 39.2% 增加為 1998 年的 48.2%。另外，1992 年有 8.1% 之受訪者認為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1998 年的用詞改為「主張台灣應該接受

表 1 哪種政治主張對我們社會的危害最大

	% (N)	
	第二期第三次 (1992 年)	第三期第四次 (1998 年)
主張恢復戒嚴的人	5.8 (82)	其他 <sup>a</sup> 5.4 (97)
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	35.0 (493)	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人 17.1 (308)
主張共產主義的人	39.2 (552)	主張共產主義的人 48.2 (884)
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	8.1 (114)	主張一國兩制的人 18.1 (325)
未答	11.9 (167)	沒有任何人有危害 3.5 (63)
		不知道 6.7 (121)
總數	1,408	1,798

<sup>a</sup> 1998 年有「其他」這一項，但無法得知指的是何種主張的人。

中共所提一國兩制的人」，不過基本上都是針對主張統一者，有 18.1% 之受訪者表示主張一國兩制的人危害最大。此種對目標團體的改變，可能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有密切關係。當台獨言論不再是社會禁忌時，將其視為毒蛇猛獸的便逐漸減少。同樣的，在兩岸分立分治的事實之下，政府不再強調反攻大陸，視主張兩岸統一者危害最大的比例因此增加。

接著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給予那些危害社會最大的人憲法上所賦予之政治權利，表 2 顯示民衆並不是那麼願意給予其公民之權利。在 1992 年調查的六項政治權利中，每一項皆至少有四成以上受訪者表示不應該賦予他們政治權利，尤其有高達 55.8% 之受訪者覺得應該禁止其舉行集會遊行。令人驚訝的是，1998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政治容忍度不升反降，有高達 59.4% 之受訪者認為應禁止其擔任學校老師，高於

表 2 是否應該給予危害社會最大的政治主張者公民權利

	1992 年			1998 年		
	應該	不應該	無意見	應該	不應該	無意見
禁止自由出入境	51.3 (637)	27.0 (335)	16.4 (203)	--	--	--
禁止舉行集會遊行	55.8 (693)	26.4 (328)	13.0 (161)	--	--	--
禁止在電視上發表言論	45.4 (563)	35.0 (434)	15.2 (189)	50.4 (811)	39.3 (632)	7.0 (112)
禁止擔任學校老師	50.3 (624)	29.5 (367)	15.6 (193)	59.4 (956)	30.1 (485)	7.2 (116)
禁止競選縣市長或民意代表	43.9 (546)	32.6 (427)	17.2 (214)	--	--	--
禁止擔任公務員	43.3 (538)	34.5 (424)	17.5 (217)	58.1 (935)	29.7 (478)	8.4 (135)
總數 <sup>a</sup>		1,241			1,610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第二期第三次、「變遷調查」第三期第四次。

<sup>a</sup>第三期第四次的「變遷調查」將「禁止擔任公務員」改為「禁止擔任政府官員」。

1992 年的 50.3%。有 58.1%認為應禁止其擔任政府官員，4 50.4%認為應禁止其在電視上發表言論，其百分比皆高於 1992 年。此種結果與我們一般的預期不符。若我們再仔細觀察表 2 的結果，可以發現主張不應該禁止在電視上發表言論以及不應該禁止擔任學校老師的比例也在 1998 年略有上升。有一部分因素可能是表達意見者增加了。1992 年回答無意見的百分比介於 13.0%至 17.5%之間，但是在 1998 年則介於 7.0%至 8.4%之間。至於是否應該禁止擔任公務員，認為應該禁止者上升，同時，不應該禁止者下降，顯示不容忍度確實上升，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問卷題目改變。

接著，本文觀察是否不同背景者對目標團體的選擇有差異。從表 3 中可以看出，1992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不同的性別、省籍、年齡、教育程度、對國民黨或民進黨之喜歡度、統獨立場對目標團體的選擇確實有顯著之差異。在性別方面，男性與女性對目標團體的選擇差異並不大，之所以在統計上呈現顯著之差異主要在於女性未回答有目標團體之百分比較高，男性以主張台獨者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團體之百分比稍高於女性。在年齡的差異方面，越年輕者視主張共產主義的人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團體的百分比越高，50 歲以上者回答沒有目標團體的百分比高於年紀輕者，特別是年齡在 20-29 歲者。50-59 歲者視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團體的百分比最低，但是 20-29 歲者為最高。高達 67.6%之大陸省籍者認為主張台獨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客家人有 40.4%，而閩南人則僅有 28.2%的受訪者認為主張台獨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閩南人選擇最多的目標團體為主張共產主義者占 42.1%，其次為客家人的 38.5%，大陸省籍者只有 23.5%認為主張共產主義者對社會危害大。另外，未回答有任何目標團體者，以閩

4 第三期第四次的「變遷調查」將「禁止擔任公務員」改為「禁止擔任政府官員」，此種改變可能對某些受訪者的看法產生影響。

表3 個人背景因素與目標團體的選擇：1992年

	主張恢 復戒嚴 的人	主張台灣 獨立建國 的人	主張共產 主義的人	主張海峽 兩岸立即 統一	未答	統計檢定
% (N)						
性別						
男性	6.2 (47)	36.9 (278)	39.4 (297)	8.4 (63)	9.2 (69)	$\chi^2 = 97.354^{***}$
女性	5.4 (35)	32.9 (215)	39.0 (255)	7.8 (51)	15.0 (98)	
年齡						
20-29	6.1 (23)	39.3 (149)	44.1 (167)	7.7 (29)	2.9 (11)	$\chi^2 = 97.534^{***}$
30-39	6.5 (26)	33.5 (134)	42.8 (171)	8.3 (33)	9.0 (36)	
40-49	7.0 (20)	37.3 (107)	35.5 (102)	8.0 (23)	12.2 (35)	
50-59	3.4 (8)	28.6 (67)	32.1 (75)	9.0 (21)	26.9 (63)	
60以上	4.6 (5)	33.3 (36)	34.3 (37)	7.4 (8)	20.4 (22)	
省籍						
本省閩南	6.7 (69)	28.2 (289)	42.1 (431)	9.1 (93)	13.9 (142)	$\chi^2 = 107.345^{***}$
本省客家	4.3 (9)	40.4 (84)	38.5 (80)	7.2 (15)	9.6 (20)	
大陸各省	2.4 (4)	67.6 (115)	23.5 (40)	3.5 (6)	2.9 (5)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4.8 (26)	28.8 (156)	34.6 (187)	7.9 (43)	23.8 (129)	$\chi^2 = 114.775^{***}$
初中	7.0 (15)	37.2 (80)	41.4 (89)	10.7 (23)	3.7 (8)	
高中	5.4 (19)	35.3 (125)	46.3 (164)	6.8 (24)	6.2 (22)	
專科	4.2 (7)	47.6 (79)	39.8 (66)	5.4 (9)	3.0 (5)	
大學以上	10.7 (14)	40.5 (53)	35.1 (46)	11.5 (15)	2.3 (3)	
國民黨喜歡度						
喜歡國民黨	4.0 (30)	43.2 (322)	41.1 (306)	5.0 (37)	6.7 (50)	$\chi^2 = 142.925^{***}$
不喜歡國民黨	13.3 (30)	23.1 (52)	41.3 (93)	15.1 (34)	7.1 (16)	
無意見	5.2 (22)	27.4 (116)	35.2 (149)	10.2 (43)	22.0 (93)	
民進黨喜歡度						
喜歡民進黨	9.2 (33)	20.7 (74)	49.6 (177)	9.8 (35)	10.6 (38)	$\chi^2 = 167.831^{***}$
不喜歡民進黨	4.1 (24)	49.3 (291)	35.9 (212)	7.3 (43)	3.4 (20)	
無意見	5.6 (25)	27.9 (124)	35.8 (159)	8.1 (36)	22.5 (100)	
是否支持獨立						
不支持獨立	5.2 (47)	44.8 (404)	39.1 (352)	6.4 (58)	4.4 (40)	$\chi^2 = 63.796^{***}$
支持獨立	12.4 (21)	17.8 (30)	45.6 (77)	18.3 (31)	5.9 (10)	
是否支持統一						
不支持統一	11.2 (26)	25.8 (60)	44.2 (103)	15.9 (37)	3.0 (7)	$\chi^2 = 52.105^{***}$
支持統一	4.5 (37)	44.4 (368)	38.8 (321)	6.5 (54)	5.8 (48)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第二期第三次。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南人的 13.9% 最高，其次為客家人的 9.6%，大陸省籍者僅有 2.9% 為最低。在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為專科、大學以上者以主張台獨的人為目標團體較高，而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下者則最低。由於台獨言論在解嚴之前是被打壓的，即使解嚴之後的 1992 年在集會遊行法以及人民團體法中都禁止主張分裂國土，通常教育程度高者接受此方面的訊息越多，因此就越容易會有台獨主張對社會危害之認知。另外，從表 3 中亦可以看到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下者未回答有目標團體之比例亦最高。在政黨的喜歡度方面，喜歡國民黨者以主張台獨者為目標團體的百分比(43.2%)遠高於不喜歡國民黨者(23.1%)，兩者相差兩成。相反的，不喜歡國民黨者，選擇主張恢復戒嚴的人與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之百分比皆高於喜歡國民黨者；而選擇主張共產主義的人之百分比則不相上下。至於對於國民黨沒有所謂喜歡不喜歡者有 22% 未回答任何目標團體。接著觀察民進黨部分，喜歡民進黨的受訪者選擇主張共產主義者、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主張恢復戒嚴的人為目標團體之百分比均高於不喜歡民進黨者，但是對於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之威脅認知則遠低於不喜歡民進黨者，前者為 20.7%，後者為 49.3%。在統獨立場方面，不支持獨立者認為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對社會之危害最大者之認知高達 44.8%，而支持獨立者視主張共產主義者對社會之危害最大。另外，支持獨立者對於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和主張恢復戒嚴的人對社會威脅之認知，都高於不支持獨立者。支持統一者和不支持獨立者對目標團體的選擇模式非常類似，事實上，這兩批人的重疊性應該非常高。

前面提到 1998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民衆認為危害社會最大的目標團體有些改變。若我們觀察 1998 年的受訪者背景與目標團體的關係，與 1992 年還是有一些差異。在性別方面，女性選擇主張共產主義者對社會之危害最大之百分比高於男性 7.6%，但是男性選擇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稍為高於女性。在年齡方面，雖然沒有呈現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但是可以看到與其他年齡相比，20-29歲的年輕人視主張獨立建國者為目標團體之比例最低，30-39歲者為最高；以主張一國兩制者為目標團體者20-29歲為最高，30-39歲者為最低，次低者為60歲以上者。但是在1992年20-29歲者視主張獨立建國者為目標團體之比例最高；而以一國兩制為目標團體者，則以60歲以上者為最低，其次為20-29歲者。如果我們以 Ronald Inglehart (1997)的世代(cohort)概念來看，1992年20-29歲者到1998年時為26-35歲，該年齡層視主張台獨建國者為目標團體之比例依舊最高，為21.8%，而20-25歲者則只有12.6%視主張台獨建國者為目標團體。20-29歲之世代以獨立建國為目標團體的比例為最低，可能是因為新的年齡群體20-25歲進入而形成的變化。同時，1998年時為26-35歲者以一國兩制為目標團體者與其他年齡層相比依舊是次低。表4中看到的以主張一國兩制者為目標團體者，以20-29歲為最高，是因為20-25歲的影響所致，該年齡層有高達28.6%之受訪者以一國兩制為目標團體，比整體平均18.1%高出10.5%。省籍因素雖然呈現顯著水準，但有些變化。1992年時，客家人各項百分比皆介於閩南人與大陸省籍者之間，但在1998年客家人對目標團體之選擇較接近閩南人。大陸省籍者視主張台獨建國者為目標團體之比例遠高於閩南人與客家人，而閩南人與客家人以主張共產主義者和主張一國兩制者為目標團體之比例則高於大陸省籍者。教育程度方面在統計上雖呈現顯著水準，但差異並不大，大學程度以上的受訪者與其他教育程度者相比，以主張台灣共和國者為目標團體的比例較高，以主張一國兩制為目標團體的比例最低。在政黨喜歡度方面，喜歡民進黨與不喜歡民進黨之差異，大於喜歡國民黨與不喜歡國民黨之差異。喜歡國民黨者以主張台灣共和國者為目標團體的比例，只比不喜歡國民黨者多3.2%；兩者在以主張一國兩制為目標團體的比例也僅相差5.1%。喜歡民進黨者以主張台灣共和國者為目標團體的比例，較不喜歡民進黨者少19.4%；兩者在以主張一國兩制為目標團體的比例也相差



表 4 個人背景因素與目標團體的選擇：1998 年

% (N)

	主張台灣共 和國的人	主張共產 主義的人	主張一國 兩制的人	其他	沒有任 何人有 危害	統計檢定
性別						
男性	20.0 (169)	48.9 (413)	20.7 (175)	6.3 (53)	4.0 (34)	$\chi^2 = 9.811^{**}$
女性	16.7 (139)	56.5 (471)	18.0 (150)	5.3 (44)	3.5 (29)	
年齡						
20-29	14.9 (45)	48.2 (146)	26.4 (80)	5.9 (18)	4.6 (14)	$\chi^2 = 24.219$
30-39	22.0 (110)	53.9 (270)	15.6 (78)	5.4 (27)	3.2 (16)	
40-49	17.0 (76)	53.1 (238)	20.8 (93)	6.0 (27)	3.1 (14)	
50-59	16.3 (33)	54.5 (110)	19.3 (39)	5.9 (12)	4.0 (8)	
60 以上	19.7 (44)	53.8 (120)	15.7 (35)	5.8 (13)	4.9 (11)	
省籍						
本省閩南	15.4 (181)	54.6 (643)	20.0 (236)	6.5 (77)	3.5 (41)	$\chi^2 = 88.304^{***}$
本省客家	13.3 (34)	58.2 (149)	22.7 (58)	1.6 (4)	4.3 (11)	
大陸各省	37.2 (86)	38.5 (89)	12.6 (29)	6.9 (16)	4.8 (14)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15.4 (61)	52.9 (210)	20.4 (81)	5.8 (23)	5.5 (22)	$\chi^2 = 38.55^{**}$
初中	17.8 (43)	55.6 (134)	19.1 (46)	5.0 (12)	2.5 (6)	
高中	17.2 (94)	53.9 (294)	22.4 (122)	3.7 (20)	2.8 (15)	
專科	19.9 (52)	54.0 (141)	16.1 (42)	6.9 (18)	3.1 (8)	
大學以上	25.2 (58)	45.2 (104)	14.3 (33)	10.0 (23)	5.2 (12)	
國民黨喜歡度						
喜歡國民黨	21.0 (113)	54.2 (292)	17.8 (96)	4.5 (24)	2.6 (14)	$\chi^2 = 18.432^{**}$
不喜歡國民黨	17.8 (78)	49.4 (216)	22.9 (100)	7.1 (31)	2.7 (12)	
無意見	16.8 (117)	53.6 (373)	18.5 (129)	5.7 (40)	5.3 (37)	
民進黨喜歡度						
喜歡民進黨	10.3 (48)	55.0 (255)	28.0 (130)	4.1 (19)	2.6 (12)	$\chi^2 = 101.413^{***}$
不喜歡民進黨	29.7 (158)	46.2 (246)	15.0 (80)	6.6 (35)	2.4 (12)	
無意見	15.1 (102)	56.1 (378)	17.1 (115)	6.1 (41)	5.6 (38)	
統獨立場						
台灣獨立	6.6 (18)	54.6 (149)	34.8 (95)	2.6 (7)	1.5 (4)	$\chi^2 = 113.341^{***}$
統一	32.4 (46)	44.4 (63)	14.1 (20)	8.5 (12)	0.7 (1)	
維持現狀	20.2 (207)	53.0 (755)	17.1 (175)	5.7 (589)	4.1 (42)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第三期第四次。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13.0%。但在 1992 年其差異分別為 20.1%與 10.1%，後者為 28.6%與 2.5%。與 1992 年相比，1998 年的資料顯示，對國民黨與對民進黨的喜歡度對不同目標團體的選擇之差異在減少。在統獨立場方面，1998 年與 1992 年問卷調查的問法完全不同。前者直接詢問對未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贊成台灣獨立、與大陸統一、還是維持現狀；後者則為兩個變項，一個變項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台灣獨立的主張，另一變項則是問是否同意台灣永遠是中國一部分的看法。表 4 中呈現相當明顯的關係，認為未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應該獨立的、以主張一國兩制為目標團體的比例有 34.8%，主張維持現狀者以一國兩制為目標團體的比例降為 17.1%，主張與大陸統一者則只有 14.1%以主張一國兩制為者目標團體；以主張台灣共和國者為目標團體的比例順序正好相反，分別為 6.6%、20.2%、32.4%。

接下來分析民衆對於不同的目標團體容忍之程度，表 5 中可以看到民衆對不同主張團體之容忍度是有差異的，且所有項目皆呈現統計顯著水準。無論是 1992 年或 1998 年的調查都顯示民衆對於主張共產主義者最不能容忍。<sup>5</sup> 不過有趣的是，1992 年民衆對於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之不容忍度高於主張立即統一的人，有 45.0%的受訪者表示應禁止其在電視發表言論，但是在 1998 年稍稍降為 41.8%；相反的，對於主張立即統一的人之不容忍度則由 32.7%增為 45.1%。對於是否禁止對社會危害最大的主張者擔任公務員，在 1992 年對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不容忍度為 38.6%，對主張立即統一的人之不容忍度為 30.3%。由於 1998 年的問卷「禁止擔任公務員」改為「禁止擔任政府官員」，其用詞改變結果對答案有很大的影響，所有受訪者的不容忍度皆提升，顯示民衆對政府官員的敏感度較高。不過對於主張一國兩制者有 52.2%

5 有一項例外，即 1998 年在禁止擔任學校老師一項，「其他」高於主張共產主義者，不過從資料中無從得知「其他」是什麼，若排除「其他」，民眾對於禁止主張共產主義者擔任學校老師贊成之比例高達七成。

表 5 對不同目標團體不容忍度百分比

	1992		1998 <sup>a</sup> (其他)		1992		1998		% (N)	
	恢復戒嚴		台灣獨立建國		共產主義		立即統一		1992	1998
禁止自由出 入境	32.5	(25)	--	51.8 (240)	--	61.5 (324)	--	44.4 (48)	--	--
禁止舉行集 會遊行	30.8	(24)	--	59.0 (281)	--	67.4 (350)	--	34.9 (38)	--	--
禁止在電視 上發表演論	20.2	(6)	50.6 (42)	45.0 (215)	41.8 (124)	56.8 (297)	58.5 (502)	32.7 (35)	45.1 (143)	
禁止擔任學 校老師	29.1	(23)	72.6 (61)	47.3 (223)	45.1 (134)	64.8 (339)	70.4 (604)	35.1 (39)	49.4 (157)	
禁止競選縣 市長或民意 代表	22.1	(17)	--	36.8 (175)	--	61.3 (323)	--	28.7 (31)	--	--
禁止擔任公 務員	24.4	(190)	65.9 (54)	38.6 (182)	42.8 (127)	58.1 (304)	69.0 (590)	30.3 (33)	52.2 (164)	

<sup>a</sup> 由於編碼簿中未列出「其他」指何種主張，因此無法得知。

之受訪者表示不願意看到他們擔任政府官員，對於主張台灣獨立建國者之不容忍稍低，為 42.8%。

總而言之，比較 1992 年與 1998 年的調查，可以發現民衆的不容忍度並沒有降低。但是隨著政治民主的發展與言論的自由，民衆選擇對社會危害最大的目標團體在改變，對於主張台獨者之不容忍度降低，但對於主張統一者之不容忍度提升。同時，本文也發現不同特質的人選擇之目標團體是有差異的。另外，兩次調查訪問資料之分析皆顯示民衆不僅以主張共產主義者為目標團體的百分比居高不下，且對該團體之容忍度也最低。由於「變遷調查」計畫有關政治容忍的題目只有 1992 年與 1998 年才有，以致無法瞭解經歷兩次政黨輪替以及開放共產黨組黨後的今天，<sup>6</sup> 民衆的政治容忍是否會提高。

6 2008 年 6 月 20 日大法官釋字 644 號正式宣告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違憲。目前已經有以「共產黨」為名之政黨在內政部正式登記。

為要瞭解此問題，筆者運用 2003 年與 2004 年 TEDS 的資料發現，民衆在政黨輪替後政治容忍度確實是有提升（參見表 6），不過由於 TEDS 的問法與「變遷調查」計畫之間卷題目設計方式不同，因此不宜過度推論。其中 2004 年的資料是在 2004 年年底的立委選舉之後所做的訪問，當時民衆歷經 2004 年 3 月總統選舉的 319 槍擊事件，以及選後反對黨在凱達格蘭大道抗議，而政府對這些抗議基本上是採取容忍而非鎮壓的態度。2004 年無論是對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人，或是對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在是否同意禁止集會遊行、禁止在學校教書、禁止競選公職三項政治權利上，都比 2003 年容忍。即使是受訪者認為該主張對社會是有危害的，認為應該禁止他們從事該三項活動的依舊遠少於不應該禁止的。2003 年認為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人對社會有危害者，有 41.5% 認為應該禁止其集會遊行，但 2004 年降為 30.6%；同樣的，對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也由 42.0% 降為 31.6%。

## 六、影響政治容忍的實證分析

在瞭解民衆心目中危害社會最大的團體（目標團體）以及對這些

表 6 對不同主張者與是否禁止其政治權利之關係：  
2003 年與 2004 年之比較

	2003		2004		2003		2004		%
	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人				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				
	全部	有 <sup>a</sup>	全部	有	全部	有	全部	有	
禁止集會遊行	36.5	41.5	27.8	30.6	37.4	42.0	27.9	31.6	
禁止在學校教書	30.9	35.0	25.9	29.2	32.8	36.7	26.7	30.3	
禁止競選公職	29.9	33.4	21.4	24.9	30.9	34.4	22.4	25.9	
總數	950		964		956		948		

資料來源：2003 年資料取自朱雲漢(2004)、2004 年資料取自劉義周(2005)。

<sup>a</sup>「有」是指認為該主張者對社會是有危害的。

目標團體的容忍度，並比較 1992 年與 1998 年之差異後，本節更進一步分析影響政治容忍的因素。前面提到個人變項、心理因素與政治因素皆可能影響政治容忍，不過，由於受限於問卷題目本身，我們無法檢驗心理因素與政治容忍之間的關係。本節乃依圖 1 的架構圖來檢驗哪些因素與政治容忍有關。

表 7 為影響政治容忍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與年齡無論在 1992 年或 1998 年都未呈現統計上之顯著水準，表示其與政治容忍

表 7 影響政治容忍度迴歸因素：1992 年與 1998 年之比較

變項	1992		1998	
	<i>b</i> (SE)	<i>Beta</i>	<i>b</i> (SE)	<i>Beta</i>
性別	-.035 (.051)	-.021	-.030 (.047)	-.016
年齡	-.002 (.002)	-.023	-.002 (.002)	-.034
省籍 (本省客家為對照組)				
本省閩南	.180 (.068)	.099**	-.003 (.065)	-.001
大陸各省	.056 (.091)	.024	-.136 (.090)	-.051
教育	.050 (.022)	.081*	.051 (.021)	.074*
政黨				
喜歡國民黨程度	-.129 (.029)	-.141***	-.070 (.026)	-.072**
喜歡民進黨程度	.107 (.025)	.134***	.074 (.027)	.075**
民主價值				
有參與團體	.092 (.035)	.083**	.269 (.061)	.120***
目標團體 (以共產黨為對照組)	-.032 (.050)	-.019	.029 (.056)	.013
戒嚴	.746 (.101)	.221***	—	
台灣共和國	.419 (.054)	.248***	.542 (.063)	.238***
一國兩制	.508 (.086)	.179***	.320 (.059)	.145***
常數	1.244 (.215)***		.939 (.230)***	
	$R^2 = .166***, n = 1,043$		$R^2 = .103***, n = 1,396$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並無顯著關係。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性別與年齡的迴歸係數的方向為負，亦即女性與年紀大者較為不容忍。接著，我們可以發現教育程度與政治容忍在 1992 年與 1998 年皆有顯著的關係，教育程度越高者政治容忍度越高。教育程度與政治容忍的關係，在美國、西歐國家、東歐國家等其他國家也同樣得到證實(Sullivan et al. 1981; Stouffer 1955; Peffley and Sigelman 1989; Duch and Gibson 1992; McIntosh et al. 1995)。在省籍方面，1992 年閩南人相較於客家人的政治容忍度較高，但是在 1998 年則沒有顯著差異，或許是因為台灣主體性，促使對台獨容忍度提升，但對主張中共的一國兩制者之不容忍度提升所致。

在民衆的政治預存傾向方面，喜歡國民黨程度、喜歡民進黨程度、以及民主價值在 1992 年與 1998 年對政治容忍皆有顯著的影響。越喜歡國民黨者，其政治容忍度越低；反之，越喜歡民進黨者，其政治容忍度越高。民主價值與政治容忍度亦如預期呈現正向的顯著關係。不過，在 1992 年對兩個政黨的喜歡度之 *beta* 值的絕對值都大於民主價值，但是在 1998 年則小於民主價值，顯示政黨認同因素之影響力在下降。當然我們可以說是因為兩年的民主價值測量方式不同所致，或許 1998 年民主價值之 *beta* 值增加勉強可說是測量方式所致，但是卻無法解釋喜歡國民黨程度、喜歡民進黨程度 *beta* 值的絕對值同時在 1998 年下降。根據鄧忠俊(2005)分析 2004 年 TEDS 的資料發現，在政黨取向傾向泛藍者，對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較不容忍，但是政黨取向傾向泛綠者，對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並沒有較不容忍。有人會質疑不是經常有民進黨台獨基本教義派譴責國民黨「賣台」，為何會呈現民進黨支持者比國民黨支持者容忍？此種情況有可能是基本教義派雖然非常活躍，但在統計上僅僅是民進黨支持者之一小部分；另外一種情況是，勇於表達意見並不代表就會反對敵對團體也有同樣表達意見之自由。至少，在 2004 年總統選後的抗議以及 2006 年的紅衫軍，當時的民進黨政府以及民進黨支持者都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克制。

至於，參與團體並未如筆者預期，在 1992 年甚至呈現負的方向，在 1998 年雖然與政治容忍呈現正的關係，但是仍舊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與 Cigler 與 Joslyn (2002)對美國的研究不同。由於 1992 年的問卷允許受訪者複選，因此讓我們有機會分析是否參加越多團體，與他人有更多的互動，政治容忍度因而增加，不過以參與團體數目取代是否參與團體變項之後，不僅沒有發現顯著的關係，其係數還是呈現負的關係。團體本身的性質亦有可能影響參與者之態度，有些團體有利於容忍態度的發展，有些團體則反而有不利的影響。由於 1992 年與 1998 年兩次的問卷所列的團體不盡相同並無法直接比較，但是至少提供我們思考的方向。在 1992 年沒有任何類型團體有顯著的影響，不過宗親會、宗教團體、同鄉會、政治團體、社會團體與政治容忍有負向的關係。<sup>7</sup>宗親會、宗教團體、同鄉會都是屬於同質性較高的團體，因此加入該類團體並無助於政治容忍度之提升。與未加入團體者相比，1998 年也沒有任何類型團體有顯著的影響。不過，我們同樣發現宗教團體的迴歸係數是負的。政治團體則由負轉為正，可能是 1992 年還是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1998 年台灣政黨與政治團體得成立已有相當的變化。由於這些團體影響皆不具統計上顯著水準，因此不宜做過多的猜測。

另外，民衆對於不同目標團體容忍度確實有顯著的不同，相較於主張共產主義者，民衆對於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與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的政治容忍度較高。我們更可從迴歸係數的變化看出，在 1992 年民衆對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之容忍度低於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但是在 1998 年民衆對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之容忍度高於主張一國兩制的人。

Wang 與 Chang (2006)運用 TEDS2003 的調查訪問資料發現，對威

7 為節省篇幅，因此並未列出所有類型團體的迴歸分析表。



脅的認知(perception of threats)是影響台灣民衆對主張統一或獨立者不容忍的因素之一。當民衆認知獨立運動將會引起北京當局的威脅時，對於台獨主張的不容忍度將提高；同樣的，當民衆認知北京當局一國兩制的統一計畫時，對於主張中共當局提出的「一國兩制」者之不容忍度也會提高。此種威脅認知隱合理性的評估，所以政治容忍不僅是情緒的反映還包含對危險認知的理性計算。此種不同目標團體容忍程度之差異或許與民衆對於目標團體之威脅認知有關。換言之，無論是1992年或1998年，民衆對於主張共產主義者的威脅認知應是最高。

比較1992年與1998年兩個年度影響政治容忍的多元迴歸分析，除了省籍因素外，所有變項（包括：政黨認同、民主價值、不同類型之目標團體）在1992年呈現顯著水準的，在1998年也一樣；同樣的，在1992年未呈現顯著水準的，在1998年也沒有。就此而言，影響政治容忍因素是穩定的，然若更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不同變項之影響力大小是有變化的。

## 七、結論

本文旨在比較「變遷調查」近年來所做的調查中，民衆政治容忍的態度與長期變化趨勢，以及影響民衆政治容忍態度之因素。政治容忍是民主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因素，較高的政治容忍讓民主的多元得以呈現。

本文對政治容忍的測量採取Sullivan等人(1981)之內容控制測量，先詢問民衆危害社會最大的是哪一種主張的人，再繼續問其是否願意給他們各種權利。比較1992年與1998年之資料，本文發現民衆之政治容忍度並未因逐漸民主化而上升，主張共產主義的人在兩次調查中都是最高的目標團體，而且也是民衆最不能容忍的對象。但是在兩次調查中，民衆對主張台獨者與統一者之看法有轉變。再者，性別、年

齡、省籍、教育程度、政黨喜歡度、統獨立場與目標團體的選擇大多呈現顯著的關係。

至於究竟有那些因素可能影響民衆的政治容忍度，本文發現無論在 1992 年或 1998 年，性別、年齡、參與團體與政治容忍皆無顯著相關。省籍在 1992 年有影響，1998 年此種影響便消失。教育程度、民主價值、政黨喜歡度、不同的目標團體在 1992 年與 1998 年皆影響民衆之政治容忍度。Peffley 等人(2001)的研究發現社會經常有正反意見的討論，久而久之，民衆的態度就會較容忍。可惜「變遷調查」在 1998 年之後並沒有相關的問卷調查題目可供分析。若借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之資料，似乎可以看出近年來儘管政黨對立，但是大家動口不動手，反而促進了對敵對團體的政治權利的容忍，也就是在更開放的社會下，政治容忍度應會提升。

## 附錄 「變遷調查」問卷題目

### 第二期第三次問卷題目（1992年）

#### (一) 政治容忍題組

D1 哪種政治主張對我們社會的危害最大？

- (1) 主張恢復戒嚴的人 (2) 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人  
(3) 主張共產主義的人 (4) 主張海峽兩岸立即統一的人

D2 應該禁止他們自由出入境嗎？

D3 應該禁止他們舉行集會遊行嗎？

D4 應該禁止他們在電視上發表言論嗎？

D5 應該禁止他們擔任學校老師嗎？

D6 應該禁止他們競選縣市長或民意代表嗎？

D7 應該禁止他們擔任公務員嗎？

#### (二) 民主價值

1. 政府把治安交通經濟搞好就好是否民主不重要。
2. 從解除戒嚴後的變化來看台灣不適合實行民主。
3. 社會那麼亂是因為政府給人民太多自由的緣故。
4. 今天社會那麼混亂，跟解除戒嚴有直接的關係。

本文將以上四題重新編碼成 1-5 分的五分量表，非常同意為 1 分，同意為 2 分，無意見為 3 分，不太同意為 4 分，非常不同意為 5 分，四題分數加總作為民衆民主價值的指標，分數越高表示越具有民主價值，分數越低表示民主價值程度越低。

#### (三) 政黨的喜歡程度

我國社會上有人喜歡國民黨，有些人喜歡民進黨，也有些人都不喜歡，請問您對他們的喜歡程度？

- (1) 國民黨  
(2) 民進黨

#### (四) 參與團體

請問你目前參加了那些社會團體？（可複選）

- (1) 宗親會 (2) 職業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 (3) 宗教團體  
(4) 同鄉會 (5) 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等） (6) 校友會所  
(7) 祠堂、祭祀公業 (8) 政治團體（如政黨等）  
(9) 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學術團體、婦女團體）

## 第三期第四次題組（1998年）

## (一) 政治容忍

在下列各種人中，請問您認為對我們社會的危害最大是那一種人？

- (1) 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人
  - (2) 主張共產主義的人
  - (3) 主張台灣應該接受中共所提一國兩制的人
  - (4) 其他
- a 請問您認為應該禁止他們在電視上發表言論嗎？
  - b 請問您認為應該禁止他們擔任中小學老師嗎？
  - c 請問您認為應該禁止他們擔任政府官員嗎？

## (二) 民主價值

1. 一種言論或意見，可不可以在社會上公開流傳，應該讓政府來決定
  2. 以這幾年的政治情況來看，台灣並不適合實施民主政治
  3. 政府如果常常受到民意機關的牽制，就不可能有所作爲了
  4. 國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應該聽從中央政府首長的決定
  5. 在地方上，如果有許多不同意見的團體，就會影響到地方的安定
- 以上五題，非常同意爲 1 分，同意爲 2 分，無意見爲 3 分，不同意爲 4 分，非常不同意爲 5 分。分數越高表示民主價值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 (三) 政黨的喜歡程度

1. 我們希望了解一般民衆對政黨的感覺，請問您是否喜歡國民黨？程度怎樣？
2. 是否喜歡民進黨？程度怎樣？

## (四) 參與團體

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參加民間社團，或是和親戚、朋友或同事等，組休閒團體？

- (1) 沒有 (2) 有
- (1) 宗教團體
  - (2) 同業公會／工會
  - (3) 運動／休閒／娛樂團體
  - (4) 社交團體
  - (5) 教育／個人成長團體
  - (6) 社會公益團體
  - (7) 政治性團體
  - (8) 其他

## 參考文獻

- 朱雲漢(2004)2002年至2004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民國九十二年民主化與政治變遷民調案。國科會研究計劃，編號：NSC 92-2420-H-001-004。
- 胡佛、徐火炎(1983)結構性的政治文化：概念類型及面向的探討。見第三次社會指標研討會論文集(上册)，頁47-82。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陳陸輝、鄧忠俊(2005)台灣民衆政治容忍感的分析與探討——以TEDS2003爲例。2005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5月22日。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 傅仰止、伊慶春(1994)容忍態度的結構肇因：都市背景、遷移經驗、異質聯繫。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2): 257-301。
- 黃秀端(1996)台灣民衆政治容忍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6: 1-38。
- 劉義周(2005)2002年至2004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V)：民國九十三年立法委員選舉大型面訪案。國科會研究計劃，編號：NSC 93-2420-H-004-005-SSS。
- 鄧忠俊(2005)台灣民衆政治容忍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Adorno, Theodor W., Else Fre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hry, Donna (1987) *Politics, Generations, and Change in the USSR*. Pp.

- 61-99 in *Politics, Work, 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 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 edited by James R. Mill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Bahry, Donna, Cynthia Boaz, and Stacy Burnett Gordon (1997) Tolerance, Transition, and Support for Civil Liberties in Rus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0: 484-510.
- Bobo, Lawrence, and Frederick C. Licari (1989)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Testing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Sophistication and Target Group Affec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3: 285-308.
- Brehm, John, and Wendy Rahn (1997)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3): 999-1023.
- Cigler, Allan, and Mark R. Joslyn (2002) The Extensiveness of Group Membe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The Impact on Political Tolerance Attitud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5(1): 7-25.
- Culter, Stephen J., and Robert L. Kaufman (1975) Cohort Changes in Political Attitudes: Tolerance of Ideological Nonconformit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9: 69-81.
- Davis, James A. (1975) Communism, Conformity, Cohorts and Categories: American Tolerance in 1954 and 1972-7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3): 491-513.
- (1992) Changeable Weather in a Cooling Climate Atop the Liberal Plateau: Conversion and Replacement in Forty-Two General Social Survey Items, 1972-1989.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6: 261-306.
- Duch, Raymond M., and James L. Gibson (1992) 'Putting Up With' Fascis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Cross-Level Analysis of Political Toleranc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5: 237-273.

- Duckitt, John, and Belinda Farre (1994)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 among Whites in the Future Majority-Rule South Africa.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4(6): 735-741.
- Gibson, James L. (1992)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Political Tolerance: Must Tolerance Be "Least Like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2): 560-577.
- Gibson, James, and Raymond M. Duch (1993) Political Intolerance in the USSR: The Distribution and Etiology of Mass Opi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6(3): 286-329.
- Golebiowska, Ewa A. (1995) Individual Value Priorities,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Political Behavior* 17(1): 23-48.
-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ckman, Mary R. (1977) Prejudice, Tolerance, and Attitudes toward Ethnic Group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 145-169.
- (1978) General and Applied Tolerance: Does Education Increase Commitment to Racial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302-324.
- Karpov, Vyacheslav (1999) Political Tolerance in Po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77(4): 1525-1549.
- Lawrence, David G. (1976) Procedural Norms and Tolerance: A Reassess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 80-100.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Earl Raab (1970)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 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0*.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rcus, George E., John L. Sullivan, Elizabeth Theiss-Morse, and Sandra L.



- Wood (1995) *With Malice toward Some: How People Make Civil Liberties Judg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losky, Herbert (1964)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361-382.
- McClosky, Herbert, and Alida Brill (1983) *Dimensions of Tolera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 McCutcheon, Alan L. (1985)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Tolerance for Nonconformity in the American Public.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9: 474-488.
- McIntosh, Mary E., Mac Iver, Martha Abele, Daniel G. Abele, and David B. Nolle (1995) Minority Rights and Majority Rule: Ethnic Tolerance in Romania and Bulgaria. *Social Forces* 73(3): 939-968.
- Muller, John (1988) Trends in Political Toleran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 1-25.
- Nunn, Clyde A., Harry J. Crockett, and J. Allen Williams (1978) *Tolerance for Nonconformi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Peffley, Mark, and Lee Sigelman (1989) Intolerance of Communists during the McCarthy Era: A General Model.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3: 93-111.
- Peffley, Mark, Pia Knigge, and Jon Hurwitz (2001) A Multiple Values Model of Political Toleranc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4(2): 379-406.
- Peffley, Mark, and Robert Rohrschneider (2003)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in Seventeen Countries: A Multi-Level Model of Democratic Learning.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6(3): 243-257.
- Prothro, James W., and Charles W. Grigg (1960)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Bases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22: 276-294.

- Putnam, Robert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amir, Michal, and John L. Sullivan (1983)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Tole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911-928.
- Sniderman, Paul M. (1975) *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niderman, Paul M., Philip E. Tetlock, James M. Glaser, Donald Philip Green, and Michael Hout (1989) Principled Tolerance and the American Mass Public.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25-45.
- Stouffer, Samuel C. (1955)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A Cross-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Mind*. New York: Doubleday.
- Sullivan, John L., James Piereson, and George E. Marcus (1979)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al Tolerance: Illusory Increases, 1950's-1970'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 781-794.
- Sullivan, John L., George E. Marcus, James Piereson, and S. Feldman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Tolerance: The Impact of Social Class, Personality and Cogn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ducation* 2: 115-139.
- Sullivan, John L., George E. Marcus, Stanley Feldman, and James E. Piereson (1981)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Tolerance: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1): 92-106.
- Sullivan, John L., James Piereson, and George E. Marcus (1982) *Political Toleranc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ullivan, John L., Michal Shamir, Patrick Walsh, and Nigel S. Roberts (1985) *Political Tolerance in Context: Support for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New Zealand*. Boulder, CO: Westview.

Wang, T. Y., and G. Andy Chang (2006) External Threats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in Taiwa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9(3): 377-388.

Wilson, Thomas C. (1994) Trends in Tolerance toward Rightist and Leftist Groups, 1976-1988: Effects of Attitude Change and Cohort Success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8: 539-556.

Zaller, John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alkind, Sheldon S., Edward A. Gaugler, and Ronald M. Schwartz (1975) Civil Liberties Attitudes and Personality Measures: Some Exploratory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1(2): 77-91.



# 第 8 章

## 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 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

熊瑞梅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張峰彬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林亞鋒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

誌謝：本文初稿曾發表在 2008 年 11 月 1 日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階層組研討會」。本文另刊登於《台灣社會學刊》(2010, 44: 55-105)，感謝編輯委員會與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 摘要

本研究合併 1990、1992、1995、1997、2000、2002、2005 和 2007 等八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民眾社團參與的資料，引進 Yang 與 Land (2006) 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法，企圖釐清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時期與世代的效應。本研究發現民眾社團參與在 1995 到 2000 年間呈現些微下降，到 2000 年後劇降，2007 年有微升的狀況。根據層級線性分析的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分析，1990-2007 年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時期和世代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應。經過控制個人特質的固定效應（性別、年齡、族群、大學畢業學歷）後，時期的效應大於世代。1990-1995 年民眾社團參與率相對保持在較高的水準，但 2000 年以後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便很明顯。出生於 1956-1965 年的世代是社團參與最多的世代，其前後兩個世代也是積極參與社團的世代，1980 年以後的世代出現顯著地不積極參與社團的現象。大學畢業者在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的隨機效應是不明顯的，但大學畢業者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的隨機效應卻很顯著。

關鍵詞：情感性社團、工具性社團、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法、民主轉型、高教擴張

## Changes of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fter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Effects and Implications of Period and Cohort

Ray-May Hsu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engbin Ch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Ya-Feng L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study merged eight years of data on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from the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and 2007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using Yang and Land's (2006) age-period-cohort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ose factors on changes in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mall decline between 1995 and 2000, a dramatic decline after 2000, and a small amount of growth in 2007. According to results from a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the influences of period and cohort on these changes are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ge, ethnicity, and attainment of a college degree, the effect of period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cohort. We found that the 1956-1965 cohort was the most active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that post-1980 cohorts were generally inactive. The effects of college educa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expressiv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but they were significant for instrumental voluntary associations.

*Keywords: instrumental associations, expressive associations,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democratic transition, educational expansion*



## 一、前言

近二十年來，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在憂心「民衆社團參與呈現下降的趨勢」。政治學家 Putnam (1995)使用美國多年期全國性的民衆社團參與調查資料，發現美國民衆社團參與的下降趨勢；進而警告美國人，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所蘊含的信任規範和來回交換互惠性(reciprocity)的網絡社會資本正在下降。若美國社會一般信任下降，會導致政府治理效率下降，進而危及民主政治的發展。Skocpol (2003)針對這樣的下降趨勢，指出社團組織趨向組織化與制度化後，造成社團組織漸漸由菁英來管理，社團內跨階級的互動減少，組織民主的精神漸漸喪失，導致公民參與的意願降低。不論是從政治學或社會學的角度來反省這個趨勢，都可見民衆社團參與趨勢下降是學術上重要的研究問題，但在趨勢分析方法和變遷趨勢的解釋上仍在探索的階段。

1987年的政治解嚴是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自主性社團得以合法地發展。然而，台灣過去在探討民衆社團參與的議題，多半偏向社會運動組織動員發展的個案研究，或是使用零星片段的統計資料來展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故，至今仍缺乏完整且有代表性的長期資料來具體呈現變遷的趨勢與意涵；也因此，我們無法確立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的趨勢，並進一步解釋可能的結構因素。有些研究使用內政部公布的社團參與資料描述性地呈現社團參與趨勢（王甫昌 2003；林勝偉、顧忠華 2004），這些研究呈現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是快速成長的趨勢。然而，林亞鋒(2007)比較 1992、1997 和 2002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民衆社團參與數目時，卻發現民衆社團參與數目有下降的趨勢。可見，資料的片段和資料品質沒有確立，以及分析方法的不一致，都會導致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確立與解釋的問題。故從事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研究時，首先

要在分析策略和分析方法上確立一個比較細緻的趨勢分析技巧；繼而，還需探索解釋影響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制度轉型力量。

在分析策略上，西方學者在分析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時，都會考量依照社團的類型，來觀察變遷趨勢。例如：Putnam (1995)的研究發現真正造成美國民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主要是指民眾參與鄰里性社團和教會的數目下降；反之，參與新興的婦女和環保團體的數目是呈現成長的趨勢。本研究在社團參與的類型分類上，透過嚴謹的文獻回顧概念化過程，及統計分析策略，採用「情感性社團」和「工具性社團」的分類，並企圖觀察民眾在不同類型社團參與上的變遷與意涵。情感性社團主要是在滿足會員的內部需求，促進成員的情感連帶與凝聚力；工具性社團是結合會員的集體行動力量，有目的地向組織外的社會與政府爭取利益，改變政策。鄰里和教會等社團，是傾向於情感性社團，而婦女和環保社團是屬於工具性社團。

社會學家提出各種較精深的趨勢分析方法，可以分解並驗證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效應。Paxton (1999)將時期當成自變項，對民眾一般信任和社團參與數目進行因果關係分析，結果發現時期對民眾社團參與數目沒有任何顯著影響。其實，將一般社會調查多年期資料合併，過去多半是使用世代分析，但世代分析無法釐清時期、年齡和世代之間的相關。直到 Yang 與 Land (2006)從 2004 年以來一系列的論文，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s Model, CCREM)，來驗證時期和世代的影響效應，社會變遷趨勢的成分效應才得以更精緻地被分解和驗證。本研究企圖引進他們的分析方法來分解並釐清台灣民眾從 1990 年以來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時期和世代效應。

爲了要解釋解嚴以來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時期和世代的制度變遷意涵，本研究企圖從兩股社會制度轉型趨力來探索之。一股社會力是來自於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另一股社會力則是來自於台灣的高

等教育擴張，大學畢業者或中產階級對於社團參與的理性化變遷模式。政治學者認為台灣的民主轉型是一個由上而下，由國家主導漸進改革的模式，並非像西方民主化發展過程中，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由下往上發展的模式(Gilley 2008)。故，在解釋反省台灣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時，本研究特別注意台灣民主轉型經驗與經驗資料的關連性。社會學家在探索台灣社團參與和社會運動組織興起的社會力解釋時，多半主張社會參與的成長源自於中產階級的興起（蕭新煌 1990）。照理說，從 1990 年以來，台灣高等教育快速擴張是有利於民眾的社團參與和市民社會的發展。高等教育的人多半是中產階級的來源，這群人的社團參與行為是相當利益導向的理性選擇，期望社團參與的行動能有效地影響公共政策。隨著高教擴張，大學畢業生會參與更多的社團。

總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企圖使用較精緻的統計分析，勾勒台灣解嚴後民眾真實的社團參與圖像；並嘗試從兩股與這個社會變遷趨勢關連的制度轉型來詮釋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社會學意涵。本研究將使用 1990、1992、1995、1997、2000、2002、2005、2007 等八年的「變遷調查」民眾社團參與的資料，進行兩階段的分析。第一個階段是描述八個時點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第二階段則使用 Yang 與 Land (2006) 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法，企圖釐清對民眾社團參與變遷的影響效果。同時，我們也特別關注大學畢業的受訪者對於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在不同的時期上的變化。最後，我們進一步地針對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和工具性社團數目進行相同的模型分析，並且企圖探索高等教育擴張後，大學畢業對情感性社團及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如何隨時間變化而變異。

## 二、文獻探討

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相關研究存在許多爭論，在文獻探討時，首

先回顧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相關文獻，及討論情感性和工具性社團類型在研究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分析的意義，並針對分析方法的討論作一個簡單回顧與反省。繼之，我們企圖從解嚴後的民主轉型與高教擴張來探索與台灣社團參與下降趨勢的關聯性。

## (一) 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研究發現與爭論

Putnam (2000)在《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中，具體的提出美國民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引發學術界和公共政策界很大的震撼。Putnam (1995, 2000)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觀察到美國民眾在 1974 到 1994 年間，參與幾個重要組織的比例都在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主要社團是和教會有關的團體、勞工工會、兄弟會、退伍軍人協會、和學校服務有關的協會。此外，使用相同的題組，觀察不同年度的各項公民參與的指標（教會出席、公眾會議出席、投票率和花在鄰里社交時間、感覺信任的程度），結果都呈下降趨勢。社會學家後續針對 Putnam (1995)社團參與的下降趨勢的研究，使用相同資料，嘗試各種處理時間趨勢分析的方法與技巧，研究發現常出現不一致的現象。大致歸納的原因有二：社團參與類型意義不同，長期變遷趨勢也不同；隨著長期趨勢分析方法的改進，有關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分析有更精緻的發現與結論。以下將就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研究爭論，分成這兩個部分來討論。

### 1. 社團參與的類型與社會學意義

社團參與的類型不同，其變遷趨勢也不同，因此，在從事社團參與變遷研究時，先區分社團參與類型可以減少不同類型社團參與變遷趨勢造成的混淆效果。許多西方研究也指出民眾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團所生產出來的聯繫和功能是不同的。Putnam 及後續社會學者進一步分析相同資料的結果，也指出美國民眾社團參與下降快速的社區型和教會型的社團，會快速地瓦解社會凝聚力。大多數有關民眾參與社團組

織的研究，都會進行社團參與的分類，只是不同研究會採用不同分類概念定義。

不同類型的社團參與究竟有何社會學意義？法國社會學家 Rose (1954)認為志願組織可以分成情感性組織(expressive organizations)和具有社會影響力(social influence)的組織；前者是滿足成員興趣和情感滿足，後者則是參與團體希望透過團體的集體行動，對社會產生影響力及企圖改善社會的福利和就業條件。簡言之，前者是一種自我抒發情緒的情感性組織，後者則是透過集體行動產生公共政策改變的工具性組織。一些社會學家將民衆的社團參與分成地方性和跨地方性組織，也進一步發現地方性的組織是促進同質性的聯繫，但跨地方性的組織是促進異質性的聯繫。社團參與是地方性的類型，則社團參與偏向情感連帶與地方集體認同的功能；若社團參與屬於跨地域的組織，則社團參與傾向於工具性的目的與功能(Feld 1982; Kalmijn and Flap 2001; Marsden 1990; Popielarz and McPherson 1995)。所謂工具性志願組織是組織成員為組織以外的活動和目標而努力，例如：職業團體和政治團體，都為了要透過立法，為社會或成員獲取更多利益。但情感性的組織，則是組織內部成員在參與組織內部活動時，便能滿足組織成員自身的需求和社交性功能(Glanville 2004)。

社會網絡的學者，長期以來在分類社團參與的類型時，會考量社團類型所奠基的同異質性或強弱聯繫和功能。一般而言，情感性社團，多半是仰賴血緣、地緣及宗教等社團，社團內部成員聯繫強度較強，同質性較高，容易形成封閉性的網絡，進而產生較高的結構凝聚力(McPherson et al. 2001)；例如：Coleman (1988)指出社區鄰里學校父母子女間網絡關係的封閉性，有利於信任規範的形成和社會控制功能的產生。工具性的社團傾向於集結異質化和較弱的聯繫，工具性的社團較易將來自不同階級身分地位的人，藉著弱聯繫，將異質化的個人和團體連結成一個鬆散整合的社會(Breiger 1974; Granovetter 1973)，故工

具性社團參與具有橋樑者的效應。Putnam (2000)也認為一些鄰里性的社團參與有助於凝聚(bonding)，而一些跨區域的社團參與有助於搭橋(bridging)。

林南(Lin 2001)使用 1997 年「變遷調查」資料，企圖將六種社區協會和七種一般志願組織分別進行因素分析。六種社區協會分成參與村里團體和參與教會團體兩群，七種志願組織分成專業和政治團體。再將這四種團體進行二度因素分析，而產生了地方性(local)和全面性(global)社團的社團參與類型。林南發現地方性的社團參與和民衆特質的差距(range)無關，但全面性的社團參與民衆，其各種社經特質差距明顯地較異質多元。

行政院主計處「社會發展趨勢調查」(2003)比較民國 88 年和民國 92 年的民衆社團參與。這個調查發現最近一年(2003 年)台灣民衆參與一個及多個社團占 28.11%，相對是低於「變遷調查」結果。再更進一步地觀察細分類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可看出民衆社團參與比例下降的社團有職業團體、政治團體、學術文化團體。但不變的甚至成員增加的社團包括宗教團體、學校社團、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醫療衛生團體、休閒團體和宗親會、同鄉會和校友會。這些資料顯示了，台灣民衆在情感性社團參與上保持穩定或成長趨勢，但工具性社團參與上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從以上民衆參與不同類型社團比例變遷的趨勢來看，和過去一些片段的統計資料是不一致的；以上台灣民衆參與情感性和工具性社團變遷模式的差異，在過去社會學家個案的社會運動組織動員研究中，也不容易觀察到。

總之，不論是從有關社團參與類型的文獻，或從官方民衆社團參與統計來看，在理論概念定義和實際資料分類模式上，情感性和工具性社團的分類是較恰當的。

## 2. 社團參與趨勢分析方法的演進

社團參與變遷研究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時段，分析技術上有不



同的進展。在 1980 年以前有關社團參與變遷的分析停留在不同時期社團參與的描述性分析；亦即將不同時段，民衆人口社會經濟地位特質對社團參與進行交叉分析的卡方檢定，及比較不同時段，這些基本人口社經地位對社團參與的影響有哪些變化。Hyman 與 Wright (1971) 針對美國在 1950 至 1970 年間的社團變遷進行描述性分析時，發現這段期間，教育程度高和社經地位高的人，參加社團數目也較多；但考量這些影響社團參與的人口社經地位特質在時間的變遷上，又發現美國在 1960 時期時低地位和黑人對參與社團數目的正面影響力增加。可見，社經地位對於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會隨著時間區段有所改變。

而後續一些社會學家使用 Putnam (1995) 的社團參與變遷資料，企圖分析時期對於不同類型社團參與的影響效應，也嘗試使用不同的統計分析方法，常得到不一致的研究結果。Bear 等人 (2001) 重新使用 Putnam (1995) 的資料，將社團參與類型分成所有的社團參與類型，和剔除工會與教會的社團參與類型。結果發現，美國教會和工會在 1974-1994 年是呈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當沒有納入這兩種社團參與類型時，美國民衆社團參與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換言之，研究若不考量參與社團的類型，則很難精確地掌握社團參與在時期上變遷的模式。此外，Rotolo (1999) 控制年齡和教育水準，將時期當作一個變項，觀察時期的非線性效應。他發現社團參與趨勢是一個非線性，在 1974-1984 年間社團參與是下降，但在 1984 到 1994 年間有增加趨勢。Paxton (1999) 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二十年的資料，採取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EM) 模型來處理時間、信任、社團參與等多重指標間複雜因果關係。將時間當作這些結構模型的外衍變項，結果發現時間變遷趨勢的效果不是那麼明顯。雖然，Paxton (1999) 使用 SEM 分析方法，將時間當成一個面向因素，企圖將時間和社團參與的共變關係找出來，但這樣的分析，仍然無法釐清趨勢變遷分析中的年齡、世代和時期對依賴變項產生的混淆效應。這種混淆效應會造成估計係數不



穩定(Ryder 1965; Mason and Feinberg 1985)的問題。近年來，有關年齡—時期—世代趨勢分析技術有些新的突破，故對於許多社會變遷的趨勢分析，產生很大的影響。

時間趨勢的分析從過去世代分析研究演進到最近興起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age-period-cohort analysis)。近年來人口學家 Yang 與 Land (2006, 2008)針對使用大型長時期的橫剖面調查資料，進行趨勢分析，他們建議使用年齡—時期—世代分析。長久以來，趨勢分析中有一些影響成分是需要被拆解，長期趨勢的調查資料中，年齡、世代和時期之間是有線性關係，某個時間點的時期資料是等於受訪者出生世代加上年齡。這個線性關係，使得過去使用世代分析時，若將這三種類型資料放在同一個層次的分析單位來分析，則會彼此產生高的共線關係，使得估計誤差大，估計值不穩定。Yang 與 Land (2006, 2008)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來釐清趨勢變遷分析中的世代和時期效應(Raudenbush and Bryk 2002)。他們將出生世代分成每五年一個世代，出生世代和時期可以製作成一個交叉分類列聯表，這個列聯表的方格則是屬於時期與世代的交叉分層樣本數，當我們合併多重時期的大型調查資料時，每個時期對應世代的方格次數是不同的。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的層級線性分析，可以釐清依賴變項受世代、時期和個人差異的影響力。

本研究企圖引進這樣的研究分析方法，來釐清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在年齡、世代和時期的效應。民眾社團參與會隨著年齡、世代和時期而有變化。一般而言，年齡對於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是呈現倒 U 型(Erickson 2004)，民眾會隨著年齡從 20 歲到中年呈現社團參與增加，從中年到老年會逐漸下降的趨勢。不同出生世代的民眾所經歷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是不同的，故出生世代的社團參與行為也不同。政治民主開放的時代，民眾社團參與比較踴躍；以美國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來說，1950-1970 時期，是美國政治經濟強盛的時代，社團參與增

加。從 1974-1984 年，社團參與下降，1984 到 1994 年略微上升。換言之，1974 到 1984 年期間，美國遇到兩次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可見經濟和政治不穩定的時代，民衆社團參與有下降的趨勢。過去研究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幾乎都沒有將年齡、世代和時期的效應區分。因此，研究成果會出現不一致的現象。

本研究若能使用年齡—時期—世代的最新趨勢分析技巧，有效地釐清世代和時期對於社團參與的效應；緊接著所面臨的問題，究竟是有哪些社會轉型的力量，較能適當地詮釋台灣民衆在解嚴後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

## (二) 社會轉型與社團參與變遷

此外，本研究企圖針對解嚴後二十年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在時期與世代效應上的社會學意義作一個探索性的文獻回顧與詮釋。本研究歸納文獻，發現解嚴後的二十年間，影響社團參與在時間變遷上的社會轉型力量有兩個：民主轉型和高教擴張。

### 1. 民主轉型與社團參與變遷

Putnam (1993, 1995, 2000) 一系列的研究主張民衆的社團參與和有效的民主制度發展是長期互為因果的制度建構過程。亦即民衆社團參與的程度越踴躍，民主制度的政府組織治理效能越高(Tocqueville 1961)；政府治理效能高，則更誘使民衆參與社團，關懷監控政府效能(Fung 2003)。Putnam (1993)主張民衆社團參與變遷模式，是與民主制度效能互為因果的制度化過程，他嘗試從社會資本與歷史的制度理性選擇觀點，來分析義大利民衆社團參與和地方民主制度效能之間的長期動態關係。Putnam (1993)使用 12 個區域政府制度效率指標，發現北部和南部區域成對比，北部政府制度表現較佳，北部義大利有歷史以來，社區市民協會網絡就很豐富，經濟生活較佳，政治制度表現也較佳。誠如前面文獻已指出，Putnam (1995, 2000)後續使用美國一般社會

調查民眾社團參與資料，揭露美國人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造成民眾的一般信任下降，及對政府效率監控機制喪失，進而影響民主制度的發展。

Skocpol (2003)從社會學的角度卻提出對美國民眾社團參與數目下降趨勢不同的解釋。她認為由於美國社團組織越來越朝向菁英和專業的領導管理，使得會員喪失了民主參與和價值分享的機會，也使得社團中較少產生跨越階級界限的友誼，故使得原本在社團中多數人參與的集體行動，成為少數人透過菁英組織管理來從事議題決策和行動。故，人們藉著社團參與，產生對公共政策的公平參與，進而影響民主政府運作的效能機制，漸漸喪失；因而促使民眾對社團參與產生疏離，進而導致民眾社團參與數的下降。

以上這種從民主制度發展和民眾社團參與的宏觀因果邏輯來推理的社會變遷機制，可說是一種西方社會典型的由市民參與主導的民主制度發展過程。根據研究東亞民主發展的學者的觀點，台灣的民主制度是一種民主轉型模型(democratic transition) (Gilley 2008)。Cheng 與 Haggard (1992)認為台灣的政體轉型，是國民黨與反對勢力策略互動的政治過程結果。台灣的民主轉型模型大致上是從威權統合的路徑依賴制度轉型而來的(Gilley 2008)，基本上是由國家主導的民主轉型。國民黨政府面對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內部反對運動壓力，及外部國際地位和經濟危機，在蔣經國政體末期，宣布解嚴，是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解嚴後到 1990 年代，大致上是李登輝掌權的國民黨民主改革期。1990 年李登輝採納學運人士和教授的意見，承諾民主改革，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這個時期，正是民主轉型理論的社會動員階段。故，這段期間社會學者投入社會運動與組織動員研究的作品較多。到了 1996 年，總統直選，台灣民主轉型走向一個較完整的階段。在 1990 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動員和反對黨的勢力越來越組織化，使得台灣在 2000 年時，成功地產生政權移轉到民進黨。政治學者將台灣的民主轉型經

驗歸類「混和國家／社會引導」(mixed state/society-led transition)的民主轉型模型(Gilley 2008: 225)，亦即早期由國家主導改革，繼而社會運動與組織動員和反對黨的社會力促使政權和平移轉的模型。本研究企圖更進一步，具體地從文獻回顧中，整理出 1990 到 2000 年間的社團參與和社會運動組織研究的發現，及 2000 年後民進黨執政對民衆社團參與相關的文獻與論述，以便整理出 1990 年以後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可能有的解釋策略。

從民主轉型的模型觀點來看，解嚴後 1990 年代初期，市民參與模式可說是一個以社會運動力量來挑戰國家威權的「國家發展混和模型」時期。蕭新煌、尹寶珊(1998)便在那個時期，提出台灣公民社會的可能性觀點；他們認為台灣社會運動與資源動員的能量與能力，是有助於發展直接參與民主的公民社會。根據 Diamond (1999)的觀點，公民社會是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部門，本身具有自我組成與自我支持的能力，是受到法規與制度規範的社會參與生活場域。台灣即使在 1990 年代出現明顯的社會動員與民主改革特質，但仍然是一個國家主導由上而下的民主轉型模式。Diamond (1999)也認為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民主制度發展不穩定，未看到民主帶來的效率和國家發展，反而造成市民社會參與的退縮，以致形成民主倒退的現象。

1990 年代是國民黨李登輝執政的時代，國民黨統合的各種團體組織也漸漸鬆綁；同時，這也是台灣社會運動組織與本土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內政部提供的社團組織成員的數目，呈現 1990 年代初期台灣社團組織會員快速成長的圖像（王甫昌 2003；林勝偉、顧忠華 2004）。過去威權體制時，國民黨滲透到各個同業公會和職業工會，社團參與在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之下，民衆缺乏自由結社的能力。職業團體（工會與商會團體）幾乎都被國民黨員的領導幹部控制，無法代表團體成員的利益，社團主要功能在配合國家政策，會員較少有自主意識（朱雲漢 1989）。在威權體制瓦解後，這樣的統合侍從主義鬆

綁；加上台灣的勞動力大多屬中小企業，故不利於工會的成長；1990年代可說是民眾參與職業團體的工會、商會、農會與漁會等團體下降的時期（李允傑 1992；蔡東杰 2002: 190）。從社會學家從事的社會運動個案研究中，可看出由知識分子啟動的環保、婦女和教育改革社會參與是呈現成長的趨勢。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在解嚴前是由專家、草根力量和黨外人士啟動與組織動員的，解嚴政治民主化後到 1990 年代底，環境運動也漸漸組織化與制度化（何明修 2000, 2006）。范雲 (2003) 也針對婦女運動組織，進行了完整的運動者傳記紀錄資料蒐集與分析，發現台灣婦女運動的領導者，在 1980 年代時，便以非草根性的基金會組織形式推動婦女權益議題；到了 1990 年代，新一批的婦女運動者，積極地推動性政治和政黨認同，企圖產生社會更全面的影響力。

統計資料和個案研究都呈現，2000 年政權轉移、民進黨執政後，反而出現明顯的社團參與快速下降的現象，該如何解釋？林亞鋒 (2007) 整理 1992、1997、2002 年的「變遷調查」社團參與資料，發現 2000 年以後民眾參與非地方性社團的數目急速下降。從國內外文獻及研究成果可歸納出三個解釋方向。一個是當社團組織發展到制度化的階段所普遍存在的問題。2000 年後，當社團數目越來越多，社團彼此競逐社團會員，社團要能永續經營、持續發展，社團組織自然要更加組織化和專業化（李丁讚 2004）。民進黨政府的政策，也朝向讓社運組織朝向制度化管理及體制化，因此，也陷入 Skocpol (2003) 所提及的一旦社團組織走向菁英管理專業化，會喪失民眾民主參與的能力，進而造成民眾疏離，以及民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民間社團組織和傳統地方派系勢力的競爭能力。Madsen (2008) 發現台灣的社團間的連結效果不強，他也指出如慈濟的宗教團體的成長、組織與動員能力。台灣地方性和宗教性社團在 2000 年後相對穩定，且有成長的趨勢，這和美國民眾參與鄰里和教會數目下降的趨勢是相反的。這意味著國民黨執政時代，扶植的地方派

系，或以廟會地方宗教為主的地方勢力始終都具有其特殊歷史制度路徑依賴的影響力量。2000年後，有研究台灣社區公共參與和公民性的田野研究，發現一些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的專業性組織，進入社區進行社區改革，專業組織的影響力仍然很難和傳統地方派系與廟會結合而成的地方勢力競爭，故社區總體營造的市民組織力量反而最後無法產生社區改革的功能（吳介民、李丁讚 2005）。也因此，究竟地方派系是否仍然在台灣的地方政治有影響力，因為使用研究的資料和分析方法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論述。王金壽(2004)深入地分析某個縣市各鄉鎮的地方派系發展過程，似乎勾勒出地方派系在選舉動員能力上的衰退，故使得地方派系展現瓦解的趨勢。然而，徐永明、陳鴻章(2004)使用1983-2001年區域立委選舉資料，發現地方派系雖然有選舉動員效率降低的趨勢，但在政黨勢力競逐和議會地位影響力有強化的趨勢。也有個案研究發現，台灣廟會仍然和地方政治動員形成緊密結合重疊的關係，進而較全面地影響地方居民生活（蔡常斌 2005）。

最後的可能解釋是1990年代台灣社會動員期所生產的社運組織和社團組織領導人才，在2000年後納入行政系統所造成的影響效果。吳介民(2002)觀察到，民進黨在2000年執政後，過去從事民間社團組織與民主運動的領導人才，大量投入執政團隊，造成社會改革運動和社會改革議題相對地空洞化，故促使民間組織動員能力遞減。這種現象應該也可以部分解釋台灣在2000年以後民衆社團參與急遽下降的原因。

總之，隨著解嚴後，台灣民主轉型從初期的國家與社會混合發展時期，到市民社會漸漸自主且社團參與朝向組織化與制度化；演進到政權移轉的新興民主國家，由於民主效率不彰，導致市民參與倒退的現象。

## 2. 高等教育擴張與社團參與變遷

一個社會高等教育的擴張，有助於社會的現代化與理性化。社會



資本的研究者認為社會的理性化，是可以從人們的社團參與重疊模式和變遷趨勢來解釋。Coleman 認為社會發展是從原初關係發展到法人組織化的社會。在Coleman的現代社會分析中，人們的社會活動參與，從早期的家庭和鄰里等「原初的社會結構」(primordial social structure)，進展到許多社會活動都由國家和市場等「組織法人的社會結構」(corporate social structure)來主導(Coleman 1990:585)。人們經常是在各種社團組織活動中，認識新朋友。Völker等人(2009)在荷蘭進行全國性調查，發現荷蘭舊世代的民衆，所參與的家庭、鄰里和其他各種社團活動，成員重疊，但年輕世代的民衆，則經常在工作場所和教育機構認識新朋友，這些組織和家庭、鄰里等場合遇到的朋友不會重疊。荷蘭民衆參與社會各種類型的活動場合，越來越朝向工具性、目的性和特殊性的方向發展。

民主發展的現代化理論觀點，主張市民社會參與的興起，主要是經濟發展和中產階級興起使然。許多個案研究也證明，台灣在1990年代消費者運動、環境運動、婦女運動和教育改革運動都是知識分子的中產階級投入推動的。解嚴後，中產階級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中產階級藉著參與社團，進行自主且自由的結社並致力於對社會議題的反省與批判（朱雲漢 1990）。

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主運動和市民參與的發展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早期中產階級主要的組成分子多半是國民黨遷台帶來的外省籍文官和管理人員；新中產階級則主要是有專業技能、大學學歷及管理能力的成員。蕭新煌(1990)主編的《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一書中，多位學者研究企圖勾勒以大學畢業和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產階級對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反應。蔡淑鈴(1990)發現受過大學教育者和專業人員都認為自己所屬的階級和其他階級間有較高的利害衝突；但這群高等教育和專業者在支持農民上台北抗議的態度上，相對地比其他階級保守；但他們仍然關懷公平正義的事務。蕭新煌(1990)



認為這群高等教育和專業者，具有相當理性現實的性格，對社會改革運動也樂觀支持，若社會變遷不會帶來壞處，會支持；否則也會選擇撤退。從這些研究的論述，可以推導出高等教育民衆，從 1990 年以來，和其他教育團體相比，他們仍然是比較積極參與社團，有助於市民社會發展的一群人；但由於台灣過去經歷政權移轉和經濟衰退，政治經濟的不穩定，也影響這些高等教育者在社團參與數目的時間變遷效應是下降的趨勢。

台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在社會參與上會有世代的差別。從世代(cohort)的角度來解釋社會行動的差異，在西方文獻上，已經有相當長的學術傳統。Mannheim (1952[1927])認為一個人所處的世代，就如同其所屬的階級一般，會賦予個人在社會和歷史時點當中一個特殊的位置。也因此讓這樣的一群人擁有特別的思考模式。

Inglehart (1990: 56)從西方國家的調查資料中發現二次大戰後出生的世代，在價值觀和態度上跟先前世代有明顯的差異。戰前出生的世代，有物質缺乏的經歷，因此重視經濟成長和工作保障，而戰後出生的世代則比較強調環境保護，以及生活品質的維持，甚至會以犧牲經濟成長來換取這樣的價值優先性。Putnam (2000: 275)則認為在戰爭時期成長的人，會終其一生投入市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Davis (2004)則利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的長期重複性調查資料顯示相對於其他世代，在 1960 年代進入 16 歲年紀的美國民衆，在權威、家庭、言論自由、種族及性關係方面，終其一生都保持比較開放的價值與態度。蕭阿勤(2008)指出世代、知識分子與台灣公共論述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對於公民社會參與和台灣認同的公共論述上有世代的差別。1970 年代的大學生在學校社團和社會參與的公共論述上，都呈現社會服務和民族意識的集體情感，但 1980 年代的大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改革和推動台灣主體意識論述。1970 年代的大學生是 1950 年代出生的世代，1980 年代的大學生則是 1960 年代出生的世代。

我們認為這兩個世代與台灣各世代相比，應該是社團參與較多的世代，但 1970 年代以後出生的大學生，對於公共參與的投入應該是呈現下降的趨勢。在台灣社會的發展經驗上，1970 年代受到一連串如退出聯合國等外交挫折的衝擊，當時年輕人感受到國家社會生死存亡的危機，從而激發出許多社會行動（蕭阿勤 2008）。相對於之前和之後的年輕人，這群戰後出生、在 1970 年代讀大學的世代，在歷史事件的衝擊下，展現出有別於其他世代的特殊行為模式。

中外文獻也顯示教育程度對民衆社團參與的效應在時期上是有差異的。Skocpol 發現從 1975 到 1995 年間，美國大學畢業者平均參與社團數是比其他教育群體高，但變遷的趨勢是下降的。但其他教育群體的平均社團參與數目、社團參與比例沒有明顯下降（Skocpol 2003: 187）。張茂桂（1990）觀察到在 1987 年解嚴前，台灣知識分子在各種類型的社團組織扮演重要的領導性角色，例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婦女運動組織、環保組織、勞工組織及原住民組織等。在 1987 年後這些知識分子仍持續投入這些社會改革社團組織，但這些社運組織在解嚴後有較多的政黨人士投入，使得知識分子從核心漸漸地被邊緣化，進而退縮疏離。

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對大學畢業者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在時期上會有不同的變化。解嚴後高等教育快速擴充，大學家數從 1986 年的 16 所增加到 2008 年的 102 所，學院從 1986 年的 12 所增加到 2008 年的 45 所。Gesthuizen 等人（2008）使用 2004 年 Eurobarometer Survey 及層級線性迴歸模型來分析 28 個國家的調查資料，探討教育擴張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在個人層次的分析上，發現教育程度對大部分的社會資本指標都具有正面的影響，卻對地方性的鄰里互動和活動參與沒有影響。具體而言，他們發現教育程度高者較會參與社團，公民意識較強；但教育程度低者，有比較高的地方主義，比較偏好鄰里互動和參與地方性的活動。在國家層次的分析上，他們發現教育擴張程度高的

國家，國家內部民衆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社會資本的不平等差異變小。此外，也發現教育擴張會對民衆社團參與機率有正面的效應，但對社團參與捐獻呈負面的效應。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教育擴張程度大，則會使得這個國家內部的高教育和低教育者比較可能互動，且高教育程度者帶領低教育程度者加入社團的可能性增高，進而整個國家民衆社團參與數目會增加。然而，教育擴張對民衆社團參與的研究不但稀少，且仍然存在不一致的結果，目前找到的文獻也只限於跨國比較研究，缺少長時期社會變遷資料的分析，本研究企圖從大學畢業者對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在時期上的變遷來探討，也是一個新的探討教育擴張與社團參與變遷的策略。

### 三、研究方法

#### (一) 資料來源和變項測量與描述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合併「變遷調查」二期一次(1990)、二期三次(1992)、三期一次(1995)、三期三次(1997)、四期一次(2000)、四期三次(2002)、五期一次(2005)、五期三次(2007)等八次的調查資料。<sup>1</sup>這八次的調查資料都具有社團參與資料，其中1990、1995、2000和2005年是一組完全相同的問法：請問目前你參加哪些團體？選項有：(1)宗親會，(2)職業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3)宗教團體，(4)同鄉會，(5)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6)校友會，(7)祠堂、祭祀公業，

<sup>1</sup> 本論文在研究過程中，曾經選擇四個年度資料（1992、1997、2002和2007年）以維持相等的時間距離來驗證民眾社團參與變遷的趨勢。其分析結果和八個年度結合的資料相類似。為求時期—世代交叉細格內有足夠的樣本數，進而獲得較穩定的估計係數，本論文採用八個年度的合成資料作為分析的基礎。

(8)政治團體（如政黨等），(9)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學術團體），(10)其他團體。在1992、1997、2002和2007年的問卷中詢問受訪者目前參加哪些團體，1992、1997年和前述的社團參與類屬相同，2002和2007年的選項設計有些變更，刪除了政治團體選項，但多了參加哪些政黨的題目，在社團參與的選項上多了社區管理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協會。為了能從事八年的比較，1992、1997、2002、2007年的資料，只要是受訪者有參加政治團體或政黨都過錄成參加了政治團體；由於2000年以前，沒有社區管理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協會，故將這個社團選項歸類成其他社團。本研究在分析時，刪除其他社團，保持八年的社團參與類屬完全相同；如此，可以從事社團參與時間變遷的比較。

1992、1997、2002、2007年社團參與的問題，我們為了能從事比較，將政黨併入政治團體，最後使用九種社團參與來分析。當我們將這八年的社團整理成九組相同的社團，便可以將八年的資料合併成完全一致的九種類型社團。並進一步地使用 Mplus 進行探索性類別因素分析，九個社團參與變項區別出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命名成情感性社團，依照因素負荷值的大小順序為宗親會、同鄉會、社區祭祀團體和宗教團體；從前面文獻探討的概念化定義，到客觀的因素負荷值的順序，可定義這些類型的社團都是強調家族、鄰里和宗教等強聯繫組成的集體情感強且凝聚力高的社團。第二個因素命名成工具性社團，依照因素負荷值大小順序分別為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學術團體）、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政治團體（如政黨等）、職業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及校友會等由弱聯繫組成的工具性利益團體。

本研究使用到的分析變項有性別（1 = 男性，0 = 女性）、年齡、大學畢業與否（以教育年數 16 和以上為標準）、族群（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大陸外省、原住民）。關於這些基本變項和社團參與的描述

性分析分別在表 1 和表 2。表 1 是八年資料的民衆平均社團參與數、情感性與工具性社團參與數、性別、年齡、大學畢業生比例及族群比例的概況。整體上來說，性別、年齡及族群的變化並不大，維持著相當穩定的變遷趨勢。在大學畢業生比例中，1995 及 1997 年以後比例明顯上升，1997 到 2000 年從 9.9%增加到 14.8%、2000-2002 年及 2002-2005 年都以將近 4%的比例增加，最後到了 2007 年，約有 24.5% 的人擁有大學畢業及以上的學歷，充分反映出台灣高教擴張的現象。

此外，平均個人參與社團數則呈現下滑的趨勢，在 1990-2000 年間相對穩定，但在 2000 年後開始大幅滑落，到了 2005 年的時候，幾乎只剩下前期的一半，但在 2007 年的時候，有開始回復的跡象。

表 2 是九個社團在八年中變化的情形，爲了較易觀察，區分成情感性社團以及工具性社團。在情感性社團中，其變化的趨勢較不明顯，約都在 11%-16%間變動，但如果仔細比較個別四個社團，可以發現在宗親會、同鄉會及祠堂祭祀公業這三種的變化並不大，比例的變動主要來自於宗教團體，而宗教團體到了 2007 年的時候，有開始微幅上揚的現象。

在工具性社團中，變化就相當明顯，從 1992 到 2005 年止，都是持續下滑的趨勢，從 1992 年 42.8%的民衆參與工具性社團，下降到 2005 年僅 23.8%的民衆參與工具性社團。民衆參與工具性社團的比例，也是到了 2007 年的時候，才又往上彈升。仔細觀察個別工具性社團比例的變化，變動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民衆參與職業團體的比例，2005 年約只剩下 1990 年的三分之一，從 25.1%大幅下降到 9.8%，民衆參與職業團體比例快速下降的趨勢和民衆參與政治團體比例快速下降的趨勢很類似。民衆參與政治團體的變遷趨勢，應該要分成兩組變遷時段模式來觀察，亦即分別就 1990 年(7.9%)、1995 年(6.4%)、2000 年(4.6%)、2005 年(1.5%)（這四年社團題組相同）的變遷模式；以及 1992 年(20.4%)、1997 年(16.6%)、2002 年(7.4%)、2007

表 1 社團參與之描述性統計資料，1990-2007

變項名稱 \ 時期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2007	總計
社團參與數 <sup>a</sup>	.73 (.91)	.73 (.91)	.74 (.95)	.66 (.87)	.70 (.94)	.49 (.85)	.44 (.79)	.63 (.97)	.65 (.91)
情感性社團參與數	.19 (.48)	.15 (.41)	.21 (.49)	.13 (.39)	.19 (.43)	.12 (.37)	.15 (.40)	.19 (.46)	.16 (.43)
工具性社團參與數	.50 (.71)	.55 (.77)	.48 (.71)	.47 (.69)	.46 (.72)	.32 (.63)	.27 (.57)	.34 (.64)	.44 (.69)
平均年齡 <sup>b</sup>	38.70 (11.35)	40.79 (11.82)	40.01 (11.37)	40.96 (11.46)	41.61 (11.23)	40.35 (12.71)	40.73 (12.74)	41.19 (12.67)	40.47 (11.91)
男性	47.1%	45.8%	49.6%	49.6%	49.5%	48.3%	50.1%	49.6%	48.6%
大學 <sup>c</sup>	9.9%	8.5%	11.0%	9.9%	14.8%	18.3%	23.9%	24.5%	14.3%
族群 <sup>d</sup>									
閩南	73.2%	74.1%	69.6%	78.0%	74.7%	77.4%	73.4%	74.5%	74.5%
客家	13.1%	11.8%	14.3%	10.9%	10.5%	11.7%	15.5%	13.3%	12.6%
外省	12.7%	13.5%	13.2%	9.4%	12.5%	9.7%	9.7%	10.8%	11.5%
原住民	1.0%	.6%	2.9%	1.8%	2.4%	1.2%	1.5%	1.4%	1.5%
總計	2,521	2,324	1,831	2,566	1,622	1,667	1,825	1,695	16,051

<sup>a</sup> 括弧內數值為標準差。

<sup>b</sup> 三期三次以前調查之母體年齡為 20 歲到 65 歲，四期三次後才取消 65 歲以上之限制，為了整體的統一，因此本論文將四期三次之後 65 歲以上也都排除掉。

<sup>c</sup> 學歷為大專以上之比例，本論文定教育年數 16 年為到達此一標準。

<sup>d</sup> 族群僅保留四大族群以便後續處理及分析。

表 2 各時期參與各社團之情況

社團類型/ 時期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2007	總計
情感性社團 <sup>a</sup>	311 (15.9)	306 (13.2)	331 (18.1)	292 (11.4)	279 (17.2)	186 (11.2)	248 (13.6)	276 (16.3)	2,319 (14.4)
宗親會	145 (5.8)	82 (3.6)	95 (5.2)	82 (3.2)	64 (3.9)	28 (1.7)	51 (2.8)	53 (3.1)	601 (3.7)
宗教團體	210 (8.3)	179 (7.7)	205 (11.2)	190 (7.4)	186 (11.5)	144 (8.5)	180 (9.9)	211 (12.4)	1,503 (9.4)
同鄉會	70 (2.8)	55 (2.4)	41 (2.2)	35 (1.4)	33 (2.0)	21 (1.2)	30 (1.6)	26 (1.5)	311 (1.9)
祠堂祭祀	56 (2.2)	29 (1.2)	41 (2.2)	30 (1.2)	17 (1.0)	13 (.8)	12 (.7)	23 (1.4)	221 (1.4)
工具性社團	1,068 (42.4)	995 (42.8)	751 (41.0)	1,034 (40.3)	640 (39.5)	452 (27.1)	435 (23.8)	562 (33.2)	5,937 (37.0)
職業團體	632 (25.1)	464 (20.0)	467 (25.5)	516 (20.1)	354 (21.8)	180 (10.6)	178 (9.8)	208 (12.3)	2,997 (18.7)
康樂團體	109 (4.3)	74 (3.2)	97 (5.3)	83 (3.2)	90 (5.5)	72 (4.3)	97 (5.3)	55 (3.2)	676 (4.2)
校友會	232 (9.2)	144 (6.2)	108 (5.9)	67 (2.6)	106 (6.5)	72 (4.3)	64 (3.5)	92 (5.4)	885 (5.5)
社會團體	88 (3.5)	126 (5.4)	93 (5.1)	126 (4.9)	127 (7.8)	91 (5.4)	124 (6.8)	78 (4.6)	851 (5.3)
政治團體 <sup>b</sup>	200 (7.9)	475 (20.4)	118 (6.4)	425 (16.6)	75 (4.6)	126 (7.4)	28 (1.5)	145 (8.6)	1,592 (9.9)
至少參與一個社團	1,216 (48.2)	1,107 (47.6)	884 (48.3)	1,112 (43.3)	744 (45.9)	539 (32.3)	548 (30.0)	613 (36.2)	6,763 (42.1)
總計	2,521	2,324	1,831	2,566	1,622	1,667	1,825	1,695	16,051

<sup>a</sup>括弧內數值為百分比。

<sup>b</sup>二期三次及三期三次中有政治團體及政黨兩種選項，四期三次之後只有政黨，為方便處理將政治團體及政黨合併為政治團體類。



年(8.6%) (這四年社團題組類似) 來比較。在 2005 年以前, 兩組民衆參與政治團體比例變遷模式都是持續下降的趨勢, 前者模式的民衆參與政治團體的比例普遍比後者模式偏低, 主要原因是問卷設計的答項不同使然。<sup>2</sup> 可見, 在工具性社團的下降主力, 明顯的是由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所造成的。

表 3 是根據樣本的時期以及其世代別製成的交叉表, 時期就是每次調查的年份, 而在世代方面, 主要是參考人口學的設計, 爲了使得每個世代人口數有足夠樣本, 以確立模型係數的穩定性, 故二次大戰之後出生者是以 10 年爲一個間距。本研究在合併資料時, 只包括 20 歲到 65 歲的人口, 將這些人口分成 1926-1945 (二次大戰前)、1946-1955、1956-1965 (九年國教開始)、1966-1975、1976-1988 等世代。在樣本的調查時期及其世代所形成的交叉表中, 可以看到每個人都被歸類爲某一調查年的某個世代別, 如此就可以進一步的運用層級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HLM)來分析時期以及世代對於社團參與的影響, 其中特別關懷大學畢業者與社團參與的斜率在時期的變遷上是否有差別。

表 3 世代和時期之人數交叉表

世代/時期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2007	總計
1926-1945	660	679	379	461	227	185	124	56	2,771
1946-1955	719	587	494	624	347	339	371	322	3,803
1956-1965	865	750	615	794	535	407	425	452	4,843
1966-1975	277	308	343	627	377	376	393	353	3,054
1976-1988	0	0	0	60	136	360	512	512	1,580
總計	2,521	2,324	1,831	2,566	1,622	1,667	1,825	1,695	16,051

<sup>2</sup> 前者的調查中將政黨直接列入政治團體內, 而後者則是區分成兩題來問, 或僅問是否參與政黨; 後者的參與政治團體過錄是凡參與政治團體或政黨, 便是有參與政治團體, 故比例普遍偏高。

## (二) 分析模型的設定

本研究是採用 Yang 與 Land (2008)多層次的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分析法(Raudenbush and Bryk 2002)。他們的分析方法是將大型橫剖面調查多年重複測量的資料合併，進行年齡—時期—世代分析。將多年期資料合併後，建立一個世代和時期的列聯表，行是時期，列是在不同時期的世代層。

由於時期與出生世代和年齡的線性依賴關係，造成估計方程式的認定問題(identification problem)，人口學家使用加總方式來計算不同時期、不同出生世代的生命統計指標；但社會學的調查分析單位往往是個人的。一般人口學的調查，可以使用五年時段為一個區隔，但在個人資料分析時，我們可以將由出生世代群和時期做成的列聯表中的方格視為一個時期與世代的交叉聚集，這些交叉聚集可以使用層級線性模型的交叉分類隨機模型方式來估計時期和世代效應，又可以解決年齡、時期與世代的線性依賴效應。Yang 與 Land (2006)的方法，在相同時期和出生世代者分享相同的隨機誤差。若將年齡、時期和世代放在同一層次的線性關係上來估計，是會造成認定問題。世代和時期組成的群落，放在第二層次來分析，可以將世代和時期組成的群落視為脈絡的隨機變項。如此，便可以進行檢定，並使用層級線性模型的混合模型來估計脈絡效應。第二層次的脈絡效應採隨機的預設，對於世代與時期的方格不平衡的條件下，是比較適用的。

本研究企圖針對三個依賴變項（所有社團參與數目、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進行分析模型，每一個依賴變項有三個分析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只有時期和世代效應的原始模型(unconditional model)，第二個模型是將性別、年齡、族群（客家、外省、原住民，對照組是本省閩南）和大學畢業當作固定效應，而時期和世代交叉分類當作第二層，第三個模型則是預設大學學歷不是固定

效應，會隨時期產生隨機效應。本研究決定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果之前，是參考了過去的文獻論點並且進行了探索性的統計分析。過去文獻中指出大學畢業者被視為台灣民主改革過程中重要的中產階級社會力量；文獻中也有主張一個國家高等教育擴張會有利於民衆社團參與數目增加。此外，本研究在探索性的統計分析上，嘗試探討大學畢業和時期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是否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結果發現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不是固定的，而是會隨時期變化，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故在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模型的設定時，才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

本論文表格呈現的方式採用 Raudenbush 與 Bryk(2002: 373-398)的分析步驟，先呈現只有層級一的個人層次和層級二的世代和時期層次的原始模型，其次再放入層級一的固定效應和層級二的隨機效應條件模型。最後再加入大學畢業者 and 時期隨機效應的模型。本論文將所有社團參與數目的第三個模型設定如下：

個人層次：

$$\text{所有社團參與數目}_{ijk} = \beta_{0jk} + \beta_1 \text{性別}_{ijk} + \beta_2 \text{年齡}_{ijk} + \beta_3 \text{本省客家}_{ijk} + \beta_4 \text{大陸各省}_{ijk} + \beta_5 \text{原住民}_{ijk} + \beta_6 \text{大學畢業}_{ijk} + \varepsilon_{ijk}$$

第二層次：

$$\beta_{0jk} = \gamma_0 + \mu_{0j} + \nu_{0k}$$

$$\beta_{6jk} = \gamma_6 + \nu_{6k}$$

在上述公式中， $\beta_{0jk}$  為個人層次的截距，代表的意思是第  $j$  個世代第  $k$  個時期的個人平均社團參與數目。而  $\gamma_0$  則為細格層次的截距，表示全體受訪者的平均社團參與數目； $\mu_{0j}$  為世代  $j$  的殘差隨機效應； $\nu_{0k}$  為時期  $k$  的殘差隨機效應。此外， $\beta_{0j} = \gamma_0 + \mu_{0j}$  代表所有資料合併後的各個世代平均社團參與數目； $\beta_{0k} = \gamma_0 + \nu_{0k}$  代表所有資料合併後的各個

時期平均社團參與數目； $\beta_{6jk} = \gamma_6 + \nu_{6k}$  代表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會隨著不同時期而變動。

## 四、研究發現

表 4、表 5、表 6 分別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CREM)來估計影響民衆參與所有類型社團總數、參與情感性社團總數、參與工具性社團總數的個人層級固定效應係數和世代時期層級的隨機效應變異數成分。以下將分別描述三個表的係數意涵。

表 4 模型 1 是只有估計世代和時期等第二層次的影響民衆所有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的原始模型。模型 1 呈現世代和時期對民衆社團參與總數都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其中世代影響效應(.038)比時期(.003)來得大。模型 2 是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族群和大學畢業等固定效應變項的模型。在模型 2 中，所有的個人層次的變項是採用 grand-mean centered 的估計變數，整個模型的 deviance 比模型 1 減少了 781，自由度增加了 6，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的。可見這個模型的配適度(goodness of fit)是比模型 1 來得好。在模型 2 中，控制了個人人口特質變項後，世代的隨機效應減少（變異數從.038 降到.005）。這表示在控制人口變項之後，民衆參與所有社團數目因出生世代所造成的波動會減少；主要原因是年齡與世代有高度相關所致，故放入年齡變項後，世代的淨效應便大量減少；但時期效應反而突顯出來，且呈現顯著增加的現象（變異數從.003 上升到.014）。放入所有的人口變項後，模型 2 中的世代和時期對民衆參與所有社團數目的效應仍然是顯著的，且更能真正呈現時期比世代大得多的事實。

模型 2 中的固定效應呈現男性比女性社團參與數目多；年齡越大，參與社團越多；本省客家、大陸各省和原住民都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社團參與數目較多；大學畢業以上者比其他教育程度者顯著地參與較

表 4 社團參與的層級線性模型，1990-2007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應						
截距	.561***	.090	-.204*	.079	-.184*	.073
性別			.257***	.013	.255***	.013
年齡			.014***	.001	.014***	.001
族群 (vs.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200***	.020	.201***	.020
大陸各省籍			.074**	.021	.071**	.021
原住民			.359***	.054	.358***	.054
教育程度 (大學 vs.專科或以下)			.270***	.020	.287***	.055
隨機效應						
世代						
1926-1945	.210***	.026	-.072*	.029	-.068**	.025
1946-1955	.176***	.024	.068*	.028	.061*	.024
1956-1965	.059*	.023	.077**	.027	.070**	.023
1966-1975	-.150***	.025	-.010	.029	-.015	.025
1976-1988	-.295***	.030	-.064*	.032	-.048	.029
時期						
1990	.019	.025	.134***	.030	.118***	.026
1992	.032	.025	.131***	.030	.106***	.026
1995	.042	.026	.095**	.031	.093***	.028
1997	-.010	.025	.019	.030	.013	.026
2000	.053*	.027	.037	.032	.033	.028
2002	-.082**	.027	-.134***	.032	-.119***	.028
2005	-.081**	.027	-.190***	.031	-.176***	.028
2007	.025	.027	-.091**	.032	-.067*	.029
時期×大學						
1990					.111*	.049
1992					.292***	.054
1995					-.051	.054
1997					.035	.049
2000					-.017	.051
2002					-.125**	.047
2005					-.091*	.042
2007					-.154***	.043
		變異數		變異數		變異數/共變數
世代效應 $\text{var}(b_{00j}) = \tau_{b00}$		.038***		.005***		.004***
時期效應 $\begin{pmatrix} \text{var}(c_{00k}) \text{cov}(c_{00k}, c_{00k}) \\ \text{Cov}(c_{00k}, c_{00k}) \text{var}(c_{00k}) \end{pmatrix}$		.003***		.014***		$\begin{pmatrix} .011*** & .010 \\ .010 & .021*** \end{pmatrix}$
個人效應 $\text{var}(e_{it}) = \sigma^2$		.735		.700		.698
離異數 (deviance)		40660.049		39878.827		39839.863
自由度		4		10		12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表 5 情感性社團參與的層級線性模型，1990-2007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應						
截距	.156***	.039	-.107***	.020	-.106***	.021
性別			.039***	.007	.039***	.007
年齡			.006***	.000	.006***	.000
族群 (vs.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109***	.010	.109***	.010
大陸各省籍			.026*	.011	.026*	.011
原住民			.305***	.027	.304***	.027
教育程度 (大學 vs. 專科或以下)			.018	.010	.017	.010
隨機效應						
世代						
1926-1945	.110***	.014	-.006	.007	-.005	.007
1946-1955	.059***	.014	.008	.007	.008	.007
1956-1965	.011	.013	.010	.006	.010	.006
1966-1975	-.068***	.014	-.009	.007	-.009	.007
1976-1988	-.112***	.016	-.003	.008	-.004	.008
時期						
1990	-.007	.014	.034***	.009	.035***	.009
1992	-.046**	.014	-.011	.009	-.014	.010
1995	.021	.015	.035***	.010	.037***	.010
1997	-.041**	.014	-.031***	.009	-.032***	.009
2000	.021	.015	.011	.010	.013	.011
2002	-.019	.015	-.033**	.010	-.035**	.011
2005	.016	.015	-.018	.010	-.020	.011
2007	.054***	.015	.013	.010	.015	.011
時期×大學						
1990					-.014**	.004
1992					.006	.004
1995					-.015**	.005
1997					.013**	.004
2000					-.005	.005
2002					.014**	.005
2005					.008	.005
2007					-.006	.005
變異數						
世代效應 $\text{var}(b_{00j}) = \tau_{b00}$		.007***		.000***		.000***
時期效應 $\begin{pmatrix} \text{var}(c_{00k}) & \text{cov}(c_{00k}, c_{00k}) \\ \text{Cov}(c_{00k}, c_{00k}) & \text{var}(c_{00k}) \end{pmatrix}$		.001***		.001***		$\begin{pmatrix} .001*** & -.010 \\ -.000 & .000 \end{pmatrix}$
個人效應 $\text{var}(e_{ij}) = \sigma^2$		.180		.177		.177
離異數(deviance)	18056.788		17748.122		17746.779	
自由度	4		10		12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表 6 工具性社團參與的層級線性模型，1990-2007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應						
截距	.405***	.056	-.109	.068	-.086	.060
性別			.218***	.011	.216***	.010
年齡			.009***	.001	.008***	.001
族群 (vs.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092***	.016	.092***	.016
大陸各省籍			.048**	.017	.045***	.017
原住民			.055	.043	.054	.043
教育程度 (大學 vs.專科或以下)			.251***	.016	.267***	.049
隨機效應						
世代						
1926-1945	.097***	.024	-.072**	.025	-.065***	.019
1946-1955	.115***	.023	.054*	.024	.049**	.018
1956-1965	.047*	.022	.064*	.024	.057**	.018
1966-1975	-.081***	.024	.006	.025	-.001	.019
1976-1988	-.178***	.027	-.052	.027	-.039	.023
時期						
1990	.028	.024	.101**	.026	.085***	.020
1992	.081***	.024	.146**	.026	.124***	.020
1995	.024	.025	.058*	.027	.052*	.021
1997	.032	.024	.053*	.026	.044*	.019
2000	.036	.025	.024	.027	.018	.021
2002	-.068**	.025	-.099***	.027	-.085***	.021
2005	-.103***	.025	-.174***	.027	-.153***	.021
2007	-.029	.025	-.109***	.027	-.085***	.021
時期×大學						
1990					.109**	.037
1992					.252***	.040
1995					-.026	.040
1997					.047	.037
2000					.000	.038
2002					-.128***	.035
2005					-.111***	.032
2007					-.145***	.032
		變異數		變異數		變異數/共變數
世代效應 $\text{var}(b_{00j}) = \tau_{b00}$		.013***		.004***		.003***
時期效應 $\left\{ \begin{array}{l} \text{var}(c_{00k}) \text{cov}(c_{00k}, c_{00k}) \\ \text{Cov}(c_{00k}, c_{00k}) \text{var}(c_{00k}) \end{array} \right\}$		.004***		.012***		$\left( \begin{array}{cc} .009*** & .010 \\ .010 & .017*** \end{array} \right)$
個人效應 $\text{var}(e_{ij}) = \sigma^2$		.461		.438		.436
離異數(deviance)		33160.497		32348.273		32289.242
自由度		4		10		12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多社團。模型 3 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世代和時期的效應仍然顯著。模型 3 的 deviance 比模型 2 少了 39，增加了 2 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仍然是顯著的，可見模型 3 比模型 2 配適度更佳。在模型 3 個人層次的固定效應，大致上和模型 2 類似，僅教育程度對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更加明顯，這意謂著大學畢業和時期的交互作用是顯著的，因此，模型 3 考量大學畢業與時期的交互作用時，大學畢業的主效應更加顯著（從 .270 增加到 .287）。至於在表 4 的模型 2 和模型 3 當中 1990 年到 2000 年間的時期效應從顯著的正向係數轉變到不顯著，而且在 2000 年之後，時期效應進而再轉變成顯著的負效應。可看出時期對民衆社團參與數目影響的效應是穩定的下降，每一個時期群組是和時期層級的截距（或群組平均數）來比較。明顯可見 1990、1992、1995 年等時期民衆社團參與數目顯著地比所有時期群組的平均值多，故效應也比平均值高；到了 1997 和 2000 年時，民衆社團參與的數目已趨近所有時期群組的平均值，故效應呈現與平均值沒有顯著的差異。過了 2000 年以後，2002、2005 和 2007 年時，民衆參與社團數目顯著地比所有時期平均社團參與數目來得低，故效應呈現顯著的負效應；但到了 2007 年時下降的趨勢有減緩的現象。

表 5 呈現解釋民衆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模型。模型 1 是只有估計世代和時期對民衆所有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模型 1 顯示世代和時期對民衆情感性社團參與總數有顯著的影响力，但時期的效應反而比世代來得小。從前面描述性的資料上已經發現民衆在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上，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模型 2 是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族群和大學及以上等固定效應變項的模型。在模型 2 中，整個模型的 deviance 比模型 1 減少了 309，自由度增加了 6，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的。可見加入個人特質固定效應的模型的配適度是比模型 1 來得好。同表 4 的發現，在表 5 的模型 2 中，控制了個人

特質變項後，由於年齡與世代的相關，當年齡被控制後，則世代對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的淨效應便比時期來得低。模型 3 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模型 3 的 deviance 比模型 2 少了 1，卻增加了 2 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模型 3 沒有比模型 2 更加顯著配適，還多用了兩個自由度。故解釋民眾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使用第 2 個模型即可。在模型 2 中，大學畢業與否和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無關。男性比女性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較多，年齡越大，參與情感性社團越多。本省客家、大陸各省和原住民都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較多。

表 6 是呈現影響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效應。模型 1 仍呈現世代比時期對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效應來得大。模型 2 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族群和大學畢業及以上等固定效應變項的模型。模型 2 的 deviance 比模型 1 減少了 812，自由度增加了 6，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的；可見這個模型的配適度是比模型 1 來得好。誠如表 4 和表 5 一樣，在模型 2 中，控制了個人特質變項後，時期對民眾的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反而比世代來得大。模型 2 中呈現男性比女性參與工具性的社團數目較多；年齡越大，參與工具性社團越多；本省客家、大陸各省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較多，但原住民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和本省閩南民眾沒有顯著差別。大學畢業以上者比其他教育程度者顯著地參與較多工具性社團。模型 3 將大學畢業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時期的效應仍然比世代大。模型 3 的 deviance 比模型 2 減少了 59，增加了 2 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仍然是顯著的，可見模型 3 比模型 2 配適度更佳。在模型 3 個人層次的固定效應，和模型 2 比變動不大，僅有教育程度對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效應增加幅度較大（從 .251 增加到 .267）。

本研究更進一步地將模型中的平均殘差效應(average residual

effects)以圖示呈現，圖 1、2、3、4 分別是世代、時期、年齡和大學畢業與時期交互作用對參與所有社團數目、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和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平均殘差效應。

圖 1 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世代效應：1946 年以前（二次大戰前）出生的世代整體社團參與數目偏低，1946-1955 及 1956-1965 世代是社團參與數目最多的世代（表 4），之後的世代社團參與數目持續下降。1946-1955 年出生的世代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世代，1956-1965 年出生的世代經歷了九年國教的教育擴張。1965 年出生的世代在青壯年時期，經歷了政治解嚴和國會議員全面改選，1987 年政治解嚴時這個世代的人 22 歲，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時這個世代的人 27 歲；可見 1956-1965 年出生世代的人口是社團參與數目最多，最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世代。1966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在青壯年時期經歷了一連串的經濟（東南亞風暴和 2000 年的網路泡沫經濟）和政治劇變（政權移轉），社團參與數目持續降低。然而，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世代的效應上，看起來沒有太大的變遷，相當穩定。不同世代參與工具性社團的效應仍然和整體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模式類似，呈現倒 U 的曲線，早期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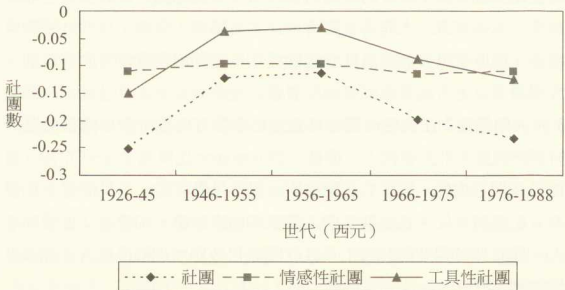


圖 1 社團參與的世代效應

生和晚期出生的世代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較少，1956-1965年出生的世代仍然是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最多的世代。

圖 2 呈現三種類型的社團參與的時期效應。民眾參與社團的總數在時期的平均殘差效應變遷模式上，變化最大的時期是在 2000 年到 2005 年；圖 2 中可看出 2000、2002、2005 年間的時期平均殘差效應大幅下降。2000 年前，僅有微幅下降的趨勢，2007 年有微幅上升的趨勢。若參照表 4 來看，在 1995 年以前，雖然時期對整體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係數有些微下降的趨勢，但時期的效應仍然是保持正效應（例如：模型 3 的時期效應在 1990、1992 和 1995 年分別是 .118、.106、.093）。反之，民眾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不同時期的變遷上變化不大，若要對照表 5 的時期效應係數來看，可看出時期對情感性社團參與的效應，上下起伏不大；可見過去二十年，民眾在情感性社團參與上是相當穩定的。民眾工具性社團的參與數目的時期效應殘差變遷模式類似整體社團參與數目時期效應殘差變化；從 2000 年以後快速下降，在 2007 年才略為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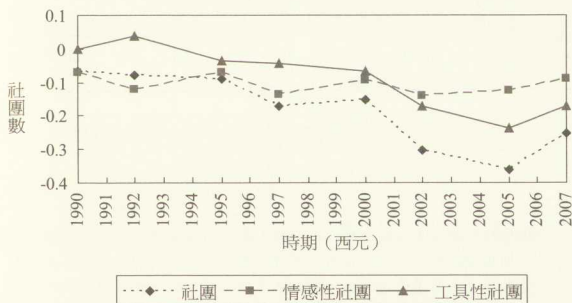


圖 2 社團參與的時期效應

圖 3 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年齡效應。民衆從 20 歲到 50 歲左右，年齡對整體社團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平均殘差效應持續增加，之後，便呈現沒有明顯變化的趨勢。年齡對於民衆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的平均殘差效應，雖然仍然是隨年齡增加而微幅增加，但增加幅度很小。

圖 4 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大學學歷與時期隨機效應的估計值：<sup>3</sup> 大學畢業者在整體社團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跨不同時期的估計值曲線是平行的。換言之，大學畢業者的整體社團參與數目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的變遷模式是相當類似的。從 1992 年以來，大學畢業者整體社團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便開始下降，2000 年後又持續下降，近年來下降趨勢減緩。大學畢業者對參與情感性社團的隨機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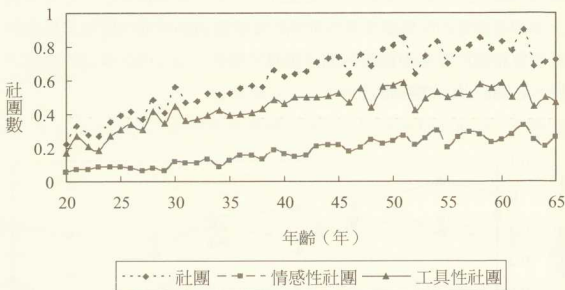


圖 3 社團參與的年齡效應

3 大學學歷對社團參與數目具有正向的固定效應影響力，但這個影響力隨著時期呈現隨機效應，且時期的隨機效應在整體社團和工具性社團參與上是呈現負向的變遷趨勢。故在圖 4 上，本研究使用大學固定效應加上時期隨機效應的殘差估計值來圖示，以便於理解大學學歷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實質效應在時期的變遷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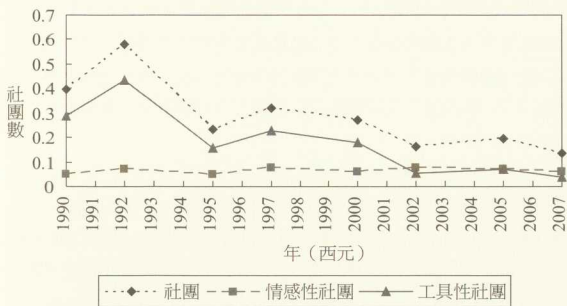


圖 4 不同時期大學文憑對社團參與的效應

是不顯著的（如表 5 的模型 3 所顯示），即大學畢業者在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沒有變遷。

整體而言，從 1990 年以來台灣民眾社團參與數目下降的趨勢，可說是因為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變遷模式所致。更有趣的是，這個下降的趨勢對受過高等大學教育者而言，是更加明顯。

## 五、討論與結論

首先，本研究發現台灣在解嚴後，只經歷很短暫的民眾社團參與成長時期，便逐漸地持續下降。若從美國第二次大戰後民眾社團參與數目的變遷資料，可看出：美國的民主政治發展，是經歷 1950-1970 年很長一段民眾社團參與增加的歷史發展經驗，一直到 1970 年以後才有下降的趨勢。反觀台灣民眾的社團參與成長的經驗太短，僅有 1990 和 1992 年呈現成長趨勢；在 1995 年到 2000 年間，經歷了東南亞風暴和國民黨的分裂等經濟和政治的不穩定，民眾參與社團的數目便持續下降。經過嚴謹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時期和世代對民眾社團參與

數目都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應；當控制年齡變項時，時期效應又較世代效應來得大。大學畢業者對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的變異上不明顯，但大學畢業者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的變遷上卻很顯著；具體而言，大學畢業者從 1990 年代初期以來，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便顯著地下降。

世代的效應比時期弱，但仍然能夠顯著地解釋台灣民衆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過去學者指出 1970 和 1980 年代的大學生或知識分子，對社會運動和民主改革都是具有貢獻的世代；本研究也發現 1956-1965 年出生的世代社團參與數目最多，這個世代的人上大學的時期應該是 1974-1983 年間，故可間接地解釋 1956-1965 出生的世代是最積極投入社團的世代。

時期對民衆社團參與數目的變遷趨勢產生較大的效應。過去學者使用內政部公布的社團社員資料，呈現了和本研究相反的變遷趨勢。本研究的貢獻是，使用從 1990 年以來八年的全國性代表樣本，來釐清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世代與時期效應；特別是指出了大學畢業者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隨著時期逐漸減少。這樣的結果也意謂著台灣的民主轉型仍然沒有穩定的市民社會參與作為基礎；從 1990 年野百合學生運動到 1992 年的立委全面改選間，可說是民衆參與社團的高峰期；之後，便緩慢下降，到 2000 年政權轉移後，則快速下跌。2000 年後民衆社團參與數目快速下降的趨勢，一方面可以呼應吳介民(2002)克勞賽維茲魔咒論，亦即是 1990 年代台灣社會動員期所生產的社運組織和社團組織領導人才，在 2000 年政權轉移後，納入行政系統，故造成民間組織缺乏領導動員人才，這種現象應該也可以部分解釋 2000 年以後民衆社團參與急遽下降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支持 Diamond (1999)東亞新興民主的公民民主制度不易鞏固的論點。

此外，若根據 Gesthuizen 等人(2008)的研究發現來推論，照理說，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應該是對市民參與的提升有幫助，也能夠提升



台灣民主的發展和效率。但本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畢業者對參與社團總數和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影響效應，隨著時期呈現下降的趨勢。過去十年的高等教育擴張，使得台灣大學畢業民衆到 2007 年，已達到 1/4 的樣本人數，但這些中產階級的主要構成者，社團參與數目下降得很快。這樣的發展趨勢會令人擔心不利於健全民主市民社會的發展。當然，大學畢業生的快速增加，並沒有如預期地創造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帶領低教育程度者來參與社團的現象，進而提升全民社團參與的程度；未來仍需要更進一步地研究高等教育擴張為何無法提升民衆社團參與的可能原因。

從 1990 年以來，台灣民衆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的變化不大，但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卻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樣的變遷模式究竟有哪些社會學意涵？民衆參與情感性社團中，主要以參與宗教團體比例較高；民衆面臨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參與宗教性的社團的比例相當穩定，可見，民衆參與宗教社團的意涵是需要更進一步討論。台灣的宗教活動大致上是以廟會為核心的宗教參與活動，這些宗教活動往往是社區事務、政治地方派系活動的核心，地方政治首長也擔任廟會中重要職務（蔡常斌 2005）。選舉時，廟會和宗教組織往往是資源動員很重要的管道。傳統鄰里社團靠著地理親近性，參與社團的成本很低，且具有凝聚(bonding)的效果。台灣在解嚴後，社區營造的專業人士，進入社區和傳統地方派系產生權力競逐時，地方派系若和廟會等地方祭祀宗教活動結盟，這些具有建構地方公民參與和公民性目的的參與者往往無法和傳統勢力抗衡（吳介民、李丁讚 2005）。Putnam (1995, 2000) 的研究發現美國社團參與的社會資本明顯下降的趨勢是由於鄰里的社團參與下降；但過去二十年，台灣民衆情感性的社團參與沒有明顯的變遷趨勢，也可以說情感性社團反而是過去持續存在、穩定不變的民間社會參與力量。本研究的發現，意涵了台灣在短短的民主化發展過程中，過去傳統廟會和地方派系的地方勢力仍然是一個很強大的制度

慣性；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偏好參加的工具性社團的力量，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在邁向以市民社會為主力的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這將是台灣需要面對的一個潛在問題。

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期望能降低地方性以及較封閉的社團參與，增強高教育或中產階級者社團參與的角色功能。學者都認為能健全民主政治發展的市民社會，是需要仰賴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才能使市民社會更加成熟。台灣過去二十年來雖然高等教育人口急速擴張，但反而在社團參與上出現衰退趨勢，使得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的公共性與市民政治反而萎縮。許多個案質化研究也一再指出，台灣過去二十年的民主發展，市民社會的公共性不強。台灣民衆參與情感性社團的數目保持穩定的趨勢，情感性社團參與會強化血緣、地緣和宗教的集體情感，是具有較封閉的社會控制連結(bonding)效應，而缺乏多元包容的鬆散結合跨地方性團體的橋樑性(bridging)連結的效應。這樣的社團參與模式不利於多元包容的溝通發展。

最後，本論文對於大型調查的社團參與問題設計上，有些建議。大部分的全國性調查有關社團參與的題目，都只有問過去一年或目前是否有參與某些社團。換言之，這樣的詢問方式，是可以掌握近期的社團參與的行動。使用內政部的社團成員資料應該是比較不正確的，因為這些資料，無法測量人頭會員，也無法測出這些會員近來是否有參加社團活動的行動。西方大型調查有關社團參與的問題，都是採用詢問社團類型。另外，有關社團類型的分類要一致，本論文爲了將八年資料合併，在政治團體和其他團體上作了些微的調整。期望以後「變遷調查」問卷設計時，在社團參與的問題設計上要考量長期比較的目的而設計。本論文在分析民衆社團參與程度僅使用社團參與數目、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和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但 Putnam 和 Skocpol 還使用了許多其他參與程度的指標，建議「變遷調查」未來在社團參與的面向上，能增加參與程度和可以解釋民主參與的政治行動等題目，以

便市民參與和民主社會的政治參與的理論驗證得以進行。

## 參考文獻

- 王甫昌(2003)社會運動。見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421-452。台北：巨流。
- 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縣為例。台灣社會學 7: 177-207。
- 朱雲漢(1989)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見台灣研究基金會國防研究小組編，解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頁 139-160。台北：桂冠。
- (1990)中產階級與台灣政治民主化。見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頁 233-244。台北：巨流。
- 行政院主計處(2003)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何明修(2000)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草根(1980-1986)。台灣社會學 2: 97-162。
- (2006)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群學。
-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賽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 4: 159-198。
- 吳介民、李丁讚(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會學 9: 119-163。
- 李丁讚(2004)導論：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見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域在台灣，頁 1-62。台北：桂冠。
- 李允傑(1992)台灣工會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巨流。
- 林亞鋒(2007)社團參與、政黨鑲嵌與政治行為之變遷——以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為資料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勝偉、顧忠華(2004)社會資本理論定位與經驗意義：以戰後台灣社會

- 變遷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 37: 113-166。
- 范雲(200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 5: 133-194。
- 徐永明、陳鴻章(2004)地方派系與國民黨：衰退還是深化？。台灣社會學 8: 193-228。
- 張茂桂(1990)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見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頁 189-209。台北：巨流。
- 蔡東杰(2002)台灣與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較。台北：風雲論壇。
- 蔡常斌(2005)寺廟組織與平安燈文化的建構：制度與網絡的機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淑鈴(1990)中產階級的分化與認同。見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頁 77-96。台北：巨流。
-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蕭新煌(1990)總論：台灣的中產階級何來何去？。見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頁 5-20。台北：巨流。
- 蕭新煌、尹寶珊(1998)政治轉型與集體認同變化：台灣與香港的比較。見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黃紹倫編，華人社會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頁 207-25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Baer, Douglas, James Curtis, and Edward Grabb (2001) Has Voluntary Association Activity Declined? Cross-national Analyses for Fifteen Countrie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3): 249-274.
- Breiger, R. L. (1974) The Duality of Persons and Groups. *Social Forces* 53 (2): 181-190.
- Cheng, Tun-jen, and Stephan Haggard (1992)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 87-110 in

-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edited by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James A. (2004) Did Growing Up in the 1960s Leave a Permanent Mark 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vidence from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8(2): 161-183.
-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Erickson, B. H. (2004) The Distribution of Gendered Social Capital in Canada. Pp. 27-50 in *Creation and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A New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H. Flap and B. Völker. London: Routledge.
- Feld, Scott (1982) Social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Similarity among Associ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797-801.
- Fung, Archon (2003)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ories, Hopes, and Real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515-539.
- Gesthuizen, Maurice, Tom van der Meer, and Peer Scheepers (2008) Education and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Do Educational Effects Differ due to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5): 617-632.
- Gilley, Bruce (2008) Taiwan'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Model for China? Pp. 215-242 i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edited by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Glanville, Jennifer L. (2004)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Why Organizational Location and Type Are Important? *Sociological Forum* 19(3): 465-491.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Hyman, Herbert, and Charles R. Wright (1971) Trend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of American Adults: Replication Based on Secondary Analysis of National Sample Survey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91-206.
- Inglehart, Ronald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lmijn, Matthijs, and Henk Flap (2001) Assortative Meeting and Mati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Settings for Partner Choices. *Social Forces* 79(4): 1289-1312.
-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Civic Engagement, or Tru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Hong Kong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sed version), September 25, 2000, Hong Kong.
- Madsen, Richard (2008) Relig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Pp. 79-94 i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edited by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Mannheim, Karl (1952[1927])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Pp. 276-320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rsden, Peter V. (1990) Network Diversity, Substructur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ntact. Pp. 397-410 in *Structures of Power and Constraint: Papers in Honor of Peter M. Blau*, edited by Craig

- Calhoun, Marshall W. Meyer and W. Richard Sco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son, William M., and Stephen E. Fienberg (1985) *Cohort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Beyond th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 McPherson, M., L. Smith-Lovin, and James M. Cook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415-444.
- Paxton, Pamela (1999)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1): 88-127.
- Popielarz, Pamela A., and J. Miller McPherson (1995) On the Edge or In Between: Niche Position, Niche Overlap, and the Duration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3): 698-720.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65-78.
-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audenbush, Stephen W., and Anthony S. Bryk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ose, Arnold M. (1954)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otolo, Thomas (1999) Trend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8(2): 199-212.

Ryder, Norma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843-61.

Skocpol, Theda (2003) *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61)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Völker, Beate, Henk Flap, and Gerald Mollenhorst (2009) Changing Places: The Influence of Meeting Places on Recruiting Friends. Pp. 28-48 in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edited by Ray-May Hsung, Nan Lin, and Ronald L. Breiger. New York: Routledge.

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2006) A Mixed Models Approach to the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ata on Trends in Verbal Test Score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6: 75-97.

— (2008)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36(3): 297-326.

# 第 9 章

## 總統大選投票意向調查中不表態的 社會距離效應

杜素豪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洪永泰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 摘要

本文探討問卷調查中總統投票意向題之不表態是否存在著社會距離效應。利用多年期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以受訪者與訪員間社會人口特徵的不同配對組合或距離指標分數進行跨時間的比較分析，驗證訪談互動中的社會距離是否會影響投票意向不同類型的不表態。利用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模型分析(2-Level Hierarchical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的結果發現，三種投票不表態多受到性別、婚姻、年齡與教育距離的影響。若分別從每一年大選調查中訪答的社會距離效應來看，部分社會距離效應有跨時間的變化，亦即在回憶當年到回憶幾年前的投票行為中，需回憶的時間越久的訪答，其社會距離效應越顯著。

關鍵詞：不表態、社會距離、訪問順從、訪答效應、選舉調查

## Social-distance Effects on Non-response to a Survey about Voting in President Elections

Su-hao Tu

*Center for Survey Research, RCHSS, Academia Sinica*

Yun-tai Hu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cial-distance effects on non-response to a survey about voting in president elections. Four-year data collected in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from 2000 to 2005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extent to which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 and the index of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respondents and interviewers resulted in non-response over time. The results, based on a 2-Level Hierarchical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 that three types of non-response (i.e. refusal, don't remember, and invalid ballot) are influenced by the distances of gender, marriage, age, and education between respondents and interviewers. Some effects vary with survey period over time. 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items that need longer-term memory to answer, for example, whom respondents voted for in elections.

*Keywords: non-response, social distance, conformity in interview, response effect, election survey*

## 一、前言

問卷訪談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人際互動。理論上，訪員是引導互動持續、維護互動品質與順利獲得互動結果的關鍵人物。爲了降低回答誤差，訪員必須依據規定的方式進行訪問與追問（例如：逐字唸題目、不離題意且適當地追問等）。不過，在實際的訪談過程中面對陌生的訪員時，受訪者的最初想回答的內容很可能隨時改變，最後的回答因此不盡如研究者所期待的有效或偏離原意。

當問卷題目的困難度較高時，例如題目或回答選項不容易理解，受訪者的理解能力有限因而不知該如何回答，也可能是不願意多加思考便任意的回答不知道或拒絕回答。但是，在可明確理解的問卷題目中，又可能因內容過於敏感、有隱私洩漏的風險、容易產生身心上的威脅或者具有道德規範的暗示，受訪者爲了迴避而僅僅提供接近於社會規範、較無身心威脅、個人隱私可被保密或較符合他人或社會期望的回答，或者乾脆回答不知道或根本不願意回答。此類的扭曲回答可能歸因於受訪者本身的個性與偏好，例如防衛心理、道德觀念、個人主義、女性主義等等。

面對以上可能的無效或扭曲的回答，依賴訪員的訪問經驗與工作能力來挽回受訪者回答的配合度，以提高回答品質與效度是必要的，前人的研究也證實訪員與回答品質有很重要的關連性，尤其是在政治或種族、藥物濫用、性別隱私等主題上，訪員的種族、性別、年齡等對於題目有效回答的比例或回答的傾向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Kane and Macaulay 1993; Davis 1997a, 1997b; Fendrich et al. 1999)。不過，根據 Dijkstra 與 van der Zouwen (1982)，訪談是由訪員主導，在維持訪問品質上的確扮演著吃重的角色，但只從訪員的相關因素來解釋回答品質仍嫌不足，從訪問關係來探討問卷回答的結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 (一) 社會距離的理論解釋

過去與訪問關係相關的研究多半是從友好關係(rapport)與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兩個方向探討其對回答偏差與回答有效性的影響。在1960年代末期的研究定義友好關係是訪員所建立之受訪者的合作程度，而社會距離則是訪員與受訪者在特徵上的相異程度，其理論假設是訪員與受訪者的關係越友好，訪答品質則越好，而訪員與受訪者在個人背景特徵上的相異性越小（亦即社會距離越小），代表著雙方之間比較可能有相似的生活觀念、經驗與習慣，因此訪問的社會距離越小，彼此的瞭解程度與吸引力就越大，因此受訪者的溝通與回答意願會越強烈。

不過，少數的研究顯示友好關係不見得會降低回答偏差(Dohrenwend et al. 1968; Weiss 1968; Dohrenwend et al. 1969)，這呼應了Hyman (1954)的說法，亦即爲了盡快解除受訪者面對陌生人的顧慮，訪員多會刻意的營造互相的吸引力，但所建立看似親密的友好關係有時反而會造成受訪者回答的扭曲。不過，這些友好關係研究多半是單方面的依賴訪員對受訪者合作程度的主觀評估，其實無法確實反映訪談過程中真正的訪問關係，著實可惜，後續驗證友好關係的研究也缺乏。相反的，從訪員與受訪者間之社會距離來界定客觀的訪問關係，可補足利用主觀認知之訪問關係探討訪問品質之不足，而這方面的研究在理論性探討上相對的比較充分，且實證分析也比較豐富。

從社會距離分析訪答品質的研究中，不同問卷主題之間所引用的理論名詞似乎有所差異，但事實上只是解釋的方法不同，其理論觀點均源自於社會心理學的順從理論(deference theory)，關注的重點是訪員與受訪者之間社會人口特徵（包括種族、社會地位等）的差異會影響訪問結果的有效性或正確性(Webster 1996)。例如，「種族順從」(racial deference)指的是面對不同種族的訪員與種族相關主題的問卷時，受訪

者會爲了免於恐懼而傾向於一般人對某一種族刻板印象的那個回答方向(Campbell 1981)。「地位順從」(status deference)著重在解釋社會地位的差異會造成受訪者在回答政治經濟方面的問卷題目時，偏向於表達較保守的、不激進或不種族隔離的態度(Katz 1942)。「條件性社會特質」(conditional social attribution)則應用在假設受訪者嘗試回答藥物濫用、肢體或性虐待方面的隱私問題時，會先判斷訪員的外表或行爲等特徵，憑其印象決定是否誠實回答(Dailey and Claus 2001)。而綜合各類社會人口特徵相似性組成的「社會距離指標」可以預測受訪者回訪的偏差或有效的程度(Weiss 1968; Johnson et al. 2000)。

## (二) 社會距離的相關研究

前人研究結果多建議訪員與受訪者的性別、種族、教育程度或社會地位等特徵相似時所獲得有效回答的比例會比較高；社會人口特徵相似性較高時回答偏差較小，且這種關係較容易發生在與該特徵息息相關的問卷主題上，例如性別議題回答的有效性會受到訪員與受訪者間性別差異的影響，而種族議題的回答與種族距離有關(Benney et al. 1956; Williams 1964; Sudman and Bradburn 1974)。不過，也有少數針對回答偏差的研究發現：個人特徵相似或綜合幾種社會人口特徵所表示的社會距離越低時，回答偏差反而越明顯(Weiss 1968)；雖然在女性訪問女性的組合中有效回答率最高，男性訪問男性的組合所獲得的有效回答率卻比異性配對的組合還要低(Benney et al. 1956)。

以下分別從性別與家庭議題、藥物濫用與身心健康、政治與種族敏感以及教育測驗與知識等四個主題，從不同測量的社會距離對兩種回答品質（回答的有效性與實質內容）之影響回顧前人的研究，綜合評述社會距離效應的重要性以及尚待探討的議題。

### 1. 性別與家庭議題

Benney 等人(1956)發現在性別相關的問題上，有效的回答比例最



高者發生在年輕女性訪員訪問年輕女性受訪者時，最低者則是年輕男性訪員訪問年輕男性受訪者的配對。近期的研究比較深入的從特徵配對組合來探討在性態度與性行為題目回答的無效性。兩類型無效回答的總次數在不同的性別配對之間並無明顯的差異，相反的，婚姻、省籍、年齡與教育距離對「不知道」與「拒答」兩種無效回答有不同的影響效果。在四種婚姻狀態的組合中，相較於雙方均已婚的訪問配對，接受單身訪員訪問的已婚受訪者回答「不知道」的頻率比較高，而雙方均單身時拒答的頻率比較低。省籍距離越大的配對拒答的比例較高。受訪者比訪員年輕或者教育程度比訪員高時較傾向於回答「不知道」或「拒答」(Tu and Liao 2007)。

再從回答內容來看，如理論預期的，女性訪問女性時的回答較傾向於現代化的性別角色態度(Lueptow et al. 1990; Huddy et al. 1997)。但也有些研究發現，接受女性訪員訪問的男女均傾向於兩性平等的回答方向(Kane and Macaulay 1993)；在雙方異性、社會地位或種族的距離較大的訪問情境下，受訪者不見得傾向於社會期望的回答方向(Esbensen and Menard 1991)。另外，在女性避孕知識方面的題目中，相較於異性訪問組合，同性訪問組合的回答品質（以兩波調查間一致性來測量）比較好(Becker et al. 1995)。而針對家庭教養態度的研究則發現，受訪者遇到教育與職業特徵差異較大的訪員時比較傾向默從(acquiescence)，表示同意(Lenski and Leggett 1960)。

## 2. 藥物濫用與身心健康

進行吸食大麻與非法藥物使用等行為的調查時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受訪者隱瞞回答（低報）。Fendrich等人(1999)從條件社會性特質(conditional social attribute)提出有威脅性題目的回答會受到受訪者與訪員間人口社會特徵之交互作用的影響。針對美國 12 個城市青少年的問卷調查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若受訪者與訪員都是西班牙後裔，回答有吸食大麻的比例明顯高於當白人訪問西班牙後裔。但是，這種較誠

實回答的傾向卻不見得發生在黑人訪問黑人時。異於前人多半使用的訪問配對組合或訪員與受訪者特徵之交互作用的方式分析社會距離效應，Johnson 等人(2000)採用綜合了訪員與受訪者在性別、種族、年齡層與教育程度相異程度的社會距離指標分析藥物使用的回答率。結果發現社會距離在受訪者回答最近有無使用藥物的機率有負面的影響，社會距離分數越低（亦即訪員與受訪者在個人特徵上相似度越低）回答有使用藥物的比例也越低。

在身心健康方面，Dailey 與 Claus (2001)依循 Fendrich 等人(1999)的條件社會性特質理論，但是採用受訪者與訪員在性別、年齡與種族的相似性來看受虐者對較隱私敏感的性虐待或家暴經驗者回答受虐的次數。結果顯示女性訪問女性或年齡差距在五歲之內的訪問組合中，受訪者回答有被家暴的次數明顯比較高；年齡比訪員小二十歲以上的受訪者回答被性侵害過的次數則比其他年齡組合明顯的少很多。

在比較不敏感之身心健康方面的研究則顯示，低收入的受訪者接受中等收入訪員的訪問時，其心理健康分數比理論預期的還要高(Dohrenwende et al. 1968)。針對醫師滿意度的研究則顯示，接受社經地位（指的是教育與家庭收入）與種族相似的訪員詢問時，回答有受到醫師尊重者的比例明顯的高於與自己差異較大者(Malat 2001)。

### 3. 政治與種族敏感

關於政治敏感議題，投票行為回答的研究多從社會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偏差的觀點假設投票是公民應履行的社會義務，有公民意識或社會壓力較大的民衆在接受訪員的詢問時通常會考慮到訪員對他（她）回答的期待，因而傾向於回答有（會）去投票或投給某位（組）候選人。美國研究已證實黑人在接受黑人訪員訪問時傾向多報參與投票活動(overreport)；而接受黑人訪問的白人則傾向表達會投給受到較多白人支持的候選人(Anderson et al. 1988; Finkel et al. 1991)。

在政治意識與態度方面的回答傾向上，美國黑人比較會對白人說

謊或表示沈默，因而在黑人議題上容易隱藏真正的政治理念與對不同政黨的支持與偏好(Davis 1997a, 1997b)。在政治知識方面，被白人訪問的美國黑人在知識量表中說出正確回答的總次數低於被相同種族訪問的黑人，此研究印證了社會心理學所謂的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亦即黑人受訪者在回答這類敏感性題目時會有被否定或被負面評價的心理壓力，也因此回答容易出錯(Davis and Silver 2003)。

政治議題的回答品質也具有種族以外的社會距離效應。社會地位屬於低收入的受訪者接受高收入訪員的訪問時，比較傾向於回答保守而非自由解放的政治態度；但面對一樣是低收入的訪員時則比較敢於表達有被政治或種族隔離感覺(Katz 1942)。異於理論假設的早期研究則發現訪員與受訪者的年齡相同者比不同者容易有回答偏差的現象；利用綜合教育、社經地位及年齡在訪員與受訪者之間相異程度的社會距離指標則顯示，社會距離傾向越高者的回答偏差反而越小(Weiss 1968)。

在族群意識的訪答效應中，應用族群認同原理的分析結果證實，比起白人，美國黑人的回答較因訪員不同種族而有明顯的差異，不同種族的訪問回答品質也有明顯的差別，其中，黑人面對白人的訪問時比較會有扭曲回答的傾向，對異族情感較親近、種族距離或衝突感較低(Schuman and Converse 1971; Hatchett and Schuman 1975; Campbell 1981)。延伸到白人與西班牙後裔之間的比較則發現，同樣在種族文化相關的問卷題目中，接受白人訪問的白人有種族文化距離感的比例比接受西班牙後裔訪問的白人受訪者高(Reese et al. 1986)。若從有效回答的比例來看，無論是白人配白人或西班牙後裔配西班牙後裔，相同種族的訪問獲得的無回應都比不同種族的訪問還要低。另外，同性配對的有效回答比例也比較高，且回答被扭曲的比例也比較低(Webster 1996)。

#### 4. 教育測驗與知識

刻板印象威脅假設也在根據美國一般民衆字彙測驗的全國性調查資料中得到印證。同樣是黑人，被黑人訪問時的測驗分數比被白人訪問時的分數高，但是對白人來說，訪員的種族對測驗分數無明顯的影響(Huang 2009)。但是來自不同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在語言、數學或字彙的成就測驗上並沒有明顯的種族距離效應(Weeks and Moore 1981; Kim et al. 2003)。

不過，刻板印象威脅的理論假設不適用於非政治敏感性知識題的回答心理歷程。利用基因知識與生物科技態度題組所研究的訪答效應，則從社會心理學的區位心理學原理假設受訪者會從訪員的外表、行為以及雙方互動中得到暗示，因而表現從眾或被預期的行為，研究結果印證了較低教育水準（國中以下）的受訪者在接受較高教育水準（大專以上）的訪員詢問時有效回答數比較多(Yang and Yu 2008)。

以上的文獻無論焦點是放在回答傾向或回答有效性、是否針對敏感或隱私性題目、採取順從、期望或防衛等不同的理論觀點，研究發現仍有些分歧，儘管如此，多半研究仍指出訪員與受訪者特徵上的差距對於受訪者的真正回答會造成高報或低報的現象，例如低報個人隱私（性行為或性侵害等）或非法威脅的行為、高報投票參與、或提供社會或訪員所期待的回答方向（如：種族意識題的默從或種族刻板印象的回答內容）。

前人研究結果的分歧多發生在與性別意識、有個人隱私威脅疑慮，以及較不敏感的一般政治經濟等問卷題目的回答品質上。有些研究在社會距離的測量方法上比較簡單，且在研究架構中不含理論上與主題關係較不密切的社會距離因素，不過近期的研究已有跳脫受訪者與訪員特徵的相似或相異兩分類配對組合的方式，進一步以多種配對組合(Tu and Liao 2007)或以綜合社會距離指標(Johnson et al. 2000)做較深入的訪答效應分析，也漸漸顯現出前人研究結果分歧的癥結。

在性別議題的研究中發現，相同特徵的訪問配對組合，其有效回答率不見得就一定最高。女性訪員配對女性受訪者的有效回答率最高，而男性訪員配對男性受訪者的有效回答率比異性配對的有效回答率還要高(Benney 1956)。類似的，在四種婚姻狀態的配對組合中，已婚訪問已婚組合的有效回答率最高，單身訪問單身組合的有效回答率最低(Tu and Liao 2007)。在吸毒的研究中也發現西班牙後裔訪問西班牙後裔，回答有吸毒的比例比其他種族配對組合者要高，但黑人訪問黑人時回答有吸毒的比例卻低於不同種族配對者(Fendrich et al. 1999)。以上相反的發現挑戰了傳統社會距離理論僅從特徵相似與否來討論回答品質的適合性。

應用社會距離指標的研究可能是考慮到與所探討主題密切相關的個人特徵不那麼鮮明，例如一般政治議題或藥物濫用在性別或政治種族的敏感性較沒那麼強，可預期訪問的結果不會有明顯的性別或種族距離效應，較不需單獨的檢驗個別的特徵距離效果，因此可僅採用綜合性的距離指標。兩種針對截然不同主題利用社會距離指標的研究發現正好相反，早期的研究反而推翻社會距離效應，至今仍無法解答(Weiss 1968; Johnson et al. 2000)。不過，社會距離指標該納入哪些特徵仍莫衷一是，有待討論。早期屬於政治議題的研究反而不含種族這個在美國探討政治議題非常重要的變項，而藥物濫用的研究所包含的特徵則相對的比較適合。

綜上，若要深入而細緻的分析社會距離效應，毫無疑問的需超越特徵相似性的比較，進行各種特徵的不同配對組合的分析，檢視各種可能的社會距離變項對回答有效性或回答傾向的影響。至於社會距離指標，若仍依據文獻，僅僅利用傳統相似與否的兩分法來計算距離指標分數，在面臨多種配對已經挑戰兩分配對的適用性之際，顯示社會距離分數的計算方式仍有待改進。因此，當務之急是從多種配對組合來探討社會距離效應的存在以及穩定性，亦即探究在某一或某些主題

問卷回答中受到社會距離的影響是發生在哪些特徵上，以及社會距離影響效果是否隨時間而變化。

### (三) 研究目的

前人研究探討政治敏感性議題的回答偏差者較多，且社會距離效應的發現也較有一致性的結論。有鑑於問卷調查中投票意向這類敏感性題目不表態的比例通常較高，且台灣個人隱私保護的意識越來越高，此比例應有持續上升的趨勢，相應的，社會距離效應可能越來越顯著。本研究因此以總統大選投票行為的回答有效性為例，對社會距離採取較詳細的分析策略，驗證不同特徵配對組合在投票敏感性題目中對於表態與否的影響，以及影響效果是否具有跨時間的穩定性。

具體來說，本文利用多年期大型調查資料，跨時間的比較分析總統選舉投票意向的回答受到訪員與受訪者之間特徵相異性的影響程度。從時間變遷的分析來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包括民衆對政治敏感性題目的回答（隱瞞、拒答或其他不表態）是否受到訪員與受訪者之間各類個人特徵距離的影響？哪些特徵距離對受訪者的回答有明顯的影響效果？在越來越注重個人隱私的趨勢中，這些影響效果是否隨時間而持續穩定的存在或越來越明顯？

至今利用台灣調查資料進行與社會距離相關的研究僅圍繞在性敏感與新興生物基因科技知識題目的訪答有效性上。本文初探性的分析與政治敏感性題目回答可能息息相關的社會距離，除了參考國外相關研究的建議之外，盡量周延到相應於個人特徵的所有可能的特徵距離，包括文獻中已經建議的種族距離（應用在台灣則是省籍）、教育距離（也與社會地位息息相關）、以及年齡距離。除此之外也加入在個人隱私相關研究中發現會影響訪答品質的性別與婚姻距離，主要是對受訪者提問其在總統大選的投票對象屬敏感性且某個程度在揭露個人的隱私。本研究遵循以上特徵距離會增加受訪者不表態之機率的理論假



設，但先不預設多分類配對組合中哪一特徵相似組合的表態機率比較高。

研究架構中除了以上的特徵距離之外，也納入文獻建議的控制變項，在受訪者層次上包括與投票議題息息相關的政黨支持、統獨立場以及對於敏感性問題回答相關的個人特徵（受訪者的職業階級與訪談中第三人在場）；在訪員層次上則包括訪員職業與訪問經驗（Dijkstra and van der Zouwen 1982; Hox et al. 1991；杜素豪 2004）。另外，本研究在受訪者層次新增一個文獻中少探討但事實上選舉研究與預測專家多認同的重要變項——政治版圖，依據各政黨在受訪者戶籍所在地區歷年得票率來表示區位的政黨傾向，用來補充僅僅以主觀性之政黨與統獨態度而缺乏客觀測量變項之不足。

## 二、資料與方法

###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分析資料來自多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分別是針對兩屆總統大選（2000 與 2004）之四期一次卷一(2000)、四期四次卷二(2003)、四期五次卷一(2004)與五期一次卷一(2005)共四項問卷調查所產生的五筆資料。以上調查的對象為台灣本島設籍的 18 歲或 20 歲以上的成人，<sup>1</sup>採分層三段「與母體等比例的機率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選取樣本個案。本研究只針對有投票權的個案進行分析，最後納入分析的有效個案數分別是針對 2000 年總統大選，選後(1)當年被訪問的 1,960 人（四期一次卷

<sup>1</sup> 每一調查對象的年齡層實際為：四期一次卷一與四期二次卷二是 20 歲以上，四期四次及以後的調查均為 18 歲以上。



一，2000），(2)三年後接受訪問的1,748人（四期四次卷二，2003），與(3)四年後被訪問的1,511人（四期五次卷一，2004）。其次是針對2004年總統大選，選後(1)當年被訪問的1,666人（四期五次卷一，2004），以及(2)第二年接受訪問的1,954人（五期一次卷一，2005）（表1）。<sup>2</sup>

各年資料顯示女性比例除了五期一次卷一之外多半稍低（表1）。平均年齡（實歲年數）約在44到48歲不等；已婚的比例除四期五次卷一之外都在八成以上。國小及以下、高中與大專受訪者的比例大略都在23%到34%之間。台灣閩南人的比例除了四期四次卷二之外，都在七成以上，台灣客家人的比例在四期一次卷一特別低（8.9%），而大陸各省市的比例在四期五次卷一相對的較低（8.6%左右）。<sup>3</sup>歷年資料中白領階級者都是三成多。各項調查訪問工作由95位或以上的訪員完成，訪員中女性的比例介於60%到73%之間（表2）。歷年來的訪員平均年齡有上升的趨勢，但多半在30歲到40歲之間。歷年來未婚訪員的比例從接近七成降到四成，<sup>4</sup>大專以上者居多，學生訪員的比例從六成遞減到三成。<sup>5</sup>自認是台灣閩南人者都在七成以上，以四期一次

2 因本研究只選取2000年或2004年有投票權的受訪者進行分析，各項樣本數據會因為排除年輕人而有別於台灣地區的整體數據。

3 省籍的問法，除了四期一次為「您父親的籍貫是哪裡？」之外，其他均為「請問您父親是哪裡人？」，比較四項調查原包含所有樣本個案的次數分配顯示，四期四次卷二的受訪者中間南人的比例的確比歷年低，僅69.2%；而四期五次卷一的受訪者中（請參見各次「變遷調查」的執行報告）。

4 訪員特質主要來自作者所設計之訪員自填問卷，由於訪員的婚姻、教育、省籍與訪問工作經驗有少許漏填，遺漏資訊部分利用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調查組建置之訪員系統資料，以及協辦調查人員的證實結果加以插補而得。

5 學生訪員比例通常可以看出訪員流動性與經驗程度，因此，執行調查者通常希望學生訪員的比例能減少。

表 1 受訪者的特質、政治態度、總統選舉投票意向

總統選舉年度	2000年			2004年	
	四期一次 2000(卷一)	四期四次 2003(卷二)	四期五次 <sup>a</sup> 2004(卷一)	四期五次 <sup>a</sup> 2004(卷一)	五期一次 2005(卷一)
有效樣本數	1,960	1,748	1,511	1,666	1,954
性別					
女	49.5	48.3	49.0	48.9	50.9
男	50.5	51.7	51.0	51.1	49.1
年齡	44.1(15.5)	47.3(15.4)	48.5(15.3)	46.1(16.4)	46.5(15.9)
婚姻					
未婚	18.8	16.7	15.4	22.3	19.3
已婚	81.2	83.3	84.6	77.7	80.7
教育					
國小及以下	32.5	30.9	34.2	31.3	28.3
國中	14.6	15.5	15.4	14.3	12.7
高中職	27.1	25.9	23.8	24.2	27.3
專科及大學	23.2	24.5	23.9	27.4	27.4
碩博士	2.6	3.2	2.7	2.8	4.3
省籍					
台灣閩南	76.6	67.9	76.0	76.1	71.5
台灣客家	8.9	15.6	14.2	14.2	15.6
台灣原住民	2.0	3.0	.9	.8	1.5
大陸各省市	12.3	13.2	8.7	8.6	11.0
國外	.1	.3	.2	.3	.5
階級					
非白領	66.9	63.1	66.3	65.7	64.0
白領	33.1	36.9	33.7	34.3	36.0
政黨支持					
明確	60.1	59.9	61.5	61.2	61.0
不明確	39.1	40.1	38.5	38.8	39.0
統獨立場					
明確	29.0	60.4	33.8	34.5	26.8
不明確	71.0	39.6	66.2	65.5	73.2
第三人在場					
有	63.7	65.8	64.7	64.0	59.9
沒有	36.3	34.2	35.3	36.0	40.1
政治版圖分數 <sup>b</sup>	1.645 (.85)	1.772 (.94)	1.640 (.86)	1.049 (.53)	1.066 (.53)
深綠	--	--	--	17.5	17.1
淺綠	16.2	14.0	17.9	52.2	47.8
淺藍	41.2	38.8	41.0	12.3	15.4
深藍	42.7	47.2	41.1	18.1	19.7
投票意向					
有表達投票對象	66.5	75.9	76.7	73.6	63.4
沒去投票/廢票	7.1	9.0	11.5	14.2	11.2
不記得	5.6	5.0	3.2	.8	9.7
拒答	20.8	10.2	8.5	11.4	15.7

註：表中數據在年齡與政治版圖分數為平均數（標準差），其他為百分比。

<sup>a</sup> 均為 2004 年蒐集的調查，但針對兩屆總統大選進行訪問卷，因此產生兩樣本，其差異主要是在 2000 年與 2004 年總統大選時有無投票權。

<sup>b</sup> 政治版圖分數亦即當年總統大選中泛藍與泛綠得票率的比值，計算方法與四組歸類方式請詳見內文。

表 2 訪員特質與訪問經驗

總統選舉年度	2000 年			2004 年	
期次	四期一次	四期四次	四期五次 <sup>a</sup>	四期五次 <sup>a</sup>	五期一次
訪問年(問卷別)	2000(卷一)	2003(卷二)	2004(卷一)	2004(卷一)	2005(卷一)
有效訪員數	99	105	95	96	95
性別					
女	60.6	67.6	72.6	72.9	67.4
男	39.4	32.4	27.4	27.1	32.6
年齡	28.7 (9.7)	32.2 (11.1)	32.9 (10.3)	32.9 (10.2)	37.1 (10.3)
婚姻					
未婚	68.7	63.8	53.7	53.1	40.0
已婚	31.3	36.2	46.3	46.9	60.0
教育					
高中職及以下	10.1	15.2	25.3	25.0	22.1
專科及大學	83.8	79.0	65.3	65.6	72.6
碩士	6.1	5.7	9.5	9.4	5.3
省籍					
台灣閩南	79.6	78.1	75.8	76.0	72.6
台灣客家	11.2	14.3	13.7	13.5	10.5
原住民	0.0	0.0	1.1	1.0	1.1
大陸各省市	9.2	7.6	9.5	9.4	15.8
職業					
學生	60.6	56.2	38.9	38.5	31.6
其他	39.4	43.8	61.1	61.5	68.4
訪問經驗	1.14 (2.09)	2.17 (5.45)	3.81 (7.55)	3.81 (7.50)	2.97 (4.71)
無經驗	53.5	64.8	20.0	19.8	32.6
1-2 次	34.3	21.0	43.2	42.7	35.8
3 次及以上	12.1	14.3	36.8	37.5	31.6

註：表中數據在年齡為平均數（標準差），其他為百分比。

<sup>a</sup> 均為 2004 年蒐集的調查，但針對兩屆總統大選進行訪問卷，因此產生兩樣本，其差異主要是在 2000 年與 2004 年總統大選時有無投票權。

卷一為最高。在訪問經驗方面，以參加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之面訪調查計畫的項次總數來表示，訪員中沒有中研院學術性調查參加經驗的在早期比較多，晚期調查的訪員大多有訪問經驗，無論調查經驗次數多寡，比例均比早期來得高。

## (二) 測量與分析

本研究分析的投票意向主要來自一或兩個問卷題目。四期一次卷一與五期一次卷一是兩題的問法，先詢問某年總統選舉有沒有去投票，然後進一步問受訪者記不記得投給哪位（組）候選人，且對於記得之受訪者的回答方式是開放性的，並不提供選項。而四期四次卷二與四期五次卷一則是採用單題問法，直接詢問某／今年總統大選時投票給哪一組候選人。無論是單題或兩題的設計，在表態與否的回答類型依循前人研究的處理方式（杜素豪 2004），參考交叉列表卡方檢定與  $t$  檢定的結果，整合有無實際投票行為與投票對象表態兩概念後，均產生四類型的回答：(1)沒投票或投廢票、(2)不記得、(3)拒答、(4)有明確投票對象（見附錄）。

從表 1 得知，有表達投票對象的比例最高，但在五期一次卷一調查資料中降低至 63.4%，相差最多，沒投票或投廢票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回答不記得的比例在四期五次卷一明顯較低；拒答的比例則除四期一次卷一之外，歷年來有逐漸提高的現象。不同問卷題目與選項的設計可以解釋以上的差異。首先，四期一次卷一與五期一次卷一均採雙題問法，問法中均文字提示受訪者可以回答不記得，且也提供不記得與不願意回答兩個選項。相較於其他兩年調查以單刀直入的方式詢問投票對象，且不記得與不願意回答兩選項並未放在問卷上，在明確表達投票對象的比例上相對較低，不記得與拒答的比例則相對較高。其次，只有四期五次卷一詢問選後當年的投票行為且並未提供「不記得」選項，因此回答「不記得」的比例較其他調查低是合理的。不過，

若兩次大選分開來看，針對 2000 年選舉的拒答比例第三年後明顯下降，但 2004 年選舉的拒答比例第二年仍上升的現象，我們大略可猜測這類敏感性題目的回答，到了第三年請受訪者回憶時，隱私威脅性似乎大幅降低。

本研究利用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模式(two-level Hierarchical 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 HMLM)，以符合同一訪員多位受訪者的巢狀式資料分析，同時避免迴歸分析時估計標準誤被低估而統計顯著性被高估的情形(Hox et al. 1991; Hox 1994;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所使用的統計軟體為 6.04 版的 HLM (Raudenbush et al. 2007)。在分析模式中，依變項為投票意向的三到四類型回答，包含明確表態及三種不表態（包含沒投票、不記得與拒答）。<sup>6</sup>之所以分成三類不表態是因它們可能來自三種不同的回答心理歷程，其影響因素也會有所不同。本研究關注的是無效或隱瞞的回答，因此以有明確表達投票對象者為對照組，最後分析的是相對於有表態之其他類型不表態的發生機率。每一類型回答分別有一個模式的推估，且每一模式中均包括受訪者層次與訪員層次的兩個次模式。關於詳細的公式，請參考杜素豪(2004: 119)論文。

在受訪者層次模式中，自變項包括經由訪員與受訪者在性別、婚姻、年齡、教育與省籍所產生的社會距離變項，控制變項則包含受訪者職業、政治態度、戶籍所在地區的政治版圖與訪問情境。在社會距離方面，性別、婚姻、年齡與教育距離均參照 Tu 與 Liao (2007: 181-183)的操作定義，以受訪者與訪員之兩分類的特徵所產生的四種組合配對來定義性別與婚姻距離（詳見表 3）。年齡距離是先產生訪員

<sup>6</sup> 不過由於四期五次卷一的四類型回答中「不記得」的比例非常的低，尤其是針對 2004 年總統大選，回答不記得的比例幾近於 0。因此在兩筆來自四期五次卷一的資料中，不記得的回答並未納入最後的兩階層模式分析中，不進行其相對於有表態者的發生機率。

表 3 受訪者與訪員之社會距離分布情況

總統選舉年度	2000 年			2004 年	
期次	四期一次	四期四次	四期五次 <sup>a</sup>	四期五次 <sup>a</sup>	五期一次
訪問年 (問卷別)	2000 (卷一)	2003 (卷二)	2004 (卷一)	2004 (卷一)	2005 (卷一)
有效樣本數	1,960	1,748	1,511	1,666	1,954
性別 (訪員 vs. 受訪者)					
女 vs. 女 <sup>b</sup>	32.8	34.2	36.9	37.0	35.6
男 vs. 男	17.6	16.4	12.7	12.9	14.1
男 vs. 女	16.7	14.1	12.0	11.9	15.3
女 vs. 男	32.9	35.3	38.3	38.2	35.0
年齡					
訪員<受訪者	68.2	70.7	68.3	62.8	55.2
訪員=受訪者	18.9	14.2	17.9	19.1	18.2
訪員>受訪者	12.9	15.1	13.8	18.1	26.6
婚姻 (訪員 vs. 受訪者)					
已婚 vs. 已婚 <sup>b</sup>	27.8	32.3	43.2	39.8	53.3
單身 vs. 單身	11.0	10.6	8.4	12.3	6.4
已婚 vs. 單身	7.8	6.1	7.0	10.0	12.9
單身 vs. 已婚	53.3	51.0	41.4	37.9	27.4
教育程度					
訪員<受訪者	5.5	5.6	7.4	8.0	9.8
訪員=受訪者	22.7	24.2	21.7	24.8	28.7
訪員>受訪者	71.8	70.2	70.9	67.2	61.5
省籍					
訪員=受訪者 <sup>b</sup>	70.4	69.4	76.1	75.8	59.7
訪員≠受訪者	29.6	30.6	23.9	24.2	40.3

註：表中數據為百分比。

<sup>a</sup> 均為 2004 年蒐集的調查，但針對兩屆總統大選進行訪問卷，因此產生兩樣本，其差異主要是在 2000 年與 2004 年總統大選時有無投票權。

<sup>b</sup> 社會距離變項的對照組在性別變項為女性訪員訪問女性受訪者，婚姻變項為已婚訪員訪問已婚受訪者，省籍變項為訪員與受訪者省籍相同者。

與受訪者的出生世代，用 0 到 8 分別代表以下的出生世代：民國前 10 年至前 1 年、民國 1-9 年、民國 10-19 年、民國 20-29 年、民國 30-39 年、民國 40-49 年、民國 50-59 年、民國 60-69 年與民國 70-79 年。然後以受訪者出生世代的代碼減訪員出生世代的代碼後即得年齡層的距離分數，分數越高表示受訪者的年紀比訪員越低（亦即訪員比受訪者年長） $n$  個世代。同理，教育距離是先將受訪者與訪員的教育程度分成無、國小、國（初中）、高中職、大專與技術學院、碩士與博士，分別以 1 到 7 來表示。然後以受訪者教育代碼減訪員的教育代碼即產生教育距離，分數越高表示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比訪員越高。省籍距離只簡單依照傳統的方法，分為訪員與受訪者的省籍相同與否兩類。

在受訪者層次的控制變項中，受訪者職業分為白領與非白領階級，政治態度包含是否明確表達政黨認同與統獨立場來表示，而訪問情境則以訪問中是否有第三人在場表示。本研究利用政治區位的觀點，以受訪者之戶籍所在地的各政黨在歷次選舉的得票率來表示客觀的政黨傾向，稱之為政治版圖，其用意在於瞭解受訪者在投票意向的表達上是否具有不同政黨版圖之間的差異。模式分析中的政治版圖是利用洪永泰教授所蒐集之台灣地區各鄉鎮市區在總統大選中各政黨得票率，經集群分析後產生可以代表政黨傾向的 10 個依據各政黨票源順序的地區版圖（洪永泰 2000, 2004）。本研究延用針對 2000 年與 2004 年總統大選的 10 個地區版圖中泛藍與泛綠的得票率。首先，在受訪者之戶籍所在鄉鎮市區中，將泛藍得票率除以泛綠得票率產生藍綠比，以表示受訪者戶籍所在地當年總統大選中泛藍得票率為泛綠得票率的倍數。比值等於 1 表示泛藍與泛綠的得票率是 1 比 1，小於 1 表示泛藍得票率小於泛綠的得票率，反之則是泛藍得票率大於泛綠得票率。總的來說，藍綠比值越大表示受訪者所在地區越傾向於泛藍。在實際分析中，藍綠比值再分成四大類，以 1 為切點，大於 1 且小於 1.66 者歸類為淺藍，等於或大於 1.66 為深藍，小於 1 且大於 0.5 歸類為淺綠，等於或



小於 0.5 為深綠。不過，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時期並無 0.5 及以下的藍綠比，因此深綠這一類從缺。

受訪者中非白領階級的比例如預期的較高，在政黨認同方面有明確表達的比例在歷年資料中多超過五成；明確表達統獨立場者，自四期四次卷二(2003)之後有下降的現象。<sup>7</sup> 明確回答政黨支持度者約六成，回答明確統獨立場者的比例除四期四次卷二之外均大約有三成。從兩年選舉調查的政治版圖來看，2000 年大選偏向泛藍的比例較高，而到了 2004 年則剛好相反(表 1)。

在訪員層次的控制變項包括訪員職業(學生與否)與訪問經驗(分為無經驗、1-2 次與 3 次及以上)兩變項(表 2)。學生訪員的比例歷年來有明顯降低的趨勢。2000 與 2003 年調查中無經驗訪員的比例超過五成，其他年期調查則約在兩三成左右。

兩階層分析模式中屬於類別變項者均以虛擬變項方式處理，對照組分別是性別距離的女性訪員配對女性受訪者、婚姻距離的已婚訪員配對已婚受訪者、省籍距離的相同省籍、受訪者的非白領階級、政黨支持不明確、統獨立場不明確、訪問中無第三人在場、政治版圖屬深藍、非學生訪員以及無經驗的訪員。為了解社會距離對於投票回答的影響，本研究分析步驟有三：(1)常數模式：不含任何變項，(2)社會距離模式：再加入五個特徵距離變項，以及(3)完整模式：再加入其

---

7 歷年資料中之所以在統獨立場回答上有明顯的差異，主要的原因來自選項設計的不同，四期一次卷一與五期一次卷一均只設計四個回答選項，包括統一、獨立、維持現狀與看情形，本研究定義明確回答為統一與獨立。而四期四次卷二與四期五次卷一的選項設計則不僅強調急統與急獨，且在維持現狀部分再細分為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三個選項。再者，四期五次卷一更新增「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綜合這兩期的回答，本研究的定義是將回答盡快統一、盡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定義為明確回答。

他受訪者層次與訪員層次變項。

## 三、研究結果

### (一) 社會距離的描述

從表 3 可知女性訪員訪問女性或男性受訪者的比例在各年分別約在三成五左右，且歷年有上升的趨勢。婚姻距離中四個組合的比例在歷年的變化明顯，已婚訪員訪問已婚或單身受訪者的比例幾乎逐年提高，相反的單身訪員訪問已婚受訪者的比例則有降低的趨勢。綜合四種組合在比例增減的變化，可歸因於歷年來已婚訪員的比例呈現遞增（表 2）。

在年齡距離中，受訪者較訪員年長的情形歷年來均占了一半以上（55%到70%之間），而雙方在同一出生世代的比例也多在17%或以上。在教育距離方面，受訪者教育程度低於訪員教育程度的比例歷年均最高，不過逐年有緩和下降的傾向。相反的，受訪者的教育程度高於訪員的比例則歷年均顯示最低，且小幅上升。在省籍距離方面，除了五期一次卷一之外，訪員與受訪者省籍相同的比例幾乎都在七成或以上。

### (二) 社會距離的訪答效應

本研究有三個分析步驟：常數模式、社會距離模式與完整模式。其中，常數模式是進行兩階層分析(HMLM)時的基本步驟，主要目的是用來判斷HMLM是否適用於所採用的調查資料。若常數模式顯示訪員間變異的卡方檢定未達統計顯著性，表示該資料不需進行多階層模式分析。本研究顯示所有資料以HMLM的常數模式分析的結果均達顯著性，因此接下來只呈現後兩種模式分析的結果，比較特徵距離在控

制其他變項前後的變化情形。

根據表 4，在 2000 年總統投票意向的三類不表態中，省籍相似與否對於表態與否並無顯著的影響，但性別、年齡、婚姻與教育四種特徵距離的效應是存在的，只是他們在不同類不表態之間的影響效果有些差異。以下的分別從沒投票、不記得與拒答三種回答，說明兩次大選間社會距離與其他的影響效果。

首先，在沒投票的回答上，只有同性的兩種訪問配對組合之間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其影響顯著性在加入其他控制變項之後在不同調查資料之間呈現不穩定的變化。不過仍可依稀得知相較於女性訪問女性時，男性訪問男性時受訪者傾向回答沒去投票（在 0.05 顯著水準之下，僅四期一次卷一與四期四次卷二）。婚姻距離效應多穩定且一致的呈現於四期四次卷二與四期五次卷一，相對於已婚訪問已婚的組合，其他三種訪問配對組合的受訪者回答沒投票的機率幾乎都明顯較高，唯一的例外是單身訪問已婚這個組合明顯的下降。四期四次卷二(2003)與四期五次卷一(2004)中才出現年齡與教育距離的影響。年齡距離效應在控制了其他非社會距離變項之後比較顯著，且在晚一年調查中，其顯著性無論有無控制其他距離變項均穩定呈現，受訪者年齡層小於訪員時回答沒投票的機會明顯的較高。不過，教育距離效應的顯著性在控制了其他非社會距離變項之後反而有下降的傾向。

以上各種特徵距離效應中僅性別距離效應在 2004 年大選投票意向跨模式間均未達 0.05 顯著水準，其他特徵距離對於回答沒投票的影響方向都和 2000 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相同（表 5）。其中，年齡與教育距離效應僅發生在五期一次卷一，且同樣的在控制其他非社會距離變項之後，沒投票的機率受到教育距離的影響顯著性明顯下降。婚姻配對的影響中僅剩兩種配對具有影響效果，且在五期一次卷一中較具跨模式的穩定性。

綜合表 4 與表 5，我們可進一步從兩層面的時間變化來看回答沒

表 4-1 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2000 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回答沒投票）<sup>a</sup>

期次卷 模式	四期一次卷一（2000 年）	四期四次卷二（2003 年）	四期五次卷一（2004 年）
受訪者層次			
社會距離變項			
性別（女性 vs. 女性）			
男性 vs. 男性	0.624* (.315)	0.172* (.068)	0.307*** (.066)
年齡			
婚姻（已婚 vs. 已婚）			0.351*** (.073)
單身 vs. 單身	0.545 † (.312)	1.361*** (.280)	1.127*** (.282)
已婚 vs. 單身		0.830* (.340)	1.050*** (.289)
單身 vs. 已婚	-0.532 † (.276)	0.602* (.263)	0.799*** (.227)
教育			
階級（非白領）			-0.192** (.074)
政黨支持（不明確）	-1.012*** (.192)	-0.430 † (.226)	-1.774*** (.187)
統獨立場（不明確）		-0.347 † (.189)	-0.376 † (.204)
訪員層次			
職業學生（其他）			0.510 † (.263)
訪問經驗（無經驗）			0.596* (.284)
1-2 次			-0.441* (.221)
常數項	-2.591*** (.287)	-2.052*** (.454)	-2.167*** (.207)
受訪者層次係數信度	0.275	0.111	0.037
訪員層次變異量	0.342	0.101	0.025
訪員間變異卡方檢定 <sup>b</sup>	135.677**	114.092	92.711

<sup>a</sup> 本表僅呈現迴歸係數顯著性達到 0.1 顯著水準者，† 0.1 > p > 0.05, \* 0.05 > p > 0.01, \*\* 0.01 > p > 0.001, \*\*\* 0.001 ≥ p。

<sup>b</sup> 四期四次卷二、四期五次卷一的常數模式訪員間變異量未達到 0.1 的統計顯著。

表 4-2 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2000 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回答不記得）<sup>a</sup>

期次卷	四期一次卷一（2000 年）	四期四次卷二（2003 年）	四期五次卷一（2004 年） <sup>b</sup>
模式			
受訪者層次			
社會距離變項			
性別（女性 vs. 女性）			
男性 vs. 男性		-0.848 <sup>†</sup> (.441)	-0.876 <sup>†</sup> (.456)
女性 vs. 女性		-0.722 <sup>†</sup> (.423)	-0.822 <sup>†</sup> (.440)
女性 vs. 男性		-0.606* (.279)	-0.638* (.291)
年齡		-0.306***(.084)	-0.337***(.095)
婚姻（已婚 vs. 已婚）			
單身 vs. 已婚		-0.692* (.338)	-0.737 <sup>†</sup> (.439)
教育		-0.305** (.102)	-0.344* (.141)
政黨支持（不明確）		-1.897***(.255)	-1.573***(.269)
統獨立場（不明確）		-0.559* (.282)	
政治版圖（深藍）			
淺綠			-0.960* (.469)
訪員層次			
訪問經驗（無經驗）			
1-2 次		-0.608 <sup>†</sup> (.342)	
3 次及以上			1.261** (.451)
常數項			
受訪者層次係數信度	-3.324***(.375)	-1.991***(.553)	-3.663***(.380)
訪員層次變異量	0.360	0.289	0.226
訪員間變異卡方檢定 <sup>c</sup>	0.781	0.570	0.474
	167.273***	127.676*	130.704*

<sup>a</sup> 本表僅呈現迴歸係數顯著性達到 0.1 顯著水準者，<sup>†</sup> 0.1 > p > 0.05, \* 0.05 > p > 0.01, \*\* 0.01 > p > 0.001, \*\*\* 0.001 ≥ p。

<sup>b</sup> 四期五次卷一中 2000 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題的不記得選項因為比例過少(3.2%)，故在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中刪除此項。

<sup>c</sup> 常數模式訪問變異量皆達到 0.1 的統計顯著。

表 4-3 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2000 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拒答）<sup>a</sup>

期次卷 模式	四期一次卷一 (2000 年)	四期四次卷二 (2003 年)	四期五次卷一 (2004 年)
受訪者層次			
社會距離變項			
性別 (女性 vs. 女性)			
男性 vs. 男性	0.516* (.230)	0.659** (.240)	-0.669 † (.406)
男性 vs. 女性	0.769*** (.228)	0.633** (.239)	-1.070* (.448)
女性 vs. 男性	0.305 † (.170)	-	-1.044* (.466)
年齡	-0.096 † (.050)	-0.092 † (.054)	-0.147* (.064)
婚姻 (已婚 vs. 已婚)			
單身 vs. 已婚		-0.688* (.278)	-0.175* (.073)
教育			
階級 (非白領)		0.273** (.099)	
政黨支持 (不明確)	-1.589*** (.133)	-0.689** (.249)	
統獨立場 (不明確)	-0.616*** (.155)	-1.943*** (.205)	-2.096*** (.236)
第三人在場	0.233 † (.139)	-0.698*** (.189)	-0.535* (.249)
政治版圖 (深藍)			
淺藍			0.744* (.303)
訪員層次			
訪問經驗 (無經驗)			
3 次及以上	-1.017* (.446)		
常數項	-1.680*** (.224)	-0.761* (.344)	-1.815*** (.262)
受訪者層次係數信度	0.524	0.481	0.409
訪員層次變異量	0.456	0.421	0.611
訪員間變異卡方檢定 <sup>b</sup>	221.631***	189.370***	189.564***
		173.603***	154.944***
			129.763**

<sup>a</sup> 本表僅呈現迴歸係數顯著性達到 0.1 顯著水準者，† 0.1 > p > 0.05, \* 0.05 > p > 0.01, \*\* 0.01 > p > 0.001, \*\*\* 0.001 ≥ p。

<sup>b</sup> 常數模式訪員間變異量皆達到 0.1 的統計顯著。

表 5-1 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2004 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回答沒投票）<sup>a</sup>

期次卷 模式	四期五次卷一 (2004 年)		五期一次卷一 (2005 年)	
	一	二	一	二
受訪者層次				
社會距離變項				
性別 (女性 vs. 女性)			0.418 <sup>†</sup> (.224)	0.425 <sup>†</sup> (.246)
男性 vs. 男性			0.226*** (.058)	0.208*** (.062)
年齡				
婚姻 (已婚 vs. 已婚)				
單身 vs. 單身	0.726** (.229)	1.041*** (.310)	1.083*** (.266)	0.875** (.292)
已婚 vs. 單身	0.557* (.250)	0.475 <sup>†</sup> (.270)	0.100*** (.226)	0.818*** (.241)
教育			-0.188** (.068)	-0.139 <sup>†</sup> (.082)
政黨支持 (不明確)		-1.764*** (.163)		-1.705*** (.164)
統獨立場 (不明確)		-0.436* (.176)		-0.425* (.190)
第三人在場		0.282 <sup>†</sup> (.169)		
政治版圖 (深藍)				
深綠				
淺藍				
常數項	-1.706*** (.183)	-0.837* (.338)	-2.177*** (.194)	-0.361 (.330)
受訪者層次係數信度	0.128	0.171	0.065	0.026
訪員層次變異量	0.075	0.122	0.038	0.016
訪員間變異卡方檢定 <sup>b</sup>	108.357	112.427 <sup>†</sup>	87.820	72.838

<sup>a</sup> 本表僅呈現迴歸係數顯著性達到 0.1 顯著水準者，<sup>†</sup>  $0.1 > p > 0.05$ ，\*  $0.05 > p > 0.01$ ，\*\*  $0.01 > p > 0.001$ ，\*\*\*  $0.001 \geq p$ 。

<sup>b</sup> 四期五次卷一、五期一次卷一的常數模式訪員間變異量未達到 0.1 的統計顯著。



表 5-2 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2004 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回答不記得）<sup>a</sup>

期次卷 模式	四期五次卷一（2004 年） <sup>b</sup>		五期一次卷一（2005 年）	
	—	二	—	二
受訪者層次				
社會距離變項				
性別（女性 vs. 女性）				
女性 vs. 男性			-0.941***(.220)	-0.720** (.234)
婚姻（已婚 vs. 已婚）				
已婚 vs. 單身			0.776* (.317)	0.662* (.335)
教育			-0.385***(.082)	-0.346***(.099)
政黨支持（不明確）			-1.886***(.192)	-1.886***(.192)
統獨立場（不明確）			-1.066***(.267)	-1.066***(.267)
政治版圖（深藍）				
淺藍			-0.805 † (.468)	-0.805 † (.468)
常數項			-2.347***(.269)	-0.825 † (.470)
受訪者層次係數信度			0.491	0.438
訪員層次變異量			0.879	0.791
訪員間變異卡方檢定。			214.261***	167.879***

<sup>a</sup> 本表僅呈現迴歸係數顯著性達到 0.1 顯著水準者，<sup>†</sup>  $0.1 > p > 0.05$ ，\*  $0.05 > p > 0.01$ ，\*\*  $0.01 > p > 0.001$ ，\*\*\*  $0.001 \geq p$ 。

<sup>b</sup> 四期五次卷一中 2004 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的不記得選項因為比例過少(0.8%)，故在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中刪除此項。

<sup>c</sup> 五期一次卷一的常數模式訪員間變異量達到 0.1 的統計顯著。

表 5-3 兩階層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2004 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拒答）<sup>a</sup>

期次卷 模式	四期五次卷一（2004 年）		五期一次卷一（2005 年）	
	一	二	一	二
受訪者層次				
社會距離變項				
性別（女性 vs. 女性）	-0.827* (.381)			
男性 vs. 男性				
婚姻（已婚 vs. 已婚）				
單身 vs. 單身		0.817* (.374)		-0.775 † (.432)
單身 vs. 已婚				0.136 † (.082)
教育				
階級（非白領）		0.654** (.226)		-2.134*** (.158)
政黨支持（不明確）		-2.051*** (.195)		-0.422* (.181)
統獨立場（不明確）		-0.445* (.206)		0.317* (.161)
第三人在場（不在場）				
政治版圖（深藍）		-0.873 † (.499)		
淺藍				
訪員層次				
職業學生（其他）		-0.642 † (.365)		
常數項	-1.874*** (.249)	-0.845 † (.446)	-1.322*** (.223)	-0.116 (.423)
受訪者層次係數信度	0.483	0.429	0.592	0.559
訪員層次變異量	0.721	0.666	0.877	0.8937
訪員間變異卡方檢定 <sup>b</sup>	204.091***	167.988***	273.657***	241.002***

<sup>a</sup> 本表僅呈現迴歸係數顯著性達到 0.1 顯著水準者，† 0.1 > p > 0.05, \* 0.05 > p > 0.01, \*\* 0.01 > p > 0.001, \*\*\* 0.001 ≥ p。

<sup>b</sup> 常數模式訪員間變異量皆達到 0.1 的統計顯著。

投票的社會距離效應。首先，同一選舉投票在跨兩個或三個年度調查間，多半是選舉當年的調查結果（2000年與2004年）比較少明顯的社會距離效應。此趨勢在兩次大選調查結果之間也有明顯的差異，其差異可以從選後調查在跨年間隔的差異得以解釋。針對2000年總統大選的三年調查分別是在當年以及連續的第三年與第四年進行，而針對2004年大選的調查則分別在當年以及第二年進行。選後越久的調查對受訪者會有比較重的回憶負擔，因此受到社會距離的影響會比較明顯。其次，比較四年前後兩次大選調查則可發現，兩種婚姻配對組合（皆已婚相對於均單身、已婚訪問單身）的距離效應從2003年到2005年均呈現穩定。而年齡距離效應則依稀具有隨時間，亦即離選舉年越久越明顯的趨勢。

接下來比較兩年總統大選投票意向回答不記得的社會距離效應。相對於2000年總統選舉中有表態者，兩筆有效的調查資料均顯示，受訪者年紀越小於訪員時（年齡距離分數越高），回答不記得的機率越低（表4-2中負的迴歸係數），這雖然與回答沒投票的影響方向相反，受訪者遇到年紀比自己小的訪員時傾向於回答不記得的現象合乎理論預期，亦即年紀差距越大時越年長的受訪者傾向於不記得或懶得回想當初投票給誰。其他較穩定具有顯著差異（在0.05顯著水準下）的距離變項都僅出現在2003年調查。與回答沒投票的發現有些類似的是，受訪者在面對教育程度比自己高的訪員時（教育距離分數越高）回答不記得的機率越低（負的迴歸係數），這呼應了前人知識題的發現，亦即低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可能有配合高教育程度訪員期待的心理，而提供有效的回答。但與理論預期相反的是，相同女性配對下回答不記得的機率反而比較高，而已婚者在接受已婚訪員的訪問時回答不記得的機率比接受單身訪員訪問時來得高。

以上的性別與教育距離效應在2004年總統大選訪答中也有同樣的發現，只可惜僅有選舉後第二年的調查資料可驗證（由於該次調查問

卷回答不記得的比例不到 1%)。不過婚姻距離在五期一次卷一的發現與對 2000 年大選調查的發現有些差異，但與理論預期比較接近，亦即婚姻狀態相似性高的組合，有效回答的機會比較大，同樣被已婚訪員訪問時，單身比已婚者傾向於回答不記得。

回答不記得的社會距離效應在針對 2000 年選舉的調查中具有明顯隨時間而增強的現象，同樣是選舉當年調查的社會距離效應非常少（2000 年）。在前後兩次大選調查之間穩定呈現顯著影響的是教育距離與女性訪員配對不同性別受訪者之間在回答不記得的差異，而且在 2005 年調查顯示比前幾年的調查更顯著。

最後，在拒答方面不論是跨模式或跨時間（含跨兩次總統大選）的結果均非常分歧。性別距離只出現在針對 2000 年總統大選的當年與第四年的兩項選後調查中，且其對拒答的影響方向在兩年調查之間剛好相反（表 4-3）。比較符合理論預期的是回憶 2000 年（當年）總統大選時投票給誰時，相對於女性訪問女性時，其他性別組合（即使是男性訪問男性）中拒答的機率較高（四期一次卷一）。而受訪者的年齡層越高於訪員（年齡距離分數越高）時，傾向拒答的機率比較低（見表 4-3 四期一次卷一與四期四次卷二中負的迴歸係數）。傾向於拒答的受訪者明顯發生在訪員的教育程度比受訪者高時（教育距離分數越低時，四期四次卷二中負的迴歸係數）。針對 2004 年總統大選的拒答，在 0.05 顯著水準下，僅性別距離有接近的影響效果，但在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的效果不再顯著（表 5-3）。另外則發現如理論預期的，已婚者面對單身訪員時比面對已婚訪員時容易拒答。不過，以上的效應均零星分散在單獨的調查資料中。

### （三）投票意向訪答的其他效應

綜合多年調查資料針對兩屆總統大選的三種不表態的分析結果，在受訪者層次上，是否明確回答政黨支持與統獨立場對於三種不表態

的發生有明顯的影響。如理論預期且呼應前人研究的發現，回答不明確者較傾向於沒投票、回答不記得或拒答（杜素豪 2004）。屬於區位政黨立場指標的政治版圖效應可零星的在不同調查資料中發現，來自不同政治版圖地區的受訪者在三類不表態上有明顯差異。相較於來自深藍較鮮明地區的受訪者，淺綠地區的受訪者回答不記得的機率比較小（四期四次卷二，2000 年大選）；淺藍地區的受訪者傾向於拒答（四期五次卷一，2000 年大選）；而來自深綠與淺藍地區受訪者傾向於表態而非回答沒投票（五期一次卷一，2004 年大選）（在 0.05 顯著水準下）。符合理論假設預期的是，訪問中無第三人在場時受訪者比較傾向於拒答（五期一次卷一，2004 年大選）。階級效應在兩年大選間僅發生在 2003 年與 2004 年調查中，其影響方向完全相反，白領階級較傾向於拒答的 2004 年調查比較符合理論預期，亦即較高階級者隱私保護的意識較強烈。

在訪員層次上，本研究僅在針對 2000 年總統大選的三筆調查資料中發現訪員經驗對於回答沒投票（四期五次卷一）、不記得（四期四次卷二）與拒答（四期一次卷一）有顯著的影響。相對於無經驗，有經驗的訪員獲得的回答比較傾向於回答不記得，但較不會有拒答或沒投票兩種回答。這顯示訪員經驗對於提高有效回答是有明顯幫助。由於訪員效應多發生在單獨的調查，我們幾乎無法看到其效應的時間趨勢。不過，在針對 2000 年總統選舉回答沒投票的樣本中，比起回憶兩年前的投票行為，回憶三年前者受到訪員職業的影響更加明顯。雖然訪員特徵對三類不表態的影響在不同年度資料中並非都顯著，我們仍可從訪員層次變異量的卡方檢定結果發現，大部分資料均顯示不表態之發生機率在不同訪員間具有統計上明顯的差異。這表示兩層次邏輯迴歸模式的推估多具備應有的適合度。不過，從信度係數大小不一來看，各筆資料在各次模式推估的穩定性是有些變化的。

## 四、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多年期的「變遷調查」資料，從訪員與受訪者在特徵上的差異與距離來驗證敏感性的總統選舉投票意向題中的不表態是否存在社會距離效應。結果發現在投票的三種不表態類型的發生多受到性別、婚姻、年齡與教育距離的影響。若分別從每一年大選訪答的社會距離效應來看，我們可依稀看到部分社會距離效應跨時間的變化，即在回憶當年到回憶幾年前的投票行為中，回憶越久以前的訪答，其社會距離效應有越明顯的趨勢。在沒投票回答上，無論針對 2000 年或 2004 年總統大選投票，在需越多時間回憶時，已婚配單身或單身配已婚的組合，相對於已婚配已婚組合時，回答沒投票傾向越明顯。沒投票的機率越高且跨選舉與跨時間越明顯的情形，也可在訪員年長於受訪者之年齡距離效應上發現。已婚相似性似乎對於低報投票參與是有正面效果的，但是，年齡距離中受訪者越年輕沒投票的機會越大是一般的現象，回答沒投票是否來自年齡距離有待驗證。

其次在回答不記得方面，雖然只有針對 2000 年大選的兩年資料可比較，也可發現性別、婚姻與教育距離效應在跨時間也有越來越明顯的趨勢。這種跨時間的趨勢在拒答方面不僅看不到，而且跨模式的穩定性也不一致。其中，在不記得與拒答有一致的發現且符合社會距離理論假設，亦即訪員年紀大於受訪者越多時回答不記得或拒答的機率越高。在教育距離上雖然影響方向相反，但也頗符合社會距離的理論解釋，不記得與拒答的機率上升都來自教育距離，只是距離的方向不同，前者是受訪者教育程度比訪員還高時，而後者是受訪者教育程度比訪員還低時。

不過很可惜的，本研究並未發現如美國投票意向研究所建議的種族距離效應，無法證實的政治敏感題目中受訪者面對省籍與自己不同

的訪員時是否傾向於提供偏差或無效的回答。這也許表示在「變遷調查」中還有比省籍相異性更重要的因素，例如訪員的訪問技巧與經驗，亦即在標準化的訪談基本訓練中訪員不被允許挑起省籍情結或族群及政黨認同的討論。又例如，可能受訪者的省籍情結或族群認同已經在關於統獨立場與政黨支持兩個問卷題目的回答中充分表達，這可以從本研究的模式分析結果中，這兩個主觀態度對回答顯著的影響在跨模式、調查資料與時間上均非常穩定得以確定。

由於考慮到省籍相似性兩分類法不夠深入，作者事實上也嘗試過多種訪問配對組合或計算的省籍距離分數(Tu and Liao 2007)進行分析，但都沒有省籍距離的明顯效果。當然除此之外，仍有未來須再次檢驗的內容。首先，本研究將兩種性質的題目整合成一個投票意向變項來分析是否正確仍有待證明。未來可考慮將有無參與投票這類較有社會規範性的題目以及投票對象表態的敏感性題目分開來探討與驗證。其次，本研究使用的資料來自選後調查，與國外研究假設或結果不相符似乎是可能的，未來若能對選前調查資料進行社會距離效應的分析將會更理想，也可進一步提供國際比較的參考。

本研究結果中有少部分的特徵距離對於兩種不表態（不記得與拒答）的影響方向異於社會距離理論的預期，分別是性別與婚姻配對組合，顯示相異特徵的配對組合時不表態的無效回答不見得比較高，未來無論在理論解釋或社會距離的測量方法上均還有修正的空間，此方向也適用在年齡與教育距離，雖符合一般理論預期或可合理解釋的影響效果上。而在有沒有投票的回答上，如前所述的也需進一步的分析是否年齡距離真正具有明顯的影響效果。

無論如何，本研究的許多侷限，總的來說具體的提供了未來更多相同主題研究或是其他題目性質回答之社會距離效應上面更深入研究的方向。未來可繼續研究的是其他容易造成受訪者防衛心理與社會規範暗示等題目的社會距離效應。這些主題包含個人隱私的收入題，族



群意識題與有不法疑慮的藥物濫用行為題，有無投票的行為題與性別角色態度題，心理健康題與人際網絡題等。這些主題在國外都陸續的在探討訪員效應的研究中出現，但焦點放在社會距離者則仍稀少。本研究的初探結果無疑除了提供台灣調查方法研究參考之外，也可作為調查實務執行上重要的參考，尤其是在訓練訪員面對不同特徵（質）的受訪者回答各種不同敏感性問卷主題時，如何依據與自己在特徵上客觀的距離，進一步拿捏好訪談關係，提升訪問品質。

## 附錄 各期總統大選題組與答項

題目	2000年		2004年		重編碼
	四期一次卷一	四期四次卷二	四期五次卷一 <sup>a</sup>	四期五次卷一 <sup>a</sup>	
這一次總統選舉(民國89年)的時候, 有沒有人沒有去投票, 請問您有沒有去投票?	請問您上次總統選舉投票給誰?	請問您上次總統選舉投票給誰?	請問您這次(今年三月20日)的總統選舉投票給誰?	請問您這次(今年三月20日)的總統選舉投票給誰?	投票意向
請問您記不記得投給那一位總統候選人?	請問您記不記得投給那一位總統候選人?	請問您記不記得投給那一位總統候選人?	請問您記不記得投給那一位總統候選人?	請問您記不記得投給那一位總統候選人?	
答項	1. 連戰 2. 陳水扁 3. 李敖 4. 宋楚瑜 5. 許水德 0. 沒去投票 6. 投票票 7. 不記得 9. 不願意回答	1. 連戰 2. 陳水扁 3. 宋楚瑜 4. 其他 5. 沒有投票 6. 投票票 7. 不記得 <sup>b</sup> 8. 拒答 <sup>b</sup>	1. 宋楚瑜、張昭雄 2. 連戰、蕭萬長 3. 李敖、馮滬祥 4. 許信良、朱惠良 5. 陳水扁、呂秀蓮 7. 沒去投票 6. 投票票 97. 不記得 <sup>b</sup> 98. 拒答 <sup>b</sup>	1. 連戰、宋楚瑜 2. 陳水扁、呂秀蓮 2. 連戰、宋楚瑜 4. 沒去投票 3. 投票票 <sup>b</sup> 7. 不記得 8. 不願意回答	0. 明確 1. 連戰、宋楚瑜 2. 陳水扁、呂秀蓮 1. 沒投票/投票票 2. 不記得 3. 拒答

<sup>a</sup>均為2004年寬集的調查,但針對兩個總統大選進行訪問卷,因此產生兩樣本,其差異主要是在2000年與2004年總統大選時有無投票權。

<sup>b</sup>該選項未顯示在問卷上。

## 參考文獻

- 杜素豪(2004)投票意向問題不同類型項目無反應之分析：以2000年總統大選為例。選舉研究 11(2): 111-131。
- 洪永泰(2000)2000年總統選舉政治版圖。未出版研究報告。
- (2004)2004年總統選舉政治版圖。未出版研究報告。
- Anderson, Barbara A., Brian D. Silver, and Paul R. Abramson (1988) The Effects of Race of the Interviewer on Measures of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by Blacks in SRC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1): 53-83.
- Becker, S., K. Feyisetan, and P. Makinwa-Adebusoye (1995) The Effect of the Sex of Interviewers on the Quality of Data in a Nigerian Family Planning Questionnaire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26(4): 233-240.
- Benney, Mark, David Riesman, and Shirley A. Star (1956) Age and Sex in the Inter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2): 143-152.
- Campbell, B. A. (1981) Race-of-Interviewer Effects among Southern Adolesc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 231-244.
- Dailey, R. M., and R. E. Claus (2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viewer Characteristics and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s among Substance Users: a Multi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Drug Issues* 31(4): 867-888.
- Davis, Darren W. (1997a) Nonrandom Measurement Error and Race of Interviewer Effects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1(1): 183-207.
- (1997b) The Direction of Race of Interviewer Effects among African-Americans: Donning the Black Mask.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1): 309-322.

Davis, Darren W., and Brian D. Silver (2003) Stereotype Threat and Race of Interviewer Effects in a Survey on Political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1): 33-45.

Dijkstra, W., and J. van der Zouwen (1982) *Response Behaviour in the Survey-Interview*.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Dohrenwend, B. S., J. Colombotos, and B. P. Dohrenwend (1968) Social Distance and Interviewer Effect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2(3): 410-422.

Dohrenwend, Barbara Snell, J. Allen Williams, Jr., and Carol H. Weiss (1969) Interviewer Biasing Effects: Toward a Reconciliation of Finding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3: 121-129.

Esbensen, Finn-Aage, and Scott Menard (1991) Interviewer-related Measurement Error in Attitudinal Research: a Nonexperimental Study. *Quality & Quantity* 25: 151-165.

Fendrich, M., T. P. Johnsonm, C. Shaligram and J. S. Wislar (1999) The Impact of Interviewer Characteristics on Drug Use Reporting by Male Juvenile Arrestees. *Journal of Drug Issues* 29(1): 37-58.

Finkel, Steven E., Thomas J. Guterbock, and Marian J. Borg (1991) Race-of-Interviewer Effects in a Preelection Pol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3): 313-330.

Hatchett, Shirley, and Howard Schuman (1975) White Respondents and Race-of-Interviewer Effect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9(4): 523-528.

Hox, J. J., E. D. de Leeuw, and I. G. G. Kreft (1991) The Effect of Interviewer and 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Quality of Survey Data: A Multilevel Model. Pp. 439-462 in *Measurement Errors in*

- Surveys*, edited by Paul P. Biemer, Robert M. Groves, Lars E. Lyberg, Nancy A. Mathiowetz, and Seymour Sudma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Hox, J. J. (1994)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s for Interviewer and Respondent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2(3): 300-318.
- Huang, Ming-hsiung (2009) Race of the Interviewer and the Black-White Test Score Gap.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 29-38.
- Huddy, L., J. Billig, J. Bracciodieta, L. Hoeffler, P. J. Moynihan, and P. Pugliani (1997) The Effect of Interviewer Gender on the Survey Response. *Political Behavior* 19: 197-220.
- Hyman, H. H. (1954) *Interviewing in Social Research*.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T., M. Fendrich, C. Shaligram, A. Garcy, and S. Gillespie (2000)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Interviewer Characteristics in an RDD Telephone Survey of Drug Use. *Journal of Drug Issues* 30(1): 77-102.
- Kane, E., and L. Macaulay (1993) Interviewer Gender and Gender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 1-28.
- Katz, D. (1942) Do Interviewers Bias Poll Result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2): 248-268.
- Kim, H., N. Baydar, and A. Greek (2003) Testing Conditions Influence the Race Gap in Cognition and Achievement Estimated by Household Survey Data.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3: 567-582.
- Lenski, G. E., and J. C. Leggett (1960) Caste, Class and Deference in the Research Intervie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5(5): 463-467.

- Lueptow, L. B., S. L. Moser, and B. F. Pendleton (1990) Gender and Response Effects in Telephone Interviewers About Gender Characteristics. *Sex Roles* 22: 29-42.
- Malat, J. (2001) Social Distance and Patients' Rating of Healthcare Provider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2(4): 360-372.
- Raudenbush, S. W., and A. S. Bryk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audenbush, S. W., A. S. Bryk, and R. Congdon (2007) *HLM6.04*. Chicago: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Inc.
- Reese, S. D., W. A. Danielson, P. J. Shoemaker, T. K. Chang, and H. L. Hsu (1986) Ethnicity-of-Interviewer Effects among Mexican-Americans and Anglo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4): 563-572.
- Schuman, Howard, and Jean M. Converse (1971) The Effects of Black and White Interviewers on Black Responses in 1968.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5(1): 44-48.
- Sudman, S., and N. M. Bradburn (1974) *Response Effects in Survey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Tu, Su-hao, and Pei-shan Liao (2007) Social Distance, Respondent Cooperation and Item Nonresponse in Sex Survey. *Quality & Quantity* 41: 177-199.
- Webster, C. (1996) Hispanic and Anglo Interviewer and Respondent Ethnicity and Gender: The Impact on Survey Response Qual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3(1): 62-72.
- Weiss, Carol H. (1968) Validity of Welfare Mothers' Interview Respons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2: 622-633.
- Weeks, M. F., and R. P. Moore (1981) Ethnicity-of-Interviewer Effects on Ethnic Respondent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2): 245-249.

Williams, Jr. J. Allen (1964) Interviewer-Respondent Interaction: a Study of Bias in the Information Interview. *Sociometry* 27: 338-352.

Yang, Meng-li, and Ruoh-Rong Yu (2008) The Interviewer Effect when There is an Education Gap with the Respondent: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n Biotechnology in Taiw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 1321-1331.





# 附錄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演變  
(1985-2011)

章英華 傅仰止 張苙雲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一、計畫原由與目的

台灣經歷百餘年之現代化衝擊，尤其近三十年來，整個社會變遷十分巨大。這樣的社會變遷在本質上究竟如何？到底在社會、文化、政治等各個層面有著什麼樣的變遷？如何變遷？各層面變遷彼此間的關係如何？甚至究竟變了沒有？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重要社會科學議題。三十年前，學者面對台灣社會這樣巨大的變遷，除了若干政府統計資料外，並無可供深入分析的研究資料。到1980年初，在既有的調查資料中，經濟調查的資料已相當豐富，社會文化調查資料卻相當稀少且零散，尤其欠缺全國性的抽樣調查資料。雖然行政院主計處每隔十年都會進行人口普查，但一方面資料內容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資料儲存和運用也有問題，實際上能貢獻於社會變遷研究的非常有限。在缺乏相當規模資料的狀況下，社會科學界就不易深入研究社會變遷現象，進而掌握其特徵加以論述。政界和學術界雖然常常強調社會變遷快速，也呼籲社會因應，但缺乏客觀的數據，總是停留在常識性的說法。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以下簡稱「變遷調查」）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有效建構台灣社會變遷的調查資料檔，為台灣社會變遷的研究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變遷調查」在1982年時開始規劃，當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故人文社會發展處處長華嚴教授與擔任研究員的葉啟政教授，有鑑於國內欠缺全國抽樣的非經濟調查，乃主動進行規劃並推動，希望集中社會科學人力與經費，建構一個有關台灣社會變遷的調查資料庫。在1984年由楊國樞教授擔任主持人，瞿海源教授為執行秘書，推動了第一次的調查。到了1988年，即第一次調查完成三年後，當時國科會人文處處長劉克智教授和負責社會學部門的陳寬政教授，認為應該積極進行第二次調查，於是委請瞿海源教授負責規劃，開啓了往後五年為期、每年兩份問卷的持續性社會調查。瞿

教授自二期一次起擔任計畫主持人，奠定了「變遷調查」的推展模式；1999年三期五次調查開始，由章英華教授與傅仰止教授擔任主持人；2006年五期二次計畫執行時，由傅仰止教授擔任主持人，張晉芬教授為共同主持人；2007年的五期三次計畫，由張荳雲教授擔任主持人，廖培珊教授共同主持，直到目前「變遷調查」仍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人員主持。

「變遷調查」在1984年第一次規劃時，本著以下三個核心的基本精神進行。第一是時間序列性，調查以間隔五年重複施行。就調查研究的性質而論，單次調查所得資料仍然極為重要，研究者可以利用單次調查的資料探討社會現象，本身的學術價值與貢獻，不需贅述。然而，從多時間點多次調查來探測社會變遷現象，所能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就更豐富了。每隔五年對同一主題再行施測，主要是因為對社會變遷的研究需要時間序列的資料，也就是至少要有兩個以上時間點的調查。經過評估，以五年為期進行調查，對台灣社會變遷狀況的掌握應該是合宜的，因為時間距離太短，很難探測出變遷，實質的社會變遷也不是一兩年的變動可以顯現的，而且頻繁的調查所需經費非常龐大。

第二項核心信念是促成社會科學科際間的合作，邀請社會、經濟、政治、心理、人類、教育、傳播、法律及精神醫學等領域學者共同參與。所謂的社會變遷實際上包含了政治、社會、文化、心理等面向，不同的社會現象間也可能有密切的關係，由於科際間的合作在實質研究上有必要，於是社會科學對社會變遷研究的整合就可以從這個調查研究計畫來開始建立重要的資料庫。

第三是秉持學術資料庫是公共財的信念，為學術界提供高品質可供研究用的全台抽樣調查資料。「變遷調查」開風氣之先，問卷調查原始資料在蒐集清理建檔後一年內全面開放給國內外學術界使用，參與計畫的學者只有一年優先使用資料的權利。在調查研究進行過程中

已經由不同學科的學者參與，再向各相關學術領域的學者公開調查資料，當有助於學術研究之發展。資料公開的做法也在於節省經費，一方面學者和研究生可以不必親自進行調查就能獲得研究資料，另一方面由於計畫邀集了主要社會科學界從事調查研究或在研究上有專精之學者參與計畫，其原始之目的也在減少不完整調查的數目。全台抽樣調查需要相當的經費，不是單一或少數幾位學者可長期進行的，更不可能持續進行，「變遷調查」即在整合的基礎上為研究人員蒐集長期的調查資料。到 2011 年 12 月底為止，國內外學者或機構申請或下載資料的次數總計為 26,381 人次。<sup>1</sup> 學術資料庫作為公共財早年即使在國際上也不多見，目前國際上已經有若干社會調查計畫仿照本計畫在資料清理建檔後開放釋出。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做法不只是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同時也對學術調查資料公開使用的風氣有很大的導引作用，進而促成學術研究的發展及公共性格。

「變遷調查」的取向在國際間也極為少見，比較接近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國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自 1970 年初開始進行的「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簡稱 GSS)。GSS 並不是以社會變遷為主要目的，而是以涵蓋重要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現象的橫斷面之調查為主，但是由於有若干題組曾多次施測，確實也可以作為分析社會變遷的依據。在美國社會科學界，根據 GSS 資料撰寫出版的學術論文不計其數，成了全國普查資料之外，學者分析出版最重要的二手資料來源，對美國社會科學發展有重大影響。換言之，GSS 調查研究計畫對美國社會科學有重要的貢獻，甚至影響了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變遷調查」參考類似做法，規劃長期目標，希望為台灣社會留下寶

---

<sup>1</sup> 目前下載來源包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網頁（免費即時下載），以及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屬「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的調查研究資料庫（採會員制），本文所引次數採兩者合計。

貴的社會科學實證紀錄。

## 二、計畫成效

「變遷調查」是社會科學多領域合作的計畫，歷年來除了審慎選擇能力極受肯定者擔任問卷設計小組召集人，並邀請曾經有問卷設計經驗的專家學者參與問卷研擬，同時也吸收在調查研究或量化研究方法上具有相當訓練的年輕教學研究人員，藉著新血的加入來推展計畫，歷來協同主持計畫的學者、參與問卷研擬及調查方法設計者已逾數百位。

上述各領域學者在參與問卷主題研擬和實際施測題目時，多根據相關的變遷理論及文獻加以研析，作為擬定主題與草擬題目的依據。第一期計畫於1984與1985年間進行，共執行了兩份綜合問卷。自1990年以後則從第二期開始以五年為一期，目前已進行到第六期的計畫。截至2011年執行第六期第二次調查為止，總計完成了48份問卷調查，訪問成功的總樣本數為101,026。根據美國GSS計畫主持人及其他歐美學者在2006年的統計，<sup>2</sup>「變遷調查」已經成為全世界蒐集到最多成功訪問樣本、規模最大的一系列社會調查計畫。在五年期計畫的第一年都以一期一次為依據，經小幅度修改後，執行兩份綜合性問卷的訪問與資料建檔工作，至於各期第二次至第五次，則各進行兩份專題問卷。每一專題每五年均重複執行的各期專題及相關內容，請參見附表1-1至1-6。

「變遷調查」到2011年初已經公開釋出44個資料檔（不含附加的專題計畫：「東亞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六期一次資料預

---

<sup>2</sup> Smith, T.W., Kim, J., Koch, A., & Park, A. (2006)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s. *Comparative Sociology* 5(1): 33-43.

計於 2012 年 3 月對外釋出。釋出資料除了可以由計畫網頁下載之外，亦委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下的「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在 2003 年之前為「調查研究工作室」）公開釋出。這個龐大調查資料有效地建檔供公眾使用，本身就是資源整合和累積的結果，更促成了進一步的資源整合和累積。自 1999 年即開始在網路上開放原始資料直接下載，當可促進廣泛研究使用。另外，每次調查計畫完成後出版執行報告，以便學界同仁瞭解計畫的內容，目前至六期一次止，共出版了 21 冊報告（二期一次和二次合為同一冊）。截至 2012 年 1 月底為止，運用「變遷調查」資料的相關論著至少累計 31 篇博士論文、215 篇碩士論文、14 本專書及 741 篇學術論文（包括會議論文 343 篇、期刊論文 293 篇、專書論文 105 篇）。由於只能以蒐集到的資訊估計，這應該是最保守的數字。

為了積極擴展學界的參與，促成更多對資料的運用，1987 年「變遷調查」的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了第一次研討會，並在 1995 年召開第二次研討會，兩次會議所發表的論文，經過修改審查後，出版了兩部專書。<sup>3</sup> 之後在各期各次調查資料公布之前，也都配合舉辦專題研討會，鼓勵更多學者利用調查資料撰寫論文，到 2011 年 1 月底已舉辦 15 次研討會。

---

<sup>3</sup> 兩部專書分別為：《變遷中的台灣社會》，楊國樞、瞿海源主編（1988），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上、下冊），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1997），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三、問卷設計：綜合、專題與國際 比較問卷及掛題措施

「變遷調查」問卷設計的作業模式自第一次調查以來，有其延續性，但亦有所轉變，以下依不同問卷性質詳細說明。

#### (一) 綜合問卷

在 1980 年代初期規劃的第一期「變遷調查」，原只構想每五年重複一次兩份問卷的調查，藉以累積觀察社會變遷的長期資料。自第二期，則規劃以五年為期每年進行兩份問卷，第一期的兩份問卷在每期的第一年重複施測，稱之為綜合問卷，每期第二至第五次的八份問卷稱之為專題問卷。歷次綜合問卷原則上儘量維持第一期兩份問卷的題組，由社會、心理、政治、傳播、教育、文化、精神醫學的各分組討論後，進行小幅度的必要修改或增補。相較於專題問卷，綜合問卷在各次調查的問卷題組與問項相似性最高（參見附表 1-1 至 1-6）。目前至六期一次為止，進行了間隔五年的六次調查。此外，從五期一次開始，因為將問卷之一設定為包括「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簡稱 ISSP）共同題組的問卷，因此將綜合問卷精簡為一份，六期一次已依據此份問卷重複施測。

#### (二) 專題問卷

在第二期的規劃中，便設定以五年為一期，相同的主題在五年之間以大體相同的問卷，使用全國性的樣本再度施測。在第三期中，做了稍許的調整。經過了兩個五年期共 16 個專題問卷（各次主題參見表 1-2 至表 1-3），到四期三次再增加 4 個專題。二期二次至五期五次之

間，每五年都重複（即進行四次調查）的主題包括家庭、社會階層、傳播行為與宗教；進行過兩次調查的包括政治文化、文化價值；在第四期的調查中，政治文化的一些題目分別併入國家認同、公民權兩份問卷，文化價值的一些題目則併入宗教組問卷。

### (三) 加掛題組

「變遷調查」在第二至第三期各次問卷設計時，都是由計畫主持人邀請學者擔任問卷設計小組召集人，並且共同商議邀約小組成員。自四期一次開始，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成立了「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小組」，參與各次主題、問卷設計小組召集人與參與學者的確認。

雖然問卷的設計都經過問卷設計小組用心而密集的討論，並經過認知訪談與預試之後才修訂完成問卷定稿，但歷來多有學者反映，需要的關鍵解釋變項未包含在問卷中，或是所要解釋的現象無法從問卷中取得。若能開放讓學者提出簡單的計畫書，在利用既有的題組之外加上少許題目，便能夠滿足研究架構所需要的變項。因此，「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小組」的運作中增加了加掛題組的機制，每年在適當的時機，由計畫主持人向學界公開徵求題組，經由計畫主持人與推動小組協調組成的評審小組評估之後，將部分題組納入問卷中，或是邀請申請人擔任問卷設計小組的成員。加掛題組自四期三次開始，到目前為止已進行了十年，有若干初步成果，但仍待學界更積極的利用此一機制。

### (四) 國際比較問卷

在第三期第三次(1997)的調查中，曾以幾乎相同的題組在韓國、中國大陸和台灣三地同時施測，開展了跨國比較的空間。在各國的研究團隊都自尋經費，以大致相同的問卷在自己國家進行全國的抽樣調查。

當時的調查原先希望日本學者加入，但未能成功，一直到 2003 年，才由台灣、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的團隊共同成立了「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 簡稱 EASS, 參見 [www.eassda.org](http://www.eassda.org))。「變遷調查」自 2006 年起執行 EASS 兩年一次的共同主題調查，並擔任 2006-2007 年的執行秘書，以及 2008 年主題問卷設計的召集人。2006 年所執行的主題是「家庭」、2008 年主題是「全球化與文化」、2010 年主題是「健康」，2012 年主題是「社會網絡」。

另外，「變遷調查」在 2001 年成爲「國際社會調查計畫」的成員之一。ISSP (參見 [www.issp.org](http://www.issp.org)) 是由 1983 年在英國舉行的一項會議所促成，目的在推展四國全國性社會調查的合作，包括英國「社會態度調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 Surveys)、美國「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德國「全人口社會知識總調查」(Allgemeine Bevölkerungsumfrag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以及澳洲「全國社會科學調查」(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Survey)。這四個國家調查計畫的負責機構，在相同的核心背景資料之外，都同意在各國既有的調查問卷中，加入共同發展的 15 分鐘的題組。所有的討論以及初步問卷的設計以英文進行，並各自翻譯成自己國家的文字施測。目前共有 47 個國家（含台灣）的調查機構參加此一計畫；各國參與的機構必須自籌調查經費。加入此一組織，應該是拓展我國學者國際接觸與視野的管道之一，「變遷調查」自 2002 年開始與其他國家同步進行調查，並參與 2006 年、2009 年及 2011 年調查主題的國際問卷設計小組，擔任方法委員會委員（2005-2011 年）、執行委員會委員（2006-2010 年）。

## 四、抽樣設計

「變遷調查」的抽樣雖以全台灣人口爲母體，但在實際抽樣中，排除了離島與山地鄉。自第一期計畫開始，便以台灣戶籍資料爲依據，

建立樣本名冊，之後各次調查的抽樣原則大致類似，只在地區分層以及達到成功樣本的標準上稍有變化。各期次的樣本數與完訪率請參考附表 2-1 至 2-3。

### (一) 抽樣基本原則

在一期至三期的各次調查，大部分都以 20 歲至 64 歲的台灣居民為對象，少數幾次則包含到 75 歲的樣本；四期一次之後，則包含 20 歲以上人口，沒有年齡上限；在四期三次，為配合其他各國樣本的年齡，將最低年齡降至 18 歲。抽樣依據台灣地區人口統計資料（不同時期依據的資料有別），計算 20 歲至 64 歲（或 20 歲以上，或 18 歲以上）人口數，依比率決定各次調查各鄉鎮市區層級所應分配的樣本數，並決定各層級所應抽出的鄉鎮市區數。抽樣架構先以鄉鎮為第一抽出單位，村里為第二抽出單位，根據系統隨機抽樣原則抽出所需的戶數，再從戶中依事先預備的隨機表抽出訪問的樣本。在三期四次以前，戶政尚未電腦化，必須派人到各地戶政單位抽樣；三期四次時，台北市與高雄市戶政電腦化完成，便在兩個城市抽出的各里中，以系統隨機抽樣原則直接抽出預定訪問的個人作為樣本。三期五次之後，全台灣戶政資料都完成了電子化，因此都在抽出的村里決定後，由（當時的）「調查研究工作室」行文內政部取得所需村里的戶籍資料，再從中直接隨機抽出訪問的樣本。每一次抽樣時，大致都根據一些經驗法則，估計樣本失敗率，加抽樣本數；不同地區擴充樣本的比率不盡相同。

自第五期開始，抽樣架構依據內政部最新人口資料，採取全新的設計。以台灣地區年滿 18 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為抽樣母體，並以台灣地區戶籍資料檔為抽樣名冊(sampling frame)，利用分層等機率三階段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抽出受訪對象。地區分層詳見以下說明。

## (二) 抽樣的地區分層

第一期的抽樣，是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將全台灣的村里，依據農業、二、三級產業、漁業與礦業就業人口的比率，訂定分層的公式，將台灣地區的村里區分成都市、城鎮與鄉村三層，分台北市、高雄市與台灣省三個副母體，最後從各地區各層的村里，隨機抽出三百個村里。

第二期第一至第三次的抽樣，則依據台灣省經動會的分類，將台灣地區分成台北市、高雄市、省轄五市、省一級至五級的鄉鎮市總共八類地區（曾在二期三次中另加客家層），各類地區事先已決定應抽取的鄉鎮市區數，以隨機抽取各類地區預計數目的鄉鎮市，再由這些鄉鎮市中各抽取兩個村里。

自第二期第五次開始，鄉鎮市的分類則是根據羅啟宏(1992)<sup>4</sup>的分層原則，將台灣地區分成十個類別，由一至十類分別為新興鄉鎮、山地鄉鎮、工商鄉鎮、綜合性市鎮、坡地鄉鎮、偏遠鄉鎮、服務性鄉鎮、省轄市、台北市、高雄市。其中台北市與高雄市直接以里為抽出單位，其他地區則先抽出鄉鎮市區，再由這些鄉鎮市區中各抽出兩個村里。

自第五期開始，鄉鎮市的分類則是利用「人口密度」、「教育程度」、「65歲以上人口百分比」、「15-64歲人口百分比」、「工業就業人口百分比」、「商業就業人口百分比」等指標，將台灣的鄉鎮市區分為七層，包括都會核心、一般都市、新興市鎮、傳統產業市鎮、一般鄉鎮、高齡化鄉鎮與偏遠鄉鎮（五期一次時的命名）。<sup>5</sup>抽樣的原

4 羅啟宏(1992)〈台灣省鄉鎮發展類型之研究〉，台灣經濟月刊 190: 41-68。

5 侯佩君、杜素豪、廖培珊、洪永泰與章英華(2008)〈台灣鄉鎮市區類型之研究：「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計畫之抽樣分層效果分析〉，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23: 7-32。在此篇論文中，類型命名略有

則一如過去，先計算各分層所有鄉鎮市區的人口數，依其人口比例來分配預定從各分層抽出的人數，並在各分層中依人口數多寡而抽取一定數目的鄉鎮市區；在每一鄉鎮市區中，再以人口數多寡依照等距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有系統地抽取一定數目的村里；最後，在前述選取的村里中，再同樣依照等距抽樣法抽取一定數目的受訪個案。

### (三) 從替代樣本到擴大樣本

早期在抽樣上曾經採行以左鄰右舍同特質對象作為替代樣本的做法，但二期三次開始便完全廢止，改採事先選定備取樣本，達到預計的樣本數時則不再訪問剩餘的樣本。自四期一次開始則採取分段抽樣的方式，更精確地預估可能完成的樣本數，如果未能達到目標，則以尚未達成的樣本數估計，再抽取適當數目的樣本。只要是抽取到的樣本，訪員一定要進行訪問；但是在達到預計完成樣本數的情況下，便不再進行二次抽樣，截至目前為止，大致都能運用第一次抽樣的樣本，便接近預計樣本數，尚未遇到第二波抽樣的情形。另外，自三期五次開始建立基本的樣本單位(primary sampling unit)，以五年為一期。這些樣本單位也提供中央研究院其他面訪計畫共同使用，在此基礎下，努力建立穩定的訪員與督導體系，期能藉由訪員與督導品質的提升，更加確保訪問品質。

## 五、實地訪問與完訪率

「變遷調查」的另一推展目的，在於逐步制度化，期望問卷調查

---

修訂，「一般都市」改為工商市區，「一般鄉鎮」改為「低度發展鄉鎮」。人口密度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數，教育程度為15歲以上的大專人口數百分比，工業就業人口百分比為「工業就業人口數／總人口數x 100」，商業就業人口百分比為「商業就業人口數／總人口數x 100」。



的過程可以在有效的組織化之下完成，亦使調查研究的資源有效整合。1994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調查研究工作室」，「變遷調查」的抽樣以至實地訪問的工作開始在該單位的協助之下推動。舉凡徵募訪員與督導、舉辦預試、實地調查，都已經建立固定運作模式。「調查研究工作室」在2004年轉型為「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隸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下，仍然致力於建立穩定的督導與訪員體系。

在2000年以前，「變遷調查」的訪員以大專學生為主。國外調查研究方面的專家，一直對這樣的訪員體系有所垢病，主要的質疑之一是大專學生常因畢業或學業問題，而放棄訪員的工作，使得調查計畫無法培養專業的訪員，也無法積極提高訪問的素質。「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雖然已努力開拓徵選訪員的管道，非學生的訪員比例也有所增加，但還是很難培養願意持續從事問卷工作的專業訪員。在專業督導方面進展的幅度較大，在中部和南部設立了工作站，各有一位資深督導負責，在預試或急需的情況下，可獲得他們的支援，都較過去容易執行。在2011年六期二次的實地訪問，開始採用電腦輔助調查系統，訪員攜帶平版電腦進行家戶訪問。這是調查技術上的一大變革，但調查實施也隨之有所改變，例如：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可以直接掌握大部分的督導與協調工作，原有督導人員的功能便大幅減低。

「變遷調查」在抽樣上向來以台灣的戶籍資料為依據，雖然相較於沒有戶籍資料的國家，自有其便利之處，但在提升完訪率上，就有些先天的困難。此外，台灣居民的實際居處與戶籍資料的差距日益增加，也造成了樣本代表性的質疑。依據最近幾次調查的經驗，至少有二成至二成五的抽出樣本，因為不在抽出戶的地址而無法進行訪問。解決此一困境最直接的方法是追蹤訪問：即設法查問出樣本的實際居住地，再前往訪問。但因成本高且很難問到實際的居住地址，都未達到實際的效果。雖然從五期一次開始時，曾考慮不同的抽樣可能，但基本上沒有進行大幅度的改變。



完訪率一直是觀察問卷調查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在四期一次以後是以預計完訪數估計膨脹樣本之後，決定抽出樣本數，每一抽出的樣本都必須訪查，所以可以直接計算完訪率。但是在一至三期，當使用替代樣本時，在每一個抽樣點完成預計樣本之後，對剩餘的替代樣本就不再進行訪查，於是有相當數量的樣本未曾訪查，因此很難估計確切的完訪率。基於以上的兩種情況，附表中以兩種方式呈現二期二次至三期五次的完訪率：一是以原始抽出樣本為母數，計算完訪率（見附表 2-1），另一是扣除未接觸樣本的抽出樣本為母數（見附表 2-2），讀者可以根據這兩個表評估「變遷調查」的完訪率。至於四期一次以後的完訪率，則完全以抽出樣本為母數（見附表 2-3），附表中列出三個完訪率：粗完訪率完全以抽出樣本數為母數，校正後完訪率(一)是以扣除了因戶籍地及不合格樣本之後的樣本數為母數，校正後完訪率(二)則是扣除了不合格樣本之後的樣本數為母數。

附表 2-1 顯示粗完訪率在 39%-48%之間，校正後的完訪率(一)在 47%-68%之間，校正後的完訪率(二)在 38%-55%。附表 2-2 的完訪率顯示當扣除了未接觸樣本之後，明顯高於附表 2-1 的完訪率，粗完訪率在 41%-52%之間，校正後完訪率(一)在 56%-61%之間，至於校正後完訪率(二)則在 44%-63%之間。扣除未接觸樣本的抽樣方式，採用粗完訪率可能太嚴格。若以校正後完訪率(二)為根據，並採附表 2-1 與附表 2-2 的中間值的話，大體上除了少數幾次之外，完訪率都在 50%上下。四期一次之後，得以估計較為精確的完訪率，如附表 2-3 顯示粗完訪率在 39%-56%之間，校正後完訪率(一)則在 48%-65%之間，校正後完訪率(二)則在 41%-58%之間。在這 11 年的調查之間，2000 年至 2002 年的完訪率最佳，在 2003 年因為 SARS 的影響，完訪率稍微下降，嗣後則因電話詐騙盛行，民衆的防衛心增強，完訪率持續下降，到了 2008 年才見回升的趨勢。

## 六、結語：改善與推廣

以上簡單介紹「變遷調查」在問卷設計、抽樣設計與實地訪問等方面的演變，以及有待克服的一些課題，諸如題項的延續性、完訪率的提升等。雖然可以從利用「變遷調查」資料發表的著作數量肯定本計畫的功效，但在問卷規劃與設計上仍有改善的空間，同時仍需一些積極的作為，以提升資料庫的運用。

第一，在問卷題組與內容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必須思考的課題包括：是否應該開發新的主題？是否所有的主題，都適合以五年一次作為間隔？如果有些專題不需要五年就重複，則需開闢新專題。另外必須考慮的是，就算是每五年重複一次的專題，若維持一樣的內容，在分析上提出新課題的可能性或許較低。因此，用心考量那些題目應該重複，那些可適度變動，都應該有著更系統的思考與規劃。

第二，在專題問卷的設計中，我們遇到相當嚴重的缺失，例如在同一題組不同年期的問卷中，有些題組或答項的延續性不足，往往因為題組內題項與答項變動或是文字調整，導致無法觀察與分析長期的變遷趨勢。目前「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已有計畫就「變遷調查」資料著手加值的工作，其中之一是設法運用統計技術，讓有這樣問題的量表經過調整之後，可以進行不同期資料的串聯比較，但仍無法完全解決。雖然各年期調查單獨分析都有其價值，但長期趨勢觀察是「變遷調查」的核心目標之一，也是未來在問卷設計上的基本原則。

第三，參與「東亞社會調查」、「國際社會調查計畫」，固然有助於台灣社會科學界與國際社會科學界的交流，也可提供國內學者國際比較的素材。可是本計畫在二期至三期已經建立了主題輪替的模式，如何能夠適當納入跨國比較題組，卻不致和原來的規劃有所衝突，將是一項挑戰。

第四，如何解決戶籍抽樣的缺失，將是「變遷調查」方法小組必須繼續思考的重點課題之一。在運用電腦輔助系統進行訪問之後，我們應該進一步透過可行的方法或配套措施，加強訪問工作的質與量，增加受訪者接受訪問的可能性，將粗完訪率逐步提升到百分之六十。

第五，有些問卷的參與者的確積極使用「變遷調查」的資料，不過仍有相當數量的參與者未曾運用。鼓勵問卷設計者運用資料的具體作法之一是，要求參與者在問卷規劃設計初期便建立分析架構，以之作爲增加題目或更改题目的依據，可使得資料檔一完成，設計者便很快能進入實質分析。再者，除了建立加掛少數題組的機制以及參與國際調查計畫外，也希望學界同仁能多瞭解「變遷調查」內容與資料檔，並提出分析「變遷調查」資料的研究計畫，向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補助。最後則是更機動地釋出資料，讓學界同仁下載使用，盡快進行分析與論著。

附表 1-1 「變遷調查」第一期主題綱要

第一期第一次調查(1984-1985)

問卷 I 綜合問卷 (政治、傳播與經濟)

樣本數：4,307；受訪年齡：20-75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宗教信仰
5. 居住環境
6. 人際關係溝通
7. 生活品質
8. 傳播態度與行為
9. 經濟態度
10. 社會問題
11. 成就期望
12. 政治態度
13. 政治評估
14. 家庭組成及生活

問卷 II 綜合問卷 (休閒、宗教、家庭、心理)

樣本數：4,199；受訪年齡：20-75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宗教信仰
5. 家庭組成
6. 宗教行為與態度
7. 休閒活動
8. 教育價值與態度
9. 家庭特徵與態度
10. 教養方式
11. 個人態度
12. 生活感受
13. 道德觀念
14. 價值取向
15. 心理需求
16. 心理衛生
17. 醫療態度與行為
18. 家庭組成及生活

附表 1-2 「變遷調查」第二期主題綱要

第二期第一次調查(1990)

問卷 I 綜合問卷(政治、傳播與經濟)

樣本數：2,531；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宗教信仰
5. 居住環境
6. 傳播行為
7. 工作、成就與期望
8. 經濟態度
9. 生活感受
10. 政治參與
11. 政治態度
12. 政治評估
13. 政治支持
14. 家庭結構
15. 健康指標
16. 收入問題

問卷 II 綜合問卷(休閒、宗教、家庭、心理)

樣本數：2,531；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傳播指標
5. 宗教信仰
6. 宗教行為與態度
7. 人際關係與溝通
8. 休閒活動與態度
9. 教育價值與態度
10. 教養方式與態度
11. 家庭功能
12. 心理需求
13. 心理健康
14. 求醫行為
15. 家庭結構
16. 收入問題

第二期第二次調查(1991)

問卷 I 家庭

樣本數：2,488；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宗教信仰
5. 傳播指標
6. 健康指標
7. 家庭結構
8. 家務分工
9. 家庭觀念
10. 鄰居與朋友關係
11. 親子關係
12. 子女養育與教育

問卷 II 政治參與

樣本數：1,139；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傳播指標
5. 宗教信仰
6. 宗教行為與態度
7. 生活感受
8. 經濟態度
9. 政治參與
10. 政治態度
11. 政治評估
12. 政治支持
13. 對台灣未來前途看法
14. 家庭結構
15. 健康指標

第二期第三次調查(1992)

問卷 I 社會階層

樣本數：2,377；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傳播指標
5. 宗教信仰
6. 個人教育經驗
7. 工作情境
8. 謀職與介紹人
9. 社會網絡
10. 社會階層態度
11. 階級認同與意識
12. 生活型態
13. 家庭結構

問卷 II 政治文化

樣本數：1,408；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宗教信仰
5. 傳播指標
6. 政治意見
7. 社會與政治傾向
8. 投票行為
9. 政治態度
10. 政黨認同
11. 政治信任
12. 政治認同
13. 省籍與經濟
14. 社會文化方面
15. 族群印象

第二期第四次調查(1993)

問卷 I 大眾傳播

樣本數：1,946；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一般傳播行為
3. 傳播行為實用性與世俗性
4. 傳播行為專門性與區隔性
5. 傳播媒體的民主與自由化
6. 消費與金錢
7. 收入

問卷 II 政治

樣本數：1,964；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社區網絡參與
3. 心理涉入感
4. 政治意見
5. 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
6. 國家認同
7. 政治認知
8. 對政治與社會團體的評價
9. 選舉參與
10. 公民自主性參與行為
11. 地方公共事務參與
12. 政黨參與
13. 傳播指標
14. 政治與社會態度
15. 出國經驗
16. 經濟態度
17. 收入

第二期第五次調查(1994)

問卷 I 文化與價值

樣本數：1,853；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價值取向
5. 工作價值與倫理
6. 道德與社會福祉
7. 秩序與權力觀念
8. 家庭價值
9. 教育價值
10. 其他各種價值
11. 對各類文化的認知與評估
12. 日常生活與收入
13. 集體記憶

問卷 II 宗教

樣本數：1,862；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宗教信仰
5. 對神鬼的看法
6. 靈魂、祖先、報應等
7. 氣與陰陽五行
8. 家人、朋友的宗教信仰
9. 宗教評估
10. 個人的宗教行為
11. 家庭的宗教行為
12. 集體的宗教行為
13. 術數與法術經驗
14. 特殊宗教
15. 慈善觀念與行為
16. 醫療
17. 接觸宗教傳播行為
18. 生活經驗
19. 靈異經驗
20. 收入



附表 1-3 「變遷調查」第三期主題綱要

第三期第一次調查(1995)

問卷 I 綜合問卷 (政治、傳播與經濟)  
樣本數：2,093；受訪年齡：20-75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宗教信仰
5. 居住環境
6. 傳播行為
7. 工作、成就與期望
8. 經濟態度
9. 政治參與
10. 民主價值量表
11. 政治態度
12. 政黨傾向
13. 政治支持、政治態度
14. 政治自由化
15. 政治功效
16. 家庭結構
17. 收入

問卷 II 綜合問卷 (休閒、宗教、家庭、心理)

樣本數：2,081；受訪年齡：20-75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傳播指標
5. 宗教信仰
6. 宗教行為與態度
7. 人際關係與溝通
8. 休閒活動與態度
9. 教育價值與態度
10. 教養方式與態度
11. 家庭功能
12. 生活感受
13. 道德觀念
14. 心理需求
15. 心理健康
16. 求醫行為
17. 家庭結構
18. 收入

第三期第二次調查(1996)

問卷 I 家庭  
樣本數：1,924；受訪年齡：20-75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健康指標
5. 傳播指標
6. 宗教信仰
7. 居住環境、居住條件
8. 家庭結構
9. 社會支持
10. 家務分工與決策
11. 性別角色
12. 婚姻觀念
- 13-1. 子女照顧與婦女工作史
- 13-2. 生育價值
14. 幼年教養
15. 家庭關係與家庭氣氛
16. 奉養態度與家庭價值
17. 婚姻調適
18. 收入狀況

問卷 II 東亞比較社會調查

樣本數：2,831；受訪年齡：25-60 歲

1. 年譜簡表：教育史、婚姻史、生育史、工作史
2. 基本資料
3. 工作經驗
4. 工作概況
5. 工作態度
6. 民間社會參與  
政治功效意識  
民主態度  
信任  
政治參與
7. 家庭  
家務分工  
家庭決策  
性別角色與家庭觀念  
家庭活動  
婚姻調適  
家庭居住狀況  
傳播行為

第三期第三次調查(1997)

問卷I 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  
樣本數：4,313；受訪年齡：20-64 歲  
長卷  
1. 基本狀況  
2. 宗教信仰  
3. 教育狀況  
4. 個人教育  
5. 職業狀況  
6. 謀職與介紹人  
7. 社會網絡  
8. 社會階層態度  
9. 階級認同與意識  
10. 生活滿意與生活型態  
11. 子女教育經驗  
12. 家庭結構  
13. 收入  
(短卷主題含 1-5、9、12、13 各項)

問卷II 社會網絡、社會支持與社區  
樣本數：2,835；受訪年齡：20-74 歲  
1. 基本狀況  
2. 職業狀況  
3. 教育狀況  
4. 健康情形  
5. 情感性網絡  
6. 工具性網絡  
7. 其他網絡  
8. 社區聯繫  
9. 社區界定  
10. 社區組織與活動  
11. 生活感受與滿意感  
12. 收入

第三期第四次調查(1998)

問卷I 大眾傳播  
樣本數：1,920；受訪年齡：18-64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傳播行為與傳播態度  
5. 收入

問卷II 政治文化  
樣本數：1,737；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職業狀況  
3. 宗教信仰  
4. 教育狀況  
5. 民主價值、理念與威權主義  
6. 政治疏離、犬儒主義與功效意識  
7. 政治信任與社會信任  
8. 政治關心  
9. 政治參與和社會、社團參與  
10. 個人主義與集體意識  
11. 民族認同  
12. 政黨形象、認同與支持  
13. 族群認同、關係與印象  
14. 社會議題  
15. 公民意識

第三期第五次調查(1999)

問卷 I 文化與價值

樣本數：1,948；受訪年齡：20-70 歲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價值取向與倫理
5. 道德與社會福祉
6. 家庭價值
7. 教養價值
8. 生活態度
9. 對各類文化的認知與評估
10. 流行與通俗文化的評價
11. 日常生活與主觀評估
12. 父母權威
13. 教養方式
14. 收入
15. 宗教與術數

問卷 II 宗教

樣本數：1,925；受訪年齡：20-64 歲

1. 基本狀況
2. 職業狀況
3. 教育狀況
4. 宗教信仰
5. 宗教活動
6. 對神鬼、死亡的看法
7. 靈魂、祖先與報應
8. 氣與陰陽五行
9. 個人宗教行爲
10. 家庭宗教行爲
11. 集體宗教行爲
12. 術數與法術
13. 特殊的宗教經驗
14. 宗教與慈善
15. 接觸宗教、傳播行爲
16. 生活經驗
17. 收入

附表 1-4 「變遷調查」第四期主題綱要

## 第四期第一次調查(2000)

問卷 I 綜合問卷(政治、傳播與經濟)  
樣本數：1,960；受訪年齡：20歲(含)以上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宗教信仰
4. 居住環境
5. 傳播行為
6. 全球化
7. 工作、成就與期望
8. 經濟態度與金錢行為
9. 政治參與量表
10. 民主價值
11. 國家與族群認同
12. 政黨傾向
13. 政治支持、政治態度
14. 政治自由化
15. 政治功效
16. 家庭結構與生活
17. 就業狀況與收入

問卷 II 綜合問卷(休閒、宗教、家庭、心理)

樣本數：1,895；受訪年齡：20歲以上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傳播指標
4. 宗教信仰
5. 宗教行為與態度
6. 人際關係與溝通
7. 休閒活動與態度
8. 教育價值與態度
9. 教養方式與態度
10. 家庭功能
11. 生活感受
12. 道德觀念
13. 心理需求
14. 心理健康
15. 求醫行為
16. 家庭結構
17. 職業狀況與收入
18. 居住環境

## 第四期第二次調查(2001)

問卷 I 家庭  
樣本數：1,979；  
受訪年齡：18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家庭結構
5. 代間關係與子女奉養問題
6. 家庭經濟管理
7. 家產分配
8. 性別角色
9. 關心與照顧
10. 家庭照顧
11. 心理衛生
12. 擇偶史
13. 家庭與婚姻的認知價值
14. 奉養態度
15. 其他
16. 婦女工作史
17. 婦女離婚原因
18. 追蹤問題

問卷 II 社會問題

樣本數：2,052；  
受訪年齡：18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電腦網路行為
3. 教育行為與教育問題感受
4. 伴侶及家庭關係
5. 社區控制
6. 婚姻調適與婚姻關係
7. 子女管教
8. 社會支持
9. 環境議題
10. 生活品質
11. 整體性社會問題
12. 對政府的政治態度與政治功效
13. 信任
14. 社會治安
15. 吸毒和自殺
16. 個人失業經驗
17. 對失業問題的認知
18. 對失業救助政策或措施的看法
19. 景氣變化對投資行為的影響
20. 其他

問卷 III 失業問題

樣本數：427  
受訪年齡：18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教育與語言程度
3. 前職工作狀況
4. 失業原因
5. 求職狀況
6. 家人失業狀況
7. 保險與失業給付狀況
8. 台灣就業狀況評估
9. 個人未來與台灣社會發展之評估

第四期第三次調查(2002)

問卷 I 性別

樣本數：1,992；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職業狀況
4. 家庭結構
5. 性別意識態度
6. 日常生活
7. 性別核心議題 (ISSP 2002 核心題組)  
家庭性別角色與分工  
婦女工作歷程  
生活與工作滿意
8. 婦女參政
9. 身體意識
10. 收入狀況
11. 性行為、性態度與色情消費

問卷 II 社會階層

樣本數：1,983；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宗教信仰
3. 教育狀況
4. 個人教育經驗
5. 職業狀況
6. 謀職與介紹人
7. 社會網絡
8. 生活型態與消費行為
9. 藝術品味
10. 社會階層態度
11. 階級認同與意識
12. 健康行為與身心健康
13. 家庭結構
14. 個人與家庭收入

第四期第四次調查(2003)

問卷 I 大眾傳播

樣本數：2,161；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傳播行為  
街坊閒聊  
正式會議  
傳真電話  
印刷媒介  
電子媒介  
新媒介
3. 網路使用行為
4. 網路使用動機與態度
5. 網路消費傾向
6. 網路關係
7. 網路與公共領域
8. 公民參與
9. 人際信任與生活滿意

問卷 II 國家認同

樣本數：2,016；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第 4-6, 9 項含 ISSP 2003 核心題組)

1. 基本狀況
2. 國家認同
3. 國家認同的重要性
4. 區域與國家認同的排序
5. 民族疆域
6. 國家光榮、愛國精神
7. 國家相對於全球的文化差異與經濟利益
8. 多元價值
9. 民族身分的認定
10. 對重要他人統獨傾向的評估
11. 台灣集體記憶與認同意識
12. 對統獨與公投的傾向或態度
13. 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差異
14. 家人與個人的大陸經驗
15. 對台灣民族教育的看法
16. 民主價值
17. 家庭狀況與其他

第四期第五次調查(2004)

問卷 I 公民權

樣本數：1,781；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公民權一 (ISSP 2004 核心題組)
  - 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 政治參與與容忍
  - 政治與社會信任
  - 政治制度與民主實施
  - 對國際組織的評價
3. 公民權二 (ISSP 2004 建議題組)
  - 政治媒體行為
  - 人際互動與尊重
4. 選舉參與、投票行為
5. 國家與政黨
6. 全球化與移民
7. 宗教與政治
8. 階層與職業
9. 社會網絡
10. 收入狀況

問卷 II 宗教文化

樣本數：1,881；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宗教態度
3. 個人的宗教行為
4. 數術與法術
5. 特殊宗教經驗
6. 慈善團體行為
7. 接觸宗教傳播行為
8. 個人與社會情勢
9. 文化價值取向
10. 對宗教和政治的看法
11. 慈善觀念
12. 對各類文化的認知與評估
13. 日常生活
14. 個人及家庭收入

附表 1-5 「變遷調查」第五期主題綱要

第五期第一次調查(2005)

問卷 I 綜合問卷

樣本數：2,146；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宗教信仰
4. 傳播行為
5. 全球化、工作成就與期望
6. 經濟態度與金錢行為
7. 宗教行為與態度
8. 人際關係與溝通
9. 休閒活動與態度
10. 教育價值與態度
11. 家庭功能
12. 道德觀念
13. 生活感受
14. 心理需求
15. 心理健康
16. 求醫行為
17. 民主價值量表
18. 政治行為與態度
19. 家庭結構
20. 就業狀況
21. 居住環境

問卷 II 工作與生活

樣本數：2,171；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日常生活及國際接觸經驗
3. ISSP 2005 核心題組
  - 時間運用
  - 工作與家庭的配合
  - 工作目的與價值
  - 工會功能
  - 工作時間彈性及偏好
4. ISSP 2005 建議題組
  - 個人個性與工作特質
  - 工作中的人際關係
5. 工作、成就與期望
6. 經濟態度
7. 家庭結構
8. 就業狀況
9. 新興工作型態
10. 性別與工作
11. 收入狀況

附加調查 東亞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

樣本數：5,381；受訪年齡：20-69 歲

1. 基本資料
2. 父母親工作情形
3. 教育史
4. 個人職務變動史
5. 配偶工作史
6. 居住史與家庭狀況
7. 社會價值與生活感受
8. 個人收入



第五期第二次調查(2006)

問卷 I 家庭

樣本數：2,102；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2-9 項含 EASS 2006 核心題組)

1. 基本狀況(一)
2. 家庭背景
3. 代間關係
4. 家人評估及其他
5. 家庭、婚姻與性別角色
6. 家庭價值
7. 擇偶史
8. 夫妻關係
9. 社會階層與文化價值
10. 基本狀況(二)
11. 其他

問卷 II 公民與國家

樣本數：1,972；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資料
2. 日常生活與全球化
3. 經貿發展
4. 政府角色 (ISSP 2006 核心題組)  
政治意見表達方式  
守法行為與司法體系  
政府功能與責任  
對政府職能之評估  
人民與公務員關係
5. 廉能國家
6. 施政評估
7. 社會保障
8. 資訊風險
9. 家庭與個人狀況

第五期第三次調查(2007)

問卷 I 社會階層

樣本數：2,040；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宗教信仰
3. 教育狀況
4. 職業狀況
5. 社會階層態度
6. 階級認同與意識
7. 生活形態、健康行為與身心健康
8. 財富狀況 (包含儲蓄、投資、消費與借貸)

問卷 II 休閒生活

樣本數：2,147；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生活態度
3. ISSP 2007 休閒題組  
自由時間從事的活動  
時間與休閒的意義  
運動/遊戲活動及其主觀功能  
運動與休閒的社會學觀點  
社會與政治參與  
休閒的社會決定因素和後果
4. 運動
5. 觀光
6. 休閒之紛爭解決與安全
7. 休閒閱讀題組
8. 個性與生活感受
9. 收入狀況
10. 訪問記錄
11. 督導記錄

第五期第四次調查(2008)

問卷 I 大眾傳播

樣本數：1,980；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傳播行爲
3. 網路使用情形
4. 新聞使用情形
5. 社會影響

問卷 II 全球化與文化

樣本數：2,067；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第 2-16 項爲 EASS 2008 核心題組)

1. 基本資料
2. 本地文化活動
3. 東亞禮儀與差異
4. 欣賞的朋友特質
5. 價值觀
6. 東亞認同
7. 娛樂活動
8. 全球知識
9. 媒體使用
10. 文化交流
11. 與其他國家人的社會距離
12. 國際遷移
13. 對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態度
14. 全球化整體評估
15. 社會網絡
16. 英語流暢性
17. 全球飲食
18. 時空連結
19. 理財行爲
20. 多元文化
21. 全球媒體
22. 其他基本資料

第五期第五次調查(2009)

問卷 I 社會不平等

樣本數：2,026；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ISSP 2009 核心題組
  - 不平等地位與結構的主觀認知
  - 不平等的歸因與態度
  - 不平等相關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 社會流動機制的認知
3. 職業狀況
4. 日常生活
5. 健康生活
6. 收入狀況

問卷 II 宗教與文化

樣本數：1,927；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第 2-4, 7 項含 ISSP 2008 核心題組)

1. 基本狀況
2. 宗教信仰
3. 宗教態度
4. 個人的宗教行爲
5. 術數與法術
6. 慈善團體的行爲
7. 社會議題
8. 文化價值取向
9. 慈善觀念
10. 對各類文化的認知與評估
11. 日常生活
12. 個人及家庭狀況

附表 1-6 「變遷調查」第六期計畫主題綱要

第六期第一次調查(2010)

問卷 I 綜合問卷
樣本數：1,895；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教育狀況
3. 宗教信仰
4. 傳播行為
5. 全球化、工作成就與期望
6. 經濟態度與金錢行為
7. 宗教行為與態度
8. 人際關係與溝通
9. 休閒活動與態度
10. 教育價值與態度
11. 家庭功能
12. 道德觀念
13. 生活感受
14. 心理需求
15. 心理健康
16. 求醫行為
17. 民主價值量表
18. 政治行為與態度
19. 家庭結構
20. 就業狀況
21. 居住環境

問卷 II 環境
樣本數：2,209；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
2. ISSP 2010 核心題組
環境信念
問題優先性·經濟問題
施政優先性·環境問題優先性
科學與環境·經濟與環境
施政看法·台灣表現
替代能源·情感
人際信任·政府信任
公平性
3. 價值觀
4. 居家環境
5. 生活經驗
6. 環境態度
7. 環境行為
8. 生活品質
9. 工作與收入

第六期第二次調查(2011)

問卷 I 家庭
樣本數：預訂 2,000；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1. 基本狀況(一)
2. 家庭背景
3. 代間關係
4. 性別角色/家務分工/決策
5. 家庭價值
6. 婚姻態度與生活
7. 家庭生活評估
8. 照顧與責任
9. 家庭衝突
10. 基本狀況(二)

問卷 II 健康
樣本數：預訂 2,000；受訪年齡：18 歲或以上
(第 1-4, 6, 7 項含 EASS 2010 與 ISSP 2011 題組)
1. 居住環境
社區污染·社區的發展與便利性
2. 對醫療系統與醫生的評估
3. 資源分配
4. 健康狀況
身體與心理狀況·健康行為
就醫行為
5. 健康資訊
6. 價值與認知
信任·不健康的歸因
對於老化/健康/善終的認知
7. 個人狀況評估和基本資料
8. 工作狀況

附表 2-1 二期二次至三期五次（抽出樣本數不作任何修正）

期次/年度	問卷	抽出樣本數	訪問樣本數	期望完成份數	實際完成份數	失敗樣本數	粗訪問率	校正後訪問率(一)	校正後訪問率(二)
二期二次	I	5,160	5,160	2,500	2,488	2,672	48%	68%	55%
1991	II	2,400	2,400	1,200	1,139	1,261	47%	68%	53%
二期三次	I	6,832	6,832	2,500	2,377	4,455	35%	45%	38%
1992	II	3,669	3,669	1,500	1,408	2,261	38%	51%	42%
二期四次	I	4,998	4,998	2,002	1,946	3,052	39%	53%	43%
1993	II	4,990	4,990	2,002	1,964	3,026	39%	59%	44%
二期五次	I	4,634	4,634	2,000	1,853	2,781	40%	53%	43%
1994	II	4,634	4,634	2,000	1,862	2,772	40%	55%	43%
三期一次	I	5,480	5,480	2,184	2,093	3,387	38%	48%	41%
1995	II	5,493	5,493	2,184	2,081	3,412	38%	48%	40%
三期二次	I	5,026	5,026	1,990	1,924	3,102	38%	47%	41%
1996	II	7,535	7,535	3,000	2,831	4,704	38%	49%	40%
三期三次	I (長卷)	6,312	6,312	3,016	2,596	3,716	41%	52%	45%
1997	I (短卷)	4,182	4,182	1,984	1,717	2,465	41%	53%	45%
II	II	6,285	6,285	3,004	2,835	3,450	45%	56%	49%
三期四次	I	4,240	4,240	2,000	1,920	2,320	45%	57%	49%
1998	II	3,942	3,942	1,800	1,737	2,205	44%	56%	48%
三期五次	I	4,344	4,344	2,000	1,948	2,396	45%	53%	47%
1999	II	4,299	4,299	2,000	1,925	2,374	45%	53%	47%

註：1. 粗訪問率=實際完成份數/抽出樣本數  
 2. 校正後訪問率(一)=實際完成份數/(抽出樣本數-不住在戶籍地者及身心障礙不能溝通者)  
 不住在戶籍地者包括：受訪者因工作不住在戶籍地；受訪者寄籍在此，住戶不知其寄籍在此原因；受訪者因學籍因寄籍在此，受訪者因其他因素寄籍在此；受訪者因房屋出租給他，不住在戶籍地；受訪者因婚姻或分家，不住在戶籍地；受訪者因其他原因不住在戶籍地；外出不知去向，如失蹤等；受訪者戶籍遷出、死亡、服刑或迴籍犯；該地址為軍事單位等機構；找不到地址、空屋、房子改建、此戶中原本確實無此人。  
 3. 校正後訪問率(二)=實際完成份數/(抽出樣本數-不合格受訪者)  
 4. 不合格受訪者代碼定義為：28 服兵役，41 軍事單位、醫院、療養院、學校、訓練中心、監獄等機構，42 空屋，57 死亡，58 服刑，59 該地址查無此人，60 受訪者戶籍遷出。此定義是依據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6 的 Standard Definitions。附表 2-2 與附表 2-3 亦同。

附表 2-2 二期二次至三期五次（抽出樣本數扣除未接觸備取樣本數）

期次/年度	問卷	抽出樣本數	訪問樣本數	期望完成份數	實際完成份數	失敗樣本數	粗完訪率	校正後完訪率(一)	校正後完訪率(二)
二期二次	I	5,160	4,586	2,500	2,488	2,098	54%	81%	63%
1991	II	2,400	2,116	1,200	1,139	977	54%	82%	61%
二期三次	I	6,832	4,935	2,500	2,377	2,558	48%	71%	54%
1992	II	3,669	2,943	1,500	1,408	1,535	48%	69%	54%
二期四次	I	4,998	4,187	2,002	1,946	2,241	46%	68%	52%
1993	II	4,990	4,139	2,002	1,964	2,175	47%	80%	54%
二期五次	I	4,634	4,386	2,000	1,853	2,533	42%	57%	46%
1994	II	4,634	4,518	2,000	1,862	2,656	41%	57%	44%
三期一次	I	5,480	4,398	2,184	2,093	2,305	48%	64%	52%
1995	II	5,493	4,340	2,184	2,081	2,259	48%	65%	52%
三期二次	I	5,026	3,998	1,990	1,924	2,074	48%	63%	52%
1996	II	7,535	6,458	3,000	2,831	3,627	44%	61%	47%
三期三次	I (長卷)	6,312	5,984	3,016	2,596	3,388	43%	56%	47%
1997	I (短卷)	4,182	3,897	1,984	1,717	2,180	44%	58%	48%
	II	6,285	5,764	3,004	2,835	2,929	49%	63%	54%
三期四次	I	4,240	3,809	2,000	1,920	2,320	50%	66%	55%
1998	II	3,942	3,577	1,800	1,737	2,205	49%	63%	54%
三期五次	I	4,344	3,650	2,000	1,948	1,702	53%	65%	57%
1999	II	4,299	3,741	3,000	1,925	1,816	51%	63%	55%

註：1. 訪問樣本數 = 抽出樣本數 - 未接觸備取樣本數（該村里已達樣本目標數，不用訪問的備取樣本數）

2. 粗完訪率 = 實際完成份數 / 訪問樣本數

3. 校正後完訪率(一) = 實際完成份數 / (訪問樣本數 - 不住在戶籍地者及身心障礙不能溝通者)

4. 校正後完訪率(二) = 實際完成份數 / (訪問樣本數 - 不合格受訪者)

附表 2-3 四期一次至六期一次

期次/年度	問卷	抽出樣本數	訪問樣本數	期望完成份數	實際完成份數	失敗樣本數	粗完訪率	校正後完訪率(一)	校正後完訪率(二)
四期一次	I	3,526	3,526	2,000	1,960	1,566	56%	65%	58%
	II	3,526	3,526	2,000	1,895	1,631	54%	64%	57%
四期二次	I	3,659	3,659	2,000	1,979	1,680	54%	64%	56%
	II	3,659	3,659	2,000	2,052	1,607	56%	65%	59%
四期三次	I	3,735	3,735	2,000	1,992	1,743	53%	64%	56%
	II	3,735	3,735	2,000	1,983	1,752	53%	62%	56%
四期四次	I	4,652	4,652	2,000	2,161	2,491	46%	55%	49%
	II	4,391	4,391	2,000	2,016	2,375	46%	55%	49%
四期五次	I	4,012	4,012	2,000	1,781	2,231	44%	53%	46%
	II	3,955	3,955	2,000	1,881	2,074	48%	56%	50%
五期一次	I	4,862	4,862	2,016	2,146	2,716	44%	52%	46%
	II	4,862	4,862	2,016	2,171	2,691	45%	52%	46%
五期二次	I	5,032	5,032	2,000	2,102	2,930	42%	51%	44%
	II	5,032	5,032	2,000	1,972	3,060	39%	48%	41%
五期三次	I	4,912	4,912	2,000	2,040	2,872	42%	45%	44%
	II	4,912	4,912	2,000	2,147	2,765	44%	48%	46%
五期四次	I	4,604	4,604	2,000	1,980	2,624	43%	51%	45%
	II	4,604	4,604	2,000	2,067	2,537	45%	53%	48%
五期五次	I	4,488	4,488	2,000	2,026	2,462	45%	52%	47%
	II	4,488	4,488	2,000	1,927	2,561	43%	49%	45%
六期一次	I	4,018	4,018	2,000	1,895	2,123	47%	56%	49%
	II	4,602	4,602	2,200	2,209	2,393	48%	56%	50%

註：1. 粗完訪率=實際完成份數/抽出樣本數。

2. 校正後完訪率(一)=實際完成份數/(抽出樣本數-不住在戶籍地者及身心障礙不能溝通者)。

3. 校正後完訪率(二)=實際完成份數/(抽出樣本數-不合格受訪者)。

4. 四期二次另有問卷Ⅲ失業問題，樣本取得方式是在問卷 I、問卷 II 中設有追蹤問項，除受訪者本人失業以失業問卷進行訪問外，凡受訪者同住家人中有失業  
者，亦以問卷詢問，以擴大樣本數。為避免資料重疊性過高，除原受訪者失業時接受失業問卷訪問外，若屬同住家人則限定最多訪問不超過兩位。受訪者同住家  
人的年齡不加以限定，未滿二十歲也可接受訪問。最後問卷Ⅲ共完成 427 份，其中 246 人是從問卷 I、II 原樣本所得，181 人為樣本的同住家人。





## 作者簡介

王嵩音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碩士、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新聞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客座講師、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教授及系所主任。研究專長為新聞學、政治傳播、研究方法、弱勢社群傳播、網路傳播，主要著作為「台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曾獲第 25 屆曾虛白新聞學術獎。

杜素豪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屬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副研究員。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主修鄉村社會學。主要的專長領域是調查方法學，有興趣的領域包含性別研究、環境社會學、人文社會區位學。目前主要的研究主題為調查回應的訪員效應、問卷回答的訪員與社會距離效應、入選機率調整法(Propensity Score Adjustment)修正調查推估的偏差，以及態度量表的回答模式誤差。參與進行中的全國大型調查研究計畫有「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傳播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世界價值觀調查」、「台灣地區國民營養與健康狀況調查」。

吳乃德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兼任教授。專研領域為台灣政治發展、族群政治、民族主義、轉型正義等。曾任台灣政治學會會長、《台灣政治學刊》總編輯、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美國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社會系訪問副教授。聯絡地址：ntwu@sinica.edu.tw。

吳重禮 美國紐奧良大學政治學博士（1997 年），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研究領域為美國政治（政治制度）、都市政治

暨少數政治、比較政治，以及選舉研究。研究論文曾發表於 *Party 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Parliamentary Affairs*、*Journal of Black Studies*、*Asian Survey*、*Issues & Studies*、《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歐美研究》、《選舉研究》、《問題與研究》、《台灣政治學刊》、《政治科學論叢》、《中國大陸研究》、《臺灣民主季刊》等學術期刊。曾獲得 2009 年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2005 年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傑出研究獎、2003 年國立中正大學傑出研究獎，以及 2002 年國立中正大學新進學者獎。

林亞鋒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現就讀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班。主要研究興趣在社會資本、網絡分析及家庭社會學。研究範圍包括市民社團參與的變遷及效果、社團網絡的結構，以及生育率的探討。

洪永泰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亞洲研究所碩士，密西根大學統計學碩士、生物統計學博士。曾任東海大學統計學系副教授兼主任，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員、兼主任。研究領域包括抽樣調查、投票行為與選舉預測、統計指標、社會科學統計方法。著有《統計與生活》、《戶中選樣之研究》，以及期刊、專書論文數十篇，編有《2001 年台灣政治紀實》、《2004 年台灣政治紀實》等。

陳樹靜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業。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屬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研究助理，曾任「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四期二次至四期五次、五期五次）」以及「依據次樣本加權的成效評估與無反應項目、隱藏因素之插補分析」、「電話訪問的最初互動與調查合作」、「台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料庫建置之規

劃」等計畫研究助理。

陳憶寧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告學系教授，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博士。研究領域包括政治傳播、科學傳播及行動傳播，探討媒體使用對於民衆認知與態度的效果。發表的論文刊登在幾本重要的傳播學期刊，包括《新聞學研究》、《中華傳播學刊》、《傳播與社會學刊》、《台灣民主季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Public Relations Review* 等，並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發行的傳播與社會學刊公共衛生與媒體以及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的客座主編。過去五年擔任兩個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的主持人，分別為國科會科教處三年期的「促進公眾對於科技的理解及參與：從訊息產製到閱聽眾接收」，以及人文處的「候選人、媒體與總統大選」。

張茂桂 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曾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教授、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2009-2010)。研究領域為政治社會學，興趣包括社會衝突、社會運動、族群關係、民族與國族主義、多元文化、台灣外省人、公民社會等相關課題。

張峰彬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興趣是從比較的觀點研究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方面的議題。除了從事東亞跨國比較的實證研究之外，目前也關注台灣的教育和勞力市場連結議題。

黃秀端 美國 Emory University 政治學博士，現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任、人權學程主任。主要專長領域為國會政治、投票行為、政治文化、公民與政治權利。

熊瑞梅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在組織社會學、社會網絡、社會資本與勞力市場等議題。近年來從事台灣半導體產業技術與專利創新網絡和財務投資策略網絡的研究。在社會網絡分析的研究上，關懷動態變遷的大型網絡的分析，特別是小世界網絡現象。

羅文輝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及傳播學院院長。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獲得美國奧立岡大學碩士學位及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學位，並曾在英國李斯特大學及美國史坦福大學擔任訪問學人。主要研究興趣為新聞分析、政治傳播及傳播效果。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為，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 4 / 張茂桂, 羅文輝, 徐火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中研院社研所, 民 102.07 面；公分.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專書；第 7 號之 4)  
ISBN 978-986-03-7253-3 (精裝) .--  
ISBN 978-986-03-7252-6 (平裝)

1. 社會變遷 2. 文集 3. 臺灣

541.407

102011952

專書第七號之 4

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為，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 4

主 編 張茂桂 羅文輝 徐火炎

編 輯 謝麗玲 陳秋玲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排版印刷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7 號 2 樓

初 版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七月

定 價 精裝 350 元 · 平裝 300 元

GPN 1010201231 ISBN 978-986-03-7253-3 (精裝)

GPN 1010201232 ISBN 978-986-03-7252-6 (平裝)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1985-2005: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r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I, Vol. Four

**Edited by** | Mau-kuei Chang  
| Ven-Hwei Lo  
| Huo-yan Shy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2013





3041763

中華民國壹零貳年拾月廿壹日 總存

---

本書收錄九篇研究論文，呈現1990年中期至2000年中期重要且相互關聯的台灣社會變遷議題。論文分為(1)媒介生態、資訊與政治，(2)政黨支持與認同，(3)政治兩極化與公民社會等三大主題、八篇論文，以及一篇關於當面訪問的研究法論文。主題內容涉及民眾使用媒介的動機與行為變遷(王嵩音)，新聞媒體、政治知識與參與的關係(陳憶寧)，報紙與電視的可信度變遷(羅文輝)，族群與國家認同趨勢(吳乃德)，政黨認同變遷(吳重禮)，民眾政治「兩極化」現象(張茂桂、陳俐靜)，政治容忍度變遷(黃秀端)，民主化與民眾的社團參與變遷(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以及面訪時訪員與受訪者間的社會距離效應(杜素豪、洪永泰)。

---

ISBN: 978-986-0372533



9 789860 372533